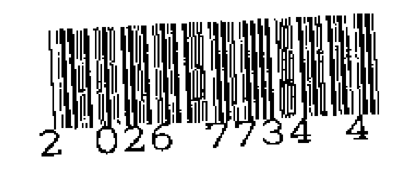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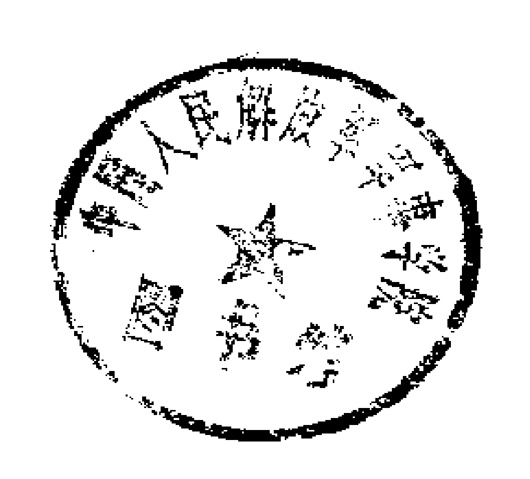


俄 国 人

（下　　册）

〔美〕赫德里克·史密斯著

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Hedrick Smith

THE RUSSIANS

Quadrangle/The New York Times Book Co., New York, 1976

根据纽约夸德伦格尔图书公司/纽约时报图书公司1976年版译出

俄国人

（下 册）

〔美〕赫德里克·史密斯著

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6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4.25 字数 239,000

1978年10月第1版 197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 册

书号：3188·9 定价：1.10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下　册）

十一 共 产 党

共产党的仪式和共产党的笑话

党是我们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

列 宁

在我们附近那所小学校里，孩子们每天早晨上学时，一进门厅就看到一幅金色的列宁画像。工厂里，院校里，公寓大厦里，都有自己的“红角”，那往往是一些死气沉沉的小房间，在列宁像周围布置了一些标语、图表和照片。这一切使人联想到俄国人旧的传统习惯，把耶稣、圣母和教会圣徒的像挂在屋子角落里，向它们祈祷[1]—— 这或者是因为共产党了解俄国人是天性虔信宗教的民族，所以决定利用这一特性为党服务，或者只是因为俄国人一经从一个宗教改信了另一个宗教后，就本能地把他们新的圣像安放在那个角落里。

① 按旧俄习惯，尤其是在农村中，“上首角落”又称“红角”或“神圣的角落”，指房门斜对面左首的角落，那里供有神像，靠这角落的座位代表上座。——译者

在离红场不远的莫斯科列宁博物馆里，党的学术研究者和宣传工作者搜集了一万多件列宁的纪念品，把它们陈列在三十四间大厅里，摆满了那幢巍峨宏伟的老式三层楼建筑。我曾经看到中小学和大学的学生被成群结队领到那里去，与其说是去游览，毋宁说是集体去受教育。博物馆内陈列了许多有趣的展品：有列宁的革命地下刊物《火星报》的第一期；有把《火星报》偷运进沙皇俄国时用的夹底衣箱、空心儿童积木和衣服的里衬；有列宁乘坐的罗尔斯—罗伊斯牌黑色敞篷汽车；有列宁的红色假发和其他化装用品；有他用过的银柄手杖。但是讲解员叫参观者注意的并不是这些展品。他们只顾宣读列宁著作中的重要选段、他的信件、他的报纸、他对下级作的指示、他对行动发出的号召。满都是革命的陈词滥调——"阶级斗争"呀，"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呀，"新型的党"呀，"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呀，等等。我看到几批睡意蒙眬的小家伙就这样不停地听了两小时的讲解，都一声不吭地发愣，然后一溜烟都走了，原来在他们只参观了十七个陈列室时，向导员突然停止继续参观，把他们解散了。

实际上，苏联的每个城镇里都有类似列宁博物馆的某种东西。有一次，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在住着类似爱斯基摩人的雅库特人的地方，我参观了一所农村小学，学校里的一位老师很得意地引我去看"列宁室"。她

最欣赏的陈列品，是那幅由几个小朋友画的据说是列宁诞生的小屋。在塔吉克，那些巨大的努列克水坝的建设者用第一次发出的电，照亮了山顶上那条"列宁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标语。列宁格勒的一些横幅上写的是："列宁过去活着。列宁现在活着。列宁永远活着。"这种到处都可以看到的标语，有的从屋顶上挂下来，有的漆在沿路的标语牌上，好象是美国南方"耶稣拯救世人"的广告牌。

11月6日，举行一年一度的游行庆祝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前夕，崇拜列宁的狂热达到了高潮。那天晚上，六千名苏联著名人物聚集在克里姆林宫会议大厅里举行庆祝典礼：由政治局的一位领导人作电视讲话，并且有全国第一流的演员演出丰富多彩的节目，包括大剧院演出的芭蕾舞片段，歌剧独唱，用男中音演唱爱国歌曲，以及穿着民族服装跳轻快活泼的民间舞蹈。在电视讲话已经结束但文娱演出尚未开始时，重新放映用爱森斯坦[①]手法导演的有关神圣的十月革命的电影，宽银幕上一再出现列宁的镜头，衬托着进攻罗曼诺夫王朝的冬宫的场面。列宁动作急遽，好象是加快放映的无声电影里的人物，他不停地指挥群众，鼓动他们的热情，点燃十月革命的火焰。"波将金号"战舰大炮

① 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爱森斯坦(1898—1948)：苏联电影导演和制片者。——译者

震响[①]。红军袭击冬宫。布尔什维克胜利了。

银幕上从1917年转到了1930年。那些身穿工作服的合唱队高唱革命的劳动歌曲，而建设工程队、电焊工以及大队的吊车、货车和水坝建设者的镜头又反映了热火朝天的工业化时期。接下去就是1941年。银幕上出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照片。堆积得很整齐的燃烧瓶。将步枪分发给新兵的情景。部队和坦克在雪地里游行，通过红场，直接奔赴前线，去阻挡纳粹威胁莫斯科的巨大攻势。孩子们在掘保卫莫斯科的战壕。穿着白色衣服的雪地作战部队仓猝投入战斗。这时候，另一组合唱队，头戴钢盔，高唱红军歌曲。焰火在空中光芒四射。纪念胜利的游行队伍开始。

庆祝达到高潮时，一个胸部异常宽阔的男低音歌手，在一大队合唱者的配合下，高唱"前进，共产党员！"先是他独唱，接着就是全体合唱，一共唱了十几遍："前进，共产党员！"水银灯移向前面，宽阔的舞台上排列满了大约两千名合唱队员——男演员穿着黑色衣服，身体健壮，声音宏亮，精力充沛；女演员穿着白色百褶长裙，宛如林立的哥林多式圆柱；孩子们穿着白衬衫，戴着少先队员的红领巾。那确实是一支规模巨大的合唱队。和它相比，摩门教教堂合唱队简直象是一

① 作者此处有误，当时炮轰冬宫的是"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译者

个八重唱演出小组一样了。当这队歌唱大军响起嘹亮的歌声时，聚光灯集中照亮了一尊已移到舞台中心的雄伟庄严的白色列宁塑像。合唱队象那永不平息的波涛声般放声高歌。列宁闪耀着光芒，一只手插在口袋里，另一只手托着一本打开了的书——一个活生生的人，被赋予生命而再生了。洁白的列宁像，突出了复活的意义。这片刻实在具有宗教色彩，其目的是要使人敬畏，令人鼓舞，要那些已经冷了心肠、看破一切、对许多事都满不在乎的人恢复他们的信心。当然，这是共产党的仪式，但这是适合于俄国人的性格的，因为俄国人喜欢那种夸张的舞台艺术。导演技巧是极有效果的。

为列宁进行过分的宣传，这是当局为了补救人们政治热情的日益衰退而采取的措施。因为，共产党虽然表面上团结一致，但是内部却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以及由于失去信仰而出现的腐败现象。当然，党性强的人是有的，但朋友们告诉我的情况也是事实：他们认识一些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里——而且就在这机构的核心组织里——的官员，这些人私下嘲笑他们的大头头，而且把这个制度看穿了。我自己也认识一些共产党员，他们的亲密朋友中也有象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和安德烈·萨哈罗夫那样持不同政见的人。我

还会见过其他一些人，这些人都一本正经地为孩子施洗礼，在家里举行宗教式的婚礼和吊唁，或者，在公开场合说忠于党，但背地里却相互传说一些挖苦党的笑话。斯大林的亲生女儿斯维特拉娜·阿里露耶娃身为共产党员，但是她竟然相信了宗教，并且和一些持不同政见的作家交朋友。她的变节使西方人士感到震惊，其原因之一是典型的、真正的共产主义信徒的那种刻板形象，使得怀疑论者、玩世不恭的人以及根本没有信仰的人，不可能在党内存在。

我们自己的政治环境可不能用来解释苏联的情况，在西方公开的政治舞台上，人们入党都是出于信念。然而，在莫斯科，一位体面的年轻人却会坦率地说，他要入党，这样就可以"有前途"或者"出国去，而如果没有一张党证，我就根本没有这个机会。"也有人把入党看作是和家庭传统及社会关系有关的事。中年人回想起他们在战争年代中入党时的爱国热情。此外，部队、工厂或机关里有一些人，在吸收新党员有定额的情况下，实际上是象参加俱乐部那样被邀请进了党的。"现在人们入党几乎讲不出任何理由，"一个中年党员说，"就好象西方人做礼拜一样——不过是一种习惯，而不是出于信仰。"对于那些有野心的人来说，入党是获得权力、地位和特权的必由之路。信念是次要的。

然而，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要在这方面透过党员或干部那层政治上的脂粉，确知谁是真的相信，谁又是假的相信，即象一个俄国人所说的“红萝卜党员”（外表是红的，心子是白的），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多数共产党员都用符合党的路线的教条式词句接待外宾，以致要和这些党员进行正常的对话就不可能。也许，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因为，要当着译员、向导或其他官员的面同外宾谈真心话，那可太危险啦。我记得，在一次我所采访的会议上，有一个人反复鼓吹一条特别强硬的路线，使我听得很不耐烦；后来得悉这个人曾经私下去找另一个美国人，企图逃往外国，真使我大吃一惊。原来他那种唱高调的政治态度仅仅是一种烟幕。莫斯科人流传一则笑话，描述外国人在设法了解俄国人到底在想什么时碰壁的情况。笑话是这样的：一位访问莫斯科的美国科学家，要一个俄国同行谈谈他对越南的看法。俄国人回答时一字不差地引了《真理报》上的话。美国人问到中东问题，俄国人重复了《消息报》上的一篇评论。再问到其他问题，美国人得到了同样的结果。最后，他愤愤地说：“《真理报》、《消息报》和其他报纸的观点我都知道。可是，你自己又是怎么想的呢？”

“我不知道呀，”俄国人无可奈何地回答。“我觉得我的想法是矛盾的。”

但是有一些我后来熟悉了的俄国人告诉我，他们和另一些人如何表示崇拜列宁，然后又如何想办法利用这一点得到好处。一个曾经出过国的语言学家向我谈到"沿着列宁道路"(这是党最爱用的一条口号)的游览，那就是由国家专营的旅行社组织苏联人到列宁住过或进行过活动的地方去参观访问。他说，尽管这些旅行带有浓厚的宣传色彩，但仍然很受欢迎，因为人们巴不得有一个机会去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芬兰，偶尔还可以去瑞典、瑞士、法国、英国或比利时——这些国家都是列宁去过的，但对大多数普通的苏联人来说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有一个来自莫斯科以外的外省城市的很和蔼的青年工人告诉我：在离莫斯科不远的城镇里的工厂小组或其他组织，往往包了车子去参观莫斯科列宁博物馆，但是，到了莫斯科后，他们却对自己的政治向导员说，他们对博物馆不感兴趣，要上街去买东西。他说，这些人往往是约好在下午很晚的时候集合，匆匆地去博物馆来一次象征性的参观，摆摆样子，但是也有些工厂小组根本就不去那里。我那位年轻朋友还说："这样做法是皆大欢喜。向导员白领了报酬，几乎什么事也没有做；参观的人可以在莫斯科买东西，而这却是非常重要的；博物馆和工厂里的党领导则可以记录在案：工人们在向列宁学习。"

表面上作出崇拜列宁的姿态，是一些自由主义知

识分子为了争取放宽对艺术或文学的限制而很爱采用的一种手法。艺术家有时候用列宁作主题，从而获准用现代派技巧进行实验。大提琴演奏家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因为曾为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辩护，已经有几个月不能举行独奏音乐会，一天晚上他突然在莫斯科音乐院出现，演奏阿拉姆·哈恰图良创作的匈牙利组曲。第一个节目是管弦乐队演奏的列宁颂歌，这就为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出场铺平了道路。一个音乐爱好者说："有些为了党，有些就可以为了咱们自己。"

许多年来，新闻记者、学者和作家发现，如果在他们写的文章里，特别是在开头和结尾的地方，突出地引用一些列宁语录，有时候就可以使本来会成问题的材料在审查时获得通过。例如，一位西方学者谈到，他曾看见一个苏联对外事务专家写的一本关于非洲的书，他认为这本书写得很好，唯一不足之处是列宁语录常常引用得与内容不相衔接。当我的朋友向作者谈到这一点时，那个俄国人坦率地说："你瞧，我碰上了这样一位编辑，那些段落是他加进去的。"有一位事业十分顺利的自由投稿记者对我说，他也花了很多时间去钻研列宁著作，为的是要使那些措辞微妙的文章更有根据，使文章更合读者的口味。

苏联大学生在接受正规教育时，免不了要被大量

地灌输党史、教条和列宁著作。但是发生了爱好，真正要精通这方面的基本原理的学生却寥寥无几。有一些知识分子甚至认为，对列宁的犹太教法典式的公式太熟悉了是危险的。一天晚上，我听到一个科学家告诫他那已到上大学年龄的儿子，叫他不要太认真地援引列宁的语录，否则就会从党的官员那儿招来麻烦，因为那些人对列宁著作知道得很少，会担心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引用列宁语录来反对他们而感到不安。父亲警告说："你会因为把列宁著作学得太好了，结果反而对你自己不利。"但这是一般少有的例子。多数大学生都埋怨党的政治课枯燥无味，并且公然夸口说，他们考试完了以后就很快地忘掉了列宁主义教义的问答题。

然而，他们这种普遍的冷漠态度几乎从来不曾以公开抗议或者甚至是随便开玩笑的形式表达出来。我还从来没有看见或听到，在全国各地千百万幅列宁画像中有任何一张被破坏或被无理地乱涂一气，或者甚至给多添上了一些小胡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列宁是不可侵犯的。只有一次，我看见有人公开嘲笑对列宁的崇拜。当时我自己也已经适应了苏联的政治环境，所以立刻为那些跟这件事有牵连的人感到害怕起来。

那是三对青年夫妇，他们在五月的一个半夜里同

一群外国旅游者和其他苏联人一起到列宁墓去观看卫兵交接班的仪式。年轻的苏联克格勃卫兵，一丝不苟地举行例行交接班仪式：接班的卫兵踏着缓慢的正步，从克里姆林宫出来，走到红场上，他们不拿枪的手大幅度有节奏地弧形摆动，向前平伸出的手在枪托部分直握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然后，走到了陵墓，经过了一系列轻快利落的动作，新来的卫兵顺利地接替了原来的卫兵。当原来的卫兵正以同样的慢正步离开时，那三对青年夫妇讥讽地喊道："好样的！好样的！"如果是在举行体育比赛时，这意思等于说："干得好呀，小伙子。"但是，在上述情况下，他们那样呵呵地笑着，明明露出了讥讽的神情（我离开他们很近，可以听到和看见一切），那就很象是在说，"他妈的，好得很啦！"这无异于在最神圣的地方说亵渎的话。我以为他们会被警官押走的，可是显然他们的喊声被人群走散时的喧闹声掩没了。

俄国人一般属于不关心政治的民族。他们对党那样死乞白赖地宣传列宁和"社会主义史无前例的成就"采取的主要对抗办法，就是表示漠不关心。除了对于极小部分人以外，国家的政治远不是大家关心的事情。吃饭的时候，普通一般人闲聊的是工作，或怎样谋到一份可以去旅行的美差，或谁得到了最高奖金，或关

于同事间的嫉恨嫌隙和单位里的歪风邪气。他们围着饭桌争论哪项运动比赛精彩或什么地方采蘑菇最好，谈谈家里的事情，埋怨物价高涨或供应紧张，计算卢布券的黑市兑换率，商量去哪儿钓鱼最好，而如果酒逢知己，在酒酣耳热之际，就玄之又玄地大谈其灵魂如何受苦受难，同时引一些普希金或莱蒙托夫的诗句。我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只听到大家经常议论犹太人外迁的问题，此外，一般俄国人都说，他们在家里通常是不大谈政治的。过量的宣传工作已经使他们厌烦了。

我认识一位历史学家，1974年6月14日他正好在疗养胜地基斯洛沃茨克参观访问，那天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发表一篇重要和关键性的苏维埃选举演说。“成千上万的人都在公园里散步，”这位历史学家回忆说。“天气很好。温暖愉快。公园里到处装着高音喇叭，正在转播勃列日涅夫的讲话。我观察那些人，过了两个小时也没有看见一个人停下来听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在斯大林统治下，所有的人都听的，他们唯恐听不到。在赫鲁晓夫统治下，人们会偶尔听听，因为他有时候会说一些有趣的话。可是现在，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下，大家就是漠不关心，普遍地漠不关心。”

这种态度在其他情况下也明显地反映出来。书店里都设有汗牛充栋的宣传品书柜，专售共产主义经典著作——包括列宁著作，以及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总理

或党的主要意识形态专家米哈伊尔·苏斯洛夫等的言论集。可是那里并不是顾客们光临的地方。我注意到，他们总是聚集在书店的另一头，全神贯注地看技术书籍、文学作品或者是那些搜集得有古老俄国教堂的照片集。1974年年中，莫斯科市中心区一家很大的“旋律”唱片商店廉价出售勃列日涅夫论青年的两张一套的密纹唱片，售价是五十戈比（合美元六角七分）。可是我走到店里时，看到那些青年人根本不注意这些唱片，却争先恐后地去购买由匈牙利乐队演唱的《塞西莉亚》和《鲁宾逊夫人》单张唱片。

与其说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是针对着勃列日涅夫个人的，毋宁说它是针对着整个宣传系统的。人们都不去注意这些宣传。我和其他许多外国人一样，也立即注意到了那些巨幅政治标语，它们有的从屋顶上悬挂下来，有的是张在桥上或旅馆的阳台上，有的则设在市中心区的广场上，由灿烂的灯光照射着：“列宁是我们的旗帜”，“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共产主义必胜”，“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光荣归于建设共产主义的苏联人民”，或者就是“劳动光荣！”新来的人会被这种气势压倒，然而俄国人却不去理会这一切。在苏联外交部组织的一次旅游中，我们几个西方记者对我们访问的城市中那些五花八门的标语扮鬼脸儿。后来，另一个记者的俄国译员悄悄走近我跟前，低声告

诉我说:“我听见您在议论那些标语。但是,您要知道,我们俄国人根本就没有把它们看在眼里。它们好象是一些树木,是自然景色的一部分。我们完全不去注意它们。”

宣传系统对于这种消极反抗却毫无办法。然而,它所希望的也无非是要大家都参加共产党社会的各种政治仪式,很象俄国东正教教会从前要求教徒恪守教规一样。如果说过去教会在传统上是重视仪式有甚于重视教义,那么今天共产党则是强调形式有甚于强调信仰。“意识形态可以在两者之间起一种作用——或者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莫斯科一位戴眼镜的科学家说。“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他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是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理论。它不是活的理论。”

每逢11月7日和5月1日,共产党使红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室外电视拍摄场,以便转播火箭和坦克以及成千上万衣服鲜艳的运动员分列前进的情景,那些运动员表演着各种运动姿势,在经过聚集在列宁墓上的共产党领导人前面时停下来高呼:“光荣归于苏联共产党!光荣!光荣!光荣!”(有一个人告诉我,如果不把声音喊得象游行指挥所要求那样响亮,那可需要有点儿胆量才行。)列宁和现在的一些领导人的画像(这

些领导人看来都比本人年轻十岁到十五岁），都被高高举着通过红场，那情景很象前几个世纪里圣徒的画像被宗教游行队伍高举着通过红场一样。游行队伍行进时，呈现出的是克伦威尔那种严肃而又浮夸的精神，以致连俄国人也承认对这一切感到厌烦了。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只是因为被工厂里或公寓里党或工会的积极分子死拉活扯才去参加游行的。有些人动脑筋骗取病假条。“我母亲说，在战前和战争年代里，参加红场游行是一种荣誉，”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年轻的政府工作人员说。“可是现在呢，这件事完全是他们加在大伙身上的一种负担。”

游行只不过是共产党为了动员人民而组织群众集体参加活动的一种办法——尽管人们表示冷漠并私下里取笑共产主义。而这类办法还是行之有效的。每年秋天，学生、机关干部和工厂工人，成千上万乘了卡车去帮助农民进行收割，往往也获得一点低微的报酬。春天里，大家“捐献”一个不领工资的星期六（星期六义务劳动），去从事一次理论上被宣传为群众自愿参加的春季大扫除。事实上，正如一个俄国朋友所说的，大多数的工厂、商店和其他机关只是从它们的劳动力中获得一天的义务劳动。可不是吗，我就注意到1974年5月的《真理报》兴高采烈地报道说：在春季星期六义务劳动中，有一亿三千八百万人提供了总值将近九亿

卢布（合十二亿美元）的商品和劳务，这就不打自招地说明，保持列宁首创的这种传统的主要出发点，就是为了获取不花代价的产品。人们经常被投入各种义务的“社会工作”——包括：向正在工作的同事们进行宣传，“志愿地”协助民警值勤，充当无报酬的为政治活动服务的纠察，负责向同事们推销党报和党刊（其中有许多人完全是由上级命令订阅的，还有一些人则是为了要买到自己真正要看的幽默杂志、医学卫生杂志或通俗科学杂志，才不得不先去买《真理报》以及那些更沉闷乏味的、不需要看的党的宣传刊物）。有时候，人们告诉我，对那些最热心的“志愿者”也还是有报酬的：送几张戏票，或者是发一张去某地休假的疗养证，而这些通常是很难弄到手的。党需要无数的“志愿者”，因为它要进行许多群众性的政治活动，而单是莫斯科一个地方，据某一份地方报纸报道，作报告的专业宣传员就有十万名。

一个黑头发、矮个子的亚美尼亚女教师对我说，她学校里的党组织负责人要她参加例行的轮流报告会，做一篇有关列宁的报告，她十分害怕。“我可作不来，”她先是这样惊慌失措地说。可是，又过了几个月，当我再一次碰到她时，她正好轮到作报告，这时她已经不再担心她的发言是否内容充实或使人有兴趣了；而正象她所说的，她“跟其他人一样”，只是鹦鹉学舌似地说着

人家期待她讲的话，也不管翻来复去地讲得多么枯燥无味。一个前芭蕾舞女演员告诉我，在纪念大剧院芭蕾舞学校成立二百周年庆祝会上，发表八篇颂扬党如何悉心爱护俄国芭蕾舞的讲话是必不可少的。工厂里的工人，每周也有两次在早上或饭后休息时间里开十五分钟的政治学习会，大家在会上轮流发言。我听见一个机床工人说，他工厂里的工人常常只是读一些报纸上的宣传文章。一个前军工工厂的工长向我形容道，他实际上是"揪着工人的领子把他们拽了去"参加那每月召开一次、堆砌着政治词藻的工会会议的。"谁也不愿意去听那些报告，"他说。"如果不是在工作时间开这些会，那是谁也不会参加的。在我们工厂里，我们可以把工人留在厂里，因为他们要离开工厂时，必须向厂门口的警卫出示他们的工时记录卡。每逢要开会的时候，我们只要扣下那些工时记录卡就行啦，所以他们只好来参加会议。我知道有一个建筑工地，那里的人是在发工资的一天开会的。所有的工人都去参加会议，因为领导人要等到会议结束后才把工资发给工人。"

为了维持民主的神话和人民参政的假象，再没有其他的仪式比四年一度的最高苏维埃选举更重要的了。我和其他许多西方人一样，早已把这些选举看得无足轻重，认为它们只是一些空洞的仪式（一份候选人名单，百分之九十九的选票，等等），而要不是后来那个

工作顶真的年轻大学毕业生维塔利把他的经验说给我听，我是再也不会想象到苏联的选举工作人员那种卖力和辛苦的情形的。听他那样说法，觉得他非常象是一个纽约选区的工作人员在谈话。维塔利本人负责统计选票——实际上总是百分之百的选票，就象谈到某些产量指标一样——而由于要符合这个要求，他说，一些数字都是虚假的。

维塔利并不是出于自愿，而是由他学校的党组织点名，叫他负责莫斯科一个市中心区一百五十名选民的选举工作的，这些选民多数是退休职工和知识分子。他需要访问他们好几次。首先，他要把投票日期和地点挨户通知他们，让他们知道选举前将在邻近的红角参加的活动。他说，这样做丝毫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所以他再要进行第二次访问，向他们做一点说服工作。最后，在选举前一个星期，他去为他们登记。其中有一项工作是把缺席选举人票发给那些即将离开本地的人，让他们能够于选举日在国内任何地方参加投票。对选民来说，个别的选区和候选人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例如，一个象莫斯科“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那样的党内官员作候选人，可以由远离莫斯科一千五百英里的巴库附近一个山村里的选民投他的票，可是那里谁也不认识他，当地的干部甚至无法告诉正在那里旅行的西方记者，阿尔巴托夫是

否曾经去过他们那儿。但是，维塔利说，如果那些选民是在莫斯科投票的话，那末，他在选举前就要一直紧紧钉住他们。

"怎样钉住他们呢？"我问。"是打电话给他们吗？"

"哦，不是的，"他回答说。"打电话是靠不住的。我不打电话。我是一家一家地去访问他们。到了那时候，可不是一个思想动员的问题。也许他们会对我说，要他们去投票的话，那除非是区党委能让他们住进一所新房子，因为他们已经等了好几年啦。或者，也许他们会发牢骚说，红角（即当地党的宣传室）里的文娱活动太差劲了。有的埋怨这样，有的埋怨那样。于是我就央求他们说，'请来投票吧。看在我的面上吧，让我好交差吧，因为我一定要等到你们来投票呀。'我们当监票员的人，在所有的人还不曾都来投票，或者还没有到选举日的午夜时，是不准离开的。所以，你当然要你的选民赶早去投票啰。尽管这样，有些人还是不来，你还是不得不为他们编造一个借口。通常的借口是：'突因公事，奉召他往。'在一百个人当中，会有五个或者十个是不来的。情形随不同的选区而异。但是，要百分之百的选民都参加是不可能的事。毕竟有一些人是生病了，或者是外出了，甚至是死亡了。据我知道，选举工作人员有时候把死人也列为投票人。而这还是在全国的政治思想中心莫斯科，那里思想工

作抓得最紧，那里的人都是好说话的。所以，农村中的情形肯定糟得多。然而，谁也没有如实地报道过。我曾经见过这种情形：如果一个选民领到了选票（那上面只有一名被批准的候选人），而不把它投入票箱（票箱设在外面大家都能看到的地方），那么工作人员就会拦住他，要他去和监票员谈话。他们会要求他说明不投票的理由。所以，实际上谁也不会很公开地向这种选举制度挑战。如果他们真的对此表示十分冷漠的话，那么他们就索性避开了。”

我们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几乎毫无例外地说，尽管他们私下里不相信或者心里有别的想法，但他们还是按部就班地去参加选举投票和其他政治活动。列宁格勒一个身体较胖、年龄将近四十的中学女教师说：“你必须去参加那些政治会议，但是谁也不去听它们。那些都是我们上大学时必修的老一套东西。有时候也作一次国际形势报告——谈的是有关中国和越南问题。有的人结毛线衣服。我看书或者给考卷批分数。我们的校长作报告时，总是想把话说得有趣一些。他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党员，但他是一个好人。可是大伙儿都感到厌烦，谁也不相信那些话。”

“那么作报告的人呢？”安问她。

“连他也不相信自己所说的那一套。老一辈的人

真的相信列宁，并且认为这样就可以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可是我这一代的人压根儿不相信这一套。我们都知道这是假话。因为我们没有宗教，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列宁。我们不能改变这个制度。我们总得生活下去。我有我的家庭和我的孩子。……"说到这里，她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膀，表示她由于经济原因不能冒险去公开抗议。

乔治·奥韦尔① 当初把富有表达力的"两面派想法"一词引进了我们的政治词汇，此后它被人们使用过分，以致现在已经成为失去了人性的内容和意义的陈词滥调。如果人们在我首途去莫斯科时问我的看法，我肯定会说，奥韦尔的"两面派想法"自有它的真实性，但同样也有它的虚构夸大性，即使设想得最坏吧，那也不过是在斯大林主义极盛的恐怖时期的一种畸形现象，因为当时人们为了要保全自己的性命，是无论什么违心的话都说得出来的。在较近和不太残暴的时代里，我想象这个词可能已经是稍许过时的了。因此，使我倍增伤感的是有一帮知识分子，他们由于经常有两面派的想法，并且在很多方面有这种想法，因而私下里感到极其痛苦。据一位三十几岁的鬈发的建筑师说，他以前是一个真心诚意地相信青年人积极性的人，只

① 乔治·奥韦尔(埃里克·布莱尔的笔名，1903—1950)：英国反动作家，著有讽刺小说《饲养场》与《一九八四年》等。——译者

是到了后来他观察到党内那些官员的厚颜无耻态度，幻想才破灭了。他告诉我，他对于自己那样很容易地一下子就从私下里诚实转变为公开场合虚伪，感到多么难受。

“有人会在小组会上滔滔不绝地发言，而谈的是老一套废话，这时候你心里就会想：‘他为什么要这样谈呢？难道他是傻子吗？可他是更懂事的嘛。’然而，当他们在另一次这样的会上叫你站起来发言时，你会发现自己也是说同样的话，也是照报纸上那一套去谈。我们早已被教会应当这样在会上发言，所以，到了公开场合，我们一开口就是这样交谈。”

再说，一个人无论怎样对于参加强制性的会议感到厌烦，他仍旧不容易逃避那些政治会议。一位女数学家对我说，她那研究所里每星期三下午开一次政治学习会；如果你一次不参加，你就会受到领导的谴责，而这是一件严重的事情。“有时候我们请外面的人来作报告，也有时候是我们自己人作报告，”她告诉我。“比如说：我必须作一次有关计算机和如何解答问题的报告。感谢上帝，谈的并不是一个政治题目。但是，当然啰，我必须谈社会主义社会的计算机。在我们研究所里，计算机工作的情形非常糟。我必须在这方面撒谎，但是，叫我有什么办法呢？”

还有一件事使我感到吃惊的是，一些有后台的权

势集团作家、记者或科学家，不但对自己必须和大家一起表示思想一致，感到愤慨，而且愿意把自己的怨言倾吐给一个西方记者听。我想起，有一个高级编辑向我解释道："要向一个从来没有参加过党的会议的人描写那种会议，是十分困难的。直到会议开始的前五分钟，大家还在外面大厅里，有的互相开玩笑，有的议论别人，有的谈到阿拉伯人打得太糟糕，浪费了我们全部的军事援助。然后，会议开始了。他们都把烟卷弄灭了。而就是上述那些人，这会儿却举起手来，站起身来，谴责以色列，赞扬阿拉伯人的胜利。或者，有的人谈到'五年计划第三个决定性的年头'，于是其他的人就一本正经地听着，或者是重复同样的口号，尽管知道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当然，这是一种游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我认识一些城市知识分子，他们为了发泄对这种强制性的统一思想的做法所怀的不满情绪，就在私下里滑稽地模仿那些政治会议上的讲话，或者是嘲笑地搬演克里姆林宫在盛大节日举行的那些过分注重宣传的庆祝仪式。还有一些人，完全不相信一切宣传，以致对美国人的天真想法表示怀疑。我记得，有一次一个曾经于 1973 年 12 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爱好和平力量大会苏联代表团里工作的俄国人对我说，他对美国代表所抱的那种真挚的理想主义感到惊奇。

“美国代表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他说。“他们真的相信，他们是能够在实现和平与影响政治领导人方面有一些作为的。而我们则把一切都看穿啦——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什么状况都不会改变。我并不是说美国人喜欢会上的一切发言，因为他们也批评了政治宣传。他们希望有一些更切合实际的东西。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他们认为自己是确实能够影响政治的。难道所有的美国人都是这样的吗？”

我听到一个党员家庭出身的苏联权势集团的成员这样坦率地承认自己幻想破灭时，这就使我更加急于想要知道苏联人究竟信仰的是什么。他们那些反对现政权的政治笑话足以证明是思想上的消极背叛呢？或仅仅是以一种无害的方式发泄怨气呢？这些私下里的冷嘲热讽是表示对制度基本上不相信呢？或是更有限地说明对苏联公众生活中那种虚伪做作的失望，但并没有损及对社会制度最低限度的信仰？权势集团内的知识分子，是不是属于不同于党员的类型，比如说，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因此他们的怀疑态度所反映的只是一个狭隘圈子里的而不是一个更广泛范围内的见解呢？或者，是不是在思想与忠诚的混合体中，既包含有信仰又包含有怀疑呢？

然而，那个俄国译员曾经对我说，俄国人不去理会

建筑物上面贴的那些空洞的党的标语，同时又很坚定地对我说："尽管我们知道，我们的理想现在还没有实现，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理想，人民为了共同利益而奋斗的理想，要比你们那种唯利是图的动机好得多。"那个历史学家曾经提到在基斯洛沃茨克的公园里度假的人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漠不关心，但他告诫我说："可别误认为这是对勃列日涅夫感到极大不满的一种表现。人们并没有十分埋怨他。"那个工厂工长曾经谈到必须叉着工人的脖子去参加那些灌输政治思想的会议，并且重述了一些工厂里流传的反党笑话，可是他又说："工人们可以随意发表意见或者提出批评——但是他们只是对个别的人提意见。我从来没有一次听到有人说党或者这个制度是不好的。"

"也许他们会说一些有关赫鲁晓夫或勃列日涅夫的笑话给你听，"他接下去说，一面把眼镜扶一扶正，用一只壮健的手掠一掠他的头发。"也许他们会在墙报上画一些大肚皮、浓眉毛的人（勃列日涅夫）的漫画，或者，也许他们会取笑勃列日涅夫象含着一嘴粥那样讲话。工人们觉得，他们可以比知识分子更痛快地谈这些事情——因为他们的顾虑比较少。他们知道，在经济上还是需要他们的。他们看到周围存在的问题，但是只怪他们的厂长或其他干部不好，而不是怪党不好。不能怪制度不好。至于列宁，尽管流传着那些笑

话，他确实是无可指责的。他所说的话，仍旧是有效的。”

当然，不能用一种固定的眼光去看待一千四百万共产党员。不能把一个老党员的态度去和一个新党员的态度加以对比：老党员年纪已经六十开外，是在斯大林统治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曾经感受过最初年代的那种浪漫式的共产主义热情，而在三十年代恐怖统治时期又曾为活命而斗争；青年党员刚近三十岁，他们并不直接了解斯大林主义，而是生在一个已经确立的制度之下。至于那些中年的共产党员，他们是在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时候成年的，具有一种独特的观点，既比老一辈又比新一代的人更感到幻想破灭和情绪不满。我还觉得，你越是远离象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这样充满政治色彩的大城市去内地旅行，你就越是有机会碰到一些思想更单纯的人，他们较少有虚伪的想法，但也许有更真实的理想。那些拥有特权、政治上抱实用主义态度的党官僚，是完全不同于那些被吸收入党的普通工人和农民的。

我记得，有一天下午，我在火车上跟一个皮肤晒得黝黑的建筑工人一起喝啤酒，他是乌克兰的一个党员。对他来说，入了党就是得到了一张去埃及阿斯旺水坝工作的许可证，他在那儿的三年内攒了一大笔外汇存款，有权用这些钱在特殊商店里买东西。他回国时，买

了各种高档商品，包括一辆象头头们乘的那种伏尔加牌黑色轿车。所以，当上了党员就在物质方面获得了报偿。又有一次，我在乌兹别克去一个拖拉机手家里访问，这个人曾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最高荣誉。他也是一位党员。但是，一眼看上去就知道，他是一个健壮、坦率和朴实的庄稼人，他相信自己和周围的人所取得的成就，他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事情——人们称之为“饥饿的草原”的半沙漠地带已被开垦成为棉田。由于他的工作出色，社会主义给了他荣誉，使他和他一家人有一所朴素和舒适的住宅。他现在所过的美好的生活，是他最初来到中亚细亚这片荒野里时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起作用的是他的信念，而不是一些口号，看来他是无意于将自己的环境与外界作比较的。

莫斯科的一位律师说：“大多数的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党员，一般都不去考虑意识形态，他们只承认事物的现实。”这种意见我听到过多次，有一次是根纳季——一个国营农场会计——发表的。他也是幻想破灭了，但他说他不能代表一般人，因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根据他的经验，普通农村里的人都心中有数，也知道需要给报纸上夸大宣传的苏联的成就打一个折扣。“但是，他们仍然相信这个制度，”他说。“他们除此以外什么都不知道，于是他们接受了这个制度。”

虽然各方面都在宣传苏联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

党[①]，但是，在知识分子、官僚、教育工作者、科学家、企业经理以及现在代表苏联共产党最大组成部分的机关工作人员当中，他们的各种动机和态度要复杂得多，而怀疑的想法也更普遍。虽然共产党在表面上是团结一致的，但是那些相信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者试图按照他们的方法推行社会主义制度，而那些相信实用主义的改革派则谋求削弱意识形态的影响，要使苏维埃制度现代化，用更合理的方法制订计划、管理人事、进行耕作，有时甚至要在文化和政治控制方面采取更灵活的手法。但是，积重难返，再加党小心翼翼地注意保护自己的权力，这一切都是不利于改革派的。

一个局外人，是无法去估计和概括苏维埃制度的核心人物对意识形态的热情与忠诚的。可是在私下里，不论是党员还是非党员，苏联人自己也会悄悄地谈到：现在热情消失了，物质主义和机会主义抬头了，腐败现象和道德败坏正在滋长。

“你听到赫鲁晓夫宣布，‘我们正在走向共产主义

---

① 据《党的生活》双周刊1973年7月13日报道：在一千四百八十万党员中，集体农庄庄员占百分之十四点七，工人占百分之四十点七，“职员”（包括白领阶层和更高的阶层）占百分之四十四点六。一些党的官员私下告诉我，即使上述统计数字也夸大了工人的比重，因为，如果一个党员在他入党时是工人身分，那么此后他在为党工作的年代里就一直被登记为“工人”。因此，勃列日涅夫和其他许多党的官员在党的名册上始终被列为工人，尽管他们早就不去干工人阶级所干的活了。

的胜利，'这时候你也许会不同意他的说法，可是你至少会感觉到，他是相信这一点的，"一个很有地位的编辑评论道。"想一想吧，说这话的是一个来自社会底层的人。在大家还不知道鹿死谁手的时候，他作出了选择，参加了十月革命。他冒了风险。所以，你感觉到他是相信的。即便是象苏斯洛夫(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头子，现已七十多岁)那样的人，他可能也是相信的。但是，至于现在政治局里这些新的成员——波利扬斯基，马祖罗夫，谢列平，格里申——你感觉到，他们不过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物。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我问道。

"这是你能够感觉到的嘛。你听听他们的发言，观察他们的举动，留心他们的声音。一切都显得那么优雅大方，那么习惯自然，但就是没有感情，没有信心。"

俄国人常常嘲笑西方人，说他们试图把党员划分成自由派和保守派。他们坚持认为，在预测党的政治倾向时，更重要的是要了解那些势力集团、僚友情分、裙带关系以及早先形成的政治上效忠与敌对的对象，而不是要了解什么思想意识上的细微差别。他们把共产党说得好象是纽约民主党总部一样。一位对政治感兴趣的系统分析学家说："更重要的是知道一个人以前曾否跟勃列日涅夫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或在新

荒地一起呆过，而不是推测他是否属于保守派或温和派。他究竟是谁的人？是勃列日涅夫的？是柯西金的？是基里连科的？是苏斯洛夫的？关键是在这个地方。”

讲到意识形态或政治宣传，记得莫斯科有几个知识分子，他们是有朋友在苏联权力机构中心的党中央委员会总部里工作的，他们曾经告诉我一些事情，说明甚至在专职的党务工作者当中也存在着意识形态衰败没落的现象。一个科学家回忆说，他工作的地方是莫斯科最重要的一个研究所，有一次所长去要求中央委员会的科学部多拨给研究所一些资金。他把自己工作领域里的苏联科学的状况描绘得十分暗淡，最后说："我们的情况可不好呀，"意思是说研究所的情况不好。这位所长后来对他的同事说，他当时吃了一惊，因为那位中央委员会的高级官员也不顾自己的话和官方所炫耀的宣传互相抵触，径自回答道，"我们的情况究竟好在哪儿呢？"意思也就是说全国的情况都不好。经过了一番激烈的争论之后，所长终于不胜惊讶地离开了，他这才知道中央委员会的官员私下里是讲求现实的。他心里想："他们并不是一些傻瓜。原来他们什么都明白呀。"

一位社会科学工作者向我谈起他的在中央委员会另一个部里工作的一些朋友，说他们如何在机关里私

下取笑政治局委员们那种政治上的死硬作风。一个很有地位的苏联记者说给我听：他有一次和中央委员会文化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在树林里散步，这位官员很失望地谈到党内高级阶层中的腐败现象。他大声问道："如果教皇和红衣主教真的是一些贪污不法的市侩之流，难道教会还会容忍他们吗？"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党内一些被认为是温和与现实的官僚，玩起花招来非常象某些美国官员在越南战争期间希望采取温和政策那样，不惜放弃和取消自己的观点。除了在莫斯科以外，其他地方没有代表大会，没有可以发表自己感想的报刊，听不到公众舆论，更少有机会去影响上层人士的思想。

政治上有后台的莫斯科人，曾谈到中央委员会机构内部存在着一条无法看见但是可以觉察的鸿沟：一边是那些处于实权地位的领导人，而另一边则是那些资历悠久的机关工作人员，他们是权势人物的助手，但是一般都认为他们世故太深了，文化太高了，为人太圆滑了，所以他们不能受到充分的信任，也不能被授予很高的职位。比如，有三个虽然地位不同、但都善于观察内幕政治动态的人向我指出：每逢一个重要职位出了空缺需要填补时，政治局的领导人一般是擢用外省推选的人，而不是提升以莫斯科为根据地、染有都市习气和一心追求名利的那些人。在勃列日涅夫统治

的时期，哈萨克共和国党的首脑丁·穆罕默德·库纳耶夫(勃列日涅夫的亲信)参加了政治局；高尔基州党的首脑康斯坦丁·卡图谢夫被委任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负责同外国执政的共产党的联系工作；弗拉基米尔·多尔基赫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调来，担任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分管重工业的书记；米哈伊尔·索洛缅采夫从罗斯托夫州调来，担任俄罗斯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我听说，在党内那些获得候补博士学位的专家治国论者和那些靠忠诚驯顺、托庇于党内的显贵而逐级高升的中央委员会各部长之间，也存在着几乎类似阶级之间的猜忌。一位作家告诉我说，他有几个熟人在中央委员会工作，这些人嘲笑他们的部长，说他是一个外省来的政治古董和土包子，嘲笑他那种无产阶级的习惯——外套里面不是穿白衬衫打领带，而是穿一件卫生衫或运动衫。然而，他一走进办公室，可说是立即引起了众人的注意。“他们不得不向他表示尊敬，”这个作家说。“这个人有权决定他们将接受一些什么任务，他们能不能出差到西方国家，他们什么时候可以配到一套更大的公寓。”党灌输这种本能地效忠于上级的道德观时，其程度远甚于卷入水门事件的理查德·尼克松的白宫政府。正如一位科学家根据他与党内人士接触的经验向我所说的那样：“一个人有了自己的见解

就麻烦了，因为干这一行的窍门在于了解上司的意图，说得更恰当一些，在于迎合他们的意图。如果你被人家认为是不易相处的，或者是太有见识的，那可是对你不利的呀。”

但是，正象我在摩尔曼斯克遇到的那个既有前途又有抱负的党员记者向我保证的，这样效忠将会得到报酬。他个人感到愤愤不平的是，那些通过党的关系当上了地方领导人的官僚往往都是无能的。他满腹牢骚地说："他们其实是些检查漏气的'管子工'，除非和党的书记的女儿之间的丑事闹得满城风雨，否则他们永远也不会降职。即便是他们的小工厂或者戏院里的情形越来越糟，这个'管子工'也只不过是被调去干其他工作：或去领导一个交响乐队，或者去管理一个农民市场。作为一个党员，他决不会从领导的位子上被拉下来。我们的制度就是这样。”

然而，过了不多一会儿，正是这个喜欢花哨领带和漂亮姑娘、穿得很齐整和长得很漂亮的年轻人，又谈起了他自己升任到一个三十岁的人所羡慕的职位，并且深有体会地说："党控制一切"，而他又如何有许多"好朋友"。纽约民主党总部的特点也使他感兴趣。这种在办公室以外搞政治活动的现实想法，往往正是标准的苏联共产党员的抽象思维中所缺乏的。

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在雅尔塔举行最后一轮最高

级会谈时，我有一次跟一位高级党员记者闲谈，这位记者对西方相当了解，跟西方人接触得也很多，以致偶然会很冒失地说出了心里话。当时他在谈论战争，回忆他如何在爱国情绪高涨时加入了党，于是我问他，现在人们是为什么入党的？

“他们是为了理想入党的，”他闪烁其词地回答。我向他怀疑地瞥了一眼，对于他作出这种陈词滥调式的答复感到失望。

“那么，理想对你意味着什么呢？”

“对我吗？它意味着我们对一个未来的天堂的向往，”他冷笑了一下，接下去说，而这样就贬低了他刚才的答复的含意。“它意味着人人平等和机会均等的公正的社会。它意味着每个人做最低限度的工作，有许多余暇去做自己爱好的事情。”他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会儿，盯了我一眼，取出了一支香烟，然后，在点燃香烟之前决定继续说下去。“当然啰，跟我们每天看到的政治现实对照一下，我说的话听起来是近乎理想主义的。我国人民到处都看到各种错误和缺点，都听到一些因琐事引起的争论。但是，他们心里想，‘没错儿，再过它一、二十年，真正的党的路线一定会胜利的。’”

这时候有人走过来，打断了我们的谈话。等那个人走开后，我又提起了这个记者说的理想主义，因为早些时候，他谈到美国青年和越南战争等问题时，我从他

的话里觉察到，他认为美国青年比他国内已经成长起来的下一代更具有理想主义。

“确实有一些理想主义的人，努力在这个国家里建设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我说。“可是，根据我的经验，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在远离开莫斯科的地方。我在西伯利亚和摩尔曼斯克那些地方偶然碰到过这样的人。但是，在莫斯科，我遇到更多的是看穿了一切的人，是机会主义者，是只为自己打算的人。”

“你说得完全对，”他有点粗暴地说。“在莫斯科，人们更是看穿了一切。他们更注重物质利益。你的话使我想起了一个法国姑娘，她有一次对我说：‘我们讨厌你们捷克人和俄国人，因为你们所追求的正是我们所抵制的物质第一主义。’这话说得对。现在我国人民都是注重物质利益的人。但是，你必须明白这是由于什么原故。自从十月革命以来，已经过了五十六年到五十七年。人们知道，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现在他们一直在说：‘我们懂得什么是十月革命，国内战争，抵抗纳粹的战争，集体化，最初几次的五年计划，以及为了这一切作出的牺牲。我们懂得这一切，但是，你们所许下的那些诺言呢？人只活一世，而这一世是短促的。所以，请给我一点东西吧。别老是许给未来呀！’这样，革命的热情正在低落。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有这种想法也是很自然的。”

当他把话题转到了当时正接近高潮的水门事件时，我说这件事对美国人来说是痛苦的，“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它不但说明美国发生的麻烦事，而且说明了现在仍然起作用的一种非常真实的政治理想主义。说真的，使我感到吃惊的是，我来到此地，发觉这里基本上是个人们看穿了一切的社会，两相对比，美国毕竟还不是一个这样的社会，而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社会。”

他向我瞧了一眼，若有所思地点着头表示同意，但是半晌没有说什么。后来，他使我吃了一惊，突然说了这么一句：“我爱美国的理想主义，”接着就赶快改变了话题。

如果这次谈话给你留下了一个印象，以为这反映了苏联高级党员记者典型的态度，那将是错误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典型的。但是我确实知道，在苏美合作的时候，这是一个相当开明的记者私下里表示的真实感情。然而，代表着另一个极端也是大家更加熟悉的，则是尤里·茹科夫所表现的形象。这个人头发开始变白，面孔肥胖，衣着华丽，是《真理报》宣传冷战的战士，比其他著名的苏联宣传家更积极地扮演了正统信徒的角色。他在莫斯科的地位相等于乔·艾尔索普，但是茹科夫有时候却忿怒地引用艾尔索普的话来证明“美国右翼集团”危险的影响。茹科夫今年已经六

十五岁左右，他拥有两幢舒适的别墅，在城里还有一套很大的公寓房子，以及一辆配有司机的汽车，定期在他那间摆满了书籍的办公室里作电视广播，常常代表苏联保守派的观点发言。

就在莫斯科停止干扰《美国之音》以前，茹科夫向电视观众提出了警告，叫他们不要收听外国广播，说那些广播是思想侵略者，利用俄语散布谎言。在苏美贸易关系旺盛的时候，茹科夫说了几句公道话，设法纠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租借法案仅提供了罐头猪肉那种在苏联广泛存在的印象，列举了美国人提供的坦克、卡车、吉普车和其他装备。但他给人更熟悉的姿态是在与西方竞赛的宣传中充当急先锋。1968 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茹科夫带头大声疾呼“捷克斯洛伐克反革命”的危险，并怀着恶意评论南斯拉夫的铁托。在欧安会的长期预备会议期间，茹科夫曾指责西方各国，说它们企图要挟苏联和它的盟国开放边界以便于“帝国主义者”进行颠覆，以此作为召开莫斯科所希望的东西方高级会议的代价。在一次突然发起的攻击中，他谴责了西方大多数的主要报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伦敦的《泰晤士报》和《每日电讯报》、法国的《世界报》和《费加罗报》以及西德的《世界报》——说它们正在进行一次反对缓和的“猛烈的运动”。他在《真理报》的一些同事们对我说，

他们都对那一次攻击感到不安。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发表后，苏联群众对此保持沉默，但茹科夫自告奋勇充当了他们的代言人，宣读了愤怒的读者来信，这些信以一种朴素的爱国主义和义愤填膺的情绪——某些美国人对越南战争期间的和平运动有过这种情绪——攻击这本书。他不但发表了文章，也亲自发表了谈话。《古拉格群岛》一书受到攻击后，他就邀请西方记者去一起阅读他所收到的信件。一天下午，他大声读那些反索尔仁尼琴的信给我们听，读时一会儿用俄语，一会儿用发音硬而沙哑、但相当正确的英语。他避而不谈自己是否看过这本书，但是他却声嘶力竭地叫嚷，攻击索尔仁尼琴试图重新引起对斯大林主义的争论。他告诉我们，他不打算在电视里读那些十分尖锐辛辣的读者来信，因为他不愿人家指责他是在迫害索尔仁尼琴和物理学家萨哈罗夫。有人问他可曾收到支持这两个人的来信？"可惜没有，"他用俄语俏皮地说。"这些信可能寄到《纽约时报》去啦。"我们告别前，他和大家合拍了一张照片。两天以后，他打电话给《时代》周刊的约翰·肖，问他可曾收到《古拉格群岛》这本书，因为他想借用几天。肖把书借给了他。

但是，在我和苏联共产党员的接触中，最最使我受

到启发的一次，是一天深夜偶然和一个年轻的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晤谈。他的形象首先使我联想起一个有着独立思想和满怀信心的年轻有为的美国政治助手，但是他的矛盾态度最后却提供了许多线索可以解释这个疑团，即：是什么原因使这个专职的党务工作者在背地里嘀咕。瓦洛加是新一代的人，身材高大，长相漂亮，头发淡黄，肩膀长得和他那古典式的斯拉夫面型很相称，还具有一种在交际场所讨人喜欢的吸引力，那可以使他在美国不论做人寿保险掮客或当政客都会一帆风顺。我和他是在一次晚会上碰到的，客人多数都已经散了。那是一个开怀畅饮和闲扯笑话的夜晚。瓦洛加来迟了，他避开了众人瞩目的地方，单和少数几个留下来的人坐在一起，有人逗他说一些秘闻轶事。大家都知道，他不但是一个擅于雄辩的党的演说家，并且是一个讲故事的能手。过了不多一会儿，他已证明确实是名不虚传的。

那天夜晚说的笑话，其中一个主题是关于党内腐败的情况。瓦洛加讲的第一个笑话是两位党的书记的故事，这两个人刚收齐了党员们交纳的党费，把钱送往党办事处，一路上走的时候，一个人建议顺便到餐馆去来它一杯伏特加。干了一杯再来一杯，然后，点一些下酒的菜，再喝更多的酒，吃一顿饭，喝葡萄酒，开第二瓶酒，喝白兰地酒。他们吃喝完了以后，一看开来的帐

单，钱数可不小，除了掏自己的腰包外，还必须动用党费去付清帐目。离开餐馆后，其中一位党员说："你瞧，我不明白，要不是当上了共产党员，有谁能这样大吃大喝呀。"

大家都觉得这笑话有趣，尤其是因为讲这笑话的是一个党员，事实上是当时在场的人当中唯一的党员。只有瓦洛加的妻子，听他讲反党的笑话，尤其是在一群人当中向一个外国记者讲这样的笑话，感到很紧张。可是瓦洛加是一个高傲的人，决心要表示他是什么都不怕的——，尽管他在接下去讲故事之前，也先叫人开了收音机，并加大音量。我们大家又斟了一巡酒，于是他开始讲苏联格鲁吉亚的腐败情况，说那里已经认真地进行了两年的清洗。大家都知道，那里的政府和党的官员有非法的小公馆，有情妇，有额外的汽车，并进行非法的买卖。瓦洛加有声有色地描绘了一次宴会的场面：一些党的领导人去参加一次私人宴会，饭桌上摆满了山珍海味，有各色的伏特加，有格鲁吉亚白兰地。司仪[①]请允许他说几句话，要大家为党魁的健康干杯。

"我要为阿弗坦迪尔·布阿瓦泽干杯，"瓦洛加狡黠地斜看了一眼，拖长了声音说，"并不是因为他有四

---

① 格鲁吉亚人举行的宴会，往往由一位推选出来的"司仪"主持。酒量与口才都好的"司仪"，负责执行敬酒等礼节。——译者

个别墅——而是因为，感谢上帝，我们并没有一个人必须睡在露天里。我要为阿弗坦迪尔·布阿瓦泽干杯，并不是因为他有五辆伏尔加牌汽车——而是因为，感谢上帝，幸而我们并没有一个人必须单凭两条腿在街上走路。我要为阿弗坦迪尔·布阿瓦泽干杯，并不是因为他有一位太太和三位情妇——而是因为，感谢上帝，我们并没有一个人是光棍。我要为阿弗坦迪尔·布阿瓦泽干杯，并不是因为他有一万卢布存在银行里——而是因为，感谢上帝，我们并没有一个人是必须单靠工资过活的。我要为阿弗坦迪尔·布阿瓦泽干杯，因为他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

瓦洛加这一段话讲得很精彩，他不时停顿一下，想出一个尖酸刻薄的句子，把大伙都给逗乐了。后来，不知怎的，瓦洛加逐渐转变话题，不再说笑话了。又过了片刻，我乘机问他，他读了那么多技术课程，为什么毕业后要参加党。他现在还不到三十岁，已经负责党的组织工作了。

“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解答我的问题。“我和他一起是从同一个学院毕业的。我们俩有着同样的成绩，参加了类似的工作。我是一个党员，而他不是党员。来了一个提升的机会：那么，你看我们两个人当中谁会获得这个机会呢？”他等我向他点了点头，然后接着说：“那就是我为了什么要参加党呀。”

"那么，意识形态呢？"我问道。这时候收音机开得更响了，其他的人都在谈话。

"现在再也没有谁相信意识形态了，"他说。"没有谁需要它了。"接着，感觉到自己的话说过了头，他又把话拉回来。"是呀，可能相信的也有。但是，为数不多。"

"如果你有这样的看法，党怎么会吸收你呢？"

"因为他们知道，你一入了党，他们就把你控制住啦。如果你不是一个党员，你有时候可以拒绝做他们要你做的事情。你不必一定要去接受那些你不喜欢的任务。可是，你如果入了党，那你就必须做他们所吩咐的事。这是纪律，你要知道。"

"但是，你对意识形态又是怎么想法呢？"

"大伙都知道，我是精通马列主义的，"他微笑着说。"我在学校里把这门课学得很好。我入党的时候他们考我，我什么都回答得上来。每逢我发言的时候，我总是讲得恰到好处。可是，我嘴里所讲的和我讲的时候头脑里所想的，那可是两码事。"

我们把话岔开了，谈到了党的路线的曲折转变，听起来有点象某些西方政治分析家在谈问题。他指出，党的路线已经改变了多少次，可是它永远被称为"列宁主义的路线"。

"在列宁时代，党相信列宁的一切指示。在斯大林时代，党相信斯大林的一切指示。在赫鲁晓夫时代，党

相信赫鲁晓夫的一切指示。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党相信勃列日涅夫的一切指示。这都是'列宁主义的路线'，尽管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所说的来了一个九十度的转变，后来又出现了历次的转变。讲到列宁主义的路线，你只能说，它是周而复始的。"

这是流行于党内的一个笑话。瓦洛加的妻子又开始感到不安，于是走过来催他回去。但是瓦洛加正在炫耀自己，坚持要讲下去。他感到有趣，因为在我们这群人当中泄露了党的天机。并且，他还要显示自己有独立的思想。"我思故我在，"[①]他有一次对我说。党号召更多吸收工人，较少吸收知识分子，瓦洛加对这些指示感到不安，因为他认为，有了更多的知识分子，就可以使党更加自由化。他说，他已读过《古拉格群岛》一书，相信索尔仁尼琴对斯大林统治下的那些集中营所作的描写。他担心苏联正在恢复一种类似于1931年斯大林实施集体化时的政治气候，而人们必须去适应它。瓦洛加的意见是，应采取灵活的措施，使苏维埃制度现代化。然而，他的口气几乎是在不知不觉地改变。尽管他刚才那样说笑话，表示看穿了一切，但现在可以逐渐更清楚地看出，他是独自具有一套信念的。

"如果我有机会，我就要进行一次百分之四十五的改变，也就是将近一半的改变，"他自信地说。"情况是

① 这是引自笛卡儿的话。——译者

在 1920 年开始变坏的。……”

“是在 1918 年，”一直静听着的一个俄国朋友这时候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不，是在1920年，”瓦洛加坚持说。“那时候列宁开始失去了一些控制。在此以前，情况一直是好的！不论是在革命时期也好，是在国内战争时期也好。但是以后，情况就坏啦。当时如果我当权的话，我就会同意这点，即十月革命后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伟大的集体，”说到这里，他握紧了拳头，“使国家继续保持强大。否则的话，就不能取得这个成果。然而，今天我们的情况可不同了。我们必须用不同的方法来发展，必须给大家更多的机会。”

他开玩笑地宣称，他对党也有几分效忠之心，然后开始谈到：“一旦我进了政治局，我将要做些什么事情”等等。

他的朋友萨沙，比他更不受拘束和更不关心政治，但远不及他有野心，可被他的话吓坏了，责怪他不该热中于权力，说这样会毁了他的。“瓦洛加，听你说希望有一天进政治局，这太可怕了。如果你真的进了政治局，那我可要打死你。”这些话听来好象是学生的谈话，可是这两个人年龄都已接近三十岁，口气也都是相当严肃的。

“不会的，”瓦洛加冷淡地回答。“我是不会让这种

事情发生的。我要记住你的话，并且我要确保你无从找到我，”

突然变幻无常地从说笑话和谈哲学一下子转到了威胁一个朋友，这时刻确实是令人扫兴的。但是，事情过去了，瓦洛加的情绪又改变了。他开始谈到他所知道的党对格鲁吉亚腐败情形进行秘密调查的真实经过，以及对一些主要人物进行公开或秘密审讯的经过情况。我问到其中一两点的准确性，他不屑和我谈，转过身去对他的朋友说：“萨沙，你是知道这些消息来源的。”我猜想，他所指的和萨沙点头表示知道的是党内的消息，可是瓦洛加决意不去谈这个问题了。我们谈到缓和以及欧洲的贸易关系问题。他不知不觉地流露出对苏联的实力感到骄傲。

“那些德国人，”他说，“不是你们的德国人，而是我们的德国人，有一次企图在天然气问题上威胁我们。”

“什么天然气？什么时候？”我问。

“咳，你连有关天然气的事都不知道吗？”他问这话时流露出由于自己消息更灵通而产生的骄傲感。他的妻子又担心起来，但是他安慰她道：“他们是不知道这些事情的。”接着，他弄灭了香烟，继续谈下去。

“你知道，我们向东德人提供他们工业需要的天然气。我们向他们提供天然气，譬如说，价格是四十三戈比，然后从他们那里买回其他商品，价格是一个卢布。

从经济上说，我们是吃亏的。但是，这不是经济问题。这纯粹是政治问题。我们用天然气把他们控制住了。他们对我们说：‘为了发展我们的工业，我们需要你们把每年的天然气输送量增加一倍。’我们对他们说：‘我们可以稍许增加一点儿，但不能增加到象你们所要求的那么多。’于是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将从你们的德国人那儿获得天然气，虽然你们的德国人已经在从我国进口天然气了。换句话说，我们的德国人利用你们的德国人来威胁我们，但是他们威胁不倒我们，因为我们有，”——说到这里，他开始用手扭转一个想象中的输气管开关阀——“我们有开关龙头掌握在自己手里。有龙头掌握在你自己手里，那可是非常有用的。现在我们把东德人和西德人的龙头都掌握在我们手里。他们进口得越多，我们手里控制的也就越多。所以，他们威胁我们，这些德国人，可是对我们说来，这种威胁实在算不了一回事。只要我们暂时停止输送，他们就知道厉害啦。”

这一套说法显然是在党内会议上所宣传的。瓦洛加接下去还谈到苏联如何处理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棘手问题。“总共只有三次，东欧人向我们挑战，向我们进行威胁，”他说。“一次是在波兰，后来是哥穆尔卡上了台。一次是同德国人打交道，就是刚才我讲给你听的。还有一次是在捷克斯洛伐克——我们

大家都知道那件事是怎样结束的。"

"那么，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呢？"我问道。

"这和前面说的那些威胁是不一样的，"他回答，但并没有作出解释。

我不明白他的推理，但是我看出，这里有这样一个年轻人，他一方面愤世嫉俗，嘲笑当时的腐败，似乎真心想要在国内进行一番改革，另一方面又对本国的现实政治感到骄傲，被他个人揽权树势的野心所驱策，并且由于有一种优越感，由于自己做党的组织工作，一意追求功名，知道内部消息，因而感到沾沾自喜。他懂得革命的根源和目标；他虽然认为党在斯大林统治下采取了错误的路线，但对于斯大林建立的强大国家，对于斯大林统一在莫斯科保护下的帝国，却感到无比骄傲。当他顺着阶梯向上爬时，他总是准备好按照党的命令办事，除非是可以利用党内的关系去摆脱那些苦差事。他还准备好经常空谈意识形态，他又公开承认自己并不相信这一套——的确，他对自己擅长于掩盖个人的观点，对自己在党内以善于发言著名而感到骄傲。他实质上是一个标准的驯服的党员。他把愤世嫉俗和自由放任的态度限制在自己和亲密的朋友之间。我可以想象，他作为一个党员会随着岁月的增长而成熟起来，他那种怀疑的态度比起他的野心来已成为次要的了，他自我陶醉于当上了拥有特权和了解内幕的人物，同

时对苏联的强大所怀的民族自豪感也随着增长，并且，在某些场合，也会发出威胁，扬言要记住他的朋友因为觉得他的野心太可怕而说出的心里感到不安的话。

对于瓦洛加以及我所遇到的其他某些苏联知识分子来说，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苏联人的一个手势，也就是把手放在口袋里，紧握拳头，很不礼貌地用食指和中指夹住伸出的拇指，其粗野的意思是“他妈的”，或者是“我操你”，或者是口气更重一些的意思，一切要根据手势的强弱和当时的环境而定。但是“在口袋里”的意思是藏在裤子口袋里。那意思就是说，不叫人看见，私下里做这个表示对抗的小动作。这样，内心要对抗的冲动，就被害怕的心理和迫使服从命令的压力所克服，于是，用比喻的话来说，就是把抗议藏在口袋里了。

可见，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对意识形态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都不是关键的问题。这个制度仍然存在，并且，与制度同时存在的还有一些意识形态的仪式，它们将这个制度加以肯定，使其合法化，并使其永远存在下去。

十二　爱国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记忆犹新

俄国的过去是极为美好的，其今日是壮丽辉煌的，至于其未来——那是最为大胆的想象也无法加以设想的。这就是人们必须据以描写俄国历史的观点。

亚历山大·宾肯多尔夫伯爵，
秘密警察头子，十九世纪三十年代

我们八个人围坐在本·列维奇的餐桌周围，大家一下子都谈开了。本的亲戚们对今天莫斯科生活中的苦楚发出了那么多怨言，因此我有意识地问问他们俄国历史上哪一个时期算是最美好的时期，以便改变一下话题。谈话终于停了下来。本仿佛在寻思着什么似的；他尽管已六十多岁了，但是他那粉红色的圆脸上总是带着一种孩子气的惊异神情瞪出两只大眼。作为一个有地位的科学家，一直到1972年申请移居以色列以前，他曾在这一制度下飞黄腾达，而他作为一个已经长

期同化的和生活舒适的犹太人，仍然保持着权势集团的那种思想感情。

“你讲的‘最好’是指什么？”本呆住了，睁大着眼睛。“从物质上讲？还是从精神上讲呢？”

“这由你来定了，”我耸了耸肩。他在停了一、二分钟之后才作了回答。

“我们生活中最美好的时期，”最后他说道，“是战争时期。”

他的回答令我吃惊，显然其他的人也同样吃惊。本腼腆地咧着嘴笑了，他显然由于我们突然被他问住了而感到高兴。由于所有的苏联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巨大的灾难和浩劫，他们这种立即感到惊讶的神情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另外，这一伙是持怀疑态度的人，他们不愿随便附和或赞同任何苏联宣传的陈词滥调，特别是对于经常被讲到的关于在二次大战中苏联取得了胜利的宣传。

“战争时期，”本平静地又说一遍，“因为那时候，我们全都觉得我们比一生中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我们的政府。它当时不是‘他们的’国家，而是‘我们的’国家。不是‘他们’要我们干这样或那样，而是我们要干。那不是‘他们的’战争，而是‘我们的’战争。我们正在保卫的是‘我们的’国家，是‘我们’进行的战争努力。”

“我记得我正在喀山家里睡觉的时候，”本继续说，

他那不连贯的俄语里常常会出现一两个语音很重的英语词汇，"契卡[秘密警察]会半夜跑来把我叫醒，我并不害怕。你想想看！他在半夜里敲我的门，把我叫醒，而我却不害怕。要是在三十年代有个契卡份子这样做的话，我准会被吓坏了。要是发生在战后，就在斯大林逝世之前，也会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那时也是血腥清洗的时期，特别是对犹太人。）要是某一个人现在这样做的话，那我准会非常担心，尽管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可是，当时，在战争期间，我完全不感到害怕。这是我们历史上唯一无二的时期。他们要我去参加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他们害怕正在开始化学战。我是化学方面的专家，他们要征求我的意见。"

在本结束谈话的时候，餐桌周围其他一些人都表示同意。尽管他们蔑视苏联宣传，然而，这些爱国情绪是他们所理解的。那些年龄较大，能够记得起的都有同样的回忆。我在别处也听到过，这不仅是一个六十多岁的、孤单幸运的犹太科学家所具有的，也是各行各业的人都具有的感情。"战时是诗人真诚地写诗的时代，"一位五十多岁的离开国家的女语言学家说道。其他一些人在谈到战争时，常常认为当时不仅仅是苦难和牺牲的时期，而且也是亲密和团结的时期。战争固然意味着死亡和破坏，但是它也显示了牢不可破的团结和不可战胜的力量。苏联人对于他们在称之为伟大

的卫国战争中共同遇到的严峻考验和胜利的记忆，就是他们今天觉得问心无愧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一个主要源泉。

在人们对纯粹的爱国主义日益抱有怀疑的时代里，俄国人也许是世界上最热情的爱国者。毫无问题，一种对国家抱有的深刻和坚定不移的热爱，是苏联最强大的团结力量，是巩固苏联社会的浑然一体的全部忠诚感情中最关键的因素。这对其他没有宣布自己属于何种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些国家来说，也许只是平常的事。诚然，在革命以前，民族爱国主义确实是俄国一个典型的特点。今天的矛盾在于，列宁和其他革命领袖——其中只有少数是俄罗斯人——曾企图打破这种传统。列宁在1915年宣称，“我们是反爱国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关于世界革命和无产者大团结的信条把狭隘的忠于国家斥之为异端。正是斯大林，为了把人民团结起来以抵抗入侵的纳粹军队，才有意识地培养起俄国人的民族主义热情。在192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后来在三十年代，他逐渐乞灵于沙皇时代的英雄们的灵感。而且在战时他是那么一心想鼓励爱国热情，以致他甚至重新恢复了被迫害的东正教教会。他和东正教主教曾几次通过无线电联合向全国发出呼吁。在战争开始后的岁月里，爱国主义的势力增长了，共产主

义的热情却消逝了，因此，今天的民族主义对绝大多数苏联人民来说，要比马列主义思想更有吸引力和意义。

“民族主义，即对祖国的崇拜，已经成为所有其他信仰的替代品，”我的一位年轻科学家朋友评论说。这样说也许是一种夸张，但也不是太大的夸张。“去掉了民族爱国主义，我们人民还有什么呢？”他继续说，“革命前，俄国人相信三样东西——第一是上帝，第二是沙皇，第三，只是第三位才轮到祖国。革命后，特别是在二十年代，而且也在三十年代，人民信仰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维护俄罗斯民族主义是错误的，我们不维护它。要是维护它的话，你就会惹来麻烦。但是，随着战争的发生，斯大林强调了民族主义。从此，民族主义一直在增长。现在，人民已经没有上帝，没有沙皇或者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他们有的是俄国，祖国，而党也大大地利用了这一点。”

另外一些人也对我谈论过，苏联领导集团精明地一再利用忠于民族的感情。这是一种必须极其谨慎地对待的号召，因为俄罗斯族人和其他民族在历史上存在着摩擦。其他民族，诸如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立陶宛人或乌兹别克人等，他们目前构成了苏联人口中的大多数，而且他们常常私下里对于把他们的少数民族共和国俄罗斯化表示不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所

以会成为那么有价值的宣传手段，正因为可以用它来模糊俄罗斯族对俄罗斯母亲的忠诚同少数民族对他们自己地区的热爱的界线。它使宣传家们可以把这些民族合并起来，共同忠于一个更大的实体——苏联。这也使他们能够把战胜纳粹的民族爱国主义自豪感同在政治上服从苏维埃制度这两者之间的界线模糊起来。在宣传伟大的卫国战争时，爱国主义和政治就被这样溶合在一起了。

今天的苏联报刊欢呼苏联宇宙空间的成就和国际体育活动方面的胜利，也抱着同样的目的。在苏维埃制度下，重要的体育运动，并不象西方那样是一种娱乐，而是政治。因此，苏联体育运动是完全受到津贴补助的，拔尖的运动员都秘密地拿到额外津贴和可观的现金奖励，特别是在国外获得金质奖章者更是这样。取得体育冠军，就证明苏维埃制度的优越性，党的路线就是如此。因此，在奥林匹克运动会或是其他的国际比赛场合，抓紧一切机会坚持要奏国歌，升国旗或者举行分列式以及其他仪式的人总是苏联人，就决不是偶然的了，他们以此迎合民族感情，并使苏联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感得以炽热地保持下去。体育运动也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是用来进行这种宣传的理想的工具。

俄罗斯族的人民，就其天性和传统而言，是热情的

爱国者，他们很容易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感召。几乎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会立即激发起爱国主义来，而且予以发扬光大。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地方在长途火车出发时会用扩音器播送国歌呢？还有哪一个地方的听众会整个晚上坐在那儿听着歌唱祖国的赞美诗和颂歌而不觉得伤感呢？我记得在一次音乐会上，一位噙着泪水的男中音，在定音鼓的动人心弦的咚咚声和小提琴持续而有力的伴奏下，热情地歌唱着叶甫图申科一些爱国歌曲中的叠句，使阖座的俄国听众感动得流下泪来，并激动地鼓掌。歌词是：

普希金的祖国，
列宁的祖国，
我们孩子们的祖国。
万岁，伟大的无与伦比的人民，
千秋万代，永远昌盛。

另一个晚上，一位强壮的记者和他的妻子在他们的厨房里为我愉快地背诵了一支当时最受欢迎的流行歌曲："我们的祖国从那儿开端？是从你小小的初级读本中的图片里？是从隔壁善良忠实的同志身边？或者也许是从妈妈唱的那支歌儿里？"那个做丈夫的发觉我对这种过分自作多情感到不自在，连忙对我解释说："这是一支非常好的歌曲。我们那个十几岁的女儿喜爱它，她所有的朋友也都喜欢它。"

俄国人不论年龄大小，对俄罗斯母亲都象对自己的家庭一样，充满着激情。一天早上，我那位中年的俄语教师，回忆起几年前她因执行一项外交任务在国外住了一段时期后乘火车进入俄国境内的情况，不禁热泪盈眶。“只要听到‘罗金那’这个词儿，就会使我发起抖来，”一位年轻的女生物学家这样坦白承认道，她曾在一个艰苦的工业城镇度过悲惨的童年，而现在对苏联的情况一般持批判态度。“罗金那”这个词对她和其他俄国人所产生的那种感情力量，是无法用其他语言表达的。根据字典，这个词的意思是故土、祖国、家乡、诞生地。然而这些词都还不能表达这个词在俄文里所具有的那种勾起人们感情的力量。“罗金那”这个词对俄国人来说就含有《歌颂你啊，我的祖国》这首歌所包含的意味，它对祖国唱出了一种如痴如狂、不容置疑和毫无保留的忠诚，就象母亲疼爱她最小的孩子而孩子也盲目地报之以热爱那样，是一种坚定不移的感情，一种敬意。它使得个人忘掉了所有的无谓烦恼、困惑、缺陷和日常生活的纠缠，使他宣布他的忠诚，并以此为荣，使他不知不觉地将自己同国家溶和在一起，而且从中获得慰藉、信心和一种今天的美国人以及许多其他的西方人所不能理解的一体同根之感。对于俄国人，“罗金那”所激起的那种内在的爱国主义感情，就象自由和民主经常对美国人所激起的感情一样。这是一个

具有重要意义的词，它比关于共产党结构的一大堆图解更能清楚地说明是什么把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结合在一起，因为它唤起了俄国人对其本土的和相互之间的血肉感情。它抓住了国家对俄国人的心灵所具有的那个深邃的精神意义。

即使那些在政治上已经背弃了苏联而移居国外的人，也感到他们不免受到俄国的引力，正如不免受到地心引力一样。很多人一同它断绝了关系，就感到空虚。英国记者戴维·博纳维亚巧妙地写出了一些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那种自相矛盾的忠诚："他们就象一个打老婆的男人，白天恶毒地咒骂她，晚上又爬上床去同她相好。他们热爱俄国，即使那些已经和它断绝关系和离开它的人也是这样。"一个莫斯科朋友告诉我说，有一个俄国妇女在巴黎住了四十年，她第一次访问俄国后，乘飞机返回巴黎，带了一件她所有那些移居国外的朋友请求她带回的礼物——满满地装了一只手提箱的俄国泥土。我在西方遇到过一些犹太人，他们为了争取移居国外的权利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但是一旦到了国外，他们又突然感到自己被残酷地连根拔掉了，非常思念乡土。"从精神上和教养上来说，我是个俄国人，"有这样一个人在纽约对我强烈地抗辩说。诗人约瑟夫·勃罗茨基到了西方定居后，也以同样的情绪写信给勃列日涅夫，渴望自己还能继续作为俄罗斯文学中

的一个部分。

马克·恰加尔在流亡国外半个世纪之后于1973年回国，就是一种出于感情重返家园的举动，表明了斯拉夫民族把他们的全部热情倾注于自己的乡土。《纽约时报》驻巴黎的同事亨利·卡姆，在恰加尔从俄国回到巴黎后去看他，发现这位乌克兰出生的犹太画家确实是容光焕发，而且恢复了青春。简直就象是浪子回了头。过去，恰加尔被逐出家庭，没有人理睬他，不许他的作品展出，甚至被斥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敌人。现在，这些都不成什么问题了。恰加尔得意扬扬，因为，苏联人又要他了，要展出他几幅被锁在地窖里几十年的作品，要他在以前给国立犹太剧院的壁画上签名。他精神焕发地回到巴黎，把插了两束已经枯萎的俄国花的花瓶直送到卡姆鼻子底下，对他说："闻闻看！别的花是不会有这种香味的。我已经有五十年没闻到这种香味了。"

俄国人狂热的爱国主义，不仅包含了这种连犹太人恰加尔也具有的、对祖国的深切而毫不动摇的热爱，还包含一种原始的公社思想，即一个氏族抵御外来者的自卫精神和对内部叛徒的不能容忍的精神，一种维多利亚时代对于民族力量和对帝国所怀有的光荣感，一种盲目的种族中心主义以及一种与美国早期蒙昧时

代遥相呼应的道德优越的信念。

现在，就象过去许多世纪里一样，俄国人热爱其祖国而看不到它的任何缺点。约翰·斯坦贝克曾经描写过这种依恋之情，有一次他在谈到纽约时说："纽约是一个丑恶的城市，一个肮脏的城市。它的气候使人反感。它的政治被用来吓唬孩子们。它的交通犹如发疯。它的竞争就是残杀。但是，纽约却有个特点——一旦你在纽约住下来，它成了你的家乡，就没有别的地方比它再好的了。"俄国人也许不会这么鲁莽、狂妄或直率，但是，他们对祖国的忠诚却也同样是那么坚定和深厚。仿佛是和斯坦贝克相呼应似的，俄国人今天总是引用普希金的一行名诗："甚至祖国的烟尘，我们也觉得香甜可亲。"①

如果突然间可以完全自由外迁的话，我相信，很少俄国人会永远离开他们的祖国，这是和犹太人以及一些其他少数民族不同的地方。这部分是由于他们那种狭隘的与世隔绝的状态。他们不习惯于跑来跑去。对百分之九十五或更多一点的居民来说，通向外部世界之门从来也不曾打开过，或者说打开过一次后，就永远关上了，而且立即就产生了痛苦的怀乡病。如果那扇大门永远开着的话，对很多俄国人来说，惰性和惧怕国

① 这是一句俄罗斯谚语，意思是：即使是祖国的缺点，我们也很容易原谅它。——译者

外的陌生生活，也会成为强大的遏制力量。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因为祖国和亲属的引力，会使他们踟蹰不前。因为他们都有一种可说是农民所具有的依附于土地和氏族的思想，而这对来自好动的、频繁进行活动的美国和西欧文明社会的人民来说，却是难以理解的。

从历史上说，俄国人素来是一个具有很大社会聚合力的民族。他们以合群为乐，以离群为苦。今天，"集体"这个词儿，在苏联的神话中是仅次于共产党的一种神圣的实体。农场或工厂的劳动集体所应该做的事，远远超出了把一群人组织起来从事一项工作的范围。农场或工厂象家长般地提供住房、学校和其他服务，组织业余活动，有时甚至还要管到私人生活。工人们乘坐公司提供的大汽车一起去钓鱼，并从中得到了很大的乐趣。人们如此追求集体精神，以致我发现到处都不自觉地谈到它。甚至在我们那个小小的办公室里，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俄国雇员也时常开玩笑地谈到《纽约时报》集体。但是在俄国，地方自治的根子要比当代党的宣传根深蒂固得多。一千年以前农民们艰苦地征服未开发的森林，就是一种集体的努力。在以后那些沙皇的统治下，种植和收获是由乡村的"米尔"[①]或者是由一种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进行的。在东正教教会里，忏悔是一种公开的仪式，象征着罪人

① 沙俄时代农村中一种村社组织。——译者

回到了会众的团体里来了，个人也知道必须将自己从属于普通的信徒行列中，并同他们融合在一起。

这种情况同西方历史演变的差别，是很引人注目的。自从宗教改革运动以来，西方生活总是强调个人在教会和社交中是独立的，并且宣称个人应享有各自不同的自由。即使是美国人向来爱好参加的那些市民俱乐部或其他团体，这些组织对他们的约束也比俄国的集体和国家对俄国人的约束更为松弛和表面。从个人的关系来看，俄国人同其周围的人混迹在一起时，不象盎格鲁撒克逊人那么忸怩尴尬。我看到他们在公开场合那么十分自然而无所谓地彼此互相碰撞、互相触摸、互相靠着身子，真使我大为吃惊。俄国人密集地住在工人集体公寓或学生宿舍里的情况，很多西方人准会产生一种囿居的恐怖感。他们认为，同完全陌生的人合住旅馆房间或是合住六只床位的火车单间，是理所当然的事。俄文里没有一个词可以表达“独处而不受干扰”的意思。很自然地，个人干脆列于集体之后。我觉得，俄国人认为为集体和国家作出牺牲是一种诱人的品质。但是，我却厌恶那种集体一致的准则。这种准则试图使个人把自己首先看成是一部集体机器中的一个齿轮，而开除出集体就是最严厉的社会惩罚，不论是只不过把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开除出幼儿园的游戏小组，还是因为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写了持不同政

见的作品而把他强行驱逐出境。

“我们从历史上懂得，为了生存下去，我们必须作为俄国人而结合在一起，”阿纳托利，一位三十岁的政府经济学家对我说，“当我们生活在各个单独的公国里时，鞑靼人来了，并且征服了我们；当时每个公国实际上都有自己的边界。我们俄国人人数很多，而鞑靼人人数很少，然而，他们还是象一只大拳头那样打了我们。因此，我们懂得了我们应该结合在一起——有点象犹太人那样，尽管这听起来有些好笑。犹太人已经团结在一起，现在，他们的民族主义感情召唤他们汇合在自己的新家园中。但是，我们的祖国却号召我们留在这儿，所以我们就留在这儿。听起来好象是两回事，但是，这实际上却是同样的感情。关于我们的忠诚感，我们有许多格言。也许你听到过苏沃洛夫（元帅）其人，他是伟大的军事指挥官，打败了腓德烈大帝的军队，后来又打败了拿破仑。他总是说：‘即使再不好，可它毕竟是我们的’。”

我提出这在英语（他也懂英语）里相当于“是好是歹，总是我的祖国”，也就是我们称之为盲目爱国主义的意思，他立刻同意了这种说法。“我们称它为‘克瓦斯’爱国主义，”他说。象俄国生活中许多基本的东西那样，这个词一下子不容易翻译出来，首先必须了解克瓦斯是一种发过酵的农民饮料，是用烤焦的面包浸出

来的水制成的。克瓦斯有一种麦芽的味道，廉价的克瓦斯就象陈咖啡——很苦，颜色象泥浆水，底下还有沉淀。在夏天，俄国所有的城市，都有穿着白外衣的妇女从桔黄色的、流动的金属大桶里舀出大杯的克瓦斯来供应顾客。外国人往往是喝了一杯后就不想再喝了，但是，俄国人极其相信这玩意儿，农民则有自己家酿的克瓦斯。因此，克瓦斯爱国主义就是质朴的，具有农民色彩的强烈的俄国牌号的爱国主义。

"是沙文主义吗？"我问道。

"是的，是沙文主义，而且甚至比沙文主义还厉害，"阿纳托利肯定地说。这是一种爱国主义，它产生了象我们自己的约翰·保罗·琼斯[①]和戴维·克罗克特[②]那样的传奇故事，并且相信那些故事。这种故事随时都会从俄国人嘴里脱口而出。阿纳托利记起了那些反对纳粹的边境部队和防守布列斯特的俄国军队的英勇功绩，他们虽然寡不敌众而且被迫投降，却打得很勇敢。然而这种对祖国的积极而英勇的献身精神，也有其象麦卡锡主义那样的消极方面：对于本宗本族认为是不可饶恕的叛徒的那种持不同政见者和闹独立性

---

① 约翰·保罗·琼斯（1747—1792）：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海军军官，以英勇著称。——译者

② 戴维·克罗克特（1786—1836）：美国拓荒者、政治家，以英勇机智著称，为美国儿童心目中的英雄人物。——译者

的人，绝不容忍，并加以迫害。

“人民在他们认为祖国处于危急的时候，他们几乎任何事情都肯干的，”阿纳托利说。“不仅在发生军事危机的时候，而且在发生思想意识危机的时候也会这样，因为祖国现在遭到了外国思想的侵略。你知道，人们认为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这些人是叛徒，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道理很简单：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正在求助于外国人(我们的谈话是在1973年报界对这两位主要的持不同政见者发动了一场激烈的攻击之后)。帝国主义者正在利用这两个人，而且你必须懂得，不管怎么说，帝国主义仍然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所以要是我们的敌人在利用这些人，那么，自然而然地就意味着他们是叛徒了。萨哈罗夫呼吁西方来惩罚我们国家，不让我们取得美国的最惠国待遇。所以，他当然要被认为是一个叛徒，而人们参加这场谴责他的运动，也就是一种正常的职责了。”停了一分钟后，他表示了失望之感，但是并不是我所预料的那种失望。“现今在某些知识分子中间，民族感情正日趋淡薄，”他说。“有些人对参加反对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运动犹豫不决。并不象本来应该做到的那么自觉主动。”

任何一个外国人，他要是对苏联的生活方式或其政府提出疑问或表示异议，哪怕是提得很婉转，也必然会同这种对本宗族的忠诚相抵触。不管他们私下是怎

么想的，俄国人总是会紧密团结而且奋起保卫祖国以反对外来者。这倒不仅仅是鹦鹉学舌地重复官方的宣传而已，因为我听说有些持不同政见者在听到一个外国人对他的国家提出同他自己所提的一样的批评时，就突然改变了立场。在外国人面前表现出来的民族自豪感是一种威力巨大的感情。一位杂志编辑告诉我说，要是我认为俄国人对外国人讲什么话都必须由官方来指导的话，那我就错了。他说，即使没有提示，一般人对访问他们家庭和工厂的西方人士，也会夸大他们的生活水平。“这很自然，”他说。“人们觉得，‘我们是俄国人。我们必须在外国人面前显得象样些。我们必须让他们，特别是让美国人，看到我们生活得很好。’”

在这方面起作用的是一种本能的、部族式的忠诚的条件反射。正如俄国人在个人关系方面，对他们亲密知己和外人之间划有极其明确的界线，同样在民族感情方面，他们对自己的宗族、国家和所有其他人之间的界线也划得十分明确。象“纳什”（我们的）和“丘若伊”（别人的，外国的，异邦的）这些词汇就经常出现在宣传和会话中。这些字眼在描绘朋友或敌人以及决定态度上起着很大的作用，因为俄国人只从两方面考虑问题——赞成或反对。他们对中立态度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怀疑态度。“他是‘纳什’（我们）的人”——或者

恰巧相反，“他是‘丘若伊’(非自己人)”——这就足以解决问题了。

正是那位一听到“罗金那”这个词就激动得打哆嗦的年轻妇女，她记起了在她才十几岁时每听到西方电台广播关于俄国的不愉快的新闻时，她是多么愤怒。“我听到‘美国之音’时，我知道他们所讲的俄国情况是真实的，绝对真实的，但是它仍然使我气疯了，”她说，“因为听到外国人讲这些话就觉得有些受到侮辱。好象是外国人在笑话我们。我对我们的制度并没有象我对‘美国之音’那样生很大的气。”今天最有经验的苏联宣传家们正在巧妙地利用这种对外国人的愤慨情绪。《真理报》专栏作家和电视评论员尤里·茹可夫，在1974年下半年提醒苏联的听众要谨防外国电台使用俄语广播的狡猾战术，他故意激怒苏联的爱国者说：“在我们(“纳什”)光明洁净的苏维埃家庭里偷偷跑进来一个陌生人(“丘若伊”)，而且用我们的(“纳什”)语言来散布谎言和诽谤。”

俄国广大的幅员和它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处于同大陆隔绝的情况，给今天许多俄国人的思想上留下了强烈的沙文主义特点。这部分地是一种十足的种族中心主义的表现。同其他一些大国(中国、美国)一样，俄国认为世界围着它转，并用它自己的标准来衡量所有其他国家。俄国人有一句传统的格言，说所有的国家

都是从他们自己的钟楼上看世界的，而俄国的钟楼是最高的。这种精神上的优越感，在俄国从拜占庭接受了东正教以后就扎下了根。在沙皇统治下，俄国人就把莫斯科当作第三个罗马，是拜占庭垮掉以后唯一真正的基督教的保护者。这种历史的种族中心主义和历史使命感，由于布尔什维克革命（俄国人认为这是二十世纪的大事）而永远保存了下来，并且得到了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那种以救世主自居的思想，不仅把莫斯科宣称为新耶路撒冷，而且还把它称作共产主义的唯一正统的解释者，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必须对它朝觐和效忠。

到目前为止，苏俄倒也没有出现过那种使西方苦恼的文化上的悲观主义。俄国人虽然没有其他国家那样多的理由，却能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保留着一种基本上无可置疑的信心。他们虽然对匮乏、物价或腐败满腹牢骚，或暗自梦想会有某些修修补补的改革，但是，他们没有发生近年来折磨着美国人或其他西方人的那种丧失自信心的痛苦，没有激烈地贬低他们自己的国家，或是一阵阵感到失望。不错，我记得有一个年老的俄国人对我说，苏联那些退伍军人，不管他们多么反对美国侵略越南，就是不能理解年轻的美国退伍军人怎么会让自己把战争勋章掷还给国会，以抗议越南战争。他说，这是一种侮辱，不仅是对政府而且是对国家的一

种侮辱，这是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的俄国人简直不能同意的事情。在这方面，俄国人很少会考虑到是否有什么别的更好的办法，或者考虑到他们的制度是否应该加以彻底改变，就象很少有人会考虑换换父母亲那样。他们深信俄罗斯母亲象磐石一般牢固，是他们的庇护所。看来，除了持不同政见者，俄国人很少会看出他们的祖国也有可能并不清白或者在道德上有罪过之处。他们今天所怀的道德上的清白无罪之感，其不可动摇，就同可怕的越南战争还没有使美国人民觉得国家犯了罪和干了坏事以前相仿。

苏联领导集团觉得万分重要的是：不仅要隐瞒关于斯大林清洗的真相，而且不承认有几百万人参加了这些血腥镇压；我猜想，其原因之一就是不让俄国人感到国家犯了罪。因为红色恐怖可能是由一个人下令干的，就象希特勒迫害犹太人那样，但是，执行这个命令的却有成千上万的人，使他们的敌手同时也使他们的同志送了命。正是这种国家的罪行，使得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搞清洗的揭发，不仅成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暴露，而且成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政治举动。它对全体人民，而且无疑地也对他本人来说，都充满了危险和不安的情绪，尽管他认为这种揭发在策略上是有效的做法。也正是这种国家的罪行，使得索尔仁尼琴成为俄国人眼里这样一个具有爆炸性的危险作家，特别是他的作

品《古拉格群岛》。这本书和他初期一些关于劳改营的作品，使得俄国读者意识到他们自己，或他们的父母，或者他们的同胞所犯的罪过。这个政权本能地懂得，这种意识之所以必须加以压制，不仅因为这会要求共产党出来承担责任，并有缩小权力的危险；也因为这会逼得全体人民起来反对国家所具有的犯罪能力；这一举动会削弱民族爱国主义，而这种爱国主义却是今天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所不可缺少的部分。

矛盾的是，尽管俄国人有着精神上的民族优越感，但是，在苏联报纸上大肆吹嘘苏联在一切可以想象得出的领域里都首屈一指，都是最大和最好等等，又似乎是对其在科学、技术和商业以及在近代的种种实用科学成就方面不如西方的那种根深蒂固的民族自卑感的一种补偿。正是斯大林提倡盲目崇拜苏联，而把俄国的种种成就都夸大为天下第一，尽管他也坦率地讲到俄国的落后并不得不设法克服它。在他统治下，以沙文主义的态度夸大俄国的成就，达到了可笑的程度。百科全书上声称：发明无线电的是亚历山大·波波夫而不是马可尼，发明电灯泡的是亚历山大·洛迪金而不是托马斯·爱迪生，伊凡·波祖诺夫比詹姆斯·瓦特早二十一年发明了蒸汽机，以及亚历山大·莫扎伊斯基早在赖特兄弟之前就将第一架飞机送上了天。斯大林死后，这种吹嘘俄国第一的官方政策已经降低了调子。

但是，今天许多刊物仍然存在这种做法。城市知识分子由于对西方事物抱有崇拜的心理，因此经常以"俄国是大象的故乡"这句俏皮话来嘲笑这种极端愚蠢的沙文主义。

但是，在苏联社会里，上上下下都存在着一种非常强烈的、保守的、典型的俄国信念，即"我们的最好"。这句话经常出现在谈话里，而且往往没有什么特别的道理。有一天晚上，我乘苏联国际旅行社饭店的电梯去参加一次大型的国际招待会，听到两个俄国中年妇女在赞赏几位要去参加招待会的苏联年轻妇女所穿的那种半正式场合的服装。虽然她们的穿着并不如电梯里的几个外国客人那么时髦，可是，那两个女人却很洋洋自得。"我们的姑娘不是很漂亮吗？"其中一个啧啧喳喳说。"是啊，我们的最好，"另外一个妇女作了这种老一套的回答。

不管是在谈论姑娘、水坝、宇宙空间成就、拖拉机还是冰球队，思想保守的官场人物或是普通老百姓总是那么自然而然地说出了这种想法；因此，较无国家偏见的年轻人都津津有味地谈论这样一位共产党官员的笑话：这个官员的妻子刚刚发现她丈夫找了一位芭蕾舞演员作情妇。她硬是要到大剧院去看看她的情敌。他们刚刚同其他的首长们在包厢里坐定，帷幕就升起了，舞台上出现了一只苗条的展翅天鹅。妻子用

肘轻推她丈夫，问道，“就是这个吗？”“不是，”他答道，“那是彼得洛夫的。”妻子说，“我很高兴，她的两条腿太细了。”过了一会儿，妻子带着疑问的眼光指着另一个如羽毛般轻盈的演员。丈夫说，“不是，那是伊凡诺夫的。”妻子说，“好，她的脸长得不漂亮。”最后，丈夫指着站在舞台后面的一位演员。妻子细看那个年轻舞蹈演员，然后带着沾沾自喜的笑容，身子往椅背一靠，咯咯地说道：“我们的最好。”

这种不顾场合的民族自负，由于一种对苏联威力和成就所产生的维多利亚式自豪感而加强了。瓦洛加，一个年轻的善于钻营的共产党员，在谈到德国人和其他一些国家依靠苏联的天然气和石油时，就在他那沙文主义的老爷态度中表现了这种民族自负。一位英国外交界的朋友，经常访问东德，偶尔也同俄国士兵交谈，发现他们嫉妒德国人的生活水平，却仍然觉得自己比德国人优越，仿佛只要他们是莫斯科力量的一部分，就可以弥补其他一切缺陷似的。只有很少几个持不同政见者在红场示威抗议苏联带头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他们甚至在能够扬起他们的旗帜以前就遭到逮捕了。在娜塔利亚·巴兰斯卡娅那本描写职业妇女一周生活的小说《平凡的一周》里，当那位妻子向她的丈夫提出，他们应该讨论“越南和捷克斯洛伐克”那样的正经问题时，就隐约地透露了某些属于权势集团的知识

分子的不满情绪。目光敏锐的苏联知识分子觉察到，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同美国入侵越南，在这里已被持不同政见者巧妙地划了个等号。

但是，除了群众对入侵极其漠不关心之外，很多人显然对苏联使用武力感到自豪，就同十九世纪英国人对维持他们的帝国统治感到自豪一样。这是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一种特征。1968 年 8 月，在苏联人开始从西方的无线电广播里风闻了入侵的消息时，我所认识的一位俄国作家正在索契度假。他回忆道，"在那儿，人们对发生的情况感到很高兴，他们说，'我们的军队终于进入了捷克斯洛伐克。我们早就该这样做了。现在我们应该继续干下去，对罗马尼亚也要这么干。'这些人乐于看到俄国使用它的武力。他们极其尊重这种武力。他们喜欢看到施展俄国的威力。"那个国营农场会计根纳季说，在他所认识的农场干部和农场工人中确实也是这样看法。"他们相信这样的弥天大谎，即苏联之所以非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不可，是为了帮助那儿的人民，"他说。"（这次干涉）是他们自己的国家值得自豪的事情。"另一个朋友、一位年轻的科学家曾就民族主义狂热的问题进行过哲学上的探讨。他发现同他在一个病房里的一个普通司机在入侵布拉格时是一个坦克驾驶员。按照他的说法，这个驾驶员是一个极其讨人喜欢的俄国人，但是，却象在（越南）美莱的美国兵

一样，是个盲从而残酷的爱国者。他对那个科学家说，他和他的同志们对那些只要看上去有反对派嫌疑的捷克人，立即加以消灭。这个驾驶员说：只要有一个当地人出现在屋顶上，而且不管怎样，只要看来他对坦克手具有威胁，"我们就把大炮瞄准那幢房子，把它的屋顶轰掉。"那位科学家由于私下里反对干涉，因而对那种不必要的屠杀表示了一些不安。但是，那个有着"克瓦斯爱国主义"思想的驾驶员却不以为然。他对此觉得问心无愧，他说，"因为他们都是法西斯分子。"

作为一个民族，俄国人在感情上是同美国人一样献身于和平的。但是，官方对战争的宣传——反复重弹警惕和备战的老调——却做得大大地超过了西方。由于越南战争，战争问题就成了美国一个意见有极大分歧的争论，但是，在苏联，它却是一个毫无异议的一致的教条，被用来证明今天的许多政策是正确的。

即使在缓和的时代，苏联领导集团为了对缓和进行消毒，也还是有意识地利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使苏联的爱国主义感情保持生气勃勃的源泉。毫不奇怪的是，比如说，许多对诸如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等持不同政见者立即写信谴责或者对西方思想意识渗透的危险提出告诫的人，都说自己是当年的老战士。间谍电影和战争回忆录经常叙述或暗指西方，即使在战时

与俄国结成同盟时也是不可信任的。经常放映战时俄国被围困的影片，就含有认为采取下面一些措施是正确的意思：比如继续征兵，高等学校的军事训练，沉重的军费开支以及苏联消费者必须作出牺牲，等等，因为据说美国、德国和西方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都是受军火生产推动的，因而决不会让国防预算降低下来。

对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已是一种遥远的和不足道的抽象事物，是属于近古史的一页，是在另外一个舞台上演的一出戏。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并没有象欧洲人那样感到切肤之痛的往事。我们既未能理解法国人、波兰人或俄国人对德国人究竟天生有多么强烈的反感，也未能领会陈旧的战争故事对他们今天的情绪会有多大触动。我们同德国的关系已经由一个新纪元、一种新的贸易和外交关系确定下来了。在美国，剪贴薄和战争勋章也许只会在阴雨绵绵的午后才拿出来欣赏。偶尔也出现一本关于波茨坦的新书或者放映一部关于诺曼底登陆的电影。但是，对战争的显著的印象已经消失了。朝鲜和越南模糊了人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一种全民的经历和当代政治的一种因素，其重要性也缩小了。

这同俄国人形成的对照是再生动和再明显没有

了。对他们来说，战争有一种神秘的味道。在饭店里或旅馆里，在火车上和飞机上，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一旦发现他们曾经是在同一条战线上待过的士兵、护士、军官或记者，或者曾经在同一个战役里经过同一个城市或铁路枢纽，就会立刻交流起战争故事来了。当时还是孩子的那些人，就会既悲伤又满意地回忆起在希特勒的军队包围列宁格勒或威胁莫斯科的时候，他们离开了父母，在塔什干、古比雪夫、乌拉尔或其他更远的地方当了几年难民，靠极少的配给面包活了下来的岁月。俄国人很喜欢出席过去的战斗单位每年一次的聚会，因为这种场合与政治会议不同，他们可以接触到真正的感情。“在前线”这个词儿在战后三十年的苏联生活中听起来还相当神圣，那些老战士在许多公开场合还自豪地佩戴着他们的奖章。苏联人似乎一字不差地记取这句格言：“决不能忘掉任何事物和任何人。”访问苏联的西方人士无不经常听到关于战争的唠叨，无不老是碰到大屠杀的话题，无不听到人们用战争来解释苏联经济所以落后于西方的原因，这样就使人觉得，对苏联人说来，战争还是昨天才结束似的。

旅行者从机场驶向莫斯科的路上，要经过一个巨大的、僵直的坦克陷阱似的纪念碑，象是三个巨大的千斤顶那样，象征着纳粹当时已挺进到离首都很近的地方，而俄国人就在那儿把纳粹打了回去。在敖德萨，旅

游者被领去参观在德国和罗马尼亚军队占领时期游击队躲避过的洞穴（当代的导游人员已轻易地忘却罗马尼亚人——现在的共产党人——是以前的敌人了）。在立陶宛，树立着一个枯瘦的母亲的塑像。它是一个受到两支强大军队猛烈炮火夹击的小国所遭受到的痛苦的缩影。

苏联让尼克松总统两次来访问，第一次领他到列宁格勒的皮斯卡列夫卡公墓，这里的几英亩墓地埋葬着战争死难者，令人痛苦地回想起该城被围九百天中所遭受的惨重的人员伤亡；而在两年以后，又领他到白俄罗斯的哈蒂恩，那儿有一个纪念碑和一个男子温柔地抱着他的行将死去的幼子的铜像，追念被纳粹军队洗劫的一个村庄以及被活活烧死的一百四十九个村民，因为纳粹军队怀疑这些村民在纳粹战线后方开展支援游击队的活动。

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实际上在俄国的欧洲部分，白俄罗斯、乌克兰或者波罗的海沿岸诸共和国，没有一个城市或一个村庄没有自己的战争纪念碑、墓碑、纪念战死者的不灭的火焰。在北高加索那样的地方，纳粹军队曾攻占厄尔布鲁士峰并向油城巴库推进，那儿的战争纪念碑尽量利用各族人民共同保卫该地区这个主题——说明俄罗斯、乌克兰、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卡拉查耶夫和契尔克斯各民族的大团结。即使在一个滑雪

胜地的旅馆里，也有战争纪念室。

在古城普斯科夫，象这样的一种展览，使我久久不能忘怀。在历史博物馆里，安和我刚刚看过沙皇时代的圣像，银的圣餐杯和酒杯等收藏品，突然走进了一间专门陈列一幅1944年普斯科夫战役的大型全景画的房间，其中还陈列有缴获的德国武器，当地一些英雄的照片和他们的奖章，五个游击队员被德国兵吊死的可怕的照片，两个人在绞架上晃来晃去，另外三个则刚要吊上绞架。另一个怪诞的画面是，在城镇广场上，枪决十个穿着普通农民服装的军人，在现场上有许多被召集来目睹行刑的妇孺。这种把战争创伤保留下来不使它愈合的做法，似乎有一种受虐狂的味道。

可是，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做法正在减少，因为加强对战时情况的回忆，不仅能够加强爱国情绪，而且可以强调今天保持警惕和随时作好准备的必要性。令人惊奇的是，在1975年同盟国战胜德国三十周年的时候，报纸上竟然发出了如此大量的战争宣传，以致某些西方专家们列了表来说明这种宣传量要比在1965年或1970年在欧洲胜利二十和二十五周年的时候大得多。有时，战争宣传和现实问题的联系是相当明显的。1972年在尼克松—勃列日涅夫首次高级会议后，一群美国大学生外出野营经过苏联时，在俄罗斯中部靠近奥廖尔的一个野营地的露天电影院看到了一个节

目。那是一部渲染战争气氛的、放映一小时的剪辑纪录片，内容是美国喷气机轰炸北越，以色列空袭阿拉伯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进攻苏联，以及一些战时的坦克战。“总之，似乎战争是昨天刚刚结束那样，”一个美国人后来不免有点不寒而栗，他说，“他们为什么不能忘掉这种事呢？”

苏联的文化生活也浸透了战争的主题，而且几乎总是渲染英勇的而不是恐怖的色彩。“他们不希望把全国的人都培养成和平主义者，”一个俄国学生对我这么说。不仅在工厂里“动员预备役”和值好“一班岗”这类大量军事术语已成为经济中通用的词汇，而且战争主题已成为书本和电影最普遍的题材。有些赤裸裸地宣扬沙文主义；有些则比较含蓄和饶有兴味，因为苏联的作家们发现他们可以利用战争在政治上的神圣地位来进行实验。

一位名叫瓦西里·贝柯夫的白俄罗斯作家，因为创作了一些描写游击队的中篇心理小说而名噪一时，书里写了一些人丧失斗志而同敌人合作，另一些人则壮烈牺牲。康士坦丁·西蒙诺夫原来是武装部队的报纸《红星报》的军事记者，由于他那些日记和小说里浮光掠影地描写到一些战斗场面和战略构思以及战争年代一些领袖的半纪实的情景，实际上他已成为全国最出名的作家了。标新立异的塔甘卡剧院上演了《这儿

的黎明是静悄悄的》，这出戏写的是几个俄国妇女在苏芬边境附近被纳粹部队所杀害的故事，剧情非常动人，演出效果极好。其他一些作品则记述了老战士们的团聚，国内战线上的妇女问题，一个年轻女人对她那个死于前线的丈夫不忠等。

伊凡·斯泰德纽克的一部低级趣味的小说《战争》，激起了一种沙文主义的情绪，并为斯大林塑造了近年来最令人崇拜的形象。尤里·邦达廖夫的《热的雪》回忆了英勇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并对斯大林百般赞美和谄媚。书中一个人物回忆到斯大林时说，"这个人的音容笑貌深深地印入了他的脑海，比他死去的父母的面貌的印象更深刻，更难忘。"我在苏联的时候，战争影片的老祖宗是《解放》，这是一部有五集之多的影片，《乱世佳人》同它比起来也相形见绌，成了短片了。它完全回避了战争初期斯大林惊慌失措、俄国军队晕头转向地狼狈溃退的情况，而是从战争的转折点写起，一直写到占领了柏林的第三帝国国会。每年发行的其他战争小说和电影多极了，连最主要的也不胜枚举。提一提下述情况也就够了：在任何季节里，关于战争的书总是畅销书，而在苏联银幕上，战争题材的重要性超过了西部片对好莱坞的重要性。

间谍电影和间谍小说是俄国人的另一种癖好，在别的国家都在找情报机构的岔子期间，苏联的间谍却

依然是民族英雄。它们也不是象詹姆斯·邦德写的那种讽刺挖苦的故事。在1974年下半年，当美国报纸痛斥中央情报局在智利所扮演的角色时，苏联报纸却不停地歌颂苏联的超级间谍理查德·佐尔格，此人曾在东京伪装成纳粹的记者，事前将纳粹侵略波兰的日期以及希特勒进攻苏联的计划通知了克里姆林宫。然而，斯大林对佐尔格这两次警告都不予理睬，这一事实却始终被略而不提。到了中央情报局由于窃听国内情报而受到指责时，苏联那份最富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月刊《新世界》却在刊登一部歌颂英雄的小说，描述了1944年"消灭间谍"这个反谍报机构如何粉碎抗击纳粹的波兰民族主义的非共产党游击队的活动。该杂志将这部小说"献给那使得许多人深受其惠的少数几个人"。要是在美国做同类事情的话，《纽约人》就应该刊登一部以浪漫主义手法描写艾伦·杜勒斯和理查德·赫尔姆斯的连载小说。近年来苏联最受欢迎的两部电视连续播送故事是《春天的十七个刹那》和《盾和剑》，都是叙述苏联老牌间谍渗透进了纳粹统治集团内部的故事，毫不考虑这种电视对缓和的影响。然而，在1974年芬兰电视台放映《长统丝袜》时——这是美国在1957年拍摄的粗俗的滑稽音乐片，描写苏联特务在巴黎的情况——苏联大使馆却提出了强烈抗议。

俄国人利用各种文艺形式演出富有爱国主义精神

的节目。莫伊谢耶夫舞蹈团演出的最吸引人的剧目之一，就是一个十分出色的舞蹈《游击队员》，由穿了两襟象大翅膀的黑色哥萨克外衣的一些演员演出，每个游击队舞蹈者简直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兀鹰或大乌鸦。一个游击队骑兵先出场，又出来一个，接着是一长队骑兵平稳地滑行前进，他们的脚藏在大氅下面，高速移动，就象骑着马在黑夜里驰骋似的。突然间，舞蹈演员解开了墨黑色的斗篷，顿时出现了各个不同的民族和各行各业的人——年轻人，女游击队员，壮实的斯拉夫人，外貌象日耳曼人的波罗的海沿岸各族人，象爱斯基摩人的雅库特人，中亚细亚人，铁路工人，战士，伞兵，水兵。这个舞蹈极其成功地表现了全苏各族人民英勇的团结一致，演得很精彩。总之，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宣传，使人想起了战争的功绩，也是一个轰动一时的艺术作品。苏联观众喜爱这个舞蹈，这个舞蹈还曾在世界各地公演。

三十五岁以上的俄国人大都不必怎么提醒就会回忆起战争来。我听到过很多关于个人经受严峻考验的悲壮故事，但是，一位细长而精神充沛的艺术家，有一次却对满屋子的人风趣地回忆了他在战争年代中作为一个航空机械师的经历，把大家都给逗乐了。他说，每个人都发疯似的想弄到随便一种什么酒来忘掉痛苦、寒冷和恐惧。大家的得意杰作之一，就是把起落架箱

子里的液体抽干，然后把油和酒精的混合物用防毒面具过滤。这是一个又慢又累的操作过程，不过，却可以制成一种勉强可饮的饮料。“当然，”他说，“等到液体被抽掉了以后，飞机就斜向一边了。”

另一个人，高加索的一个导游人员，他比大多数人更能宽容德国人，因为德国兵救了他，使他免于一死。当他还是被占领区里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时，他被强征去做苦工。有一次他把一根电话线杆弄倒了，倒在一个德国中士的肩上，因而激怒了这个中士。狂怒的中士挥手叫他走到附近的树丛里去，并且啪嗒一响拉开了手枪皮套。其他德国兵感到马上要出事了，就对着中士喊道，“威利，我们知道你疯了，但是不要干这种可怕的事。”那个中士两次要拔出枪来，都被其他一些人阻止了。最后，俄国人说道，“那个中士狠狠的揍了我一拳，把我撂到十五英尺远的地方去。但是没再干什么。所以，我可以说，在德国人中间有些人还是有人性的。他们救了我的命。”他的看法比绝大多数人都更为仁慈。

在摩尔曼斯克，有一个海洋生物学家，他在战争中失去了父亲、一个叔父和另外七个亲戚，他简直不能容忍同西德搞缓和的政策。“我知道世界需要和平，”他严肃地说，“但是我恨德国人。”我私下里还听到过其他一些俄国人对勃列日涅夫太信任维利·勃兰特和德

国人表示担心。在撒马尔罕，我感到有些人仍然对德国人怀着敌对情绪。一个小店主正出售乌兹别克帽子，我问他什么价钱时，他把我当成德国人，竟拒不回答我。等到我再问一次时，他狠狠的顶撞我："我们这儿不为德国人服务。"在莫斯科，有一位年轻的东德技术员，他在朝列宁格勒方向、离莫斯科一百五十英里的一家工厂工作和培训，他告诉我说，俄国乡下人那种敌对情绪很使他震惊。"在他们心底里，他们根本就不认为战争已经结束了，"他说，"他们所想的一切就是'德国人要杀我们，我们也要杀德国人。'然而，我告诉他们，'你看我，我是个德国人，然而我并不要杀你们。战争已经结束了。我们正在我们那部分的德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年轻人是那么害怕俄国人的火气，以致他不敢同他的工人伙伴们一起喝酒，尽管他正在参加一项官方主办的关于工作效率的研究计划。这些工厂的工人对东、西德不加区分，这使他大为苦恼。"我同他们辩论了一整天，我告诉他们，我们这部分德国是他们的朋友，而且我们也在建设社会主义，"他说，"但是看来这一切都不顶用。对他们来说，德国人就是德国人，他们恨所有的德国人。"

尽管这样，当局还是很担心那些经历过战争的人们所感受到的爱国献身精神，没有能强有力地传给青

年人。颁布法令，评论电影和举行作家会议，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年轻人自幼就被灌输一种思想：要对战时所作的一切牺牲表示应有的敬意。在我记忆中有一个不能磨灭的场面，就是一群十一、二岁的男女少年，充当仪仗队在战争纪念碑前站岗。我记得在敖德萨的一个刮风的秋日下午，那儿有一座俯瞰大海的纪念塔。天空满布密云，狂风激起了白帽浪花。四个戴着红领巾、身穿白衬衫、蓝裤子和裙子的少先队员在那儿警戒，象士兵一样严肃，站立在纪念塔的四角。我同一个导游人员一起刚巧在他们换岗时到达那儿。我们停下来观看。一支新的小分队正顺着一条长长的小路行进，臂膀大幅度地摆动，他们那种缓慢的步伐不禁使人想到莫斯科列宁陵墓上克格勃卫队的整齐步伐。脚下踩着沙砾路面发出的嘎吱嘎吱声，体现了他们在整个仪式中步伐的节拍——肃穆，有纪律，极其忠于为祖国站岗的神圣职责。

这同苏联全国中学实行实际上的军事训练，对年满十八岁的人实行普遍征兵，以及苏联大学生都要严格地接受强制性的预备役军官训练等，都是一码事。我们第一次发现这种平民生活中的准军事活动网，是在我们的十一岁女儿劳丽到列宁山上去玩一种军事游戏"闪电"的时候。这种游戏是她念书的那个俄国学校里一位军事教官给六、七年级同学组织的活动。这种

活动看来极象夏令营的夺旗游戏，所不同的只是它进行得极其认真。劳丽回家来对我们说，两个班级，十一到十三岁的儿童，已先由一个穿军服的军事教官训练过编队行进和向左转、向右转。她在我们的起居室里表演了行进和向左转、向右转。他们分成两个组，一个组用蓝色布片缝在袖子上，另一个组则用绿色布片。戴蓝色布片那一组先开始分散到山上去，象游击队员那样，戴绿色布片那一组就穷追他们，撕下他们的标志，把他们当作俘虏押回来。“我们不能玩得太久，因为天气太冷，”劳丽说，“地上有雪。因为他们把我留下来看管俘虏，我着了凉。”远征包括操练和一场活动在内，差不多占了课后的四个小时左右。所有的学校全都这样搞法。在高年级里，由于教官教他们初级的野战战术，因此，游戏的复杂性也增加了。我在列宁山附近不远的地方打网球，往往不时看到一队队儿童在树林子里急奔而过在玩“闪电”。我所认得的一个美国大学生，有一天吃惊地看到一群学生穿上深色海军制服，不仅捕获了他们的对手，还玩了一整套过程，叫抓来的游击队面对墙壁，排好队，假装枪毙他们。而那些被害者顿即倒下去死了，做得非常逼真。

这只不过是许多活动中的一种，这些活动却使我联想到在苏联社会中区分平民生活和军人生活的界线远远没有西方那么重要；而在西方，这条界线是很鲜明

的。苏联的国家保健计划的宗旨是“准备参加劳动和保卫国家”。电视节目《来吧，小伙子们》企图在青年中开展地区性和全国性的射击比赛以普及各种军事技术，普及自卫技术以及熟悉有关服兵役的苏联法律。十四岁的少年就可以参加“苏联陆海空军志愿协助会”，这是一个以训练平民“具有随时准备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利益的精神”为目标的齐心协力的组织。在美国并没有一个真正能与苏联陆海空军志愿协助会相当的组织。这一组织的职能把四健总会[①]、童子军、青年会、民防系统、美国军团[②]和国民警卫队的职能都包括进去了，其分支机构遍及苏联农庄、工厂、机关和城市的里弄。这是一个范围庞大的机构。我吃惊地听到说，有一位苏联官员在一次公开演说中透露，“苏联陆海空军志愿协助会”有六千五百万会员。在一篇苏联书籍的简介中说，该组织教授军事历史和战术课程，发展民防设施，培训青少年驾驶和维修各种车辆，使用和维修无线电和电子设备，制作和设计飞机模型，并进行跳伞活动、射击和学习“有军事意义”的专业。该会还举办驾驶俱乐部和学校。对爱好养狗的人，该会订有计划，可为他们供应适于军事目的的品种。凡是领养

① 四健总会是所谓促进儿童的头、手、心、身体健康的美国农村儿童组织。——译者

② 美国退伍军人组织之一。——译者

这种狗并让它们参加训练的人，就有资格获得额外的居住面积。

对真正热衷于军事生涯的人来说，苏联至少为他们建立了一百三十五所军事院校，培养少尉以上的军官，而在美国却只有十所这样的院校。在全国范围内，青年真正开始军事生活是在九、十年级，即苏联普通中学的最后两年，此时，男女学生一星期要上两次军训和民防的必修课。一位俄国朋友送给我的一本教科书，一开头就是鲜明的冷战词藻："苏联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帝国主义者们是无恶不作的。"在1973年版的教科书里，有四行关于苏美缓和的字句，中间却夹着这样的引起人们警惕的话："美国并没有改变其侵略方针，"而且"近年来备战的需要已有所增加，因为帝国主义集团，特别是美国，在加剧国际紧张局势，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丝毫没有减少。"这是为全国中等学校所有的学生而写的。

那本教科书接着便马上转而叙述苏联的武装部队，并对拆卸武器、从战壕扔出手榴弹、卧射、构筑反坦克壕和进行野战演习等作了指导。每年夏季，中等学校的男生都到部队去五天到一个月。他们背着背包作长距离行军，进行战术性的野战训练，挖民防掩体并用各国游击队所广泛使用的闻名于世的卡列什尼科夫冲锋枪之类的武器进行射击。"在苏联，相当于美国的迪

克斯堡和杰克逊堡那样的基本训练营，就设在苏联的中等学校内，”一位美国武官对我说，“他们是由教育部而不是由国防部支付经费的。”

在六十年代后期，一个俄国孩子告诉我，在夏令营的野战演习中和课堂讲授中总是把美国人明确地定为敌人。但是，在七十年代，随着缓和的到来，有些夏令营里就不这么明白地提到美国了，不过，孩子们仍然明了所指的是谁。这个少年说，射击场的人形靶子，都戴宽沿帽——“这是资产阶级的象征，这样，我们‘就都受到[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的正确指导。’”另外一个长得又瘦又高的十几岁的少年向我透露说，他感觉那种例行手续实在是太认真了，从第一天开始便进行从头到脚的搜查，以确保没有人私带烈性酒或其他违禁品进入夏令营。“伙食实在糟透了，我简直难以下咽——我整天空着肚子，”他悲叹道。他的父亲是个和平主义者，由于他的儿子回来时已抛弃了对军队那种浪漫的幻想，他感到大为高兴。“我起先并不喜欢这种玩意儿，”父亲承认道，“但是，它也有它的好处。现在这些孩子对军队已有了现实的看法了。”

其结果之一就是很多年轻人拚命设法钻进高等院校，随便哪一个院校都行，只要能取得一个预备役军官资格，免得去服两年的兵役。但是在大学里，课程也比美国后备军官训练队计划要严格得多。在升到高年级

以前，除了关于行列、队形，军事法规和两个月野营等标准训练以外，苏联陆军还使每个学生的学术专业在军事上得到应用。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年轻语言学家告诉我，语言系学生都准备当军事翻译。他说："我们都在我们的课程中学美国武器的所有专门术语，以便随时准备接受动员。"一个女生物学家说，生物系学生要上保健措施的课程，以防核袭击，还要学习军事寄生虫学和军事微生物学。国立莫斯科大学的女生，以及其他各处的女生，都同男生一样到打靶场进行射击。"我就卧倒在我们的上校教官旁边，他教我如何握住卡列什尼科夫冲锋枪，"女生物学家面带笑容说。她是一个诱人的姑娘，有着淡黄头发和典型的斯拉夫人脸庞，加上她那双细小的鞑靼人眼睛，甚至更使人着迷了。"我打了三次。我连墙壁也没有打中。他们找不到我打出去的子弹。但是那个上校喜欢我。他给了我及格。"

苏联定期地利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紧锣密鼓的宣传以支持缓和政策，尤其是把它作为某些重要西方领袖来访的前奏。1972年尼克松总统即将来访以前，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就写了一首关于美苏军队在易北河会师的感情洋溢的诗歌，以唤起对战时盟国和共同战胜纳粹的愉快回忆，从而为这次访问定了

调子。我碰到相当多中年人，他们还留有同西方人士合作过的温暖的个人回忆，这些人曾在美国飞机降落的机场工作过，或者在摩尔曼斯克工作过，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大量西方物资就是从那儿运进苏联的。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苏联的宣传却闭口不提合作的具体情况，而是提出了不信任和有争执的问题。

例如在摩尔曼斯克，市政官员只是在口头上提到战时的合作，而在市博物馆里——有很多房间专门用来陈列有关战争的展品——去参观的俄国人却根本没有机会了解到盟国租借法案的情况。我在那些满贴在墙上反映纳粹轰炸摩尔曼斯克造成浩劫的成套照片中，发现有一期《哈泼斯》杂志，杂志翻开的一页，是一位美国记者戴夫·马洛写的一篇文章，他曾乘盟国护航舰到达摩尔曼斯克。他描写了那次在德国潜艇和飞机追踪下进行护航的情况，以及船员们在抵达目的地时感到如释重负的心情。接着他刻画了摩尔曼斯克所遭到的悲惨的劫掠。但是，只是把他描述摩尔曼斯克的部分印象翻成了俄文，至于对护航队受到射击的情况，盟国的援助，或者为什么一个美国人会来到摩尔曼斯克等，却一点也没有提到。

由于好奇心的驱使，我问热心的博物馆馆长叶莲娜·巴甫洛娃有没有关于盟国护航队的数字，或者由盟国提供并从摩尔曼斯克运进的援助物资总数的材

料。“我在这里工作的时间内，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数字，”她说。她建议我不妨到那个漂亮的新设的市科技图书馆去试试看。那儿的馆长薇拉·波波娃是一个胸部丰满、仪表堂堂的女行政领导人，她花了两三个小时自豪地带我们参观了明亮的现代化大楼。参观以后，我问起了关于护航舰队的问题。她似乎很有把握地派了几个研究工作人员去找材料。一小时左右，派去找的人回来了，带来了一份薄薄的材料，上面说在1942年有九十三艘苏联船只参加了进口军事物资的运输工作，但是，对英美援助问题却只字未提。再找资料，还是找不出名堂来，这使得陪同我的官方主人尼古拉·别利亚耶夫大为尴尬，此人是地方党报《北极真理报》主编。但是第二天，他得意洋洋地拿来了一本书，上面有一段提到“在战争的日子里把船只开到这里来的外国海员”。但是，这段话的意思却与援助一点也没有关系，而且也没有提到援助的问题。反之，它却引用了外国人赞扬协助扑灭船上火灾的“苏联边防军的功绩”的话。虽然提到了两艘船的名字，但是没有说明船只的国籍，也没有说明它们所以到摩尔曼斯克来的原因。这种避而不谈的笨拙做法，只能说是故意的，说明审查官禁止提到英美在苏联战争中提供了一百五十亿美元的援助。

一个苏联记者和一个电影导演后来确实向我证实

了这一点。他们说，由于这一原因，大多数俄国人都认为美国的战时援助不过是些他们并不放在眼里的罐头猪肉。《真理报》评论员尤里·茹可夫于1973年在电视上曾提到美援实际上包括飞机、卡车、吉普车、配件和其他重要设备。那个电影导演认为，这次报道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发展。“这是多少年来我国人民第一次听到关于你们的租借法案之类的事情，”他说。我从没有听到这个节目重播过。

对克里姆林宫来说，全面而坦率地报道西方对苏联战争所作出的贡献，是不符合苏联在战争问题上所抱有的种族中心主义观点的，这种观点往往忽视战争的全球性质，而是把俄国看作中心，把其他一切都看成次要的陪衬。诚然，这是一切国家所共有的缺点，但是，俄国人却用他们的书刊审查制度把这个缺点发展到了极端。要是承认莫斯科在紧迫的时候不得不依靠西方的帮助，那就等于给民族自尊心以狠狠的一击。由于某些根深蒂固的自卑感，这类消息向来是被扣压不发的，不论是对战时援助、赫伯特·胡佛的美国救济总署在二十年代初期的饥荒救济（这在苏联的大百科全书里被说成是进行颠覆和谍报活动的一种掩护），或者是对1972年向美国大量购买谷物等问题，都是这样。

在俄国人看来，战争也不是自然而然地成了盟国合作的一个象征。时至今日，他们对西方在战争中的

表现仍有怨言。为了思想意识上的团结一致，他们的一些庆祝会经常宣扬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在战时抗击纳粹的微不足道的战斗情况，却很少谈到英、法或美国人在战时的贡献。但是，除了共产党国家团结一致这条官方界线，我发觉自己还被下面这种论点弄得穷于应付，即认为西方有意识地拖延对诺曼底的进攻，听任纳粹集中兵力对付俄国人。这一点被俄国人普遍认为是一种有意的背叛行为。许多人在这一点上引证了斯大林的话，尽管他们总是避而不谈斯大林同希特勒在1939—1941年签订的条约，从而使德国人能够在战争初期集中全部力量去打英国人，不必分心于东方第二条战线。大多数美国人在被问到诺曼底的问题时都没有想到这一点。我自己的回答是，我们并不是要俄国人流血，因为我们当时根据租借法案通过摩尔曼斯克源源运来了价值几十亿美元的物资。而俄国人总是反唇相讥说，美援是菲薄的，只不过送来一些罐头猪肉而已。这种反应来自一个理应更了解情况的外交部官员和一个颇有名望的记者，也来自那些也许真的不了解情况的普通人民。至于那些了解并愿意承认西方战时援助规模确实比较大的人当中，其反应通常总是："援助只不过是些美元，我们付出的却是鲜血。"

战时另一个影响到今天东西方气氛的引起极大不

满的因素就是苏联人普遍认为：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盟国曾背着莫斯科企图通过艾伦·杜勒斯在瑞士同德国人秘密地进行一桩和平交易。这就是风行一时的长篇连映电视间谍片《春天的十七个刹那》的主要内容。这部影片塑造了一个两面派美国人的形象，伪造了历史。而片中的苏联间谍是一个英俊的名叫斯特尔里兹的移民，他打进了盖世太保，获得一个很高的职位，揭露了纳粹德国党卫队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企图通过党卫队驻意大利司令阿尔伯特·凯塞林陆军元帅同西方单独媾和的阴谋。据说只是由于被才华横溢的斯特尔里兹和老练多疑并意识到“盟国诡计”的斯大林所识破，这个阴谋才没有得逞。尽管电视影片和作为影片基础的故事是被描述为完全“以事实为根据”而介绍给苏联观众的，然而，当年莫斯科在纳粹德国党卫队的最高层并没有闻名的超级间谍。另外，作者尤利安·谢苗诺夫为了使所谓的西方叛卖行为显得更加可耻，故意缩短了事件发生的实际时间，介绍了一段与公开发表的外交文件彼此矛盾的历史。按照国务院1968年发表的有关苏美战时信件往来的档案看，会谈是凯塞林的一位副官倡议的，而且所涉及的是在意大利的（仅仅是在意大利的）纳粹军队有可能投降的问题。当时艾夫里尔·哈里曼大使曾立即通知苏联政府，而且还邀请他们参加会谈。然而，在文件里一点也没有提到

同希姆莱或同其他任何德国人签订任何广泛政治性和平条约的事。但是，这些文件倒确实描绘了斯大林近乎偏执狂似地拒绝接受美国诚意邀请俄国人参加会谈的情景，最后，罗斯福总统惊讶地听到斯大林的指责，愤而提出了抗议。

这部长篇连映电视片颇使苏联当局感到棘手，因此一直延搁到1973年夏天勃列日涅夫访美结束以后才首次放映。但是，由于这部片子的质量很高——从技术上和戏剧性上来说，它是我在苏联所看到的最好的长篇连映电视片——它立即引起了轰动。这部片子大受欢迎，因而在当年秋天又重映了一次，而且它的政治含意对全国广大的观众产生了特殊的影响。在这部连映电视片放映第二遍之后不久，我同一位歌剧演员和一位陆军上尉——在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的火车上，他们和我同住一个单间——讨论了这次演出。他们两人都坚决地认为，在大战将近结束的时候，美国确曾背叛过。我提到了历史文献，他们却不感兴趣。

"幸亏斯大林发觉了这个问题，否则，就给我们造成麻烦了，"那个歌剧演员说。

"这件事干得很不体面，但是，当时就是那么回事，"上尉仍一味坚持说，"我们对此也有文献材料可以证明。当然，电影是虚构的，但是，我们知道背着我们干了些什么。"

十三　西伯利亚

永久冻土上的高大建筑

我不赞成那些胆怯的自我陶醉的梦想家，
他们的志得意满中含着幼稚天真。
我
　　赞成那些乐于战斗的人
　　不赞成那些依赖祈祷的人，
赞成付诸行动的理想家！
赞成那些
　　已在着手改造世界的人。……
　　　　叶甫图申科，《使者们去见列宁》

俄国人是寒冷的鉴赏家。他们喜欢冬天的降临，那时候，白雪给屋顶和窗台披上一件任何季节都极为需要的白皑皑的新装，奇妙地把莫斯科那样一座城市的单调、灰暗的容貌变得比较明亮而悦人。在阴沉多雨的秋天之后，我自己也开始欢迎这驱逐了淫雨之秋的冬季的到来。冬天的日照时间虽短，但阳光灿烂，明彻湛蓝的天空美极了，寒冷的空气，清新而又令人神怡

气爽。

但是，我必须小心，以免被虚假的初冬迹象所迷惑。在我寓居莫斯科的第一年，十月中旬就下了一场厚达九英寸的大雪，我感到惊奇，于是写了一篇关于冬季提前来临的文章。可是我们办事处的司机伊凡·古谢夫引用了一句农谚说，雪下三遭，冬季才到，叫我不要上第一个假象的当。果然，这九英寸厚的积雪化为污浊的泥水消失了。第二场雪也是如此。第三场雪堆积了起来，压得很结实。俄国人听着坚实的冰雪在他们脚跟下吱吱作响，看到玻璃窗上结满了晶莹的冰凌，高兴得跳跃起来，为了御寒，他们的窗缝从十一月初到四月底都是用纸条封死的。

在我们院子里，司机们忙碌而焦躁地在弄着发动不起来的引擎，他们笑着把宝贵的伏特加倒进一辆汽车的水箱内，那辆汽车不知什么缘故，没有采用比较现代化的防冻措施。司机们聚在一起，揣摸和品评这第一次严重冰冻。“多少度？”有人会问。当冬天真的来到时，俄国人从不问温度多少，只问：多少度？温度理所当然是在零度以下。于是，别的司机就会怀着动物般的满足闻闻周围的空气，好象这初次的严重冰冻同春天初绽的花朵一样带有某种香味似的，接着各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将这些看法同早晨的天气预报作比较。

我们在莫斯科度过的第一个冬天开始时，我惊讶地看到，俄国人不是躲进室内，而是纷纷从家里出来，涌上公共汽车或市郊电气火车，肩背着越野滑雪鞋，来到附近的乡间，在阳光斑驳的白桦林里飞快地滑开了。身体强壮的男子会长途跋涉，来到冰封的河边，使劲在冰上凿开洞口，整天就蹲在那里钓鱼。这也是伊凡最热衷的娱乐之一。每当我取笑他只弄回来不满一杯可怜巴巴的小鱼时，他就会笑嘻嘻地回答说，他主要不是为了去钓鱼，而是为了冬天到乡间去走走。俄国人还经常说，在更北边、更靠内地有一个地方，那里气候更加酷寒，冰冻更严重，空气更干燥，那儿的人也更强壮结实。要是我这个新来的外国人对院子里的司机们议论早晨的寒冷天气的话，他们中的一个肯定就会幽默地回答说，在西伯利亚，唾沫还没有落到地上就已经结冰了，或者说，西伯利亚的厕所里只有一样设备。“什么设备？”我会天真地发问。“一根打狼的棍子，”随着这个回答他们全都大笑起来。

对俄国人来说，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不畏寒冷就象喝伏特加一样，是男子气概的一种表现。二月的一个早晨，严冬勉强地暂时缓和了一下自己的威势，六十名被俄国人称为“海象”的冬季游泳者，趁着（华氏）三十度的“温和”气候来到莫斯科河，在浮冰中间畅游一番。在高尔基公园里，我同数百名溜冰者一起停下来，

看着那些中年和白发苍苍的游泳者身穿窄小的运动裤，头戴游泳帽从更衣室里出来。看到他们几乎光着身子，踏着冰雪，向河边走去，然后一个个跳进深褐色的水中，我不由得直打哆嗦。其中有少数人兴致勃勃地表演自由泳，而多数人则把头露出水面，游狗爬式或蛙式，直到他们冷得坚持不住为止。一名水手穿着全套军服跃入水中，引起了人们一阵欢呼。几名中年妇女在一条划艇旁慢慢地趟着水，让人拍照。

“瞧我们的海象多么健壮！”一个热情的播音员对站在岸边的一群戴皮帽的人夸口说。

“他们一定是疯了，”一个穿得暖暖的民警上尉咕哝着。

但是，当我乘飞机到达东西伯利亚的雅库茨克时，上述这一切看起来就如同儿戏了。雅库茨克象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一样，是一座遥远的北方城市，但气候比安克雷奇冷一些，因为它位于大陆深处，附近没有海洋可以对气候进行调节。它紧靠北极圈，是苏联的克朗代克[1]的首府。一个名叫埃里克·德奠尼的英国记者有一次曾恰如其份地称它为“交通线的终点，只是这儿还没有一条交通线能让它充做终点。”——最近的一条铁路干线也还在它南面一千二百英里的地方。然而在

---

[1] 克朗代克，加拿大西北部一地名，盛产金沙。文中苏联的克朗代克喻指苏联雅库特自治共和国。——译者

这里，那些自称为“西伯利亚佬”的热情奔放的西伯利亚人，对于冬天的严寒和他们的忍受能力也同样怀有某种受虐狂似的骄傲。

我记得自己曾和两位苏联熟人一起穿越雅库茨克市作了一次精神抖擞的冬日漫步。从辽阔苍茫、杳无人烟的北西伯利亚平原吹来一股刺骨的寒风，刮得脸颊火辣辣的，鼻孔里都结起了冰。这不是一种怒号的狂飙，而是一股无声无息的寒风，锋利得象把刀子。我眼中满是泪水，手套内的指头本能地卷曲起来。那时已是三月中旬，然而即使空中阳光灿烂，气温也不会高于零下十三度。

那是一个凌厉而狂妄的西伯利亚寒冬，它疯狂地折磨着正在人行道旁干活的吃苦耐寒的人们，并且钻到屋内，追逐那些早已被它耗尽了精力的人。前一天，我在一家咖啡馆里看到人们不断地进来，门“砰砰”直响。他们进来喝杯热茶避避风寒，并尽可能在空气浑浊然而暖和的公共场所里多呆一会儿。我看着一个工人象喝防冻剂似的咕嘟咕嘟喝了半杯白兰地，这才再去冒着严寒干活。在外边，人们完全不顾衣著外表，为了拚命保暖，什么都拿出来穿。他们在街上蹒跚地走着，脚上穿着粗陋的黑毡靴或者包着兽皮，腿上裹着羊毛护腿，整个头蒙在皮毛里，大衣领子竖了起来，以遮住身上最后一点点裸露的皮肤，使其免遭无情寒风

的伤害。

“刺骨的冷，是吗？”我的一个同伴咕哝道，他是个刚到雅库茨克不久的乌克兰人。

“这算得了什么，”尤里·谢苗诺夫嘲笑地说。谢苗诺夫是个土生土长的西伯利亚人，他的祖父被沙皇放逐到雅库茨克来时，这里只是一个简陋的小村庄，居住着政治流放犯、皮货商和为驯鹿的人服务的雅库特土著。“今年冬天最冷的一天是零下七十二度(华氏)，”他说，“在莫斯科，象今天这种天气人们就不把孩子送到学校去了。但是，我们的孩子还是上学——要到零下五十八度才不去。”

“你觉得我们这儿的气候太可怕了吧，”亚历山德拉·奥夫钦尼科娃女士闪动着她那双爱斯基摩人的深褐色眼睛微笑着说，当时我在她的办公室里已经呆了几分钟，感到自己已经愉快地暖和过来了。自从1963年以来，她一直担任雅库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主席——这主要是一种名誉的头衔。雅库特地区的面积几乎和整个西欧相等，由于它拥有蕴藏量极大的钻石、黄金、天然气、石油以及无数其他矿藏，因此苏维埃政权现在正在加以开发。“但是这里气候十分干燥——有益于健康，”她断言说。“你看到我们这儿的人不发胖，而且都是长寿。你必须穿得暖暖的。这里的妇女都穿羊毛紧身衣裤，一件外面再套一件——至少

有三层，也可能六层。”

在雅库特，穿多层衣服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的汽车在一座座分散零落的村落之间驶过，村里小木屋上的冰柱从屋檐一直挂到地面，这时我们发现，甚至房子和汽车也是多层结构的。在莫斯科，我和安对于双层窗子已习惯了，然而在雅库特，防风窗厚达三层，每一层的右上角都有一个小窗控制空气流通。在我们寓居的肮脏的勒拿饭店，连过道都睡满了工人，为了防止灌进风来，小窗都有意地封上了。在我们房间里，唯一同室外相连的是一根穿过几层窗子的火炉烟囱，可是有人已用破布把它堵死了。大客车和小汽车上也装着双层挡风玻璃，以防玻璃上结起冰花。无法停在车库里过夜的车辆干脆就只能让引擎整夜开着，“如果它们一停——停下来，”我们那位口吃的出租汽车司机说，“你就得用专门的加热装置来进行预——预热，得花三、四个小时才能重新把它们发——发动起来。还是让引擎开——开着来得方便和便宜。”事实证明，人比机器更加耐寒。在十二月和一月，钻石矿或建筑工地上的工作进行得象爬行一样慢，工人在外面工作不超过半个小时就得往取暖棚跑。但是当气温低达零下五十八度时，他们只得完全停止作业，因为在那样的严寒中，机器会发生故障，钢条会象细树枝那样啪的一声折断。

我大为惊愕的是，尽管有着上述种种情况，雅库茨克还是发展成了一座拥有近十二万人口的城市，城里有一所大学，几个科学研究所，一个电视转播站，一个位于勒拿河边的完整港口（该河是它通往南方的生命线）以及几十个小型工厂企业。然而，室内抽水马桶在这儿却是一种罕见的奢侈品。正象前面那个关于西伯利亚厕所的笑话所说的，即使在最寒冷的天气，人们仍然使用户外厕所。一天晚上，我在一个工人聚居区看到几个户外厕所，瞥见里面结成冰的粪便堆得足有膝盖高。想到半夜里大便时挨冻的情景，我不由得不寒而栗。"这对妇女最有害了，"一位工人承认道。

普通的家庭用水也是一个问题。街角上到处装着用电保暖的水龙头以供附近地段的住家使用，但是该城有三分之二的人口住在没有这种便利设施的地段，他们的用水取之于大块大块的冰，人们用机器在勒拿河封冻的河面上把冰一块块地锯下来，装上卡车或马拉雪橇运进城里，贮存在室外或"地窖"里——一种挖在房屋底下永久冻土层里的空穴。每平方米河冰卖五十戈比(合六十七美分)，有一个妇女断言这种水"水质最佳——对胃特别有益"。

好象地理上的遥远和气候上的寒冷还不够人们对付似的，永久冻土层使人们在进行任何工作时面临着

加倍的困难并付出更多的代价。永久冻土带几乎占苏联全部国土的一半(主要是在西伯利亚)，而雅库茨克则位于永久冻土带的中心地区附近。顾名思义，永久冻土层就是土层终年冰冻，其厚度达一千英尺或一千英尺以上。我听说，除非能使这种象铁一样坚硬的土层变软，至少是暂时变软，否则，人们就无法播种庄稼，无法建成矿井开采地下的矿藏资源，甚至无法建造巨大的现代化建筑物。

我对最后一点感到困惑不解，因为，看起来永久冻土可以为建筑物提供在可能情况下最坚固的基础。可是，据雅库茨克永久冻土学院一位蓄着胡子的青年科学家罗斯季斯拉夫·卡缅斯基说，问题在于最上面五、六英尺的永久冻土在夏季会融化并变成松软稀烂的沼泽。这对于设法在林中空地上种植小麦、燕麦、白菜，甚至在温室培育西红柿的农民们来说是极有利的，但它对建筑物会造成严重破坏。我原先已注意到，有些房子已经东歪西倒，还有的滑稽地陷下地面有齐窗台那么深。卡缅斯基解释说，任何一座标准的、建造在地平面上的房屋都会产生热量，这些热量足以把房子底下的冻土融化，于是房屋就在它自己造成的泥坑里下陷。永久冻土的这种奇特现象造成了道路的起伏不平，并使铁路路轨象微型滑行铁道①似地翘曲起来。

① 滑行铁道是一种供娱乐用的弯曲滑坡的铁路。——译者

雅库特人长期以来已适应了这种七歪八斜的小屋，认为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麻烦事儿。但是当现代的苏联工程师想要建造两层楼以上的高层建筑时，显然面临着严重的危险。他们所发明的解决办法是，把建筑物建造在混凝土支柱上，从而使刺骨的西伯利亚寒风在建筑物底下环流，使冻土一直保持封冻。然而，这意味着要在冻土层中钻下足够的深度，让柱脚牢固地扎入坚土层。另一种办法是钻孔。但是最普通（虽然比较麻烦一点）的办法是用一种长长的救火皮带似的奇特装置将高压蒸汽注入冻土层，使冻土暂时融开。然后是一阵可怕的撞击声，巨大的起重机吊起一根三十英尺长的柱子，一次次地将其垂直投下，使其撞入被蒸汽烘软的土层，直至柱子纯粹靠了自身的重量把孔打到理想的深度为止。于是，冻土就象老虎钳似地冻住了柱脚。这种技术使建筑费用大大提高，然而卡缅斯基说，这种技术使得俄国人能在雅库茨克造起了一幢七层楼旅馆，并且在盛产钻石的和平城建成一幢九层办公大楼（然而我怎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要造这么高的建筑物）。

我一直向往着能参观和平城的钻石矿或者阿尔丹的金矿，但当局拒绝让我们参观。作为一种安慰，当地负责接待我们的主人，身材瘦长的新闻记者尤里·谢苗诺夫——他的祖父当年是被流放到雅库茨克来

的——带安和我出去钓鱼，使我们看到了西伯利亚生活的其他侧面。

我们乘上一辆陈旧而结实的伏尔加牌出租汽车朝勒拿河方向驶去，在夏季的那几个月里，这条河是一条运输干线，雅库茨克全年所需的物资几乎全部经过这条干线运来。在我们驶近河岸并正准备过河时，我突然意识到河上没有桥。但是司机继续驾着车朝河岸下面开去，一会儿，我们的汽车就在河面上沿着一条满是冰屑、槽状的然而维护得很好的车道里颠簸前进了。"这很安全，"尤里再次向我们担保。"冰层够厚的——大约有八英尺，坚固得可以走卡车。"我们沿着一条整齐的冬季公路行驶，这条公路从十二月一直可以使用到四月底，它把雅库茨克同其北面和东面的居民点连结起来。我们的汽车颠簸跳跃地行驶了约十五英里，途中偶尔遇上一辆卡车、汽车，甚至还遇到一辆摩托车。公路两旁(如果可以这么称呼的话)不仅有雪堆，而且还有整齐的小松树作为标记，以免患雪盲症的司机在某个没有人烟的地方误离公路陷入深雪里去。

我们离开冰上公路，慢慢地探着路驶往远处的乡间，汽车好几次陷进齐车轴深的积雪，差点儿落入动弹不得的危险境地，然后我们才在一块很大的空地上遇到了十五个雅库特人，那块空地其实是一个白雪覆盖的湖泊。雅库特人是一个从事设陷阱捕兽、打鱼和驯

鹿的聪明机智的民族，他们象美国的爱斯基摩人一样在北方占很大的优势，苏联有些人类学家认为这两个民族有着血缘关系。这一群人从清晨起就精心设下了一个捕鱼圈。他们在冰上凿了二十个蒲式耳篓[①]那么大小的洞口，二十个洞口布成一个巨大的椭圆形，面积几乎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他们熟练地把巨大的渔网塞到冰下，用绳子把它们从一个洞到另一个洞顺次串联起来，然后敲打冰面，把鱼赶入网中。

我们到达的时候，他们正在拉第三网，捕上来约五百磅鱼。他们逗我们帮他们一起拉网，并用巨大的鱼叉把鲜蹦活跳的鱼叉出快结冰的水面。没过几分钟，在一个松林的凹地附近就燃起了几堆劈啪作响的篝火。用盐、葱和香草调味的鲜鱼汤香味扑鼻，激起了我们的食欲。每人酌上了必不可少的伏特加，但是，谁也没来得及把杯子举到唇边，就有一位名字完全俄罗斯化的雅库特木匠瓦西里·安德洛索夫微笑着把一杯伏特加酒庄重地泼到了火上，霎时火光闪耀跳动。这是古时候信奉异教的雅库特人对太阳和火的膜拜仪式的再现。

“我们人民的风俗，”安德洛索夫说，“是把第一杯酒泼在火上奉献给巴约纳伊，他是猎人和渔夫之神——是一位象你们的狄俄尼索斯一样的快乐之神。

① 一种容量为一蒲式耳的容器。——译者

这是为了吉利。”

西伯利亚。

马克西姆·高尔基曾把它称为“死亡和枷锁之乡”。十八世纪伟大的科学家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曾热情地预言：它丰富的自然资源终将成为俄罗斯强大力量的源泉。今天，现实的情况正处于两者之间——既不象有人所说的那么可怕，是什么沙皇、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政权用以监禁罪犯和持不同政见者的、没有铁栏、无边无际的监狱，也不象罗蒙诺索夫梦想的那样罗曼蒂克般的富裕丰足。然而，监狱和期望在这儿都还存在着。

甚至在现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大学生们一想到要被国家强制分配，派往这个遥远、荒凉的地区呆两三年完成某个工程项目，就会不寒而栗。这个地区从乌拉尔山脉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横亘三千四百英里，行政上分为西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和苏联远东地区。但是，正如我们所见，许多西伯利亚人坚定地说，他们将献身于正在向他们发出召唤的、荒凉偏僻的原始松林，并且发誓他们将永远不会拿自己严峻的生活条件或西伯利亚自由的野外生活去换取俄国欧洲部分过于文明、过于拥挤和过于官僚主义化的生活。

“我不喜欢西方，”伊尔库茨克一位年轻的女专家

说，她不是指伦敦、巴黎或纽约——而是指莫斯科。"我在那儿有许多朋友，但是我不喜欢那个地方。人们粗野无礼。干什么事情都是急急忙忙的。他们太紧张了。这儿，人们比较友好，他们具有西伯利亚人那种襟怀豁达的气质。"我一次又一次听人们谈到这种看法。"在那边，他们是官僚主义者。"布拉茨克一位直言不讳的工程师以轻蔑的口吻评论说，"在这儿，我们是民主主义者，大家一起工作。"

对于忠实的西伯利亚佬来说，这儿是一块由天命说统治的土地。到处是强壮的年轻人，他们在宽阔的大河上筑起大坝建造水电站，在富饶但尚未开发的荒地上进行宏大的建设工程，他们在建设一个新的文明世界，他们在为未来绘制蓝图。从人们对于西伯利亚滔滔不绝的高度赞美中流露出他们对于经济发展的绝对信心。"这儿全是处女地，"我们的朋友尤里·谢苗诺夫带着一种会使霍勒斯·格里利[1]感到欢欣鼓舞的拓荒者精神自豪地说，"这儿的人们与在'西方'的人相比，机会要多得多哩。"

开拓者们凭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勇气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取得了一些惊人的成就。除了早已名驰

---

① 霍勒斯·格里利(1811—1872)：美国报纸编辑、政客。他曾于1834年在《纽约人》周刊上动员纽约失业者到西部去，并提出"上西部去，年轻人，上西部去！"这样的口号。——译者

全球的布拉茨克水电站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水电站以外，他们现在正在萨扬和乌斯特—伊利姆斯克建造宏大的新电站。在遥远的北方诺里尔斯克有一个采矿联合企业，专门冶炼铜、镍和铂。布拉茨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以及伊尔库茨克等地正在生产铝。在冰天雪地的荒原上，电线和管道纵横交错，不仅把天然气和石油从西西伯利亚输送到俄国欧洲部分和东欧，而且还输送到西欧。

西伯利亚的工业发展速度比苏联其他地区稍快一些，在那些最容易发展的地区——在西伯利亚大铁道沿线已建成的城市内或附近地区，或者在气候不象雅库特那样酷寒的南部地区——工业发展工作正在全力以赴地进行着。为了开发极其重要的矿藏资源，在西伯利亚北部新的城镇也不断涌现，这确实令人震惊。

据俄国人宣称，西西伯利亚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田，其储藏量比美国全国的储藏量还大。西西伯利亚秋明地区的油田在十年时间里从沉睡状态一跃而成为苏联产量最高的产油区，其产量甚至超过了莫斯科雄心勃勃的计划。西伯利亚拥有全苏联森林资源的百分之六十，煤炭也占全苏联的百分之六十，而西伯利亚的大河蕴有全苏联水力资源的百分之八十，如果把这些河流连接起来，可以环绕地球二十五圈。不仅在雅库特有黄金和钻石这类贵重的矿藏，就是在其他地

方也埋藏着铂、钼和钨这类稀有金属——事实上，几乎门捷列也夫周期表上的每一种元素这儿都有。其蕴藏量是如此巨大，因而苏联经济学家和工程师们完全不理睬西方学者提出的卡珊德拉[①]式警告，说什么人类正在不顾后果地耗尽世界上的自然财富。他们相信，西伯利亚的资源可以开发一千年。

然而，怀有救世主般热情的西伯利亚吹捧者们忽视了十分现实的障碍，特别是这一事实，即由于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因而在六十年代从西伯利亚迁走的人数要比移入的人数多达近一百万，尽管当局为了让人们留居在那里，实行了分等级的额外津贴制。(每个艰苦地区都有一个基数。雅库茨克的工资水平要比西伯利亚人称之为"大陆"俄国的标准工资多百分之五十。除此之外，工人在西伯利亚工作的头五年中，每年还可得到百分之十的补贴。在某些遥远的北方地区，额外津贴高达百分之二百。)仅仅几年以前，有些西伯利亚迷还在预言，西伯利亚令人眼花缭乱的前景将使该地区的人口在公元2000年以前增加到六千万至一亿。可是，到七十年代初，该地区人口只达到二千六百万，而且看来到本世纪末要达到三千五百万还希望渺茫。这不仅是由于劳动力的极端缺乏拖了工程建设的后腿，

---

① 希腊神话中特洛伊公主，能预卜吉凶，但无人相信她的警告。——译者

束缚了西伯利亚经济的全面发展，而且是因为莫斯科那些一心想着卢布的计划制定者已经发现，虽然西伯利亚矿藏资源丰富，但是开发这些资源以及提供必要的设备和方便以招徕工人所花的代价，却要比在其他地方开发资源高两、三倍，那些地方蕴藏的资源也许不如西伯利亚丰富，但是开采起来比较容易。

可是，对于一个已经丧失革命热忱但尚未脱去革命外衣的国家来说，西伯利亚作为新边疆的一种政治象征却是至关重要的。每当一项炫耀性的巨大工程项目快结束时，新的项目便又开始兴建了。当我在1974年底离开莫斯科时，为贝阿大铁路——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干线——造舆论的宣传活动正在进行之中，这条铁路将穿越两千英里荒无人烟的原野，从东西伯利亚弯刀形的自然胜境贝加尔湖一直通到邻近太平洋海岸的阿穆尔河①。公开宣称的目的是为了开发苏联远东地区矿产丰富的偏僻地带。重要的是，贝阿大铁路还将提供一条位于西伯利亚大铁路更北面的战略铁路线，从而增强对付中国任何陆上攻击的防御能力，或许这就是修建贝阿大铁路的真正原因。诗人、流行文化团体和宣传人员一起，都奉命大肆鼓吹为建成贝阿大铁路而同心协力大干特干的精神，莫斯科说，这条铁路将成为一代人的功绩，如果不是整个世纪的功绩的话。

① 即黑龙江。——译者

"如果不存在这么一个西伯利亚来兴建这些工程项目的话，党也必然会把它创造出来，"一位年轻的莫斯科经济学家评论说。"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宏伟的西伯利亚工程项目。以前是布拉茨克的一代，现在是贝阿大铁路的一代。我参加过一个项目的建设工作，环境糟极了。蚊子几乎把我们给活活吃掉，它们钻进我们的头发、帐篷、食物，处处皆是。我们共青团员象奴隶般地干活，从清晨一直干到夜里。那年夏天我挣了近五百个卢布。起初，这些钱好象很多似的，但是我去那儿的路费和在那儿的生活费花去我很大一笔钱，当我回到家时，那笔钱看起来就不那么多了。但这是把全国动员起来的一种办法。"

"人们知道，真正肮脏的活是囚犯们干的，"一位我认识的列宁格勒人补充说，"他们知道，大多数共青团突击队是在压力之下才上那儿去的，而年纪大些的工人则是为了'超额的卢布'〔高额的特别津贴〕。然而，当人们念到'我们正在建设一条横贯西伯利亚的新铁路'或'我们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水坝'这样的报道时，它还是能激起人们的民族自豪感的。请注意宣传这些巨大工程项目的方式：着重宣传的不是它们确实的经济效用，而是对农村的改造。它们在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性超过了经济上的重要性。没有那一类的事迹，就没有丝毫理想可言了。没有这些项目，我们又怎

么能知道自己是在'建设共产主义'呢?"

一个没有经历过乘火车穿越西伯利亚这种艰难历程的西方人,要想体会苏联的幅员辽阔是有困难的。他头脑里没有多少感性知识,不能理解一个包括十一个时区的国家的地理含义。他也不能一下子接受这一事实,即从列宁格勒到纽约的距离要比到符拉迪沃斯托克[①]近得多。美国人习惯地认为自己的国家是横跨美洲的大陆国家,但同苏联辽阔无垠的国土相比,它只能退居次位。仅仅西伯利亚这个地区面积就有美国再加上半个加拿大那么大,从莫斯科到伊尔库茨克的三千二百英里旅程相当于从纽约飞到洛杉矶,然而这还仅仅是走了半个苏联。

旅途艰难的预兆,甚至在乘上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火车之前就已出现。俄国人有一种抢占火车席位的习惯,好象它是一列运货机动篷车似的;他们来车站时,带着破旧的廉价手提箱、紧捆在一起的箱子、礼物、玩具、笨重的包裹和敞开的包袱。在动身之前,他们就已准备好整只整只的黑面包、大块的干酪、一份份烧熟的冷鱼或肉饼,还有一个塞得满满的网线袋,里面装着令人作呕的甜汽水或淡啤酒。一上车,他们便蜂拥而入,把车厢变成一所活动公寓,人们一会儿就换上了暖和

① 即海参崴。——译者

的蓝色睡衣睡裤，全家大小都聚在拥有四到六个卧铺的车厢分隔间里，女人们削着黄瓜皮，抚弄着孩子，男人们则穿着汗衫搔痒，打呵欠，下棋或者眯着眼睛看报。

在当今世界上，客运列车差不多已濒临绝灭，然而在俄国，火车却仍然具有迷人的神秘色彩。老式的头等车厢中挂着陈旧褪色的紫红窗帘，写字桌上装有古色古香的台灯和小垫巾，门上还有曲线型的铜把手。这一切都给人一种返回到一个世纪以前的浪漫感觉，使我的妻子老是感到自己象是安娜·卡列尼娜似的。在餐车中，人们可以买到装在公用金属器皿里的俄罗斯甜菜浓汤和卷心菜汤，不过每个车厢都有一个不断在那里扑扑冒气的茶炊，一位健谈的胖服务员在给茶炊烧火，随时可以向旅客供应茶水和甜饼干。这种老式的俄国车厢是世界上轨距最阔的，它给我提供了一个特别舒适的旅行环境——其卧铺比我过去乘过的任何火车都长。在火车上，俄国人有空闲，也有精力与陌生人闲聊，因此，我们在车上就同他们作长时间的交谈。我们动身赴西伯利亚时，曾担心车厢可能会很冷。然而这却是个不必要的忧虑，车厢同冬天俄国所有室内一样热得受不了，以至每当火车停站时，我们就奔到车外呼吸新鲜空气。

我们的火车以蜗牛般的速度爬行着，这种速度倒充分说明了地理距离之遥远。就象缓慢地逆风航行在

广阔内海中的一条嘎嘎作响的商船，我们的列车爬过辽阔的大陆。这次列车被称为莫斯科——北京特别快车（按车厢里一张通告的说法，它将行车一百七十五小时，行程为五千六百三十英里）。我们去伊尔库茨克的旅程还只是列车行程的一半，可是我们在车上呆了漫长的四天，凝视着窗外千遍一律的景色：连接微微起伏的雪原的，是由白桦树和落叶松组成的森林，然后又是茫茫的雪原。我们感到自己好象是航行在海洋上的旅客，凝视着滚滚的波涛。困困在雪原中的村庄以及村里饱经风霜摧残的冒着缕缕炊烟的农民小屋，仿佛海洋中孤寂的岛屿在我们眼前浮过，看上去好象荒无人迹地坐落在雪海之中。

我想象中的西伯利亚，原象是美国西部那样住满了一批批移民的地方。但这次火车旅行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却是人烟稀少、旷野千里。还没有见到市郊景色，眼前就突然出现了城市。列车停顿片刻之后接着开动，这些城市又忽然消失在后面了。列车和车站之间进行的小买卖可以说明我们横越大陆的旅程正在不断向目的地接近。离开莫斯科时，餐车上带足了新鲜苹果、桔子、黄瓜、巧克力糖和其他小甜食。在前面一些车站停车时，当地市民都奔向餐车，从身子探出门窗的工作人员手里购买这些食品。可是到了后来，由于火车上供应减少，饭菜供应范围缩小，交易的方式也随之

改变。在齐马枢纽站，尽管站台上只供应简单粗劣的食品，但我们还是同其他旅客一起涌向车站售货亭购买小甜面包、啤酒和新到的报纸。几个干瘪的老太婆，裹着黑上衣，包着羊毛围巾，在叫卖家里自制的泡菜和二十五戈比一磅的冒着热气的熟土豆；还有些别的妇女在用锹往列车上装煤或是在铲除排水管下冻积的冰柱和车钩上结起的冰块。一次我看到一个妇女铲冰时把一厚块金属也敲了下来。她看了它一眼，耸耸肩膀走开了。

乌拉尔山脉是如此平淡无奇、令人扫兴，因而我们几乎没有注意到那些标明欧亚大陆分界线——即标明西伯利亚正式开始的条纹标杆就已驶过了这个山脉。又旅行了两天之后，当我们到达伊尔库茨克时，我们才知道自己已进入了另一半球。一群群从蒙古、从中苏边界上的哨所归来作短期休假的年轻苏联士兵追逐着当地的女孩子，这才提醒我们，列车已接近中国了。

在火车上，我听到俄国旅客向列车服务员盘问北京的生活情况。另一些在西伯利亚大铁路远东那一段线路上旅行过的人，谈起他们在行驶的火车上看到俄国直升飞机起落场和军事设施，谈到俄国人在同中国有争议的边界上驻扎了四十个师的庞大守备力量和一百万军队。后来，我曾听人说起过 1974 年 4 月经伊尔库茨克运走的密封锌板棺材，居民们推测这是未予公

布的某次边界冲突造成的结果。然而，在当时 1972 年，尼克松已经访问了北京，但尚未对苏联进行他的第一次访问，因而俄国人神经质似地催逼着我，要我解释为什么美国要站在中国一边反对俄国。俄国人对于中国人怀有如此强烈的敌意，因此他们反复地问到我国对中国的外交态度，尤其是在我访问接近中苏边界的地区时是这样。

俄国人对中国怀有深刻的恐惧和极度的猜疑，看来，只有在这个问题上个人意见与官方路线是最一致的。苏联知识分子把中国人说成新式的野蛮人：农民在田间高音喇叭下洗脑，生活完全军事化，人民有毛主义而没有头脑。其说法同报刊文章和电视节目中对中国的描绘完全一样。在我看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些俄国知识分子头脑里的中国形象，同冷战高峰时期西方对斯大林领导的俄国的看法如出一辙，而他们也的确把中国人说成是新斯大林分子。“中国的军事威胁”是另一种无端的恐惧。有一位俄国记者从与中国远隔一个大陆的白俄罗斯回到莫斯科，他告诉我，在明斯克，人们担心会同北京发生战争。在莫斯科，母亲们会谈论到她们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在中苏边境地区服役，就象美国的母亲们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去越南一样。在边境地区或者接近边界的城市如伊尔库茨克，人们对中国人的仇恨和疑惧格外强烈。人们曾多次痛苦地

讲到1969年达曼斯基岛[①]事件中同中国人发生的流血冲突。

一天，我们在伊尔库茨克某个饭店吃午饭，同桌的是一位年轻的计算机程序编制员，午餐过程中我们对当地的反华情绪有了一些体会——据别人说，这种情绪是由秘密的政治报告煽动起来的。这位计算机工作人员说，朝东走五十英里不到，从贝加尔湖彼岸就可以看到蒙古和中国（在我看来，那儿离边境还是太远了，但是他坚持自已看法）。他以直言不讳的帝国主义式口吻，当众侮辱蒙古的名义上独立，亲密地称它为"我们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这等于是带侮辱性地将墨西哥称为美国的第五十一个州。他喜欢的是蒙古人，而不是中国人。

"在伊尔库茨克，过去有许多中国人，我们的学院里、工厂里都有，"他说。"我们把什么都教给他们。现在他们走了，你看他们又是怎样对待我们的。"中国人在报纸和北京电台发表的论战使他大为恼怒。

"现在还有什么中国人再到这里来吗？"我问，意思是指中国平民或外交人员。但是，他却是从军事角度来领会的，因而吐出了满腹沙文主义的怨气。

"不，不，不，"他声明说。"我们在边界有足够的军队对付他们。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他

① 即我国的珍宝岛。——译者

们进不了俄国。我的兄弟在达曼斯基呆过，我们在那儿给了他们一点颜色看看。如果他们想搞什么新名堂的话，我们一定会再让他们瞧瞧我们的厉害。”说完，他有力地把拳头紧紧握起，这是俄国人表示力量的特有姿势。

对于西伯利亚人来说，水坝如同军队、火箭一样是俄国强大力量的象征。它们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具体体现，是共产主义信念的一种表现。列宁在大力推进俄国现代化建设时说过："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① 列宁的信徒们如此刻板地按字面理解他的话，因而他们一直在积极热忱地树立着诗人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所谓的"千瓦之殿"。特别激起叶甫图申科灵感的那座"千瓦之殿"是布拉茨克高坝，他在叙事诗《诗之夜》中对它作了流芳百世的描绘：

在布拉茨克电站，俄罗斯，您慈母般的形
象展现在我面前，闪耀着光芒。

布拉茨克是新耶路撒冷的缩影，也是苏维埃绘制的西伯利亚蓝图的集中写照——这里建成了一项巨大的水力发电工程，为一系列新建的工厂提供了电力。这里出现了一座新兴的城市，它位于湍急的安加拉河

① 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399页。——译者

河谷边，是在一个比蒙特利尔还要朝北七百五十英里的与世隔绝的地点，于密密的松林中开辟出来的。我就在那里遇见了一位乌克兰犹太人亚历山大·鲍里索维奇·古列维奇，他集中体现了西伯利亚真诚崇拜者的传教士式精神。

萨沙·古列维奇肩膀宽阔，下巴方正，具有难以自抑的热情奔放的性格。在青年时代他响应了共产党对于热心积极的共青团员们的号召，前来建设世界上最宏伟的水坝和驱走艰难困苦。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浪漫主义者，对于工业化所能创造的奇迹怀有乌托邦式的信念，其中还掺杂着明显的十八世纪式关于人类可能臻于完美的理想主义思想。当他滔滔不绝地从文化领域各个方面提出一系列乐观主义的问题并作出回答时，他好象完全忘却了弗洛伊德那个主张不让病人安宁的学说[①]和斯大林主义恐怖的含意；也许，这仅仅是一种故作姿态，不过也确实和他的智力状况相符合。进早餐时（在布拉茨克停留的两天中，除了睡觉时间之外，萨沙几乎每一分钟都陪着我和安两人），他表示自己对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十分倾慕，而且很钦佩沃尔特·惠特曼，因为"惠特曼热爱人类"。进午餐时，

---

① 弗洛伊德(1856—1939)是奥地利精神病学专家，创立精神分析学说。主张让精神病人在医生指导下自由活动和遐想，通过联想、暗示，使病态心理有所寄托，逐步治愈。在此暗讽此人表现过于活跃。——译者

他又为我们朗诵诗歌，弄得我们疲倦不堪，但其中有一段表演是无可挑剔的：他用英语和俄语吟诵了拉迪亚德·吉卜林的诗句："当你周围一切人都手足无措并归罪于你的时候，你能否镇定自若。……"《安德烈·鲁勃廖夫》之类描写蒙古人征服时期的电影以及其他一些电影，使他心绪不宁，因为它们揭示了俄罗斯的苦难和俄国历史的黑暗面。他始终喜爱的两个杰作是爱森斯坦的《波将金战舰》和《夏伯阳》——歌颂1905年革命和国内战争时传奇式的红军指挥员瓦西里·夏伯阳的英雄史诗。

他为俄国青年的生活方式而感到烦躁不安，这些青年热衷追求西方摇摆音乐，追求各种时髦，对政治毫不关心，对工作吊儿郎当。"他们到底干过什么值得一提的事？"他责问说。他自己在年轻时曾被培养为记者，但是他志愿来到布拉茨克当钻石机手，他说，因为他无法抑制自己加入五万四千名建设工人大军的行列从事国家最重大的建设项目的愿望。"一旦党发出号召，共青团员的回答就是：'坚决响应'，"萨沙以一种狂热的口吻说道。(当我回到莫斯科对别人讲起过去共青团的这句口号时，许多人对这种陈腐的忠诚都感到惊愕。)但是，萨沙是个党员，是当地师范学院的马列主义教员，是一位宣传家。他试图告诉我，我们都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一部分，而我应当抛弃把自己当作美国中产

阶级一分子的精神锁链。

萨沙声称，他对于自己遵循爱国主义思想、发扬探险精神而来到布拉茨克一事毫不懊悔，建设布拉茨克是他一生最美好的时刻。“这是我们的十月！”萨沙热忱地说，他把建造布拉茨克高坝的十三年斗争（1954年到1967年）比作1917年的十月革命。

好象杰伊·加茨比重看昔日大学足球赛的影片、想象当时人群的喧闹喝彩一样，萨沙把我带到一个俱乐部去观看关于布拉茨克高坝建设工程的电影。俱乐部主任，一位大腹便便的中年人，与萨沙是同时代的人，他天真地把水坝描述成“我们的青春的纪念碑”。萨沙留恋地回味了在深冬沿着封冻的安加拉河吃力、单调地向上游运送设备、炸开河谷、建筑第一阶段围堰等每一个极端艰苦的时刻。他津津有味地回想起最初几年那些没有电力而寒冷艰难的夜晚。“这就是我们出生率高的原因——因为没有电力，别的什么也干不了，”他大笑着说。他对当时蚊子猖獗的情景记得一清二楚。“六月份蚊子最厉害，它们象希特勒军队一样向我们扑来，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法西斯分子，”他咧嘴笑道。

不论用什么标准衡量，布拉茨克高坝都是一项宏伟动人的成就。我们从伊尔库茨克向北飞到布拉茨克时，在空中瞥见了这座水坝——它象一条狭长的带子，

拦起一座绵长的湖泊，当地人称之为“布拉茨克海”。登坝细看，水流湍湍地泻入溢洪道，电线在我们头顶上嗡嗡作响，整个大坝奏着迷人的催眠曲。一条高达四百英尺、长达半英里的混凝土堤坝巍然耸立，横堵着巉岩重重的帕顿峡谷。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一条支线就从坝顶通过。它不仅庞大宏伟，而且是我所参观过的苏联工业设施中最辉煌、最现代化、最明净整洁，也是维护得最妥善的。

萨沙的眼里只有这座水坝，因此他嘴上老是挂着最高级的赞美字眼，比建设、管理水坝的工程师们还要起劲。“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他不住地对我们讲道。“嗯，现在不能算是最大的了，”矮小精悍，脸色红润的水坝管理处副主任列夫·阿勃洛金提醒说。1976年该坝落成时，它曾经是最大的，可是苏联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新建的一座发电能力为六百万千瓦的水坝已经超过了该坝四百一十万千瓦的发电能力。

“但是它的发电量在世界上是最大的，”萨沙执意坚持说，阿勃洛金也自豪地赞同说，就1972年而言，布拉茨克水坝的全年发电量是其他任何水坝比不上的。

阿勃洛金友好地带我们走过大坝，给我们看了一些图表和整个电站设施的地图。此时，萨沙又情不自禁地断言，布拉茨克海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湖”。“嗯，差不多，”阿勃洛金附和道。非洲赞比西河上的卡里巴

水坝所拦成的人工湖更大一些，可是他认为布拉茨克海是第二大湖。接着，当阿勃洛金解释水坝建设中的“前导法”时，萨沙又急忙插嘴说布拉茨克高坝是用这种方法建成的“世界上最高的水坝”。于是，阿勃洛金又不得不加以纠正，说是加拿大正在拉布拉多的丘吉尔瀑布用同样的方法建造一座稍为高一点的水坝。

每一次回答都使阿勃洛金感到苦恼，而萨沙更感到难受，因为很多西伯利亚人——和一般俄国人一样——都因“世界上最大的”这个词而得意非凡，他们在“巨大”一词中体会到一种民族自豪感，这种自豪感似乎补偿了许多俄国人由于本国在工业方面落后于西方屈居第二位而强烈感到的耻辱。他们好象患了民族阿维斯情结症[①]似的，抓住每一个机会竭力加以弥补，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俄国官员在会见西方人时夸大苏联成就的原因之一。阿勃洛金不同一般，他由于职业原因而讲究准确性。而萨沙就比较典型。对于大多数俄国人来说，最大就是最好。建设最大的水坝这一理想曾经是鼓舞萨沙和他同代人的力量，因而玷污这一理想是萨沙所不能忍受的。他对年轻一代的挖苦贬低也流露出他对青年的愤慨情绪，因为他们已经不再关心建设一个乌托邦，不再关心造出最大的、第一流的东西。

---

① 指一种病态的自卑心理。——译者

比如，我们不仅从萨沙那里而且也从别人那儿听说，原来建设布拉茨克的五万四千名工人中将近有一半已经离开这里去建设其他工程，或是回到俄国欧洲部分，原因是他们受不了西伯利亚的生活。也不只是萨沙一个人谈到过：象新西伯利亚经济学院院长阿贝乐·阿根别格扬这样的经济学家们，就专门挑出布拉茨克作为匆匆忙忙进行的"不平衡"发展的一个主要典型，原因是建设者们过于热心，水坝建设搞得太快，在1961年就建成发电，而它计划中的主要用户布拉茨克炼铝厂到1966年才投产，而且直到好几年之后才全部建成。

布拉茨克日常生活中单调乏味的现实，渐渐在我们面前暴露出来。在它的全盛时期，即布拉茨克列为国家最优先发展的工程项目时，该城在食品和其他消费品方面获得了国家的特殊供应，但是现在优先发展的重点已经转移到更北面的乌斯特-伊利姆斯克和其他新项目上。时间已是三月份，而我们看到布拉茨克食品商店的货架上却空空如也。一位家庭妇女抱怨说，在冬季最寒冷的五个月里此地看不见新鲜水果和蔬菜。我们只看到店里有很少一点小块的肉，人们说这种肉还是难得有的。在儿童用品商店，我们正碰上一些做母亲的为了抢购偶尔出售的女孩衬裤而恶狠狠地吵架。一位职业妇女抱怨说，文化生活已完全消亡。

"要不是我每年夏天能长途旅行回家（到俄国欧洲部分)的话，我真会忍受不了这里的生活，"她发牢骚说。

在我看来，最使人感到萧条阴沉的是：布拉茨克八个居民区一排排千篇一律的灰色预制结构公寓住房形成了毫无装饰的奥韦尔式单调景象，这些居民区的正式称呼是：布拉茨克-1，布拉茨克-2，布拉茨克-3等等。唯一带有农村景色的居民点，是令人悦目的帕顿旧镇。那儿，早期参加建设的工人们居住过的木屋，现已油漆一新。其余的居民区都是用推土机从松林中开辟出来的。整个居民区几乎没有一株松树耸立。有人告诉我，柯西金总理曾因该城建筑式样的愚笨单调和城市中全无草木而严惩了当地的市政官员。

在其他地方，我也同样看到了西伯利亚建设中这种阴暗面的出现，但是俄国人的决心却使我大为惊诧，他们不顾客观因素，无视自然和人的因素，在遥远的北方荒无人烟的地区，建立起巨大的新居民点（布拉茨克有十六万人）。我所说的"阴暗面"并不是指苏联劳改营中经法律宣判在西伯利亚服刑的数量约为一、二百万犯人，而是指普通人民的艰苦辛勤劳动，他们由于苏维埃政权向西伯利亚开战所采取的这种做法而付出了惩罚性的代价。有少数几个苏联专家曾提议，在冰天雪地的北方只设立一些小型居民点以开发自然资

源，在夏天再从南面气候比较宜人的大型永久性居民区把劳动力和建设队伍调去支援。但是苏联的计划制订者们至今尚未接受这个意见。

位于西伯利亚产油地区的下瓦尔托夫斯克和苏尔古特这两个城镇，其发展是有代表性的。六十年代中期，这两个地方都是只有一千多口人的僻静乡村。石油事业的兴起改变了它们的面貌。目前，在这个与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人口为四万八千）处于同一纬度的地方，人口都已经激增到五万，而按照苏联的发展蓝图还要增加到十五万人。它们将成为向更北面开发油田和天然气田的发展中心。这两个孤立的新居民区，坐落在封冻的沼泽地带，到了春季和夏季这儿就成了一片无法通行的沼泽泥潭。修筑一英里公路要花去约二百万美元的代价。全部建筑材料都从主要运输干线鄂毕河运来，该河的封冻期是每年九月至次年五月。1974年国家所获得的收益，是优良的萨莫特洛尔油田所生产的六千万吨石油（约合四亿二千万桶）。

为了使我们了解这些建设也同样给个人带来优厚报酬，当地的官员们向前来参观的一群西方记者介绍了萨莫特洛尔第一流油井的一位负责人。他说他的收入包括各种奖金和艰苦地区的补贴每月大约为一千五百美元，与平均工人工资一百八十七美元相比，这是个极大的数字。他的工资特别优厚，其余的工人每月

工资是五、六百美元，石油托拉斯的官员们坚持说，他们在招收新工人方面毫无困难。下瓦尔托夫斯克是苏联典型的“公司城”，当地石油托拉斯不仅雇用工人开展各种商业工作，管理港口，输入全部食品和消费品，而且还安排假期旅行，建立并经营公共汽车系统、门诊所、幼儿园、学校、商店，并且分配住房。官员们自信地告诉我们住房和公共服务事业都搞得很出色，然而当我们要求能粗略地参观一下时，他们却对我们说日程安排很紧，没有时间去看了。

官员们的说法，与苏联报纸上的报道以及偶尔相遇的几个当地人的看法并不一致，后者直截了当地揭露，官员们把生产放在首位而把工人当作工具。我们刚回到莫斯科，《真理报》上就刊出一篇文章，尖锐地批评我们刚访问过的那几个城市，责骂当地官员没有解决住房不足和服务行业不齐全的问题，并指责说住了人的公寓大楼里没有暖气、自来水或下水道，房间的隔音也不够好。后来，其他刊物的报道又指出整个西伯利亚产油区的住房建筑大概只完成计划的百分之四十。1975年初，一位下瓦尔托夫斯克的工程师写信给编辑抱怨说，该城连一座电影院也没有，工人们如果能买到一张票到石油工人俱乐部看旧影片就感到非常幸运了。另一位苏尔古特的工人写道，那儿的石油工人俱乐部造了七年至今还未落成，这说明工人们迫切需

要的娱乐设施被置于极次要的地位。苏联学术刊物估计，在西伯利亚的生活费用比其他地区高出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八十，工资津贴的很大一部分都花费在这方面。作家协会周刊《文学报》哀叹，分配去西伯利亚短期工作的工人绝大多数都有这手进那手出的感觉，他们挣到了高工资，但又花得精光。1973年8月，有一篇文章谈到一个"意料之外的发现"，即"工人中最容易流动的部分就是那些平均收入最高的人。"

当我们乘坐的飞机在越刮越猛的暴风雪中在苏尔古特降落时，当地艰苦环境的生动情景实际上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机场里挤着约二百人，他们躺在行李上，趴在窗台上，沉浸在一片疲惫、厌倦的气氛之中，这说明他们正在没完没了地等待着。两位苏联新闻社陪同人员很快地把我们领到贵宾休息室，使我们与俄国人隔开来。但是，我在报亭边闲荡时，一位眼神疲乏无力、火气很大的妇女与我搭起话来。她显然是因为我戴了皮帽子穿着羊皮大衣而把我当作俄国人了，她高声地向我提议一起上区党委去控诉。她谈到自己全家被困在这幢机场大楼里已有六天了——后来我发现很多人也是处于同样困境——楼里没有室内抽水马桶，没有睡觉的地方，只有一个小得可怜的三明治便餐柜台。

"六天？"我怀疑地问。

“我们已经在机场呆了六天，等候客机去汉特-曼西斯克（大约离这儿二百五十英里），”她重复说。“我们一直住在这里，就在室外雪地里盥洗。行李室太小，放不下我们的衣箱，所以我们只好坐在衣箱上。我的两个孩子应该上学了。我还得照管我的家庭。我们一直在控诉，但什么用也没有。我们一起上区委会去吧。或许他们能解决一些问题。”

我听说，并不是没有飞机在飞航，可是那些能够飞航的飞机都被公家占用或者用在主要航线上，却不用在她和其他一些人所想乘坐的地方航线上。坐在她近旁的一位妇女察觉到我是个陌生人，想要拦住那个妇女，不让她和我们谈话。“你知道你是在和谁谈话？”她警告说。

但是，那位妇女气得什么也不顾忌了，因而并没有住口。“‘我在对谁讲话’，这是什么意思？用不着你插嘴。”就在那时，我的一个苏联官方向导人员又过来了，而且一定要我到贵宾休息室与其他人呆在一起。几个小时之后，天气放晴，我们乘坐另一架飞机离开了那里，可是，机场上的人群还在等待着。

苏联官方的一般解释是，这些在初期象道奇镇[1]一样粗陋、发展尚未完善的西伯利亚新建城镇，是为青

[1] 美国堪萨斯市西南的一个小镇，以种植小麦和养牛为主。——译者

年人建立的，他们可以从那里增长才干。忠实的西伯利亚人坚持说，夏季你再来看看，在广阔无垠的西伯利亚原野打猎和捕鱼真是自由自在，令人心旷神怡，而且河中的船只也运来了供应品，这一切足以弥补严寒的不足。这一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大城市太拥挤，"在布拉茨克一位二十三岁的工人这样对我说。"大城市里人们总是熙熙攘攘。这里既平静又安宁。夏天，我喜欢去打猎，乘着自己的摩托艇在布拉茨克海中畅游。"

然而在布拉茨克，副市长亚历山大·谢麦尤索夫相当坦率地向我承认，青少年犯罪、偷窃车辆和收听不健康广播，在缺乏明确生活目的、不满足现状的年轻一代中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即将出现更多其他问题的征兆。谢麦尤索夫说，早年的理想黯然失色，许多青年人感到新的现实生活凄凉平淡，单调无聊。要激发他们的热情很困难。他承认，"谈起办好木材厂和铝厂，听上去就没有我们当年建造水坝和新城市时那样富于浪漫色彩。"换句话说，布拉茨克这座新耶路撒冷城，在草创时期自然而奔放的热情中曾是一个成功的城市，而在作为永久性城市的乌托邦蓝图时就不那么成功了。

十四　新闻报道

白塔斯和读者来信

起败坏道德作用的只是受检查的出版物。最大的罪恶——伪善——是同它分不开的；……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1]

卡尔·马克思，1842 年

1972 年 8 月初，莫斯科被神秘的蓝色烟雾包围了多日。烟雾一动不动地笼罩着全城。莫斯科南面多莫杰多沃巨大的国内机场能见度极差，飞机不得不改在他处起落。有几个早晨，从我们八楼的公寓里眺望，只能看到三百码的地方。莫斯科人咳得很厉害，擦着眼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78 页。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第 10 版。——译者

泪。电车和小汽车被迫开着车前灯。谣传莫斯科周围田野里的大火正在威胁着闹市区，人们惊恐万状。然而将近一个星期，报纸只字未提。最后，一篇登在末版的寥寥数行短文提到了莫斯科以东六十英里、靠近沙图拉的一个泥炭沼发生火灾。两天后，另一家报纸增加了一个已无法隐瞒的事实说，“烟尘已吹抵莫斯科，”但没有提及这个城市是否有危险。烟雾凝沉浓密，似乎不至于飘了六十英里。

我所认识的一位中年科学家急欲了解更多的情况，他试图从莫斯科中央消防站吓唬出一些消息来。他装作是声名显赫的作家协会的医生，打电话给消防站，声称他这里有一些患肺炎的病人，由于吸入了烟雾，病情危急。他要知道是否应将这些病人撤离城市。

“站长到失火现场去了，”调度员告诉他。

“那么，让副站长听电话，”科学家说。

“他也到失火现场去了。”

“那么，让我同随便哪位负责人谈谈。”

“他们都到失火现场去了，”调度员始终没有改口。“这里只有我一个人留下。”

“那么，请你告诉我这场火灾的严重程度，你认为要多久才能扑灭，”科学家说，“我需要知道火势是不是已经控制住了。”

“我不知道，”调度员回答。“他们都到失火现场去

了，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无能为力。”

我的朋友挂断了电话，情绪比刚才开始打电话时更加不安。不过，几天后，烟雾总算消散了。报上又有一篇文章，责怪夏季的酷旱导致泥炭沼失火，还宣布了一些规定，禁止在莫斯科周围一大片易燃的干旱区野营、野餐和点燃篝火。显然还有许多情况没有明说。事隔很久，有些消防员被誉为具有英雄主义精神，报上还登了一个青年的讣告，谨慎地登在里面的版面上。最后，点点滴滴地透露说，大火在7月初就发生了，波及九千英亩土地，足足过了一个月，报纸上才提到此事。参加这场战斗的有一千多名救火人员，包括飞机、伞兵和整批的军队。后来才知道有些火一直烧到离克里姆林宫仅十五到二十英里时才被扑灭，非常接近莫斯科市郊的居民区。然而，大多数报刊实际上没有登载什么，党的那份马首是瞻的报纸，则只字未提。

缺乏这种日常的和显然是必要的新闻报道，是很典型的事情。俄国人也已习以为常了，许多他们需要知道的新闻就是日复一日的不见报。一天晚上，我同那位打过电话给消防站的科学家谈论这个问题。我们出去散散步。“去散散步”对俄国人具有一种特殊意义，因为这是可以安全地避开电话录音或窃听器，坦率地谈论苏联生活中某些敏感方面的最谨慎不过的方法。我们在离开外交部不远的阿尔巴特大街附近散步，那

里有不少十八、九世纪房屋挤在一起，外表已经斑离剥落，外墙饰有一些浮华的灰泥花纹，维多利亚式的正面外貌已经褪色。这些房屋过去是贵族或者象果戈里、赫尔岑和斯克里亚宾等知识分子的住宅，现在则成了博物馆，或是在镶着花边的窗帘后面杂乱无章地晾着衣服的公寓。那天晚上，一阵十月中旬的暴雨下过后，弥漫着伦敦那样一种湿气，街上空无一人。我问我的科学家朋友，限制新闻报道对个人生活有些什么影响。

他告诉了我一个悲惨故事，有一个来自中亚细亚的女青年一年前从卡拉干达飞到莫斯科来参加国立莫斯科大学入学考试。她原定在莫斯科呆上一星期。她的父母亲等了十天，没有听到她一点音讯，莫斯科的友人也没有捎来什么音讯，感到非常担心。两个星期后，她父亲亲自飞到莫斯科来设法寻找她。他到了莫斯科大学，人们告诉他，他女儿从来没有来参加过考试，人们一点也不知道他女儿的情况。他访问了他女儿本来想去勾留的亲友家，但是，他们根本没有见到她。他跑去找警察。在一个警察分局，一个警官建议他不妨去找找机场警察派出所。在这个派出所，就象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他请求帮助寻找他的女儿。直到这个时候，才有人秘密地告诉他——并要他保守秘密——他女儿搭乘的从卡拉干达飞往莫斯科的飞机失事坠毁，她和其他乘客们一起已经遇难丧生。他楞住

了。这时他或他的朋友才第一次听到飞机坠毁的消息。

苏联报纸不报道这种灾祸，除非失事的飞机中有外国人或苏联要人搭乘才偶尔报道一下，而且，也只是简短而含糊地报道一下。这就是说，一般人是不可能从报纸上看到什么消息而警觉到他们的亲人也许会死于一架坠毁的飞机中。而且，我那位科学家朋友解释说，苏联民用航空公司往往不记下乘客们或他们亲属的住址，因此，等到一架飞机坠毁了，苏联民用航空公司也不知该去通知谁。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可怜的人不得不到处寻找他失踪的女儿和自己去发掘这一悲痛消息的原因。

苏联报纸这种耍弄花招的沉默，损害了它自己的信誉。1974 年 10 月，一个性心理变态的杀人犯闯进莫斯科街头。他在人行道上戳死了很多妇女，正象一个肥胖的主妇对我说的那样，使得莫斯科人对街头犯罪问题害了严重的神经过敏症，担心情况已经变得“象纽约一样糟”了。当时，我从一些俄国人那里听到亲身经历过的关于抢劫、盗窃、扒窃以及窃车的事，多得超过了我原来的想象。当我们的办事处向莫斯科警察部门采访已有所闻的谋杀案件时，我们遭到了毫不客气的拒绝。不过，苏联妇女们告诉我说，她们在工作时曾得到正式警告，要她们在夜间不要外出，并要公寓看守

人员严加防范，不要为陌生人开门。一个头发灰白的俄国妇女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我的丈夫对我比前几年更殷勤了，以前他从来没有为我担心过。可是，现在天一黑下来，他就坚持要在公共汽车站上接我，陪我一起走回家。"纠察队员被召来一起追捕逃犯，并且发给了他们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漂亮、和善、身体强壮、专事猎取身穿红色衣服妇女的金发小伙子。

尽管报上只字未提，我却知道有一家报馆对它的工作人员说，有七个妇女被一个心理变态者戳死。那件事和其他情况介绍所提到的类似的事发生后，谣言便传开了。据说不是一个凶手，而是两个，后来又说是一帮匪徒。有几天我们听说有一列装载大批青年心理变态者从一个拘留所迁到另一个拘留所的火车出轨了，逃跑了二百名罪犯，流窜在莫斯科。后来在逃者的数字增至五百人。最后，10 月 28 日，以前对西方报刊避不承认是一个问题的警官私下里告诉英国新闻机构——路透社记者说，他们抓到了一个青年，认为就是他杀死了十一个妇女——其中三个是在二十四小时之前被杀死的——他正在接受精神病观察。这个传说也在别处得到证实。然而，就在那天，显然是为了要使莫斯科惶恐不安的居民放心，《莫斯科晚报》引了莫斯科警察局副局长维克托·帕什科夫斯基的话说，"在过去十天中，根本没有发生过危害人民的犯罪行为。"

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差距如此之大，以致我的俄国朋友们都以怀疑的眼光来看待一切。他们嘲笑帕什科夫斯基否认发生过任何凶杀案件的说法是荒唐可笑的。他们在工作中私下交谈和同个别警官谈论中了解得更清楚。不过，因为他们感到受骗太甚，以致他们也不相信西方报纸关于凶手现已被捕，危险实际上已过去的说法。

“他们可能抓到一个了，”一个中年母亲说，她的反应是颇有代表性的，“但是，还有第二个凶手哩，他们还没有捉到主犯。”

对于西方人，尤其是对于完全受到新闻报道闪电般袭来的美国人来说，要在想象力上来个大跃进才能想象得出俄国的新闻报道是多么贫乏。在过去十年中，美国人一直被淹没在连同各种事件俱来的、瀑布似倾泻的新闻中——电视屏幕上一会儿爆出了越南战争，一会儿又让他们亲眼看到，总统因水门事件而垮台。他们被一种尼亚加拉大瀑布似的新闻所淹没，这种新闻照例是不让俄国人知道的——不仅有象五角大楼文件这样的内幕新闻，或者被某个亨利·基辛格泄漏出来的背景新闻，还有最近消费品价格指数摇摆不定或失业率等经济新闻，犯罪、吸毒或性行为等社会新闻，对政治人物或种族关系的民意测验，关于离婚率、

移民、教育的调查统计新闻，或者是主动送上门的时新商品和廉价品的广告新闻。

比较起来，俄国是处在一种新闻真空状态。当然，严格说来，它也不完全是真空的，因为科学界有它自己的情报机构，又因为苏联的报刊和图书馆都充满着令人振奋的官方统计数字，这些数字勾划出一本苏联小册子厚着脸皮声称的社会主义祖国“空前增长和全面发展的奇迹”以及沿着“史无前例的道路前进”的情况。但是，确凿而切实有用的新闻发布出来时，已被搞得支离破碎了。正如一位法国贵族居斯蒂纳侯爵在访问沙皇俄国时观察到的，这种确凿而切实有用的新闻，被俄国人那种神奇般的保密观念所限制住了（居斯蒂纳在 1839 年写道：在俄国，一切都是保密的；——无论是行政、政治、社会方面的事都是秘密，至今仍然是这样）。同他们的沙皇前辈一样，苏联官员们不喜欢承认出了什么乱子，或者有什么事已经失去了控制，对待飞机失事或莫斯科周围的夏季大火就是这样。他们固执地认为承认失败是不安全的。他们限制对那个性心理变态杀人犯的新闻报道，也许是为了不使人民惊慌，而对罪犯不作引人注目的宣传，是担心因此会鼓励更多的犯罪行为。但是，我猜想，更重要的倒是这样一种情况：凡是使人觉得有什么事情出了岔子，以及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花园里竟然生长着罪恶的野

草，这些尴尬的事实都得掩盖起来。有时候，也纯粹是由于官僚主义的愚蠢而把新闻扣压起来。更多的情况则是因为当权者（这只要是一些小官僚就能办到）认为普通的男男女女干脆用不着知道。

1972年5月尼克松第一次访问莫斯科的情况，在我脑海里留下了一个不必要地使群众蒙在鼓里的突出例子，这倒不完全是因为涉及什么高级政治，而是出于当时那种简单机械做法。西方报刊事先详细报道了有关这次访问的情况，而苏联的报刊只登了一条预告（不过莫斯科人事先都普遍得到警告，要求彻底整顿市容，并利用“看你叩首”[1]这个词开玩笑）。在尼克松预定到达的那天，《纽约时报》登了一张从要人专用的伏努科沃机场到克里姆林宫的汽车队路线图。但是，苏联报纸却没有发表路线。甚至他的到达时间也是保密的，只有那些洞察力很强的人才能在每日电视节目表里标明的一项“下午四时——国际节目”的枯燥乏味项目中辨出真正的意义。

成千上万的人都从那一小小的提示中得到了启发，丢开了工作，想去看一看第一个前来访问他们首都的美国总统。但是其中有许多人估计错误了，因为他们得到的消息不完全。我碰到一批群众，大约有两千

---

[1] 原文是俄文 книксен，该词发音与“尼克松”一词近似，而意思是行屈膝礼。——译者

人，纵深八排地仍然站在距克里姆林宫不远的练马场上，而足足在半小时前，汽车队已从隔着几个街区的、人们看不见的另一个大门，把尼克松送进了那个堡垒。

“你们为什么还等在这儿？”我问几个人。

“看呗！”一个背着背包穿长袖衬衫的大学生回答说。

“你们为什么不等在克里姆林宫另一头呢？听说尼克松是从那里进去的，”我问。

“这里比较好，可以看得清楚些，”他不明真相地说。

“可是，尼克松已经进入克里姆林宫了——从另一头进去的，”我说。“我看到他进去的。别等啦。”

“喔，”那个年轻人说，当场楞住了。我走开了，但是群众还是耐心地、满怀希望而一无所知地站在那里。

尼克松第一次访问莫斯科，就是苏联领导集团能够多么有效地把它自己的群众同政治现实隔离开来的显著实例。比起西方的群众来，俄国人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整个事件的。普通俄国人消息太不灵通，不论对高级会谈遇到的困难或取得的胜利都是无法探测的。

除了一小撮政治权势人物，没有一个苏联公民有任何理由指望能了解到限制战略武器竞赛方面会签订什么重要协议。有关核武器恐怖均衡的同类编写名

称如SALT(限制战略武器会谈)，ICBM(洲际弹道导弹)，MIRV(分导式多弹头导弹)，ABM(反弹道导弹系统)决不会成为家喻户晓的词汇，因为很少会向苏联公众提到这些名称。有关前两年半的核武器会谈情况，苏联新闻所报道的只限于温文尔雅、不泄露任何秘密地发表一些首席谈判代表们抵达和离开的声明。除了那些站在权势顶端的人物以外，人人都蒙在鼓里，因此，一个完全受到信任和富有经验的苏联记者，竟愚蠢得用一瓶白兰地来同我打赌，认为除非越南战争问题得到解决，核武器会谈决不会、也不可能达成什么重大协议。这次打赌还是在尼克松在海防港布雷危机之前作出的。这位记者对核武器会谈已经取得的进展，简直一无所知，而在西方报刊上却已相当明朗了。

海防布雷问题，也不让苏联的公众知道，这倒省却了烦恼。在华盛顿，在海防港布雷问题上的对抗情绪是显而易见的。世界报刊竞相拿它来同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相比，并推测苏联的扫雷舰企图打破布雷封锁。尼克松被民主党谴责为搞冒险的边缘战术，白宫也似乎鼓励这样的说法，即它要迫使莫斯科来一次摊牌。

如果道出了真相，聪明的苏联人肯定会发现很难理解克里姆林宫怎么吃得消这种耻辱：竟然不顾因布雷而火冒三丈的河内盟友的反对，仍然邀请尼克松访

问。据说乌克兰共产党党魁彼得·谢列斯特就是由于强烈要求政治局取消这次访问而被罢官的。但是，因为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的大多数人对尼克松的挑战采取迂回而不是针锋相对的态度，苏联报刊就不让它的公民们知道情况。在高级会谈前后的二十天中，受控制的报刊都没有提到布雷问题，只是在一则新闻的字里行间简单地一笔带过。而且报上也不提高级会谈期间有一架飞机载着在美国空袭港口地区时遇难的两具尸体和二十个受伤的苏联海员从北越飞回莫斯科的事。按照通常的情况，这本来是可以对美国进行猛烈抨击的一件新闻，可是，现在这条新闻对克里姆林宫成了一个麻烦，因此就把它压下来了。

结果，普通俄国人把苏联报刊谴责美国空袭越南看作例行公事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对于危险的形势知道得太少了，因此无法同苏联权贵们分担遭受挫折之忧——正如在高级会谈以后，苏联公众情况了解太少，无法与领导人共享达成协议之乐一样。几个月后，还有人私下邀请我去向苏联的科学家、作家和知识分子们解释协议。没有一个人高兴去读那些协议的条文，因为报纸按照原文一字不改地登了出来，不附任何使人明白易懂的必要解释。而且，最重要的文件——规定每一方的地对空导弹和导弹潜艇正确数字的议定书——苏联报纸从来不登载。一位科学家对我说，如

果向普通俄国人透露双方已就他们武器的精确数量达成了协议，势必会损害党所发动的要求居民保持冷战警惕的运动，也很难继续坚持要求科学家发誓在发表非国防性纯学术性论文中不泄露任何机密，而他们一直是要这样做的。换言之，假如限制核武器协议的内容真的让苏联的知识分子获悉，整个保密制度的理论基础就会不攻自破。

尼克松访问结束时比开始时要好得多。在尼克松离开的前一天，一个随同总统访问的美国记者在克里姆林宫注意到：一对俄国夫妇来到鲍罗维茨基大门问一个便衣保安人员，克里姆林宫何时再向一般群众开放。

“我不知道，”那个保安人员敷衍了事地说。

“我们是从列宁格勒来的，”那对俄国夫妇解释说。“我们想重新安排一下在莫斯科的计划，以便确保我们还有时间参观克里姆林宫。你能否告诉我们美国代表团什么时候离开。”

他们得到的只是一个无动于衷、僵硬的回答：“不知道。”

此时，一个站在一旁的美国记者走到俄国夫妇跟前，把西方报刊读者一般都已知道的情况告诉他们：尼克松一行明天就要走了。“也许克里姆林宫将在那时以后开放，”他说。

这是一个典型的颇有启发性的小插曲。苏联官方对普通俄国人可以知道的消息常常进行封锁——无论是交通图，电话簿，广告，克里姆林宫何时重新开放，或者其他一些在西方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琐事——看来并没有什么深刻的政治动机。官员们的这种做法，纯粹出于苏联一种残忍的或者根深蒂固、习以为常的蔑视“小人物”的骄横态度。

例如，国际旅行社可以在电话里告诉你火车和飞机的时刻表，但是，硬是不肯透露是否还有座位。只有你本人亲自前去才能打听到（而且是在经过一场激烈争辩获准旅行以后）。俄国人对我说，假如这使我们灰心丧气，那么，他们在火车站、售票处和商店里所受到的对待，还要粗暴得多。“我从不白费力气去打电话给一家商店问他们有些什么，”一个家庭妇女劝导着说。“他们是不会理睬你的。”唯一的办法是自己去排队。苏联民用航空公司似乎有一条不成文的清规戒律，或者也许实际上订有什么条文，即不告诉你它的飞机是否准时起飞或者抵达时是否误点，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因为飞机抵达和离开的时间如此不稳定，所以误点与准点的机会似乎都是一半对一半。但是，穿着蓝色制服的地勤人员，不论是假胸脯隆起的中年妇女或是胸部丰满的年轻金发女郎，除了时刻表上规定的起飞时间外，什么话都不跟你多说。这种互不通气的政策在全国

所造成的时间浪费一定是巨大无比的。我个人在一次急促的旅行中耗费了很多时间，等了十七个小时之久。我知道有些人为了等候飞机竟在终点站呆上二十四或三十六小时。实际上我每到一地苏联的机场上总是乱哄哄地挤满了人，象是一些枯萎了的花朵，靠在所有可以利用的家具上，沉闷地通宵守候，不能随便离开，因为苏联民用航空公司不肯告诉他们一个大致起飞的时间。

美国人看电视和报纸，对广告和商业新闻轰得他们头昏脑胀而叫苦抱怨固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让他们在俄国过一阵子那种对消费者市场消息一无所知的生活，他们多半就会要重新考虑一下了。缺乏最基本的消费品供应情况的消息，是俄国人生活中最虚弱和畸形的方面之一。这就是为什么俄国的人行道上经常挤满了买东西的人的主要原因，他们拎着网袋和手提包，认真地从一个商店踯躅到另一个商店，从事一种没完没了的摸彩票似的工作，希望能偶然发现什么东西，或在街上碰上某个陌生妇女，问她从什么地方买到那么好的桔子。

苏联的广告对消费者没有什么帮助，因为广告还是非常原始的。除了在交换住房方面可以得到很好的具体消息外，苏联消费者只能靠踏破皮鞋或是非正式的小道新闻。苏联的广告真是典型的为树立永久信誉

而做的广告（如“手表可以作为最好的礼物”或“假如你想延年益寿以及要美观、端庄、雅致、真实，那就请饮茶吧”）。大多数报纸都不登广告，即使比较受欢迎的《莫斯科晚报》也只是每周出一期广告增刊，上面大都是有关个人方面的广告和寥寥几句意义含混的商业广告。电视偶尔在第二频道以较短时间集中播送一下商业新闻，但是水平太差，几乎没有人要看。即使播送这种商业新闻，也很少会告诉听众何处可以买到广告中提到的商品，这是苏联许多广告中的一个主要缺陷。

顾客希望购买上等肉类或买一件时新服装，可是手边却没有黄色专页[1]以便“以手代步”。也没有西方那种告诉你何处可以买到你所需要的商品的专门刊登超级市场或百货商店广告的报纸。最方便的门路是下午一时四十五分莫斯科广播电台十五分钟的商业广告节目（我有许多苏联朋友甚至还不知道有这档节目）：第一百四十二服装商店供应“大批可供挑选的男式西服，苏联制造，有全毛、毛涤混纺或纯涤纶的，价格从七十到一百五十卢布〔九十五到二百美元〕”，或第七电器用品商店承接贴换业务，用过的洗衣机再付十二个卢布〔十六美元〕可以换一架新洗衣机。我问一位做母亲

[1] 指电话购货的商业广告，一般刊登在电话簿用黄色纸张印的附页上。——译者

的妇女对这些广告有什么看法，她有点厌恶地咕哝了一声，表示对这些广告不屑一顾。

"听着，"她说，"基本上有两种商品：一种是实际上无人问津的，有时就登广告；一种是供应紧张的热门货，商店就无需登广告。"这个简明扼要的评价得到其他一些人的共鸣。

换句话说，俄国人要就是从有地位的朋友那里获得内部消息，要就只好碰碰运气。当一个身材瘦长、面孔有点象安迪·冈普的语言学家一想起 1971 年 12 月接到一位朋友的救命电话时，就得意地咯咯大笑起来。这位朋友得到一个消息，说是莫斯科一个唯一出售新汽车的部门次日将让人们订购第一批日古利牌小汽车两万五千辆——这是全市两年的分配总额。"那个家伙告诉我，他可以在夜里排队时给我占个位子——他们不顾寒冷，已经在那里准备排个通宵，"这位语言学家说。"不过我必须在天亮时到达那里。我的朋友说，明天准会是一个乱糟糟的场面。他说的对。以后就不会再有订购的机会了。为了买我那辆汽车，就得再等上一年，不过，我总算买到了。没有那个电话，我就不会这么幸运。"谁也不愿意费心为如此重要的事情刊登广告。要找到机会，一个是靠运气，再有就是可靠的门路。

象买一张地图那样普通的事，也成了一个问题，虽

然其中可能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原因。俄国人似乎并不是非要街道交通图不可。他们没有汽车，只要相互问一问大概的方向，就可以去乘公共汽车或地铁。但是安和我都喜欢参照地图安步当车地观光。在莫斯科，有些市内报摊有时也出售地铁和街道交通图。但是，我们所到之处，几乎都无法买到街道交通图，哪怕是最简单的也买不到。我们要找地图时，国际旅行社的向导就会塞给我们一大堆折叠式地图，诱使我们到雅尔塔或其他一些遥远的地方去，或者塞给我们许多印有当地的喷泉、大学和巨大列宁塑像的小册子。不过其中就是没有地图。我们搜遍了所有的书店，没有地图。营业员们凝视着我们，仿佛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军事秘密，"一个苏联记者暧昧地说。另一位朋友看到我们到处买不到地图而有点同情地笑了起来，并秘密地对我说，在少数可以买到的莫斯科地图上，故意把街道的角度搞得偏歪一点，以便迷惑西方的情报机构。我被弄得目瞪口呆，但是，他说，他不是在开玩笑。

西方人绝对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另一种普通参考工具——电话簿——也简直成了一种无价之宝。我们在莫斯科的三年中，相当重大的事件之一就是出版了一本新电话簿。直到那时——甚至在以后——莫斯科应该列为世界上很难找到一本电话簿的最大的都市。同

西方的电话公司不一样，苏联邮电部是不主动向用户提供电话簿的。在公用电话处或其他公共场所也找不到电话簿。但是，另一方面，除了找朋友外，俄国人使用电话似乎比西方人少得多。

1973年发售的电话簿还是十五年内在莫斯科出版的第一本私人电话号码簿（尽管每经过一段比较短的时间也出版一种机关、商店、医院和其他国家机构的专用电话簿）。同苏联人向往的许多商品一样，这本电话簿的麻烦在于它的供应量不能满足哪怕是最起码的、虚装门面的需要。一个有八百万人口的城市，印刷厂只印了五万本电话簿。即使四本一套售价高达十二卢布（十六美元），几天之内也在全市的报摊上抢购一空。

那些有幸获得全套单位和私人电话簿的人，就会发现一些奇妙的事情。莫斯科州和市政府占了单位电话簿的三十二页，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这个全国最有权力和最重要的机关，拥有相当于政府各部全套机构的完整的影子政府，只是谦虚地登了一个号码（206—25—11）。大多数部都有十五个或十五个以上的号码，而国防部只列了两个。苏联的宇宙空间计划机构，根本就没有电话号码。克格勃或秘密警察部门，只登了一个二十四小时值班的问讯处电话（221—07—62）。而且，成千上万住在苏联的外国外交人员、商人和记者

的电话全部略而不登，这大概是要同苏联官方力图不让普通苏联公民与外国侨居者接触这种做法相配合的缘故。

那些因运气不佳而无法搞到一本珍贵的电话簿的人，可以打电话给问讯台(09)或者到莫斯科市区内星罗棋布的八角形小问讯亭去问。但这常常不象所说的那么简单。我知道要从问讯台的接线员那里问到一个号码，你必须报全名(名字、姓氏和父名)以及极其确切的地址。有一次，我在问我想找的一个人时，对方竟要我报出那个人的出生年月，使我大吃一惊，我只得表示道歉后挂断了电话。我并不想使那个人遭到麻烦，我担心那个接线员可能在进行非常仔细的检查，因为我的俄国话带有外国口音。不过，后来苏联朋友们解释说，这些都是接线员们经常提出的问题。由于人们住在这么大的公寓住宅区里（几幢大楼往往有着同一个街的门牌而大楼的号码不同)，由于许多俄国人都是同名同姓的，又因为有许多公用电话，所以接线员们需要具体的材料来分清是这个还是那个伊凡·伊凡诺维奇·伊凡诺夫。

要查询某一个人的住址，也同样是困难的(如果不是更困难的话)。有一天，我路过设在彼得洛夫卡大街和环行花园大街的莫斯科第五十七问讯亭时，就看到了这种情况。亭子里的窗口上有一块牌子写着："凡要

查询莫斯科居民的住址，必须提供该人的名字、父名和姓氏；年龄；出生地点（市、州、区或村）”。我简直不相信我的眼睛。“假如我是在寻找我的母亲，”一个年轻的莫斯科朋友俏皮地说，“这我办得到。要找别的人就不行了。”他说，莫斯科人很少到问讯亭去问；这些问讯亭大多是为外地人设的。事实也的确是这样，刚从内地来的人，一下火车或飞机就到红场附近的问讯亭排上几个小时的队。

我了解到苏联生活中的各种捷径后，好奇地想去看一看第五十七问讯亭究竟是否按照明文规定的制度在行事。因此，当亭内的一个灰发妇女在接待一个顾客时，我就在一旁仔细观察那张收费表。一个戴着鸭舌帽、身穿棕色棉袄的男人走了过来。他摸出了一些零钱，把一枚钱币塞进窗口，要查问一个已经搬了家的朋友的地址。我确实可以听到他急急促促地讲了这个人的全名、年龄和出生地点。隔了一会儿，那个妇女便从窗口递给他一张小纸条。他把花了五个戈比——等于乘一次地铁的费用——得来的信息装进了口袋，阔步离去。价目表上标着可以向那个妇女问讯的其他项目：郊区火车的情况（两个戈比），远程火车或飞机的情况（五戈比），城外的疗养院和休养所的情况（八戈比），乘坐联运运输工具旅游——火车、海轮和内河航轮联运——的情况（十戈比），一般的法律问题（五戈比），丢

失文件的查询(十戈比)，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回答的问讯(三十戈比)。

同苏联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要获得消息，不是要靠金钱，而是要靠门路。一个苏联人的门路越多消息就越灵通，因为消息灵通与否也象消费品一样是按等级区分的。例如，党和政府的要人，重要的部级官员和重要的中央一级报纸的宣传人员，就可以得到塔斯社的那两份特别情况简报和一份每日新闻特讯。人人都可以看的普通新闻稿，即所谓蓝塔斯或绿塔斯，把国内外的新闻经过消毒审查和修改，以符合党的路线同时又删去了可能在客观上暴露苏联本身的内容。在莫斯科环行花园大街的塔斯社总部，也对全世界各地报纸杂志发挥着过滤站的作用。有一次，一个塔斯社职工向我透露，莫斯科的塔斯社美国组，除了在华盛顿和纽约的全部记者，共有十二个编辑。

"他们究竟都有些什么事可干呢?"我问，"苏联报纸每天只刊载寥寥几百字有关美国的报道。一个人就足够应付了。"

他承认，他们大多为"塔斯社内部参考资料"工作——意思是指那份每天出版的长达一百多页秘密的塔斯社专刊，发给政府各部、党中央机关以及各重要报馆。每当我去访问《真理报》或《消息报》的高级评论员

时，我总会看到他们的办公桌上堆着这种特别的“白塔斯”参考资料。这种参考资料对外国新闻和评论(包括西方记者发自莫斯科的电讯摘录)的选材，较塔斯社通常报道要丰富和详细得多。我还听说“白塔斯”刊载了有关苏联国内事务的精确和暴露性的新闻，例如飞机和火车失事的消息，犯罪统计，卫生方面传染病的消息，产品的严重不足，收获情况以及当局认为不便公开发表的类似材料。最后，我知道还有一种印数更少叫做“红塔斯”的参考资料，因为它的封面目录现在是——或者过去也是——用红纸印的。据说它只发给报纸主编、最高级的政府官员和共产党的大头头。尽管控制这样严密，苏联的记者告诉我，内容并不是以间谍的报告或特别情报为根据的，其中大多是西方报纸的普通新闻。

塔斯社新闻稿的分等制度，只不过是根据不同的信任程度和职别，为苏联内层人士出版特别读物的整个等级制度的一部分。对苏联的广大宣传人员，党还出版一种《阿特拉斯》周刊，它所刊登的时事新闻比大多数苏联报纸稍微详细些。其他一些组织也都有同样的做法，不过它们都很胆小，不敢承认有这种特殊读物。《时代》杂志的约翰·肖告诉我说，就在1974年6月尼克松访问莫斯科之前，他在莫斯科参加一次公开讲演会，看到邻座一个青年妇女(显然是一个工会积极

分子)正在阅读一篇题为"什么是弹劾?"的文章。这使他很惊奇，因为直到那时苏联报纸还没有发表过如此明确的报道。他要求她让他看看那本杂志。原来是一篇东德文章的译文，简单地解释弹劾的具体程序，但在暗示尼克松地位的削弱方面比一般苏联书刊讲得更详细。肖草草地记下了这本刊物(一本工会内部刊物)的名称和电话号码。肖还发现这个刊物的发行量很小，大约二千份，显然是供主要领导成员和积极分子阅读的。第二天，他请他的翻译向出版单位去要一份这种刊物。但是，编辑们不但不肯给，甚至否认有这份刊物，尽管肖说他已经亲眼看到过。

同上述情况相似的另一种现象就是按照等级做秘密报告，它对苏联制度的运转有着重要作用。这种报告是为党组织、政府各部的官员、报社的干部、科学研究机构以及各种专业团体举办的。一个当过党的报告员的热情认真的青年，由于看到党内一些大人物拥有种种特权和厚颜无耻的态度而感到了幻灭。他告诉我说，报告通常是对党的政策提供比平常更坦率的解释；或者是发动一场私下攻击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之类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如果当局不希望由于公开攻击他们而引起西方不满的话）；或者讨论或解答一些难堪的事情，如歉收、工业事故、党和政府内部的人事变动，或者甚至就诸如近至1974年在莫斯科发生的性

心理变态杀人犯等问题向人民提出警告。这个人说，报告会上所透露的情况的多寡及其坦率程度，系根据听众的地位和政治可靠性而严格掌握的。他说，在党的秘密会议上"假如有人提出正当的问题，我们当然给予回答。有几种材料是可以提供的，例如，我们的收成，我们向国外购买了多少吨粮食，支付了多少黄金，或者诸如我们向越南提供了多少援助等问题——一天援助二百万卢布(二百六十七万美元)。但是，有些问题，不管是谁提出的，我们都不予回答。假如有人问行刺勃列日涅夫的那个人怎么样了，我们就不回答这种问题。又如有人问政府何时会取消赫鲁晓夫 1962 年实施的暂时提高物价的决定，我们也不回答这种问题。"他说，在他出发作报告之前，他得到指示对不同类型的人可以透露什么资料——对州和区的党的高级官员可以透露最多；对普通的机关工作人员则透露得最少。但是，他发现在各级官员中都产生了一种普遍的效果：秘密报告使每一个听众感到自己是一个圈内人并且受到信任，因此也就对党承担了义务。

除了这些秘密报告外，全苏知识普及协会所举办的无数公开报告会，虽然比起秘密报告会来显得平淡无奇，但还是较之苏联报纸有些揭露，因为在会上可以有一段时间提问和解答。在这些提问和解答中，我听到俄国人问起关于从美国购买粮食、萨哈罗夫的境遇、

埃及驱逐苏联军事顾问，或在贸易和犹太移民问题上同美国对抗的基本原因等问题。在1973年9月苏联停止对《美国之音》和西方电台广播的干扰后，人们提出的问题一般似乎比以前更为尖锐。这反映出在象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这些大城市里，有些人不但收听西方广播，还想用西方的新闻向他们自己的官方套出更多的东西来。不过，这种提问的增多或减少以俄国人对新闻事件的兴趣为转移。当西方广播电台着重广播西方的经济问题时，提问就缓和了一些。

为了使较高级圈子里的人始终消息灵通而又不使普通公民的思想受到毒害，苏联制度的一个特点是出版一些重要的以及在政治上敏感的外国图书的“特种版”。大批西方小说经过挑选，从海明威、德莱塞和高尔斯华绥到阿瑟·哈利以及库特·冯尼古特，都被译成俄文公开出售，尤其是那些不加掩饰地描绘西方生活和精神面貌的作品更是如此。但是，政治权贵们很感兴趣而又觉得会对苏联公众过于刺激的非文艺小说类作品，则在翻译出来以后用特种书籍的形式出版，印数十分有限。自动控制系统专家、最后移居到国外的持不同政见的犹太人米哈伊尔·阿古尔斯基告诉我说，在他颇为得势的年代里，他也看到过特种版的书，如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的《现代工业国家》，伯特兰·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其他人还告诉我，一些德语专

家曾翻译过对斯大林颇有教益的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或为当代的领导集团翻译了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更不必提一些英语专家曾译过各种有关美国战略思想的书籍了。

阿古尔斯基说，这些特种版都注明"仅供内部参考图书馆使用"，意思就是只有党的高级官员或党的研究人员才能阅读。这些书很容易同苏联的普通书籍区别开来，因为它们不象普通书籍那样在书的封底印有规定的价格。阿古尔斯基还说，这些书都是单独编号，象西方的绝密文件一样，如果不经登记注明什么单位借阅，什么人负责签收，谁也不能拿走一本。

在苏联制度下不单是图书，而且外国期刊也是按级别分发的。高级编辑、行政官员、科学家以及其他显要人物有时拥有个人订阅西方刊物的特权（包括美国新闻署的宣传杂志《美国》）。一位科学家告诉我说，莫斯科的物理问题研究所所长彼得·卡皮察除了收到几份有关他本人业务范围的专业杂志外，还收到《科学》、《科学的美国》或者一份象《新闻周刊》之类的普通杂志，虽然在政治敏感时期，卡皮察订阅的期刊被中止了。所有这种刊物当然必须受国际邮件检查人员或专为外国科学杂志而设立的中央情报交换所的审查。我曾经在苏联的科技图书馆看到受过这种审查的西方杂志。我在莫斯科一个研究院看到几份《科学的美国》，

在它的目录表上零零落落有几处空白的地方，有些文章有被涂掉的空隙，显然是因为其中有涉及武器技术或对苏联的科学或政策作出批判性评价这些棘手的问题。我认识的一位科学文章作者告诉我，苏联官员们对外国刊物中一些令人困窘的政治性文章进行删节，然后又笨拙地力图隐瞒。在访问莫斯科一个订有进口西方报刊并对它们进行照相复制的研究所时，他曾看到原版书和经过处理的苏联复制品并排摆在那里。他回忆说，“在一本杂志里，他们把同样的一则广告印了五页，想填补由于他们不喜欢而被抽去的一篇文章的空档。”

若列斯·麦德维杰夫，一位持不同政见的生物学家，在他那本《麦德维杰夫文集》里用冷嘲热讽的态度描述了这种邮检机关的工作情况。他耐心地用文件来证明苏联的邮检人员已变得如此无能，以致现在从西欧寄一封信到他那里，要比从前列宁在沙俄邮检制度下从西欧寄信到他西伯利亚的家里的时间长一倍。他还告诉我，1972 年索尔仁尼琴给斯德哥尔摩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卡尔·盖洛夫和他在苏黎世的律师弗里茨·希布写了两封信，信中附了一张给苏联邮检人员的纸条：“你们可以读这封信，可以用照片把它拍下来，也可以作化学分析。但是，你们有责任把它送出去，假如你们不这样做，我一定要发表一份对你们的抗议书，这对

邮政局并不是很光彩的。"除了那两张纸条，两封信都寄到了目的地。

更使麦德维杰夫感到有趣的，是处理西方寄给他本人的学术性材料和科学杂志的那种审查制度。他仔细地看了检查人员在外国寄来的材料上所做的各种记号。我读了麦德维杰夫的那本书后，就留心注意这些记号。不久，在《真理报》的一个办公室里，我看到一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也有检查人员的印记：〈185〉，据麦德维杰夫说，这意味着属于最严格控制的一类读物。(从理论上来说，《国际先驱论坛报》在苏联是有出售的，但是，实际上我却发现它只在外国旅游者住宿的旅馆里才偶尔买得到，通常总是放在柜台里面，只供应外国人，而且几乎不是缺货就是过了期的。)后来，在新西伯利亚科学城的技术图书馆里，馆长得意扬扬地给我看归了档的几份《纽约时报》。这些报纸上也有检查人员所做的同样带有限制性的符号，这意味着只有某些经过特许的人才能阅读，虽然馆长企图蒙混过去，把《纽约时报》装作可供一般人阅读的出版物。他给我看的几份报纸看上去没有人碰过。

也许再也没有一个机构象列宁图书馆——在苏联相当于美国国会图书馆——那样，体现了苏联对阅读资料方面那种仔细划分的等级制度。从外表上看去，它有着世界上庄严公共建筑物那种饰有圆柱的堂皇

的正面。在内部，它是按照脱胎于卡夫卡[1]的那套蜘蛛网似的规则行事的。在“列宁卡”（莫斯科人对列宁图书馆的昵称），很明显，苏联政府把知识看作权力，因此对它严加控制。首先，一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普通公民几乎不可能取得一张借书证，主要是由于人太多。持有借书证的人可以进入普通阅览室，但是有高级学位的（苏联哲学博士）专家可以进入特别阅览室，那里藏有更多的材料，尤其是科技读物，偶尔也有西方新出版的小说。

最后，还有一些特别藏书库，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秘密书库。“全部按字母次序排列的索引是保密的”，一天下午我们在这个图书馆时米哈伊尔·阿古尔斯基捋着他那漂亮的、姜黄色的连鬓胡子说。他的意思是说“列宁卡”也许是世界上唯一拥有两整套目录的大图书馆，每一套占了几间大房间：其中一套是对一般读者开放、数量有限并且经过审查的目录，另一套是图书馆全部藏书的目录，包括保密书库在内，只对经过安全审查的人员开放。

“这是一个问题，比如，借阅宗教或哲学作品，”阿古尔斯基轻轻地拖长了声音，以免被旁人听到。“这类

---

① 弗朗茨·卡夫卡(1883—1924)：奥地利颓废派作家，他的代表作之一《城堡》，描写某个城堡，外面道路迂回曲折，内部手续繁复，使人可望而不可即，始终无法进去。——译者

作品并不禁止借阅。但是目录里却找不到，因此你也没法通过图书馆管理员向特别藏书室预借。即使我碰巧知道了目录号码，图书馆管理员也会问我为什么要借这种书。几年前我就碰到过这种情况，我当时想借一本古老的宗教书，图书馆管理员问我，'你为什么要借这本书？你是一个技术专家，你的兴趣倒是十分古怪的。'"

"这句话并不是带着幽默的口气说的，"阿古尔斯基说，眼睛直盯着我。"她不肯把那本书借给我。"

这种问题真会惹得外国学者火星直冒。有一天，一个印度的历史学家在吃中饭时怒气冲冲地向我解释，他不得不完全通过一位中间人去查阅保密目录，然后再到保密书库去借书的倒霉情形。他说，"我全然听任这个青年妇女的摆布，她也可以说很称职，也可以说根本就不负责。"一位英国学者曾聊以自慰地认为外国人通常可以比大多数俄国人多看一些东西，可是，后来他不禁愤懑地回想起他"得先由俄国研究人员检查后"才能借到某些历史资料。一位美国教授因列宁图书馆不肯从保密书库中用静电印刷复制弗洛伊德的几篇文章而很恼火。"我们奉命不许复制弗洛伊德的作品，"图书馆管理员告诉她。"他的作品中有涉及性的理论。"

被藏入保密书库的远远不止是弗洛伊德的著作或

神学作品，这些书只有持有特许证的人才能借阅。据阿古尔斯基和其他人说，保密书库中收藏有：对目前共产党的路线进行论争的各种外国作品和期刊（换句话说，大多是这类内容）；非共产党的报纸和杂志，甚至还有一些共产党的报纸和杂志（据说，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期间，所有平常在公开书库的外国共产党报纸都被藏入了特别藏书库）；毛主义的著作；被宣告判处放逐或极刑的作者如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写的共产主义经典著作，以及早期出版的同现在党的路线截然不同的较不出名的苏联作品（比如斯大林的著作或过于奴颜婢膝地歌颂斯大林的作品，或者恰恰相反，赫鲁晓夫时期的、如今被认为对斯大林毁谤过甚的作品）；以及一般俄国文学作品，不论是十月革命前或十月革命后出版的，只要对共产主义事业或现在的克里姆林宫统治者不利——除非是非常著名的作品（陀思妥也夫斯基或托尔斯泰），如果把它们收藏起来，会使苏联人在世界舆论面前感到难堪。

同任何图书审查制度一样，这种审查制度自有它的不完善之处，有它的漏洞，以及使人感到发笑的小小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托洛茨基等的或者有关托洛茨基的书都在禁止之列，但是可以阅读引用托洛茨基言论的二十年代的共产党报纸。不过，一般说来，对于思想上喜爱猎奇而在级别上又没有资格可以满足自

已愿望的苏联人，图书馆的控制，在挫败他们的愿望上倒是卓有成效的。

苏联在提供情况方面，划分等级之森严，确实使西方人摸不着头脑。例如，美国的武器谈判者发现，在战略武器谈判中，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是个有名无实的代表团团长，他的那些文职助手对苏联的战略武器库实际上一无所知，这使他们不禁大吃一惊。换句话说，他们并不是真正处于谈判的地位，因为苏联的国防部长并没有让他们与闻内情，哪怕是苏联武器的最基本的资料也不让他们知道。美国官员后来承认他们在谈判能够取得进展以前，不得不把最初几个月的时间都花在教授苏联文职人员弄懂核基本知识上。

再谈谈一件小得多的事情。我遇到一位年轻的苏联研究人员，他已经获得特许可以阅读《纽约时报》，作为他在研究所里承担一个研究项目的一部分工作。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一份西方的大报。他被那么多的新闻报道吓呆了，而且更引起了他的好奇心。有一天，这个青年在图书馆管理员旁边消磨时间，管理员正从研究所的秘密书库里拿出一些外国书刊来，这个青年也就心不在焉地乱翻一本落在柜台上的《生活》杂志。他一边同图书馆管理员讲话，一边往《生活》杂志上瞥一眼，突然间，他发觉她变得十分紧张，并且大不以为然地盯

着他看。

“出了什么事啦？”他问。“难道我有什么话讲错了吗？”

“不，”她说。“你只可以看《纽约时报》，不能看《生活》杂志。”

在去莫斯科之前，由于苏联科学享有的声誉以及它对国家的重要性，我曾认为它在提供资料方面可能不会发生这类问题。后来我碰到一些苏联科学家，他们都强调说，他们在赶上国外的发展方面存在着困难，而且要使苏联的同行们适应新的工作甚至更为困难，因为在资料流通上有各种限制，又因为党控制了同西方进行科学交流的各种渠道。若列斯·麦德维杰夫是专门研究寿命问题的，他告诉我说，当他还在俄国的时候，他发现不可能得到附有详细说明致死原因的全部苏联死亡统计材料。尽管这种材料对他的工作是不可或缺的。他表示不满说，“死亡统计材料被视同国家机密。”在莫斯科一家最主要的外科医学研究所的一位生物医学技师说，在那里的医生得不到在外科手术后死亡或因并发症死亡的病人的累计数字。一位法国医生跟我谈起了一桩悲惨的事例，有一位西德外交官在莫斯科因患脑膜脊髓炎死亡，因为他的病没有得到及时诊断，而这主要又是由于苏联卫生当局封锁了当时莫

斯科发生的另一些脑膜脊髓炎病例的消息。一些头脑比较清醒、敢于直言不讳而又不墨守成规的知识分子，如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指责说：苏联科学遭受了麦德维杰夫所说的"独裁主义气氛、缺乏知识自由以及审查官支配一切"的苦难。①

科学作为不属于意识形态的一种客观的知识领域，作为享有巨大威信的一个部门，长期以来就是共产党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建立于1726年的科学院，几乎是一个保持着一点儿独立性、不大受党监督的唯一机构。它一再断然拒绝让党的高级官员如中央委员会科学部部长谢尔盖·特拉佩兹尼科夫成为科学院的成员。它也曾挫败要开除萨哈罗夫和申请移居以色列的电子化学家本·列维奇这些反对偶像崇拜者的主张。列宁自己据说曾对科学院的章程提出过一个修正案，即所有科学院的出版物都可免予审查，然而这个修正案一直被故意置之不理。

在过去几年中，苏联的科学家由于政治干预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在特罗菲姆·

---

① 麦德维杰夫在他的《论社会主义民主》（纽约，诺夫出版社1975年版）一书中，有一章精彩论述整个审查制度如何压制苏联知识分子在文学、艺术和科学方面的活动。他的弟弟若列斯·麦德维杰夫在他的《麦德维杰夫文集》（伦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71年版）中有很长一节谈到苏联科学家的问题。

李森科统治着生物学的二十五年中对遗传学的扼杀。他向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兜售的理论认为，在环境中获得的特性可以在进化过程中遗传下去。孟德尔的遗传学被革出教门，其支持者都被撤职，遭到迫害。他们的领袖，那位杰出的生物学家尼克拉·瓦维洛夫1942年死于斯大林的一个集中营里。在另一个时期，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相对论，阻碍了苏联在核物理方面的进展，并且反对控制论的科学。

一位高级的苏联科学家告诉我说，他感到只是在克里姆林宫开始看到现代科学的各个领域可以用于军事目的时，这些领域才能发展起来。"战前，科学是知识分子的某种玩物，"他说，"但是，后来斯大林懂得了原子武器的重要性，这就大大推动了物理学"——核物理、粒子物理、加速器、核粒子加速器以及整套设备，现在俄国人在这些领域里已蜚声国际。他又说，1950年，控制论受到极大的怀疑，以致一个主要的斯大林主义理论家鲍里斯·阿加波夫在《控制论：一种资产阶级的伪科学》一文中攻击了它。但是控制论在军队中还继续被运用，并且据这位科学家说，在赫鲁晓夫统治时期，大约在1956年，克里姆林宫重新认识到控制论在发展计算机以及直到有复杂制导系统的导弹中的重要性。官方的路线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又是这位鲍里斯·阿加波夫写了一篇新文章，《控制论：新的

科学》。他又说，下一个新宠儿是理论数学，它同化学一样，由于导弹研究而抬高了身价，尤其是高分子聚合化学，这是制造火箭上耐高温前锥体不可或缺的学科。这位科学家说，生物学从赫鲁晓夫以后的领导人手里向前推进了一步，因为它既可应用于农业，又可应用于生物战争。此人对我断然说，“国家看到某一种学科对军事有利，科学家就可以在他们的工作中获得相当大的自由。”

苏联的科学由于出了几个世界上最杰出的物理学和数学方面的理论家而在国际上享有声誉，但是，在其他方面的力量有强有弱，很不一致，实验工作也普遍薄弱。高级的科学家们私下里把这方面归咎于管理不善、顽固的官僚主义、政治干预以及第二流的设备。这些问题，对实验工作者的妨碍比对理论工作者的妨碍更为严重。“我们能从美国科学期刊上看到种种实验，可是，我们甚至不能照着实验，因为我们没有这种设备，没有计算机，”一位沮丧的苏联物理学家对我的一个美国朋友说。另一些人说，苏联的科学界虽然也有个别才华横溢的科学家，但是，仍不可避免地落后于美国，因为有关世界科学或苏联科学种种新发展的情报交流得太慢了。

我听到过几个科学家说，西方对苏联的科学估计过高了。安德烈·萨哈罗夫因帮助创造了苏联的氢弹

而享有理论物理学家的盛誉。有一次《洛杉矶时报》的默里·西格问他，苏联的科学家如何能在政治控制下取得了突破。他反驳说："什么突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苏联科学界并没有什么重要的突破，苏联每发表一篇重要的科学论文，在美国就发表了三十篇。"他谴责令人窒息的知识和政治气氛。后来，萨哈罗夫在他的论文《我的国家和世界》中说，把力量移用于军事方面以及权贵们的所作所为，使苏联的科学倒退了。他说，苏联早期的空间成就"以及在军事技术上某些成功是由于把力量高度集中在那个领域的结果"。我知道其他一些科学家，虽然不象萨哈罗夫那样具有明显的自我批评精神，私下里却跟萨哈罗夫怀有同样的抱怨情绪，认为普遍的控制气氛——虽然比斯大林时期松弛一些——仍然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在最迅速发展的领域里。

他们说，由于苏联的科学家们被严密地分隔开来，彼此极少沟通情况，因而使苏联科学受到严重损害。通常要经过一年或两年，才能把新的发现登上学术性期刊，而在西方，一有重要的突破，只消几个星期或几天就可以发表出来，从而加速科学的发展。据说，在西方科学界盛行的那种沸腾、迅速而动人的思想交流，在苏联科学界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一个非常年轻的物理学家抱怨说，甚至在六十年代初为了促进不同学科的

科学家之间进行相互取长补短的交流而建立的新西伯利亚科学城，现在也不再进行这种交流了。苏联的研究人员也不能象西方学者那样通过电话非正式地交换意见。莫斯科的一位科学作品作家对我说，"谁都不在电话里谈论技术方面的问题，人们有一种不谈论任何涉及机密事情的习惯。"俄国人把大多数科学都列入这个范畴，因为科学论文需要经过特别的安全审查（即所谓鉴定）才能出版。

俄国人竭力通过全苏科技情报研究所从所有的西方科学书刊中挑选点点滴滴有用的情报。虽然这种截取西方科技情报的工作，远比西方对苏联科研状况的跟踪更为系统，但是，把这些情报集中起来的过程往往是缓慢而繁琐的。

苏联的科学家们向我指出说，在科学实验有所发现的时代，现代科学有可能取得高速的发展。理论家们竞相解释每一新的现象。在这种竞赛中，苏联专家们抱怨说，他们处于不利于竞争的地位，因为首先是情报落后。一位有才能的数学物理学家引用1974年11月中旬美国科学家在斯坦福直线性加速器和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发现了新的芥子粒子作为例证，向我说明苏联科学的缺点。这个俄国人说，美国人为取得这项突破做了出色的实验工作。由于西方的科学情报交流很快，一有发现，在两三天内就得到西德和意大利科

学家的证实。虽然美国人也把他们的发现通知了杜布纳、新西伯利亚和谢尔普霍夫的苏联核实验中心，但是，几乎隔了六个月才传出了俄国人证实的消息。我的俄国科学家朋友把这种耽误主要归之于苏联设备不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设备的精密——比如在杜布纳和新西伯利亚的核粒子加速器，因为电子技术和磁性技术比较低级，不能取得美国加速器那样的粒子射束程度。他说，由于情报交流的限制和苏联科学互相隔绝的情况，苏联的理论物理学家被蒙在鼓里，在解释新的现象方面，无法同西方对手们竞争。

关于美国的这项发现，《真理报》起初只发表了四段消息，但是，他说，莫斯科有声望的列别杰夫研究所的理论物理学家们也只是碰巧才知道了他们所需要的一些技术上的细节。一位年轻的苏联物理学家刚巧在瑞士进行学术交流，他邮寄了一份报告给他的辅导教师、列别杰夫研究所的理论物理学家列夫·奥孔。我的朋友说，否则，这份技术报告得在好几个月以后才会印出来，而且要先经过苏联官僚机构的过滤，然后才能到达需要这种材料的科学家手里。我的朋友说，奥孔教授在莫斯科一次保密的重要科学家会议上汇报了美国的发现后显得非常沮丧，他要求进行改革，“以加速同西方的情报交流，解决实验设备方面的困难，否则我们就只有完全处于落后状态了。”

如果说作为知识的一个客观领域的科学必须屈从政治现实，那么，为了使这种政治显得不容置辩和具有科学性，向苏联公众灌输的政治就是些老一套的货色了。一些大报的头版如此雷同，教人看去仿佛出自同一个总编辑之手。(据说，塔斯社确实就如何编排新闻下达各种指示。)以西方的眼光看来，他所运用的公式似乎注定要使读者逃之夭夭——没有特快消息，没有犯罪或轰动性的新闻，没有可靠的内幕新闻或透露背景材料，没有谈论美人儿的社会新闻专栏，没有坏消息，没有证券市场的收盘行情，没有连环漫画或赛马结局。正如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对我说的那样，"看我们的报纸就象吃干面条——没有一点味道。"象《真理报》这样的报纸的主要内容，完全做到了列宁所谓由带喷灯的笑容满面的工人构成的"生产宣传品"；夸夸其谈、华而不实、重复得令人厌烦的社论；以及用不可调和的阶级冲突和反对共产主义事业或苏维埃祖国的恶毒阴谋等词句加之于世界的政治评论文章。它是鼓吹走向极端的新闻学的典型，根本不要求具有客观性。

但是《真理报》自称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日销一千多万份，即使不登广告，一份六版的报纸卖三个戈比，随便怎么说也是生意兴隆的。尽管我听到了许多知识分子大发牢骚(其中有些人自豪地说，

他们从来不看苏联报纸)，我仍然印象深刻地认为，《真理报》和其他一些苏联报纸以它们的观点为它们的制度服务还是颇有成效的，因为这些报纸不给读者对于这种制度的合法性留有挑剔怀疑的余地。

但是，这些报纸的确读起来令人惊讶不已。苏联的历史被说成是向更丰富多彩、兴高采烈的集体生活的一次顺利和斗志昂扬的进军。到了革命节日，陈词滥调达到了顶峰，一切评论文章都充满了党的激励人心的口号："苏联劳动人民！为树立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而斗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要使它成倍地增长。为努力节约原材料、燃料、电力、金属和其他各种材料而奋斗。在国民经济战线上的工人们！坚持不懈地掌握经济知识和现代经营管理方法。在生产中更广泛地采用劳动的科学组织、先进经验以及科学技术上的最新成就。"

每天晚上，平均有三十分钟的电视新闻广播，它的内容有乌克兰"共产主义黎明"集体农庄里"我们卓越的集体农庄庄员们"获得谷物丰收的一长段特写镜头，关于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工人突击队保证提前三个星期完成当年经济计划的报告，以及会见一个黎巴嫩共产党人的镜头，这个人能够一口气连续五分钟象背书似地来回答一个问题，其观点与《真理报》最近在中东问题上所作的评论大同小异。在这些固定

的节目之后还有爱尔兰暴动的实况，在希腊美国大使馆外面的示威者，杂七杂八的苏联体育新闻以及气象报告。随同主要节目播送的还有老一套的新闻短片：倒进火车车厢里的谷物，以密集队形小心地交叉滚过田野的联合收割机，钢铁工人正在向钢槽浇灌钢水，或是白热的钢锭向摄影机滚过来的镜头。主题和画面天天如此，毫无变化，好象同放映的日期很少有什么关系似的。

尽管在西方人看来觉得很沉闷，这种宣传却对俄国人有一种长期的下意识的效果。它打动了俄国人那种本能的、根深蒂固的民族自豪感，使集体和“我们的”民族成就溶为一体。个人可以私下嘲笑，但是，天长日久这种“新闻报道”就可以补偿人们在自己生活中所看到的一些明显缺陷。

另一个目的显然是要避免公众产生任何激动情绪。新闻越轰动，报道就越少。1972年10月一架苏联客机在莫斯科坠毁，一百七十六人丧生(在当时，这是历史上最大的民航机失事事件)，塔斯社只发了两段消息。1973年6月3日苏联的超音速运输机图-144在巴黎航空展览会表演时在半空中爆炸，《真理报》只以四十个字把它塞在末版上了事。但是，在我访问期间，当赫鲁晓夫于1971年9月11日去世的时候，苏联控制新闻的手段便集中地表现出来了。第二天早晨，

《纽约时报》登了一篇一万字的讣告以及一篇世界各共产党报纸——莫斯科除外——的反应的综合报道。赫鲁晓夫死的那天晚上，我到街上去收集普通俄国人的评论，可是，人们不相信这一消息，并对我产生怀疑。

“太糟糕了，他是一个生病的老人，”一个站在人行道菜摊旁边的妇女说道，她急于想摆脱我。

“你怎么知道这个消息？”一个电影院的售票员怀疑地问我。

“我在报纸上什么也没有看到，”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避开我，溜进了一个公用电话亭。

事实就是如此，一个统治了俄国近十年的人死了，苏联报纸却一下子成了哑巴。我们等候有关赫鲁晓夫的片言只字，足足等了三十六个小时。最后，终于在《真理报》和《消息报》第一版的右下角刊出了一则很小的新闻(别的报纸都不登)，只有孤零零的一句话，宣布“养老金领取者尼基塔·谢尔盖维奇·赫鲁晓夫”死了，而且是挤在一篇大丰收的报道和一篇来访的阿富汗国王的小传下面。

这项消息之所以迟迟不发表，主要原因当然是克里姆林宫的头头们需要时间来考虑如何处理赫鲁晓夫，他们发现在他被赶下台七年之后如何处理他还是十分棘手。不过，这种迟迟不发表的情况，也是合乎

苏联新闻工作那种不慌不忙的步调的。每当我去《真理报》或《消息报》时，一点也看不出有西方报纸那种赶截稿的狂乱现象，那种急于要抢先排印的情况。高级的新闻记者们在有点象美国的会议室那样宽敞的办公室里工作，办公室的陈设简朴，挂着激励人心的列宁像；他们的步调从容不迫。理由很清楚：我们所理解的新闻并不是他们的主要业务。在《真理报》社，编辑们告诉我说，他们的报纸刊登新鲜消息的版面还不到百分之二十——除非是勃列日涅夫或某一个领导人作了一次重要报告，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是原文照登而已。在上午较晚的时候去参观《真理报》社，我常常看到第二天的报纸除了留着几处空白以外都排好了。版面校样已经摊在桌上，那就是说新闻报道在两三天前已经排好，并经过了仔细检查。《真理报》编辑部十七名编委上午十一时开个碰头会，讨论通过明天的报纸内容，并一起确定后天的内容。象这样的提前准备工作，使得《真理报》和其他一些苏联报纸能做到印刷上的完美无缺，而为西方的任何编辑或读者所称赞。不过，即使发生一个差错，也不会刊登什么更正，因为《真理报》是不承认错误的（虽然别的报纸偶尔也登出更正）。

苏联报纸的特有风格，使苏联读者养成了一些特殊习惯。他们往往不看巨型炸弹似的评论，而是寻找

有着真正新闻价值的小消息——图-144在巴黎坠毁的四十个字的小新闻或关于赫鲁晓夫的一句话的讣告。勃列日涅夫或柯西金出国访问的重要公告，也大都是用这种方式透露的：在第一版大型的通栏底下登了两行新闻。这当然要使人读报从底下读起了。

人们还告诉我说，他们看《真理报》宁愿从末版倒看到头版。我听说少数几家报纸的民意测验进一步证实了这种反映一般读者兴趣的情况(对社会新闻、体育运动和有关社会风气的文章等兴趣较大，而对意识形态方面的文章兴趣较少)。例如，人们知道1957年格奥尔基·朱可夫元帅被撤去国防部部长职务的消息是作为“简明新闻”登在末版上的，关于1972年尼克松抵达时间的暗示，也隐藏在《真理报》末版的每日电视节目中。1974年2月，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境，也是作为末版的一条简讯。不过，《真理报》末版还有其他一些吸引人的东西——体育运动、棋类活动和文化消息，有时也有社会新闻特写或带有揭露性的讽刺作品。第五版以西方的眼光来看，是所有几版中新闻性最强的一版，因为它刊登了外国的新鲜消息。越往前看就越冗长乏味。

苏联的读者也变成能从谷壳似的宣传中淘出新闻米粒来的专家了。1973年，我认识的几个知识分子从当时苏联报纸刊登的一则开罗发来的小新闻得到信

息，知道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已经驱逐了苏联军事顾问。这则新闻说：埃及人感谢苏联顾问完成了他们的使命(虽然其他许多读者没有看出这一点)。另一些人注意到报纸没有刊登通常大肆渲染的有关收成的消息，就猜到1972年和1974年粮食歉收。我认识的一对夫妇看到五个著名的丈夫和妻子的讣告，哀悼他们"过早的去世"——这是经常用于意外死亡的一种委婉说法——之后，就揣测到发生了一次很大的飞机坠毁事件(在索契附近)。另一种方法是：把苏联宣传工作者喜欢将苏联所发生的问题套到别国身上的做法倒过来理解。

一位在儿童读物出版社工作的妇女说："假如你在我们的报上看到美国发生了一次很大的飞机坠毁事件，这就意味着在苏联发生了一次飞机坠毁事件。"

"不完全是这样，"她那位当记者的丈夫纠正她说。"应该这样说：假如在俄国有一架飞机坠毁，那么，下个月苏联的报纸就会登载在美国、西德、台湾或其他地方发生过飞机失事的新闻报道。这就是你能获悉我们也有一架飞机失事的办法。"他说，这种逻辑同样适用于发现传染病，物价上涨，犯罪潮涌，农业歉收，缺水，拘禁政治犯等等。西方所发生的问题，都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悲惨生活的反面教材来报道，同时，也是为了分散人们对国内类似困难的注意力。"这样的宣传十分

有效:‘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是贫困的;过去在沙皇统治下生活十分悲惨,’”一位青年科学家指出。“人们也许不相信这儿的生活就象报纸上所说的那样尽善尽美。但是,广大群众确实相信其他地方的生活过得更糟。”

尽管苏联报纸的头版内容雷同,但西方以为所有苏联报纸都是千篇一律的想法,却是不正确的。差别的程度也许有限,但是还有些不同——从军报,即保守的冷战右派报纸《红星报》、平庸乏味的《十月》杂志、新斯大林主义的《青年近卫军》月刊,到比较有点现代思想的《共青团真理报》和具有温和自由主义倾向的《新世界》杂志。不过,最近几年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报纸却是作家协会的周报《文学报》,它是滋润苏联社会学幼芽的重要场所。其他报纸却没有走得那么远,即试图在审查官所规定的范围内现实地谈论苏联当代的某些社会问题。爱好《文学报》的读者都知道,《文学报》有时也敢于找找政策上的岔子。它带头发起反对西伯利亚的贝尔加湖遭到工业污染的斗争,并且深入研究一些由于苏联姗姗来迟而又缺乏协调地钻进了汽车时代所引起的交通拥挤、污染、城市运输、零部件供应和修配不足等问题。使我产生十分深刻印象的是,有一系列文章用材料证明:消费品工业工人的收入、住房和其

他福利同重工业工人相比差别悬殊。虽然文章并没有直接明说，言下之意是克里姆林宫没有实践它要公平对待消费者的保证。《文学报》还登载一些文章，探讨苏联离婚率高的原因，公开谴责大学入学考试制度的沉重压力，幽默地讽刺消费品供应严重不足，并且有一次——尽管战战兢兢地并引用了勃列日涅夫的话来作防护——甚至建议苏联不妨试办私营合作服务商店以改善这种局面。

《文学报》并不是指出苏联生活中存在问题的唯一报纸。批评缺点是苏联报纸的义务。我知道苏联的编辑们总是自夸自己是"人民的监督员"，"我们有象你们那样搞调查的记者"。这种牵强附会的说法是骗人的，但也容易起迷惑作用。

苏联的报纸的确有一种监督作用，苏联官方确实害怕自己报纸上的揭露。一位苏联体育界的官员有一次对我说，"新闻记者是非常危险的人物，你同他们谈话，他们就把话记下来。假如发表出来，惹恼了其他人，你还得作出回答。"他清楚地表明，他指的不仅是外国记者，也指苏联记者。后来，一个莫斯科记者给我看一箱上等乌克兰烈性伏特加。这些酒是他从基辅带回家的，是乌克兰一些官员送给他的"礼物"，为的要他把发现的某些违法乱纪的事掩盖起来。

《真理报》经常不断以它特有的方式揭露一些丑

闻。例如，在一个月里，我就看到它责骂西伯利亚赤塔市的酿造厂、制革厂和汽车制造厂，因为它们建厂时没有为工人提供住房；它严厉批评巴库的卡拉达格炭黑厂厂长尤里·希哈利耶夫，因为他那个厂的煤烟和污染弥漫全城；它严厉警告了诺沃格拉德—沃林斯基肉类联合企业的女工长阿·波克罗夫斯卡娅，因为她听任工人利用工作方便偷窃贮藏的大批萨拉米熏红肠；它谴责造纸工业部没有为书报杂志提供足够的纸张；它还登了一篇揭露性的报道，批评"〔苏联〕许多农村仍然没有自来水、煤气和整套的生活服务行业"。

这些在苏联语言中所谓的"自我批评"，有两个特点。首先，除了批评农村的文章以外，批评都集中在个别工厂、经理、工长或这个那个部。这些批评刚好套得上一个苏联记者向我引用的一句座右铭："可以批评，但是不要一概而论。"换句话说，可以找个别情况中的差错，但不要写成是普遍现象，因为这在政治上是危险的。这就是苏联"揭露丑闻"的确切含义——发现瑕疵是为了润饰整部作品。但是登在《真理报》这类报纸上的大部分批评，仍然无法避免一种内在的自相矛盾。在某个边远的城市或州里发生的每一件贪污腐化或管理不善的事例，发表时都被看作一种孤立的缺点，但是登在全国性的报纸上又使这些消息十分引人注目，这就等于是党魁们在向全国机关发出警告说，

这是需要立即加以处理的一个普遍性问题。

第二个特点是，上述那些批评——以及报纸上登载的大量批评文章——都是代表领导自上而下指出中级管理部门或者小官僚所犯的错误。党的英明正确——包括勃列日涅夫，政治局，党中央委员会，作为一个法人团体的党，以及党的政策——是始终受到庇护的。在苏联，“自我批评”这个词儿专门用来避免作出或招来道义上或政策的裁判。苏联的“丑闻揭露者”揭发了“缺点”或“错误”，但是，他们并不暴露彻头彻尾的失败。这就起了安抚群众的作用，使群众获得一种印象：似乎上面看出了种种问题；而同时却又从不给人这样的感觉，即：某些政策可能有错误，社会上的不同集团之间有利害冲突，或者苏联生活中有些事情存在根本性的缺陷。

“这也许使你听起来感到奇怪，”一个苏联记者私下对我说。“不过，我们报上发表这种批评所起的效果，却是使群众更能接受这样的思想，即苏联的制度是健全的，只是少数官员不好。”我发现这是一种很有说服力的见解，它在我认识的一些同普通劳动人民有密切联系的人中也产生了共鸣，如国营农场会计根纳季和年轻的冶金工人尤里。苏联人私下都对他们的生活条件不满，抱怨贪污腐化，讥讽他们自己在意识形态上的伪装，私下里嘲笑他们的领导人，但是他们都认为制

度基本上是健全的，这也许看起来有些自相矛盾。除了一小部分持不同政见者以及也许隐藏在上层的死心塌地的反对派以外，看来并没有多少人认为一切重大问题都搞错了。

而且，同西方许多人的想法相反，苏联的报纸确实也为基层群众无关紧要的不满情绪提供了安全阀，这就是读者来信。我惊奇地发现这是一项浩繁的工作。《真理报》一个月收到近四万封来信，它的读者来信部有四十五名工作人员。《文学报》一个月收到七千封来信。几年前，读者来信曾经推动了一项工作的改革，对此，该报主编亚历山大·恰可夫斯基引以为最大的骄傲。当时许多读者抱怨邮递效率太低，《文学报》就决定自己进行试验。它试投了大批信件，发现一封信几乎要五天才能到达列宁格勒（相当于从纽约到芝加哥的路程），要六天才到第比利斯，几乎要八天才到新西伯利亚。《文学报》写了几篇文章，严厉指责邮电部，现在，它声称自己在帮助制订苏联邮政规章以加速邮件分类方面立下了功劳（虽然最近一些文章认为，邮件投递现在并不比以前快）。

"我们不怕批评，"有一天下午恰可夫斯基在他的办公室里对几个美国记者大声说。恰可夫斯基是个肥胖的大个子，有着一种可以与他腰围相媲美的自负狂，爱好把雪茄一直吸到只剩烟蒂，然后，一面撒得满桌子

都是烟灰，一面大着舌头说着相当过得去但带着浓重土音的英语。他装着深知苏联生活内情似地说："我坦白地告诉你，"或者"我不妨给你一个详细的回答。"象一个高级党员那样，他喜欢挑起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戏谑地自称是"社会主义的行家"（尽管他的报纸在某些国内问题上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但在尖刻地攻击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要求移居国外的犹太人以及西方记者方面却总是打头阵的）。

"《纽约时报》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以后，就觉得它的任务完成了，"恰可夫斯基一面吞云吐雾一面对我说。"我们却认为发表了来信只是任务的开始。信发表后，我们希望立即得到有关负责部门的答复，这个答复也要登在我们报上。假如这个答复不能使我们满意或者带有官样文章的样子，我们就写一个编者按语，指出这一个部或机构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并要求再作更具体和全面的回答。"有时确实是这样做的（假如党要这样做的话）。但是，照恰可夫斯基说来好象他是无所畏惧和善于独立思考的人，而他自己的工作人员后来私下对我说远非如此。他们引证了一些事例。由于有些文章会得罪党的某些官员，甚至是相当低级的官员，就会停止报道或者干脆不准发表。一位作家回忆说，他曾多次写文章，仅仅是揭露一个得到党支持的学者犯有欺骗罪，结果他的文章被扔进了废纸篓。这就

更不要提象苏联民族纠纷、苏联权贵的特权等题材了，编辑和记者打一开始就知道这类题材是犯忌的。

不过，这个政权一般还是认为读者来信是有用的。这些信使普通的苏联人有机会来对声名狼藉和缺乏效率的官僚机构发泄自己的怨气，对质量低劣的消费品嘟哝一下；总之，就是让人们出出气。通过这种做法，使党有了一个监督官员们的行为、也监督广大公民的道德和态度的极好的工具。实际上，读者来信促进了报纸的监督作用。对编辑们来说，读者来信往往也为那种干巴巴的面条似的空论添加一些调味品。

其实也不会冒什么大的风险。所发表的大部分来信都是无关痛痒的。比如，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有个妇女因为她的公寓房子的墙壁坚硬如铁，使她敲不进钉子和钩子，既不能挂画也无法挂上窗帘，因而十分恼火；莫斯科有一个教师对苏联的一些足球运动员留着长头发和穿着七皱八折的服装感到讨厌；在布拉茨克，有些工人发现他们工厂在支持一帮名义上在厂里工作而实际上却在踢足球的职业运动员——而且踢得很蹩脚，因而似乎有些气愤；敖得萨有个母亲被她十几岁的女儿的贪得无厌的性格搞得六神不安；一些妇女抱怨嗜酒成性的丈夫。

两个《文学报》的撰稿者告诉我，有时候报纸用一些“挑衅性的文章”故意激起读者给报纸写信。然后他

们巧妙地操纵着答复，喋喋不休地无益地争论几年。一个常年不断的讨论题目就是酗酒；还有一个题目是丈夫应否帮助妻子多做些家务和上街买东西。我在苏联的三年期间，《文学报》白花力气讨论的第三件事就是苏联的中学应否多打不及格的分数。这就不必提那些受人指使所写的来信了，据报纸的编辑告诉我，这种信实际上都是报纸自己或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写的，然后强要普通工人或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签上名，使这些信看上去好象是党的路线正在获得群众广泛的支持。一个在《文学报》工作过的人说，"我们备有一张约稿人的名单——其中有些是著名作家——我们只消告诉他们党希望他们写些什么，他们就写什么。"

尽管看起来好象是在自取灭亡，人们还是写信反对党的路线。"我确实知道在1973年反对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的运动期间，《文学报》收到了支持这两个人的一些信。还有一些信说，人们甚至不知道他们讲过什么话，也没有发表他们所写的东西，就谴责他们，这是错误的，"一个撰稿人对我说。"不过这些信是当然不会发表的。一个克格勃官员每月到我们办公室来一次，检查我们所有的来信。他总是随手带走一批，通常都是匿名信。"另一些写信的读者有时因为他们信中有信口开河的意见而受到公开谴责。《列宁格勒真理报》有一次指名责骂四个读者的来信——一封的罪名是使

用了谩骂的语言，第二封是因为反对同美国搞缓和政策，第三封因为宣称“我们有责任帮助以色列反对阿拉伯极端主义者和民族主义的保卫战”，第四封是说苏联社会已分成富裕和贫困两个阶级。

有时，编辑自己似乎错误地卷进了一些棘手的题目，这样就由某个高一级的当局引回到正道上来。《苏维埃俄罗斯报》有一次从一封信开辟了一个“妇女问题”新专栏。这封信是一个心神恍惚的女经济学家写的，她对妇女的双重负担大发牢骚，并且建议应该让妇女们得到更多的工资，缩短工作时间，使她们有更多的时间抚育子女。报纸要求读者作出反应，但是，接着，这个专栏就销声匿迹了。党显然并不想减少妇女的劳动时间，因为妇女们对经济来说太重要了，决不能让她们干非全日性的工作。

一些在内部处理读者来信的人告诉我说，他们把讨论某些社会问题的闹剧看作是一种猜字游戏，因为这些讨论完全是幕后操纵的。一个撰稿人说，不过也有例外的情况，那就是领导层的某一个派别要利用读者的怨言来提出一种观点，或者借此对别的官员施加压力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偶尔也有一些来信逃过了审查官的眼睛，提出了重要问题。但整个来信及其处理方法都被“可以批评，但是不要一概而论”这句名言弄得失去了活力。苏联的书刊审查制度，也许在这方面

发挥了自己最重要的作用。

在西方，苏联的书刊审查制度是以扣压下述种种坏消息而闻名的：如飞机失事，政治清洗，或把托洛茨基、赫鲁晓夫以及这个统治集团的其他一些敌人搞成微不足道的人物。但更重要的是，这个审查制度，为了苏联权贵的利益，在很多领域里掩盖了看来同国家安全或苏联统治者的政治秘密并无明显关系的许多现实情况——这就使得几乎任何重大问题的独立公开讨论都无法展开了。

有一次，我得到了五页用打字机打在笔记本上的主要审查项目。这是从苏联书刊审查机构（图书出版管理总局）所用大型活页笔记本上取下的几张单页，而且说来真够有趣，这种机构还是沙皇时代遗留下来的。其中要禁止的内容有：禁止印制某些军事材料；秘密警察的活动；劳改营的制度；有关书刊审查制度本身；苏联施舍的对外援助以及苏联所接受的外国贷款；或者事先透露苏联领导人的活动和行踪等。

但使我最感兴趣的是禁止发表一些比较无害的正常事情：犯罪总数和被捕者数字的材料；孤儿的数字；流氓或乞丐的数字；吸毒者的数字；霍乱、鼠疫以及包括慢性酒精中毒等其他疾病患者的总人数；关于工业中毒和职业病；工伤事故；失事和火灾等人身伤亡情

况，地震、海啸、洪水和其他自然灾害的后果；运动员在训练营训练的时间，"他们的工资等级，因成绩优异所支付的奖金数目"，以及体育队的资金筹措、管理费用和人员编制等。

凡是对苏联报纸浏览过一段时间的人，就能凭自己的观察把这张书刊审查项目的单子加以扩大。报纸上的新闻报道禁区是庞大的，例如：仍然住在自建公助的公寓里的人数的全国统计数字；流动工总数；有成就的妇女究竟是怎样发迹的；谁得到了出国的机会；进入大学的人的社会成分；苏联权贵的实际收益（包括薪金、奖金和其他种种津贴）；全国不同地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费用的差别（一个西伯利亚记者对我说，这种生活水平和费用的差别故意不予发表，"因为这会招致那些觉得生活条件差的人们的怨言"）；农村和城市在社会服务效率方面的差距；申请病床、疗养院、有补助的度假或其他福利的人得到满足的百分比；苏联社会各阶层的阶级立场或各少数民族对俄罗斯人的态度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态度。

上述这张禁单的惊人之处，在于苏联人民一直无法对自己的生活和社会获得正确和全面的了解，更不用说能有机会拿它来同别的社会作比较了。书刊审查制度使他们无法这样做。有时也有一些在对当地进行社会调查基础上写成的文章发表出来，触及我上面提

到的一些重要社会问题。但是，总的说来，由于党垄断了通讯工具，不但要找个公开表示不同观点的地方极其困难，而且在任何问题上形成独立的公开的见解也是极其困难的。结果，正如卡尔·马克思青年时代所说的，书刊审查制度滋生公开的虚伪、政治上的怀疑以及人们"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1] 我曾经从苏联的知识分子中听到这种悲痛的呼声。

"我们是一个分成许多小块的社会，"一天下午，一个留着胡子的作家在卧榻上对我哀叹着说。"我们不知道在我们自己的社会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也不知道其他一些人究竟在想些什么。我知道我自己这个小圈子里一些人的想法，还知道一点点莫斯科其他知识分子可能有的想法。但是，我不知道工人们究竟在想些什么，也不很知道他们的生活情况，不知道集体农庄庄员究竟在想些什么，也不很知道他们的生活情况。我们生活在彼此分隔的世界上，除了党让我们读到的那个世界以外，我们没有一个共同的世界。我同其他阶级的人来往的唯一时间，就是在我原来的军事单位每年举行一次团聚会的时候，我们全都喝得醉醺醺地回忆着战争。除此以外我们彼此都是陌生人。"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8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译者

十五 文 化

猫 和 鼠

在这个国家里，真正的诗歌都是国法难容的。

纳杰日达·曼杰尔什塔姆

《反希望的希望》

莫斯科作家俱乐部外面一片疯人院的景象，就象鲍勃·迪伦[1]归国时的纽约，或者象全盛时期的弗兰克·西纳特拉[2]遭到崇拜他的黄毛丫头们团团包围一样，女大学生们穿着毕挺的进口雨衣，毫不在乎绵绵的春雨，蜂拥地围着迟到的人乞讨票子。名流们开始到来了。警察为了维持秩序，请来国内保安部队作为增援。在挤过攒动的人群时，拉着我手的安被挤开了，我好不容易才重新抓到她的手，简直不得不拖着她穿过纷乱的人流进入大楼。

① 鲍勃·迪伦(1941—)：美国流行歌曲和摇摆舞曲作曲家。——译者

② 弗兰克·西纳特拉(1915—)：美国流行歌曲歌手。——译者

里面，几百名观众正迫不及待地等着开场。人群挤满了过道，有的在争抢位子。我们看见大剧院芭蕾舞主要演员玛娅·普利谢茨卡娅和她丈夫罗季昂·谢德林坐在我们前几排。他们旁边坐着喜剧演员阿尔卡季·莱金和容貌清秀、头发卷曲的维克多·苏霍德列夫，他是勃列日涅夫同外国总统、总理们举行最高级会谈时的私人翻译。然而大部分观众是青年人，他们举止文雅、略带现代派风度或者留着蓬松的长发，都是文化界和政界名流的子女。他们被吸引来出席俄国文化生活中一种特别的礼仪——一场难得的诗歌朗诵会，朗诵者是自由派主要诗人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

晚会开始了，遵照惯例，首先由苏联广播电视合唱团的约八十张嗓子表演沃兹涅先斯基献给俄罗斯的慷慨激昂的现代爱国主义诗歌。表演很出色，但观众并不怎么欣赏。他们不是来看这个的。然后六名男女演员非常谨慎地慢慢转入唱和朗诵几段获得一致好评的沃兹涅先斯基狂想诗，观众彬彬有礼地表示了他们的兴趣，并越发有所期待。接着，猝然朝着政治钢丝大胆地纵身一跃，一位演员朗诵了一首关于弗谢沃洛德·梅耶霍尔德的诗，梅耶霍尔德是一个先锋派戏剧导演，1940 年死于斯大林的一个集中营里。沃兹涅先斯基的诗并没有直接提及斯大林和那些清洗，但它使人们追思起梅耶霍尔德在古拉格群岛某地的凄凉的死亡：

何处去寻你的墓穴
——或许它仅是一抔黄土，
弗·叶·梅耶霍尔德？
我们该在哪里竖碑？
找不到你的坟堆……
你不能凝成冰凉的雕像，
象驯顺教师的得意门生。
但是，你，光彩闪耀，
作世界舞台的砥柱，
弗·叶·梅耶霍尔德。

就象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咏诗浪潮席卷莫斯科时期那样，艺术同政治的猝然融合以及诗人对这个违禁主题的重新运用，使听众活跃了起来。这正是他们来的目的——看看沃兹涅先斯基在向清规戒律进行测试和提出挑战方面走得多远。因为梅耶霍尔德，苏维埃戏剧界早期最激进、最富有才华的改革家之一，现在虽已被官方列入正册；但是，他的死亡，他由于具有反意识形态的艺术形式主义这一异端倾向而受惩罚，却还湮没于沉默之中。当沃兹涅先斯基间接提到梅耶霍尔德的自由精神时，听众中爆发出有节奏的掌声。塔甘卡剧院的导演尤里·柳比莫夫曾把梅耶霍尔德尊为该院实验主义的教父，他奔上前去同沃兹涅先斯基热烈拥抱。这时，又响起一阵阵的掌声。

在上半场演出中，诗人自己始终坐在台上，但并不居于舞台中心，他的面部——虽然已有四十一岁却仍带着孩子气——显出痛苦的窘困表情。然而，在幕间休息时，他穿着一件花格子运动衫、蓝色天鹅绒运动裤，打一条软绸领带，显得整洁利落，出场要求一群新拥入场内的无票观众安静下来。但是此时，人群都拥到台中心前面的过道上站着，围得水泄不通，个个如痴似醉，欣喜若狂。

沃兹涅先斯基的羞涩逐渐消失了。为了回答听众们默默的期望，他朗诵了一首批评技术革命违反人道主义的现代派隐语讽刺诗，结尾是一句转折巧妙、富有诗韵的请求口吻：不要用油去做人造鱼子酱，而要让天然鱼子酱里流出油来。他那段对苏联社会多年的弃儿马尔克·恰加尔[①]重返俄国的赞美诗深深地打动了观众们的心弦。接着，沃兹涅先斯基在朗诵他的早期作品《反对宇宙》时，倾诉了自己长期以来对于扼住从塞万提斯到帕斯捷尔纳克等诗人的喉咙的书刊审查官们所持的抗议态度：

> 阿门。
> 我扼杀了一篇诗。没等它出世就把它处死。
> 见鬼去吧，这首诗。

---

① 马尔克·恰加尔（1887—）：俄国画家，1922年离开苏联到巴黎，1941年移居美国。——译者

我们埋葬，
埋葬诗章。快来看哪。
我们埋葬。

此时，他已经完全抓住了听众的心。他嬉笑着念了几首狂想小调。接下来的一首诗逗起了哄堂大笑，这首诗嘲笑苏联生活中无穷无尽的排队现象，多年前就登记预订紧张商品，甚至用墨水在手腕上写下号码，以便对自告奋勇出来维护排队秩序的人证明自己排在什么位置：

我排在第四十一号，为了看普利谢茨卡娅的戏，
排在第三十三号，为了上"塔甘卡"观剧，
排在第四十五号，为了去瓦甘科沃墓地。
我排在第十四号，找眼科医生看病，
排在第二十一号，为了求见艺术家格拉祖诺夫，
排在第四十五号，为了做人工流产，
（当轮到我的时候，我已挺起了大肚皮），
我排在一百零三号，为了买汽车零件，
（在我出生的时候，就已为我登记），
我排在一万零七号，为了买一辆新汽车，
（我还没有出生，就已为我登记）。

然而，听众们最为赞赏的，却是他对于文化界的警

犬和那些假装正经的党的御用文人们大为不逊的反唇相讥，那些人一直责备他在某些诗篇中对性关系进行形象化的描述，使用猥亵的语言。沃兹涅先斯基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谴责了《灵魂上的猥亵》：

一位少女舞于大庭广众之间，
伴舞的是爱慕她的裸体少年。
妙哉，肉体猥亵！
然而，尚有灵魂的猥亵。
时见某官员讲演，
能言善辩好比厨师，
他那灵魂上的猥亵，
袒露于听众之前。
对于毕加索的绘画，
他一窍不通。
对于萧斯塔科维奇的音乐，
他糊涂懵懂。
如此招摇撞骗，
羞倒巴黎娼妓。

过道上的人群涌向前去，向台上的沃兹涅先斯基掷去捧场的鲜花。在我们寓居莫斯科期间，他仅获准组织三场这样的演出。请他签字留念的人团团围住了他，有节奏的掌声在大厅内回荡。

在我看来，那个夜晚听众们的狂热体现了苏联知识分子的一种渴望，他们渴望着能有片刻恶作剧式的桀骜不驯和坦率直言，渴望看到摆脱了正统作品的廉价逗趣和沉闷教条而得以自由表现的小小佳作。同贝克特、平特、阿尔比或鲍德温之流的西方作家那种赤裸裸的道德探索或社会批评比较起来，沃兹涅先斯基等苏联上层自由派人士常常显得象是对官方当局无礼饶舌的小孩，而不是用文字对他们社会里精神方面的太阳神经丛击以猛掌。然而，由于苏联文化中充斥着那么多陈词滥调、谎言以及粗制滥造的标语口号式东西，以至任何一种诚实的或者一瞬间不受政治支配的微弱之音，都有如在寂静的图书馆中低语一般清晰入耳。

除俄国以外，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的诗歌受到这样的宗教般的崇敬，也没有诗人这样受到教士和神使般的赞颂。如果说普通人从酗酒中寻求解脱，那么知识分子则沉迷于书本，而特别是诗歌，他们从中找到了补偿日常生活无聊的精神寄托。“我们没有你们所说的哲学家或政治评论家，没有传递精神信息的民歌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没有宗教，”一天晚上，沃兹涅先斯基在他那间高敞然而并不整洁的房间里对安和我这样讲，他身穿自己最喜爱的服装——皮茄克和粗斜纹布裤，懒洋洋地靠在低矮的长沙发上，一边喝着格鲁吉

亚葡萄酒。"所以就出现了一个真空。人们的心灵有所祈求，因而他们转向诗人。有的人是前来消遣的，有的则出于宗教、政治或哲学上的要求。他们把这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诗人身上。这就是为什么诗人在俄国居于如此重要的地位。"而且，无论是在沙皇统治下还是在共产主义统治下，诗人始终是这样的重要。因为大胆的诗歌——或任何形式的大胆艺术——都是在暴政和才智的对抗线上走钢丝，在这里审查制度和创作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人们来听诗歌朗诵，为的是看看诗人在向政治重心进行挑战方面敢走多远，看看诗人是在高空钢丝上保持平衡还是失足跌下从而承受政治恶果。这样就形成了当局和知识分子——在俄国全部历史中，他们始终是一对天然的敌人——之间的一场猫鼠之斗。对于俄国观众来说，这种争斗成了在原本是万马齐喑的苏联文化舞台上为他们提供紧张、风趣和娱乐的主要来源。

诚然，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角逐，情况正如普希金时代或陀斯妥耶夫斯基时代一样，政府及其文化界的警犬拥有批准或惩处的最终裁定权，而知识分子只能以机智、勇敢和想象力作为自己的武器。这是一种智斗，在这种角逐中采用了谋略、遁词、譬喻、伊索式的语言、隐晦的含义、意味深长的音调变化等手段，以及在戏剧演出中为了麻痹审查官采用某种形式，而为了唤

起观众的激情又以另一形式上演的两面手法。作家们告诉我，奇怪的是在这类角逐中莫斯科和外省的规矩不尽相同，因为某些外省城市的审查官比莫斯科那些头脑死硬的审查官们要宽容些，对大名鼎鼎的作者也较为敬畏。因此，有时外省出版的某几期杂志倒比莫斯科出版的有名气的刊物更有意思。同样，那些在莫斯科比较严酷的意识形态气候中，常常作为离经叛道的地下艺术而流行的作品，在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却早就被当局谨慎地认可了，这些波罗的海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并入斯大林俄国之前，那里的各种艺术就已经吸收了现代派的抽象倾向，而俄国则一直扛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面文化旗帜麻木不仁地缓缓而行。在这类角逐中，观众的多寡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观众数以百计而不是数以百万计的小剧院中警犬们可以放宽一点尺度。“观众越多，控制就越紧，”一位电影剧本作家对我哀叹说。“他们对任何拥有大量观众的东西都十分疑虑、忧心忡忡。这就是我们的电视极为沉闷乏味、电影也好不了多少的原因所在。”这类角逐是一种持续的斗争，自由派千方百计争取一点回旋余地，保守派则竭力守住防线，斗争的结果并不以实际内容，而更多的是由势力影响、个人品格和派别勾结所决定。正如地方性的普遍腐败有助于经济胡乱维持下去一样，文化生活也从作家、编辑和剧院导演

同他们在政治权贵中的同情者和保护人所结成的非法联盟里获得好处。

有时，纯粹出于幸运，一件艺术作品居然摆脱错综复杂的控制，使得人人都诧异不已——《红山茶树》。这部近年来最优秀的苏联影片之一就是如此，它在1974年春成了轰动一时的文艺杰作。瓦西里·舒克申是该片的编剧、导演兼演员。他身材瘦长，有着杰克·佩伦斯[①]那种斜目而视的严峻神态，是一位浑金璞玉的作家兼导演，他因创作了满怀同情地描写粗鲁的乡下佬甚至描述罪犯的短篇小说而享有盛名。这部影片的精湛艺术使得我的许多熟人难以忘怀。然而，大家更感到惊讶的是影片打破了很多清规戒律。这部影片不仅把拉皮条的恶棍、卖弄大腿的淫荡女子和居于社会底层的歹徒搬上了苏联银幕，而且主角还是一名刑满释放犯，他在走上正路和重新沦入犯罪活动之间动摇彷徨，最终被他过去相处的那帮歹徒野蛮杀害。影片中的农村人物，从喝醉酒的集体农庄主席到主角的那位不得不靠每月二十卢布救济金过活的老母亲，表现得生动而真实。在其中一场戏里，舒克申敢于表现出人们被迫上政治课时的厌烦情景。而在另一些镜头中，我的朋友们兴趣盎然地看到了农村家庭角落里的圣像，俄国教堂的废墟，对于迫害宗教信仰的瞬息即

① 杰克·佩伦斯(1920—)：美国舞台和电影演员。——译者

逝、然而却极不寻常的暗示，以及宗教信仰在农民心中的牢固影响。

作为一个农村浪漫主义作家，舒克申在影片中让主角去吻俄罗斯的白桦树，同时摄影机镜头亲切地掠过奔流的河水和俄罗斯农村的茫茫田野。一位好心肠的农村妇女帮助这个刑满释放犯尽力走上正路，而且影片临结尾时，他正在拖拉机上把着方向盘。然而，影片的整个主题思想——在被认为是土壤纯洁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滋生着罪恶，主角的悲惨下场，对人类趋于完美的怀疑，以及正是现代城市生活的腐化才使一个纯洁的农村青年走上邪路这一明确的寓意——都是同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准则背道而驰的。

在莫斯科知识分子中间很快就流传出这样的说法：舒克申为这部影片获得批准奋斗了几年，而且有些最好的镜头被审查官剪掉了。在我看到的公演片中，互不连贯的跳跃式的情节和删节显然可见。然而，幸存的部分仍然足以令人发问：这部影片如何竟能上演，而许多据说并不如此大胆的影片却被打入了冷宫。

我所认识的莫斯科一些有识之士的推测是，舒克申由于早期创作了比较正统的作品，已经获得信任和稳固的地位，而且电影工业也迫切需要一部与众不同的高质量片子在国际电影比赛中放映。这也许是事实，但我认为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这部影片在苏联

报刊中得到一致好评。舒克申一夜成名，看来似乎有人从高处向他微笑，但究竟是怎么回事还不清楚。数月之后，一位在党中央委员会里有知交好友的知识分子告诉我，那位为舒克申捧场的神秘影迷就是勃列日涅夫本人。我的朋友说，在审查官把《红山茶树》打入冷宫期间，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一次私下放映时看了这部影片，片中俄国农村的真实场面、写得娓娓动人的主角的悲剧性遭遇，以及那些忠于俄罗斯的信念、丝毫不为艰苦生活所动摇的淳朴人们的动人形象，使他感动得掉下了眼泪。勃列日涅夫的眼泪，我的朋友说，“保证了影片的成功。”这种解释当然不能得到肯定的证实，但听来还是有可能的，它说明了苏联机构运转过程中时而出现的反复无常情况。不幸，舒克申在获得巨大成功的几个月之后就去世了。

我从未见过舒克申，但我确实见过另一位借助上层保护人战胜审查官百般挑剔的作家——钦基兹·艾特马托夫，他是一位不寻常的共产党作家，勃列日涅夫和某些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对他都加以赞扬。1974年春，我同四位美国记者正在中亚细亚旅行，由于艾特马托夫所享有的自由派作家声望，我们都想见一见他。在我们访问他的家乡伏龙芝期间，曾试图安排一次对他的正式访问，但被当局托故推辞了。幸好，我们设法同他取得了直接联系。他冒着风险，殷勤地

邀请我们上他的郊外别墅去，那是一座舒适自在、摆设豪华的乡间住宅，即使摆在资产阶级的斯卡斯代尔或格林威治[①]也毫不逊色。他带我们在他那砖墙围绕的花园里游览，园中他珍藏着几尊古代原始风格的女人石像，据他说，这些是六世纪土耳其工匠的作品，含有传奇或宗教意义。艾特马托夫嗓门沙哑，说话很轻，是一位山区出生的中年人，他那黑色的眉毛和东方人的眼睛，使人一望而知他是中亚细亚人。他对于本民族的神话、传说和古老的历史十分欣赏。在堆满了由他妻子精心烹调的吉尔吉斯佳肴的丰盛筵席上，他热情洋溢地同我们谈至深夜，谈到了保护自然这一人类的共同问题，谈到东方和西方工业家们滥用自然资源的问题，也谈到从理查三世到现代苏联的人与人之间的叛卖行为。当有人提到他和索尔仁尼琴都关切背叛行为这一主题时，他不置可否地说道，“各人有各人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各人也有各人的手法去描绘它。”后来，他又批评了索尔仁尼琴——这是为了与党的路线保持一致，而对于反对偶像崇拜的作家受到惩罚一事也逐渐回避，缄口不言了。

对于党的领导来说，艾特马托夫是说明苏联少数民族政策成功的合适典范，因为他是用俄文写作的吉

---

① 美国纽约市作家和艺术家以及上层人士聚居的两个地区。——译者

尔吉斯人，是造诣很深的少数民族作家的代表。因而，在党为了把少数民族更牢固地溶合在同俄罗斯的联盟中而竭尽努力的时候，他是受党赞赏的难得宝贝。他的政治可靠性也是无可非议的。艾特马托夫的双亲都是吉尔吉斯共产党的上层活动家，他实际上继承父母衣钵入了党，并迅速被党提升为党在知识分子中居领导地位的代表之一。他在早期创作的、以吉尔吉斯山区为背景的、技巧圆熟但内容颇落俗套的小说，为他赢得了国家奖励和正式的公认。作为一个慎重的作家，他作了一些妥协——对某些事情隐而不叙，而对萨哈罗夫那样的持不同政见者则参加集体谴责。但近年来，他利用自己受到保护的地位，就第二流作家所回避的道德问题写了些比较非正统的作品，赢得了自由派的拥护。

1970年，他出版了小说《白轮船》，俄国知识分子的自由派把这引为自己的胜利。那是一个描述善与恶的动人寓言，一个七岁的男孩用自杀来抗议以一头珍贵的山鹿被杀作为象征的现代人类对于大自然的劫掠。保守派抗议说，作为苏联文学，这个孩子的心理及其自杀行为过于悲观消极。1973年，艾特马托夫对官方保守派又进行了一次挑战。他与人合写了一部剧本《登富士山》，它是几年来第一个提出在斯大林时期通过告密出卖他人的人们在道德上有罪的剧本。遵照猫

鼠角逐的规则，艾特马托夫避免明确提到斯大林或清洗。他选择四个战时的老朋友重新团聚举行野餐作为背景，野餐时，四个人的脑海中萦绕着一个纠缠不休的秘密：他们四个人中究竟是谁暗中告发了一个失踪的同事，因而毁掉了他的一生。“说实话，说实话，”艾特马托夫塑造的扣人心弦的角色们不断地互相告诫并向深怀同情的观众这么说着。作为对官方的含蓄谴责，他笔下两个令人憎恨的反面角色都是发迹的、贪得无厌的野心家，一个是周游列国的记者，另一个是科学院院长。我发现剧本的主题比戏剧的技巧更有力，仅仅就剧本提出个人出卖、欺诈等问题并暗示斯大林实行了镇压等情，对苏联舞台来说就够大胆、够不平凡的了，在我观看剧本上演的那天晚上，观众始终处于紧张激动的情绪之中。艾特马托夫的地位并没有稳固到不可动摇的地步，偶尔也因有脱离官方的倾向而付出代价。有人告诉我，他由于未经官方批准就同意会见我们这批记者而受到了官方的申斥，结果他被禁止出国旅行达一年左右。但是后来，当华盛顿环形剧院上演《登富士山》译本时，他被允许赴美；出于缓和的目的，党认为他是一个用得着的形象。

在其他一些场合，这场猫鼠之斗的力量对比，会因外部世界的关注和压力而发生有利于知识分子的变化。例如，1970年影片《安德烈·鲁勃廖夫》在戛纳电

影节上获奖就是如此。这是一部冷酷的现实主义影片，它通过对于传说中的十五世纪修道士和圣像画家安德烈·鲁勃廖夫的一生及其艺术的描写，反映了中世纪俄国所遭受的苦难。此片由莫斯科最有才华的导演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采用因格马尔·伯格曼[①]的自然主义风格拍摄而成，原先打算在1967年作为布尔什维克革命五十周年庆祝活动的一项节目献映。影片生动地描绘了蒙古人的暴力征服，俄国人的自相残杀，异教徒在仲夏之夜狂欢时的群裸场面，并且赞赏地表现了鲁勃廖夫的宗教艺术和他在一个充满密告者和权力主义统治的敌对环境中对于创作自由的热切愿望，然而这一切都是与审查官格格不入的。他们将这部影片扣了四年，对片中场面大删大砍；与此同时影片却又被送到西方上映，赚取硬通货，并为苏联文化赢得荣誉。该片终于在戛纳获得了国际声誉，这显然令苏联当局感到为难，他们感到再也不能继续扣压这部影片不让它与国内人民见面了。于是，一部经过删节的片子获准在莫斯科少数几家影院上映，接着又在全国作了规模不大的巡回放映。

由于缓和而出现的一个更为惊人的逆转是1974年秋官方政策的变更，当时一群非官方艺术家——他们中没有一人是艺术家协会的成员——试图为他们略

① 因格马尔·伯格曼(1918—)：瑞典电影编剧、导演。——译者

具抽象派风格的非正统绘画举办一次户外艺术展览。9月15日，当他们在一块空地上集合时，遭到了穿工人服装的便衣警察的野蛮驱逐，警察们开着压路机和垃圾车把这些艺术家、他们的几百位朋友、外交官和记者冲得四处奔散。警方打手们殴打了好几名记者，我的《泰晤士报》同行克里斯·雷恩也遭到毒手，被打掉一颗牙齿。其他旁观者还受到逮捕和审讯。有十多幅画被夺走、撕破，并且与其他破烂一起被扔进垃圾车。我的几位艺术家朋友说他们曾经看到有些油画被焚毁了。艺术家们迅速抓住机会公开了官方这场不必要的镇压。这一令人想起纳粹焚书的事件，引起了国际上的强烈抗议；这些抗议迫使克里姆林宫更换镇压手法，而高级新闻界人士则在私下竭力把事情全部推到莫斯科党的官员而不是更高一级人物的头上——然而我总觉得下令镇压的恰恰就是踞于上层的保守派人物。最后，当局终于允许在伊兹麦洛沃公园附近举办一次户外展览，时间是两星期后的9月29日。

这自然成了我在莫斯科逗留几年中最不寻常的一件文化大事。俄国人自己也为此感到诧异。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日下午，一万多人聚集在一块开阔的空地上。场地上一派节日景象，尽管有克格勃摄影师拿着高级日本照相器材对敢于公然同西方记者混在一起的俄国人拍照，气氛还是令人惊讶地自由。正如一个法

国外交官所评论的，这是“俄国的伍德斯托克[1]”，是一次重大的户外活动，由于当局无可奈何，不得不听之任之，否则就会在国际上丢脸，因而显得格外重要，而这里展出的艺术品的内在价值倒并不显得那么重要。在由六十五名艺术家提供的二百幅油画中，我看到了各种不同的风格，从幻想现实主义和宗教象征主义到超现实主义、颓废派流行艺术、色彩抽象派艺术以及幻觉时代的麻醉艺术，同时也有比较老式的油画。几乎没有艺术家把风格最新颖的作品拿来展出。他们不想走得太远以致把事情弄糟。人群兴高采烈地在场内缓缓移动，观赏着油画。人们在一堆堆人群中挤进挤出，让小孩高高地坐在自己肩上，他们向一些艺术家发出欢呼，向另一些艺术家提出质问，并且互相争辩直至夜里，展出结束后，他们还在争论一幅油画如果不为普通人所理解该不该算作艺术。整个场面一点也不象是在苏联。

按照世界标准来看，这类艺术是相当平淡乏味的。几年来，有几位较为卓越的地下艺术家，如奥斯卡尔·拉宾、弗拉基米尔·涅穆欣和莉季娅·马斯捷尔科娃，得到了当局谨慎的许可，私下向外国外交人员展示和出售他们的作品。流传到西方的艺术品仅仅引起了人们的一般兴趣，而且主要是因为这些艺术品来自苏

---

[1] 伍德斯托克在美国纽约附近，是艺术家的聚居地。——译者

联，然而无论是其现代派的风格还是讽刺性的内容都冲破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准则。当然，它远不如二十年代俄国先锋派作品那样惊人、大胆；一般来说也不及早已在苏联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里展出的图案画艺术那样抽象或富有现代派色彩。莫斯科一位老文艺批评家几天之后对我这么说，“艺术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我只看到一、两幅我所看得中的好画。我喜欢的是那股气氛以及一种自由的感觉。只是在那儿，我才一度以生为俄国人而感到自豪。”

地下艺术家们充分利用他们从国际上所获得的关注，对当局施加压力，要求再举办一些较小规模的展出。有时，当局作了让步；有时则狡猾地利用艺术家之间的分歧而加以遏制。在第一次大型展出过去一年之后，艺术家们坚持要求再举办一次大型展出。这一次展出作品近八百件，当几个保守派官员取走其中四十一幅时，艺术家们又骚动了起来，威胁说要关闭整个展览并将情况告知西方报刊。由于害怕成为国际丑闻，比较实用主义的高一级官员又一次让了步，允许将一些油画归还，仅仅禁止几幅带有明显政治含意的作品展出。“这是十足市侩式的应付办法，”一位美国官员评论道。“看来，苏联当局以为，假如他们听其自然，这种事情的新奇性会慢慢淡下去，以至完全消失，也许他们想得不错。”因为尽管这一群艺术家机灵地取得了苏

联当局最大限度的放行，但没有迹象表明党正在放松对于苏联艺术主流的控制。

有时，文化界的警犬甚至就在自己管理的领域内遭到败北，因为自由派色彩比较浓厚的杂志编辑，为了在他们必须编辑出版的、不看也知道的宣传内容中增添一点趣味，拚命地竞相争夺可以一读的材料。例如，斯特鲁加茨基兄弟(鲍里斯和阿尔卡季)所著的科学幻想小说就被鉴赏家们广泛看作是以其他行星或西方为背景来批评苏维埃俄国的寓言。在《时代的掠取物》一书中，斯特鲁加茨基兄弟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未来社会，那里物质需要应有尽有，但人们却感到不胜无聊、精神十分空虚。在《上帝难做》一书中，一支赴另一行星的地球探险队目击了一场由宗教煽起的政变和一个中世纪法西斯社会的建立，而该社会的种种特征是为俄国读者相当熟悉的。他们的幻想小说《斜坡上的蜗牛》以一个虚构的“森林事务局”为题材描绘了这样明显的一幅讽刺苏联官僚那种徒劳无益的文牍主义、效率低下和虚伪无耻的漫画，因而《真理报》攻击这部著作是“对苏联现实的诽谤中伤”。在此以后，斯特鲁加茨基兄弟在出版他们的著作方面就遇到了严重困难。

苏联知识分子以发现和分享这种滑过审查官关卡的作品为乐事。1971 年末，出了一个最令人震惊的大

纰漏，《新世界》杂志发表了叶夫根尼·马尔金的一首象征手法的诗《失重》，作者以此题为譬喻，对自己参与了把索尔仁尼琴逐出俄国作家协会的官方运动一事表示忏悔。然而，正当这首诗的解释在莫斯科知识分子中间成为家喻户晓的闲谈资料时，这台戏就收了场，报应迅速降临。我听说，对此事负有责任的审查官和编辑们都受到申斥，马尔金本人则因其诗歌的异端倾向而被撵出作家协会，因而再也不能以写作为生。

与其他艺术手段相比，戏剧可能更适宜于艺术家和审查官之间斗争的开展，这就是为什么七十年代初期戏剧成了最生动活泼、最受人欢迎的苏联艺术的主要原因。我认识一些俄国人，他们在看戏回家时总要津津乐道地回味自己从戏剧的细致表情、音调变化和手势姿态里所领会的弦外之音。他们去看戏时，会等着听那几段饶有兴味的台词或独白，原谅了演出中其余部分的单调和循规蹈矩。例如，《黎明时刻的摇摆舞》是一出由两位《真理报》编辑创作的苏联反美音乐喜剧，作者采用了《救世主耶稣》和《超级明星》的一些录音片断和美国式舞台背景气氛作为吸引观众的噱头。剧中对于美国的描绘基本上都与苏联关于美国社会的陈腐观点一致，认为它就是抓钱，没有道德，一心搞军备竞赛，同中国人勾结并且镇压国内有理想的青年。但这一巧妙高明的手法确实使得《超级明星》正

式被官方所接受，而且在剧终之前，当一个警方密探向他的长官抗议官场中的撒谎欺诈时，导演对于苏联生活发出了一段评论，他让那位演员面对苏联观众，大声地宣称："我们撒谎，一级级的撒谎。我对你撒谎，你对你的头头撒谎。而他就对最高一级撒谎。一座谎言的金字塔。它是靠什么撑住的——我不知道。或许它建筑在对于一旦有人脱离金字塔就会导致其分崩离析的恐惧上面。然而，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完蛋。现在，我个人退出这种把戏。"在我观看的那次首场公演中，这是一个震撼人心的时刻。这个警方密探说出了知识分子只会在私下而不会在可信赖的圈子之外所讲的话。现在把它当众演出，实在是妙不可言的一击。既然这段话说的是美国，当然无罪可加，但它是面对面地向俄国观众讲的，那就耐人寻味了。观众们完全领会其中奥妙，报之以热烈的掌声。

俄国人非常善于在各种艺术形式中领悟其意味深长之处，甚至在音乐喜剧节目中他们也能找出政治上的暗示。1972年12月，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被禁止出国旅行，在国内举行音乐会也受到严格限制。克里姆林宫对于他让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他家里避难一事十分恼火，然而在莫斯科冬季艺术节期间还是允许他在几个晚会上露面。最精彩的一场是他演奏波兰第一流作曲家维托尔德·利托斯拉夫斯基

专为他谱写的新曲。按照莫斯科标准来看，这首乐曲非常现代派，既不协调又不正统。为谨慎起见，罗斯特罗波维奇在自由派知识分子避难所莫斯科音乐学院演出之前，同管弦乐队只是作了几次小心翼翼的排演。

看过那次演出的俄国朋友们不仅将其理解为具有挑衅性质的现代派音乐的一次大胆公演。他们把它看作是那位大提琴家和那位作曲家深思熟虑的哲学声明。在几段乐曲中，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大提琴孤独的抒情琴声在管弦乐队隆隆刺耳的音响中挣扎着飘向观众。对于罗斯特罗波维奇的朋友和热心的老听众来说，这里表达了一个自由不屈的音乐界、知识界人士正在挣扎着冲破文化正统的喧嚣、不顾官方对他行为的审查，竭力让自己的心声为他人所闻。

有影响的自由派剧院所喜欢玩弄的手法，是上演不容非难的古典作品，但赋予它们某种现代的解释，从而使它们比当代苏联戏剧家幸免责难的任何作品具有更强的政治力量。莫斯科塔甘卡剧院富有才华和想象力的导演尤里·柳比莫夫，就是玩弄这种技巧的大师。他所改编的《汉姆雷特》一剧，由于演员身穿时髦的宽大的裤子、高领套衫，而且掘墓者也明白无误地以俄国农民的扮相出现，因而把中世纪丹麦阴谋和偷听的气氛安排在苏联的背景之中。为了增添俄国色彩，柳比莫夫让一位男演员先朗诵一首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

所著、至今仍属禁书的《日瓦戈医生》中关于汉姆雷特的诗作为开场白。而且，他塑造的汉姆雷特完全不是缺乏自信心的王子，却是一个在邪恶时代反抗暴君的狂怒青年(克劳迪亚斯王就是斯大林?)

这样的改编风险相当大，所以柳比莫夫不得不作出艰苦的斗争才获准将它搬上舞台。我去观看演出时对莫斯科还很不熟悉，不清楚该从中悟出多少名堂。演出后，我问柳比莫夫，他是怎样审慎地使他的《汉姆雷特》影射苏联现实的。他的回答很简略，仍然玩着那套把戏以保护自己。他说，“这个剧本是如此不朽，因而成了古典名作。要是剧本中再也听不出当代的声音，要是它不激起当代的反响，要是它不使人想起他们自己，演出就毫无意义了。”他停顿了一下，看我是否领会了他的意思，然后再用“活着还是死去”这段话来说明自己的论点。在他的改写本中，这段话不单是一种哲学独白，更是一种对观众的道德说教，要他们不与邪恶合流，为了强调，重复了两次。“汉姆雷特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他由于自己无所作为而严厉批判自己，”柳比莫夫说道。“他害怕死亡。我们都害怕死亡，害怕失去前程，害怕未知的一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容忍邪恶的原因。”

然而，我在莫斯科观看的最灵巧的妙语双关的戏剧表演是《巴拉莱金及其同伴》。许多我所认识的知识

分子，把这个剧本看作是对于他们生活的一种巧妙贴切而有趣的评注。这种生活包含着——知识分子懦怯的缄默；他们对于警察和政治当局摇尾乞怜的恐惧；他们用以代替知识自由和脑力活动的散步、宴会和喝酒；他们在酗酒闹饮时作哲学探讨的嗜好及过后的无所作为；他们被迫在外国人面前对俄国生活缺陷所作的遮盖；他们为使当权者息怒而使用的模棱两可的含糊语言；以及他们对当局的曲意奉承。

特别引起莫斯科知识分子好奇的是，这篇讽刺作品出于谢尔盖·米哈尔科夫之手。他是行动蹒跚的百万富翁，儿童读物作者，有名的保守派文学界警犬头头。米哈尔科夫会成为《巴拉莱金》这类剧本的作者，这是苏联的咄咄怪事之一，这些怪事老是使我难以有把握将某一个人描绘成持强硬路线的顽固分子。这件事在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无休止的私下物议。我的一些朋友将这个剧本看作是他们久已猜疑米哈尔科夫具有极度玩世不恭的思想的明证。另一些人讲，他们听说他之所以写这个剧本是由于他那具有自由派思想的儿子们向他挑战，要他写些正直而大胆的作品。我常常纳闷，这会不会是出自他的一个儿子之手，而叫他父亲出面发表的。

《巴拉莱金》的挡箭牌是，该剧系根据十九世纪伟大的俄国讽刺作家米哈伊尔·萨尔季科夫-谢德林的

小说《现代田园诗》改写的。为谨慎起见，“现代人”剧院上演该剧时台上悬挂着一面大旗，上书：“不看谢德林的戏便不能懂得十九世纪下半期的俄国历史。”舞台和戏装都安排成上个世纪的。而这一切只能使我的俄国朋友们更加把整个场面作为对他们生活的诙谐讽刺来欣赏。开场时，两个自由派知识分子刚接到“静候传讯”的警告，就象处在现代苏联的镇压时期一样。没有说明理由，这两个人就退居室内，放弃一切自由派活动和联系，一无反抗地在客厅内静坐。当代观众们对此一点也不陌生。“如果你设法躲藏起来，他们也会找到的，”其中一人告诫道。“他们找到后会问你在干什么。甚至清白无辜的人也会变成有罪的。”这两个人开始象今天的俄国人一样窃窃私语，唯恐被他人听去，虽然他们讲的尽是些无关紧要的话。“主要的事情是抑制精神上的狂热，”第一个人自负地断言。“我们的无所事事和纯洁情感将会使世界感到吃惊，”第二个人这样随声附和。久而久之，他们的生活失去了内容和意义。他们吃喝，静坐，互相瞪眼，说些废话，长时间的散步，然后，以一种当今为相当多的俄国人所使用的堂皇措词，骄傲地相互宣称：“我们有了一切。”当一名警方密探出场时，他们为了巴结他，故意把牌输给他。当令人生畏的警察局长上场时，他们吓得发抖，用模棱两可的话掩饰自己的见解，并开始随声附和他的说法。他们

十分情愿充当他的工具。《巴拉莱金》一剧在列宁格勒优秀导演格奥尔基·托夫斯托诺戈夫指导下演出，演技优美，知识分子对它大为欣赏，因为它描绘了他们的苦境，但是党的保守派却私下对它有所疑忌。

一位有影响的记者告诉我，由于米哈尔科夫的讽刺作品如此一针见血地击中了要害，因此尽管他的地位很高，还是受到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申斥，要他解释为什么写了一部含有那么多含沙射影的反苏味道的作品。然而米哈尔科夫不愧为一位大策略家。据该记者所述，他坚持说这是谢德林关于沙皇时代的写作，他对于党的官员竟硬将其理解为含有反苏感情而感到惊讶。当时他被放过了。但过后他又一次被传召。该记者对我说，这一次米哈尔科夫掌握了沙皇官员因那篇原作而严厉申斥谢德林的引文，所以当党的官员们责备米哈尔科夫时，他就引述了沙皇官方所作的相似的评论。该记者告诉我，这种反驳起了作用，《巴拉莱金》终于得以幸存下来。

《巴拉莱金》及其他类似的艺术作品所引起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紧张，莫斯科的一个中年语言学家和剧作家加利亚评论说，“给我们的文化生活带来了一点生气。在西方，随便什么作品都可以存在，因此几乎没有什么作品受到特别珍爱。在俄国，几乎不可能产生什

么杰作，因此，凡是有点价值的作品都受到无比珍爱。对于好书的挑选余地是那么小，因而没有一本好书不受到赏识。我认识一个人，他总是把珍爱的书籍带在身边，如帕斯捷尔纳克、曼杰尔什塔姆或阿赫玛托娃。当他在美国访问看到书店里曼杰尔什塔姆的作品成堆时不由得目瞪口呆。起初，他为供应的书如此之多而深为感动，接着就因没有人购买这些书而感到沮丧。他对我说，'在一个曼杰尔什塔姆的作品未受应有重视的国家中，我是无法生活的。'"

加利亚是对的。俄国知识分子确实把杰出的艺术作品视若至宝，因为他们对此如饥如渴，这种无休止的欣赏正是苏联文化生活最吸引人的特征之一。他们就象因买到一些在西方视为理所当然的时髦货而表现出新婚般激动的苏联顾客一样。俄国知识分子珍视任何一次不同凡响的诗歌朗诵会、音乐会或外国电影，把它作为生活中的大事而谈论好几个月。我记得有一天上午在第比利斯碰上一列长达半个街区的队伍，从其中几个人的口中，我得悉他们是在等书店开门，因为他们打听到将有一卷新的陀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出售。有许多夜晚，我和安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都置身于欣喜若狂的观众之中，那里的音乐极为动听，而且正如一位莫斯科友人所说，在那里，"我能摆脱我们那种政治化的生活。"知识分子们谦逊地来到那里，穿着朴素的套衫

和长裤，热烈欢呼他们当地的英雄——萧斯塔科维奇，奥伊斯特拉赫，罗斯特罗波维奇，里赫特，哈恰图良。现代无调主义倾向几乎完全受到禁止，但这些俄国人心情激动地品味着柴可夫斯基、鲍罗金、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等以及其他古典杰作。尽管大剧院芭蕾舞团上演的剧目有限，而且其明星又经常出国旅行，但剧院有时还是出现人心激动的场面，特别是在普利谢茨卡娅那样一些第一流芭蕾舞演员上台跳舞的时候。无论大厅内外，群情振奋。不管普利谢茨卡娅是一只轻柔优雅的黑天鹅还是《卡门》组舞中一个瘦削的斗牛士的姘妇，花束总是雨点似地从楼厅上投过来。这些与纽约、伦敦或巴黎那种献花场面多不胜数的纯文化娱乐并不相同，而是非常难得的赏心乐事，俄国人把每一次演出都作为铭记不忘的盛况。

然而，我所认识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把地下艺术展出、千载难逢的沃兹涅先斯基诗歌朗诵会或《巴拉莱金》这类盛举看作是偶尔发生的快事，看作是文化沙漠中的花朵和当局赐给的小恩小惠。对于他们来说，《巴拉莱金》所描绘的那幅关于知识分子生活的讽刺漫画，虽然是一种夸张，但也确实是七十年代初期苏联的令人痛苦而又恰如其分的写照。赫鲁晓夫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解冻所带来的激动和兴奋，曾经使他们对于长期的真正的文化上的宽容和自由燃起了希望，

但是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出现的紧缩中，苏联知识分子感到自己国内的文化气候变得萧瑟枯燥了。

独具一格的小说、剧本和读物时时闪现，因为自斯大林逝世以后，党感到有必要允许安全阀的存在。因而尽管它对知识分子中极端反叛的倾向加以控制约束，但仍然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其目的是要把富有才华的作家和其他知识分子招募到它的事业中去。我那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朋友所倾慕的同时代人中，不仅有舒克申、艾特马托夫和塔尔科夫斯基，而且还有（这里只提出几个人的名字）非正统地描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漫无目标的暴行的瓦西里·贝科夫；创作了令人联想起威廉·萨洛扬[①]来的、短篇讽刺小说的法齐尔·伊斯坎德尔；以犀利的笔锋描述正在上升的中产阶级市侩作风的尤里·特里福诺夫；以及对俄国农村艰苦生活和日益堕落的道德作了现实主义描写的费奥多尔·阿勃拉莫夫。但他们中不论是谁，目光所及都很有限很狭隘，对题材的处理则巧妙有余而胆量不足。

在七十年代的前五年中，苏联知识分子缺少推动力和方向，特别是缺少赫鲁晓夫时代那种一致感和希望。因而剧作家加利亚告诉我，“我一生中有十年时间，1955年到1965年，曾怀有这样的想法，即认为今天不太理想但明天就会好些。对于别人来说，这段时

① 威廉·萨洛扬（1908—）：美国小说家、剧作家。——译者

间也许要长一些，延长得晚一些。但对我来说，这十年有一种十分美好的感觉。我感到作品到头来总是可能出版的。我写了些当时无法出版的东西，但我认为那是暂时的，以后总会出版。然而对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1966年〕的审讯恰似晴天霹雳。后来，其他人也遭到了打击。六天战争。捷克斯洛伐克。出版越来越困难。我失去了希望。”

在赫鲁晓夫统治下，被称为“诗坛泰斗”的叶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贝拉·阿赫马杜琳娜，罗伯特·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曾经燃起青年人的幻想。“塔甘卡”和“现代人”之类新剧院纷纷问世。每隔一段时期，赫鲁晓夫总要对自由派加以申斥，勒紧他们颈上的缰绳。然而，他的政策摇摆不定，反复无常，再加上他的反斯大林运动，这就给知识分子提供了比较便于利用的灵活性，而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以后的岁月里，在勃列日涅夫俄国那种更阴暗、控制更严的气氛中，这样做就比较困难了。

也许，对于文化界自由派来说，最为痛苦的挫折就是1970年初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被迫离开《新世界》杂志总编辑职务一事，该杂志长久以来一直是自由派的灯塔。特瓦尔多夫斯基本人就是一个很有成就的讽刺诗人，正是他发现了索尔仁尼琴和大多数其他非正统作家。“特瓦尔多夫斯基去职后，《新世界》作为

一种杂志来说也就完结了，”一位有成就的讽刺作家痛惜地对我说道。“假定你在他任总编辑期间连续十年阅读这份杂志的话，你就会对苏联生活懂得很多。但从他去职后，就了解不到很多了。他是一位极为出色的编辑。他为那份杂志和那些作家付出了很大代价。他发表了许多如果没有他便永远无法见诸于世的作品。”那个人对我说，最近他设法把一些文章汇集成册，审查官扣下了其中最大胆的几篇——虽然它们先前都已由特瓦尔多夫斯基发表过。

其他许多与我交谈过的人，对于七十年代初期的紧缩感也有体会。莉季娅·丘科夫斯卡娅和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等作家都被赐出了作家协会，原因是他们支持索尔仁尼琴或者在国外出版象沃伊诺维奇的《伊凡·琼金》一类被当局认为是冒犯苏联的作品。《伊凡·琼金》是一部讽刺苏联官僚机构和军队中错误百出的低效率现象的作品，作者曾为该作品在莫斯科出版努力了十年，但终归无效。其他作家私下抱怨说，他们有的作品即使出版，也遭到了大删大砍。一天晚上，一位中年戏剧家辛酸地告诫我说，“绝对不要从一位苏联作家的作品中出现的东西来判断他在想些什么。我们都学会了服从审查，更糟的是，学会了作自我审查。如果你知道揭露尼克松或者发表为政府所不悦的社论，其代价是要〔流放〕西伯利亚或终身列入黑名

单，那么你和你们英雄的《纽约时报》就不会那么大胆了。你看到这儿的人们为艾特马托夫或某个人而兴高采烈，这是因为他努力做到了比一般人稍微诚实一点的缘故。然而，这只是个程度差别。假如有人对我们的生活能做到讲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三十的真话，那就会被认为是一桩轰动一时的大事了。”

我从莫斯科一家出版社的某人那里听说，有一位作家奉命把斯特鲁加茨基兄弟所著科学幻想小说中冒犯苏联的讽喻砍去，以迁就图书审查官的异议。那个作家是作者的朋友，他讨厌这件差使，但他的理由是他或许做起来会比那些毫不相干的人更温和、更富于同情心一些。那位出版社官员说，“要么删改，要么不予出版，而斯特鲁加茨基兄弟是需要钱用的。” 1971 年我初次遇见“塔甘卡”剧院导演尤里·柳比莫夫时，他曾热情地向我讲起当时正在排演的三部剧本：一部是演出过两次、后来在 1970 年遭到审查官禁止的沃兹涅先斯基讽刺剧《保全面子》；一部是鲍里斯·莫扎耶夫的非正统剧本，内容是一个有独立主见的农民想做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退出他的集体农庄；还有一部是根据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讽刺幻想作品《主人和马格丽塔》改编的剧本。但在以后的三个季度中，没有一个剧本为审查官所批准。我听说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由于遭到剧团中政治上保守的党员们的反对，一部关于普希金

和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有趣而不落俗套的剧本被打入了冷宫。一位电影剧本作家告诉我，每年或许有十至十二部影片在摄成之后禁止上映，更不用说大量的剧本在开拍之前就因政治上的原因而被否定了。我听说，不仅是法齐尔·伊斯坎德尔那样的自由派作家，而且象米哈伊尔·肖洛霍夫这种著名的保守派，也有大量的作品由于警犬们不同意其中的讽喻而被退回。保守派的青年月刊《青年近卫军》的一个前任编辑对我说，该杂志的编辑们扣压了整整一大堆公开涉及两性问题以及青年中对于服兵役的和平主义情调和愤世嫉俗思想的稿件。

西方人士常常以为一个出版社只有一个审查官，专门剔出不能接受的作品，但俄国作家们向我描述了一个远为复杂的审查过程。相比之下，他们对于编辑比对审查官更为畏惧，编辑们急于保护自己不受政治后果的影响，总是大力进行预先审查和删节。有一位国际闻名的诗人对于《纽约时报》把他一篇作品称为刺耳的反美叫嚣感到忿怒，他邀我一起午餐，整整解释了五个小时，说明在错综复杂的审查过程中，那些据他所称是最有趣的材料尽被砍去，留下来的只是一篇纯粹宣传性作品。十八个月来，为了使他的稿子获准出版，他苦苦地哀求着，拖着沉重的脚步到俄罗斯共和国文化部某个委员会、全苏文化部、区党委会、莫斯科党委

会负责意识形态的部门以及文化部剧院管理局等机关去——所有这一切甚至都是在稿子到达官方审查机构图书出版管理总局之前所作的努力。他呻吟着说，仅仅在某一级预审中，“他们就改动了一百处——我亲自数过，他们答应说不再改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以后他们又作了更多的改动。”

然而，不止一个作家向我说过，正是巨额的版税、大量的重版和宏大的观众队伍，以及花样与审查一样繁多的乡间别墅、出国旅行及其他种种特权的诱惑，收买了许多本来想做“自由派”的人物。描写爱国主义主题的忠于意识形态的作者，通常受到最贵重的奖赏。著有许多战争小说和冷战间谍惊险小说的作家瓦季姆·科热夫尼科夫（他的某些作品曾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影片），据说积蓄了百万卢布的财产。另一些作家的奢望要小得多，但是七十年代的物质主义的情绪确实影响了许多作家。有一位成功的诗人讥讽道，“当一个人急于要把一辆日古利牌新汽车弄到手的时候，哪还有心思去为大胆的诗歌操心呢？”

七十年代初期，各个方面的人士都私下抱怨六十年代的自由派诗人丧失了激情：四肢瘦弱、自作多情的叶甫图申科变成了为政府叫喊的雇佣诗人，唱着忠于苏联的公民诗，攻击中国人或智利军政府；罗日杰斯特

文斯基在写流行曲调，或狂热地大书特书空间英雄和建设计划，沃兹涅先斯基降低了青年时的响亮声调，转而采取比较小心谨慎、曲折隐晦的抗议手法；而阿克马杜琳娜在出版问题上完全陷于困境。这种困难也折磨着其他作家——如政治性科学幻想小说作者斯特鲁加茨基兄弟和六十年代初期青年散文运动的领导人瓦西里·阿克肖诺夫。我不断听人们说起，更糟的是在七十年代，令人感兴趣的作品仅仅出自现已中年的“赫鲁晓夫一代”之手，而七十年代的青年一代中尚未产生任何一鸣惊人的新天才或具有反抗锐气的作家来接替老一代人。一位二十来岁的文学批评家一针见血地评论说，“你必须先有一定成就，然后才能讲点什么而安然无恙。”一位上了些年纪的人补充说，“今天，大胆的青年作家还没有崛起就被摧垮了。”沃兹涅先斯基曾私下承认，要是在七十年代那种保守的气候下，他是永远也不能以一个自由派的身分开始自己的事业并获得自由派声誉的。”

况且，苏联文化生活的活力及其特有的天才正在日趋枯竭。不仅索尔仁尼琴被强迫驱逐出境，而且其他重要作家也纷纷流亡国外，其中有也许是当今最有天才的俄国诗人约瑟夫·勃罗德斯基，有《在斯大林格勒战壕里》一书的著名作者维克多·涅克拉索夫；有才华横溢的文艺批评家和持不同政见的讽刺作家安德

烈·西尼亚夫斯基，以及笔调尖刻的持不同政见小说家弗拉基米尔·马克西莫夫。一种文化上的幽闭恐怖感，促使其他领域中富有发明和创造能力的知识分子同样出走国外。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怨透了官方由于他支持索尔仁尼琴而强加于他的“隔离”措施，为了恢复他的艺术生涯，携同自己那个当歌剧演员的妻子加林娜·维什涅夫斯卡娅去了西方。列宁格勒基洛夫芭蕾舞剧团主要舞蹈家年轻的米哈伊尔·巴雷什尼科夫，是苏联艺术家中最享有特权的人物之一。甚至象他那样一位不问政治的人物也于1974年在加拿大叛逃，并在后来公开声称，促使他出逃的正是那种压抑一切生气的文化保守主义。他曾想在列宁格勒演出舍恩伯格和韦贝尔恩的舞蹈，但是文化部意识形态委员会以“不适宜于芭蕾舞”为理由排斥了这一类的现代派杰作。另一个基洛夫芭蕾舞团的明星瓦列里·帕诺夫出于同样的理由，也开始努力活动，以便能移居国外。

这些例子不仅说明了令人窒息的文化控制，而且显示了整个文化界的陈腐枯燥：在今日苏联的公共文化生活中，作为国家来说，它已经摒弃了二十世纪大部分文化发展——抽象派艺术、现代派舞蹈、“意识之流”散文。去世不久的季米特里·萧斯塔科维奇生前几乎是唯一的一位重要的现代音乐作曲家，而这种情况竟

发生在一个曾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以其丰富多彩的音乐和源源不绝的文学作品而压倒整个世界的国家里。今天，大剧院芭蕾舞团和苏联交响乐团尽管技艺娴熟——观看和倾听其演出是一种享受——却仍然在演出以十九世纪作品为主的节目。

同样，文学和戏剧方面的权威也还是十九世纪的古典作品。在契诃夫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老家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的《炼钢工人》，一个陈腐的宣传性工厂戏剧，仍然是当代苏联文化的共同标准。《炼钢工人》的情节围绕着由谁担任炼钢车间新工长这一问题而展开；剧中最富于戏剧性的时刻来临时，舞台幕布向两边分开，逼真地显现出舞台后方四座正在隆隆轰鸣的鼓风炉。在我即将离开莫斯科的时候，宣传得最广泛的影片是另一部关于炼钢厂的故事片《最炎热的月份》，剧情的焦点集中在能否完成计划这个问题上。发行量最大的书籍是关于青年人兴高采烈地应征入伍或参加西伯利亚建设项目的小说、描写俄国国内战争时期共产党爱国者英雄般地打败白军的故事以及反法西斯斗争的英勇壮烈的战争小说。

“塔甘卡”剧院的尤里·柳比莫夫，小剧院的阿纳托利·叶弗罗斯以及列宁格勒高尔基剧院的格奥尔基·托夫斯托诺戈夫这类戏剧导演的杰出技巧，以及他们对古典作品所作的新的解释，使得人们忽略了现

代戏剧天才的贫乏。而在文学方面，人们都一头钻在十九世纪的作品堆里，一位博览群书的工程师评论说，"因为它们比当代作者所写的任何作品都远为优秀、诚实并富有揭露性。什么叶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舒克申，我都不感兴趣。"一个热衷于古典作品的女大学生对我说，在她就读的国立莫斯科大学的一次俄罗斯散文课上，当教授宣布要学生辨认应在课外阅读的当代作家著作中某些未注明出处的段落，并以这种方式举行一次关于文学风格的考试时，课堂上出现了一片惊慌。她叹道，"三年中我从未看过现代苏联作家的作品。我的朋友们也是如此。"或许这里稍稍有点夸张，但她和其他青年人对于当代苏联作品不感兴趣却是真的。一些青年人觉得七十年代初期苏联自由派头面人物那种深受压抑的艺术是如此平淡沉闷、令人失望，因而他们几乎不顾质量好坏，如饥似渴地寻找西方作品，原因是西方作品既具有异国情调，又不受什么清规戒律的限制。其他一些比较激进的知识分子向我抱怨说，自由派正在帮倒忙，因为他们装作大胆讲话，却是吞吞吐吐，半真半假，故意耍弄花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沃兹涅先斯基，在他1972年发表的题为《一篇论烦闷的讽刺文》的几行沉思的语句里，抓住了青年这种背离情绪并且表露了自己的失望心情：

厌烦无聊乃是精神的空虚，

是孤寂寡伴的晚餐。
敌人的闹宴使你心烦讨厌，
你的同志则是加倍的讨厌。
艺术骗人，思想贫乏。
无耻的歪诗令人生厌。
你的情人又是那么讨厌，
恰似婊子来把贞女扮演。
喝彩的观众使人烦厌，
这是精神的一大空虚。

十六 精神生活

秘密文化的群岛

在俄国，文化已被驱散为星星点点的小岛。

列夫·纳夫罗佐夫，1972 年

在俄国，最生气勃勃、最富有刺激性的文化生活是非法的，因而也是秘密的。这种文化艺术最少受到官方教规的掺杂，最有独到的见解，最不委曲求全，而对于官方文化界则具有最大的威胁性。政府知道这种文化艺术的存在，出于害怕，他们(用流亡作家列夫·纳夫罗佐夫的话来说)将其驱散成为星星点点的小岛。

这些小岛构成了一群秘密岛屿，这里的生活远不如索尔仁尼琴以坚强有力的笔触描绘的古拉格群岛那样为人所共知。然而，它的存在却完全反映了苏联社会的特征。在这个秘密领域里，幸存着伟大的艺术和文化——有革命前白银时代繁荣的俄国文化，苏维埃时代初期辉煌的抽象派艺术，也有三十年代被上枷示众或迫害至死的诗人们那些无与伦比的作品。这种艺

术不仅已被蓄意排斥在官方文化之外，而且正在有意识地被人们所忘却。它之得以幸存，是因为有少数几位无所畏惧的人，自愿担任了这种文化的保护者，不然的话它就将在当代的苏联社会中绝迹失传了。

通常，是老年人才保留着人类同过去的联系，哺育着迫切想了解自己全部文化遗产的青年一代。因为，在一个经常一再改写历史以适应统治者眼前需要的国家里，在一个把有争议的文化界人物搞成庸俗可笑的偶像以适应官方文化强求一致的模式的国家里，口头流传的历史不只是一种对于未来的学者大有裨益的珍贵宝藏，而且是一种保持文化的持续性所必不可少的可靠源泉。俄国有句古话：孩子的教育是从祖父的教育开始的，如果祖父们拥有如此渊博的学问和如此丰富的知识，而若非他们健在这些学问和知识就会失传的话，那么这句古话就更有其特殊的意义了。

奥西普·曼杰尔什塔姆和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等伟大诗人的遗孀和儿子们，不仅仍然怀念着这些伟人，而且对于他们所经历的时代怀有一种亲切的血肉感情。有时，还会涌现出乎意料的历史陈迹的护卫者。一位衷心崇拜伟大的谢尔盖·爱森斯坦的青年人纳乌姆·克莱曼，不仅单枪匹马地经办一所关于这位电影天才的陈列室，而且提出了倡议，要用几段仍然存在的影片仔细重制一部爱森斯坦的电影。他的原作曾因其

异端思想而使斯大林主义审查官暴跳如雷，他们焚毁了爱森斯坦两次摄制的全部电影胶卷。正如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所揭示的，自封的非官方历史学家保存着关于斯大林主义镇压的私人文献集（共产党则竭尽全力要从公众记忆中抹去这种镇压的情况），而地下民谣歌手至今还保存着对于当年的回忆和当年人们的思想情绪。

俄国人记住纪念日的能力是超乎寻常的。在秘密文化群岛上，重要的纪念日常常也是举行某种与十九世纪文艺沙笼相当的现代式聚会的日子。我于一个凉爽的春日（5 月 30 日）去作家们的幽会之地佩列杰尔基诺村，其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几十个莫斯科人，有老有少，在这儿对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墓地进行每年一度的扫墓活动。苏联制度的怪现象之一是：象帕斯捷尔纳克那样的人物，作为一个诗人，他的话可以被人们引用、引证并得到人们的尊敬，因为统治集团认为把如此有名的抒情作家算作官方大家庭中的一员是有好处的。但帕斯捷尔纳克的另一面，对官方不利的一面，即创作《日瓦戈医生》的自由精神，则是断然不许公开存在的。每当旅游者要求参观他的墓地时，总是听到种种拒绝的借口而不能如愿以偿。

然而，那天在佩列杰尔基诺村环境却是如此宁

静，似乎由于《日瓦戈医生》一书和他被迫放弃的诺贝尔奖金而掀起的反帕斯捷尔纳克丑剧只是一种遥远的回忆。凉爽的微风吹拂着三株巨松和遮掩着坟墓的桦树枝叶。幼小的儿童在露天堆放的混凝土预制板上玩耍。在墓园近傍，赤脚的农村妇女静静地用锹掘着赤褐色的沃土，一只黑色的大乌鸦停在刚犁过的土地上啄食。

在帕斯捷尔纳克的友人，女雕塑家萨拉·列别杰娃所设计的白色墓碑上，人们默默地献上朴素的花束——郁金香、金凤花、精心采选的铃兰，甚至还有蒲公英。墓碑极为简朴而又美观，上面刻有清晰而洁净的浮雕——诗人巍峨的头像，以及简单的铭文“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他的家人拿来了各式各样的瓶瓶罐罐，里面注满水，以插放不胜其多的鲜花。“罐子还不够，”一位亲友略带责备地对作家的儿媳妇阿廖尼娅·帕斯捷尔纳克说。

“不用担心，”她答道，“通常，墓上的鲜花总是堆积如山。”

前来扫墓的有身着俄国主妇爱在严冬季节穿的松宽下垂的外套和厚厚的灰色短袜的老年妇女，有穿着装有拉链口袋的粗斜纹布裤的时髦青年妇女，也有提公文包或穿西方式样雨衣的年轻小伙子。所有的人都从莫斯科乘市郊电气火车到达佩列杰尔基诺村，然后

再步行近一英里的路程来到墓前。从上午八、九点钟起，就开始有帕斯捷尔纳克的崇拜者来到墓地，而直到傍晚时分人们还是缓缓而来，络绎不绝。他们奉献了鲜花，在坟墓四周围成矩形的扫墓者队伍中站立片刻，然后才把位置让给刚到的人。我们在墓前逗留时，有一个戴着蒲公英花冠的青年朗诵了一首显然是他自己作的颂扬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并怂恿别人也这么做。大多数人却宁愿保持沉默。几小时之后，又有一群人，其中有些人是专业作家，朗读了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其中包括摘自《日瓦戈医生》的诗句。

我漫步走入位于墓地旁边、几十年来一直为老布尔什维克保留的墓园——帕斯捷尔纳克葬在那个地方曾引起人们争议，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此。这儿的每块墓碑不仅刻着一般的出生和死亡日期，而且还刻有每个人何时加入共产党这样的忠诚记载。我对帕斯捷尔纳克的一个亲戚说，帕斯捷尔纳克和老布尔什维克奇妙地长眠在一起了，他微笑着评论说，“帕斯捷尔纳克是老布尔什维克与人民相联系的纽带。”

作家的墓，以及近旁他妻子的墓，都俯瞰着一座平缓的斜坡，坡下是一片宽阔的草地，那年春天人们已在草地上耕耘并播下了种，过了草地便是杂乱无章的古老的木建夏季别墅，帕斯捷尔纳克就在那儿度过了他的暮年。晚上，他的儿子热尼亚和列昂尼德在那儿

同朋友们聚会，沃兹涅先斯基，叶甫图申科，阿克肖诺夫等现代作家和其他许多人都前来悼念这位作家，并饱览帕斯捷尔纳克的丰富作品，这些作品中有一部分至今仍属禁书。在一个政府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而要求千百万人庆祝不胜其繁的纪念日和节日的社会中，这一纪念活动尤其显得意味深长，因为它早已为政府所遗忘，却仍被个人私下里铭记在心。

我想起另一次这样的聚会，地点是在已故的科尔奈·丘科夫斯基那位富有才华、受人爱戴的儿童文学作家的家里。在那里，人们的谈吐议论、自然而优雅的剧本朗读、诗歌的朗诵以及即兴的幽默，都摆脱了戴上枷锁的官方文化主流中所包含的那种虚假和伪善，也不带一点腐臭、涩苦味，而官方主流文化却常常使人私下感到有这种气味。人们的言语中毫无反革命的色彩，但是从中却能感到一种纯洁、正直的融洽无间，这正是俄国知识界的天然面貌。

来宾们本身就很有意思，也许这是因为丘科夫斯基一生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他不仅是一位创作了精彩儿童故事的天才作家（他的作品在俄国人中间家喻户晓，正如汉斯·克里斯琴·安徒生闻名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而且在他早年，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俄国文化白银时代的全盛期间，他就是俄国文学批评家中的佼佼者，但也是一位才思敏捷、善于非难的

后生。他一生中遇见过托尔斯泰、勃洛克、高尔基、布宁、沙利亚平、马雅可夫斯基等人物，在他终生保存的一本珍奇的纪念册上有他们草草书写的各种奇文妙句和出言不逊的题词。审查官至今还认为，这本纪念册即使在他死后也不宜出版。在晚年，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统治的年代里，在比较年轻的自由派作家（从阿克肖诺夫、亚历山大·加利奇到索尔仁尼琴）遭到保守派的攻击时，丘可夫斯基保护过他们。

那一天，他的女儿莉季娅·科尔涅叶夫娜，一位依靠自己努力而获得成功的大作家，邀集了一批不寻常的客人——有列夫·科佩列夫，一个研究布莱希特作品和德国文化的学者，他当军官时曾反对苏联部队在德国的奸淫虏掠，因而被囚在集中营中达十年之久，他在那里结识了索尔仁尼琴，成为《第一圈》一书中鲁宾这个人物的模特儿；有列夫·科佩列夫的妻子莱萨·奥尔洛娃，一个热情而有才能的文艺批评家和美国文学专家；有作家维尼亚明·卡维林，他曾是二十年代"塞拉皮昂兄弟"运动的一位领袖，曾力图使文学摆脱一切政治和社会的约束；有瓦洛加·科尔尼洛夫，一个中年诗人兼作家，嗓子沙哑，象海明威一样留着胡子；有娜塔利亚·伊丽英娜，一个优秀的、很有才干的讽刺作家兼记者；有丽娜·泽列纳娅，一个大名鼎鼎、逗人喜欢的女电视演员；有克拉拉·洛佐夫斯基，丘可夫斯基

的忠心耿耿的秘书，尽管缺少政府照例应给予的协助和支持，他还是设立并经营着这座用他自己的房子布置成的陈列馆；还有两位是年纪较轻的语言学家和批评家埃里克·汉皮拉和弗拉基米尔·格洛采尔。赴会的三代人具体地体现了文化从过去向未来的演变。

10月28日这一天，天气寒冷而潮湿。位于佩列杰尔基诺村教堂附近山坡上的小小公墓——其中埋葬着丘可夫斯基，离帕斯捷尔纳克和老布尔什维克们的墓不远——到处是一片褐色的泥浆，我们沿着小道滑滑溜溜地走着，一面用手抓住栏杆以免滑下坡去。"他去世时也是这种天气，"一个人悄悄对我说道。然而，莉季娅·科尔涅叶夫娜昂首挺身站立在墓旁。她身材高大，白发如银，凛然屹立，就象一位新英格兰加尔文派的女英雄。关于她，另一位作家是这样评述的："乡村里发洪水的时候，常常有一根标杆屹立于水流之中，标示出洪水的水位。莉季娅·科尔涅叶夫娜就象那种标杆，始终如一，坚定不移，不屈不挠。"她的描写斯大林时期的小说在西方出版；1973年秋当安德烈·萨哈罗夫遭到猛烈攻击时，她挺身而出，保卫这位持不同政见的物理学家；她在索尔仁尼琴在苏联逗留的最后几个月中为他提供了庇护所——正是由于她那种毫不屈服的独立不羁的精神，她在1974年被开除出作家协会。

在潮气袭人的墓地进行了简短的祝祷仪式之后，温暖的丘可夫斯基家庭陈列馆给人以一种令人喜悦的宽慰。一张摆满佳肴的大饭桌已为二十多位客人准备好，人们不拘礼节，一屁股坐到椅子、附有靠枕的沙发、凳子等杂七杂八的座位上。俄国人并不在乎这些，要紧的是来客和谈话内容。莉季娅·丘可夫斯卡娅的立意是，这种纪念活动不仅仅是为了纪念这位人物，而且意义更要深远些，是为了纪念一种精心培育的精神，纪念一个具有高尚优雅文化的时代，因为她特地安排了一些作品的朗读活动。一篇是丘可夫斯基 1910 年所写的论述当时几位作家的随笔，内容有趣，但笔法严谨而有力。另一篇是作家瓦西里·罗佐诺夫 1911 年的作品，文章生动地描述了丘可夫斯基作为演讲者的魅力，而后又就丘可夫斯基所说的大众宣传工具（尤其是电影）会产生贬低文化价值的腐蚀性影响这一迂腐的书生之见进行了激烈争辩，指责丘可夫斯基远远脱离了群众。

这两篇文章的朗读是一种催化剂，它促使客人们围着饭桌，就俄国白银时代文化生活中人们所熟知的基本原则展开了激烈兴奋的讨论。我不能全部听懂他们的谈话，但显而易见，人人都为那些随笔作者的语言风格之丰富多彩和六十年前争论之自由坦率而激奋。围坐一桌的作家们情不自禁地一个接一个发表了自己

的评论，并作了朗读和表演。人们举杯祝酒，纵情欢宴，丰盛的菜肴正投合大家的口味。

丽娜·泽列纳亚是一个爱说爱笑的小个子女人，有着沙哑的嗓门，一对滴溜的眼睛和一张生动善变的脸，因此看她在电视节目中扮演孩童人人都觉得有趣。她念了一篇恶作剧地嘲弄苏联宣传的滑稽模拟作品。她来的时候带了一本自己创作的故事集，其中有一篇是讽刺苏联报界对于“英雄工人”的崇拜。

她的故事是讲一个小男孩有一次帮助祖母洗涤了碗碟。这件事在少先队夏令营中传开后，马上就有人请他向全夏令营的儿童作演讲，题目是“我怎样帮祖母洗碗碟”。很快，他的事迹登上了营刊，接着又载上了校刊。这时，其他城市中孩子们的来信雪片似地飞到他的学校来，询问他如何洗盘碟，怎样做才对祖母最有帮助——丽娜·泽列纳亚以一个九岁孩子所特有的种种奇妙表情朗读着所有信件，其中夹杂着含糊的话语、咬字不清的发音、打嗝儿，还有那种装出来的一本正经样子和腼腆不安的尴尬表情，她眼光一闪一闪地转动着，一手靠着臀部，臂肘逍遥自在地撑着。客人们这时都已饮下了大量伏特加，菜肴也吃得不少，她的表演逗得他们大笑不已，有些人甚至笑得喘不过气来。

然而，宣传小英雄的运动继续在进行。别的学校请这个孩子亲笔题写洗碗碟奖状，供他们贴在告示栏

上或在校刊上发表。他的生活变成了一张大奖状。最后，一天晚上，他祖母要他再洗一次碗碟。但这位小英雄无法帮忙。他得给别人写信介绍如何洗碗碟，如何帮助祖母，忙得不可开交，因此自己已经没有时间再去干这种活了。

在所有自动承担的文化信使们中间，娜杰日达·曼杰尔什塔姆最清楚地体现了输送知识的活渠道的作用，这种知识在官方文化中早已被扼杀。她孱弱的丈夫奥西普·曼杰尔什塔姆也许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俄国诗人，他为一首十四行诗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那首诗把斯大林讽刺成"克里姆林宫的登山家"，具有"蟑螂触须般的阴险眼光"和"蛆一样肥的手指"的"杀人凶手"。曼杰尔什塔姆被消灭在斯大林主义集中营内，大约死于 1938 年——没有人能确切指出具体日期。他的一部诗集被审查官搁置了十三年，在 1973 年才得以出版，当局漠然无视俄国人民对于曼杰尔什塔姆著作的渴求心情，几乎将此书全部在国外发行。毫不奇怪，那些最锋利的诗歌，那些在苏联审查官看来过于雄浑有力或过于悲惨的诗歌并未被刊入诗集。多亏他的遗孀为使这些遗产不至消失而作了顽强的努力，那些诗歌才仅仅得以在西方出版。正如约瑟夫·勃罗德斯基所形容的，在诗人死后的数年中，她就象一只被追猎的

兔子，在国内东躲西藏，一方面避免被捕，一方面又把曼杰尔什塔姆的诗歌分散给朋友们安全地收藏好，同时她自己几乎把每行诗都背了下来，以保存这笔宝贵的财富，这样她自己也就成了一部活档案。

"假如你让我开了个头，"有一次她对我说，"我就能一直不停地背诵三小时。"那天下午她也许背不了，因为娜杰日达·亚科夫列夫娜（她的俄国朋友这样称呼她）正由于身体某种不适的加剧而声音嘶哑、咳嗽，我相信这是由于气味难闻的烈性俄式卷烟的辛辣烟草所造成的，尽管患有溃疡症，并且已达七十二岁的高龄，她依然嗜好吸这种卷烟。她老是在那儿喷吐烟雾，老是在那儿咳嗽，刚熄掉一支劣质烟卷，接着又点上一支，按俄国人的方式，把烟卷空的一段拧几转，当作过滤嘴。然而从她咳嗽的情况看来，过滤效果并不好。有时，她看上去死一般苍白、衰老，但实际上她就象生命本身一样不可扑灭——短小，精悍，象她本人喜欢自夸的那样，"吃苦耐劳——女人必须具备的素质。"

任何事情，只要能使娜杰日达·亚科夫列夫娜以诗人遗孀的身分出现，并使她回忆起同她亲爱的奥西普一起度过的苦难深重却又甘美愉快的受难岁月，就会使她十分自得。我记得，一天晚上，乌得勒支大学一位斯拉夫语专家简·迈耶虔诚地到她寓所去登门拜访，她精神大振，不住口地讲述起曼杰尔什塔姆一首长

诗的十次修改更动来，开始是凭记忆讲，后来就借助于秘藏于床下的专门资料，而迈耶奋笔疾书，我则扶住那摇晃不稳的瓷面厨桌让他好写字。

俄国青年知识分子象侍僧一样簇拥在她周围，帮她照料家务，而她只要精力允许就尽量给他们讲学、上课。当她因一条腿痛而不能起身时，她就侧身卧在床上，要不然就身裹一件褪了色的绿便服，坐在占了她那间小厨房一半面积的高背长靠椅中。她的那间卧室兼起居室里到处塞满了一堆堆杂乱无章的书籍、圣像、唱片、油画和家具——书籍多于家具——还有枯萎的花朵，那是很久以前仰慕她的友人们带来送她的，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对于他们或者对于大自然的十分珍贵的纪念，因此她难以将它抛弃。当她身边聚集了三、四人以上的时候，就不免有人会把插着枯萎花朵的花瓶碰翻。

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她以自己生动活泼的忆述在听众面前展现了一个完整的天地，其中不仅有曼杰尔什塔姆，而且有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和别利这些传奇般的俄国诗人，还有布尔加科夫、左勤科、普拉托诺夫和毕力涅克这一类作家——半个世纪来俄国文化的全部灿烂明星，她自己熟识其中的每一个人。对于她，最大的乐趣是能有机会让人证实他丈夫在群星灿烂的太空中占有杰出的地位，然而她

并不要廉价的奉承。她所喜爱的智力游戏之一，是要求别人举出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某一位文化伟人，而目的又在于贬低这个被选者，使自己再次确信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曼杰尔什塔姆，又一次证实她本人的判断：不仅俄国文化，而且世界文化都无可挽回地处于衰退之中。

她本人就象旧约全书中的耶和华一样，毫不留情地对艺术、对人作出尖酸刻薄的评价。她那毫不掩饰的评价见诸于她的两本卓越著作《反希望的希望》和《放弃了的希望》中，她的这一特点使得莫斯科知识界的许多老朋友从此永远离开了她，在莫斯科知识分子的乱伦世界里，重要的作家们不仅相互认识，而且常常有亲属关系，或相互间同他人的前妻、前夫结婚。特别是第二本书在西方出版之后，我们知道有几名具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于她把人们斥之为意志薄弱的谄媚者、告密者等等，感到忿忿不满，从而脱离了她的圈子，再也不上她家去拜访了。一些人感到愤懑的是，她是站在由于国际上的声望而相对安全的地位上来批评别人的，而别人却没有那么大的名气，因而地位也比较脆弱，无法直言不讳地公开答辩她的批评，要不然就会危及自己或者给当局提供攻击她的材料，而这两件事他们都是不愿意做的。

也许她的尖酸刻薄是年老的一种迹象。一次，我

同娜杰日达·亚科夫列夫娜谈起犹太人在苏联的遭遇问题，谈论间涉及已故的伊利亚·爱伦堡，他的著名小说《解冻》成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赫鲁晓夫文化自由主义时期的代名词。我回忆起爱伦堡的一句评论，"在一个人的祖国里有反犹主义存在时，他就无法消除作为一个犹太人的感觉。"

"这是他说过的唯一的一句好话，"娜杰日达·亚科夫列夫娜宣称。这一评语的尖刻使我吃惊，因为爱伦堡不仅是曼杰尔什塔姆一家的终生朋友，而且还在1965年主持过一次极难得的纪念奥西普·曼杰尔什塔姆的晚会。我提出我的看法：对于外国人来说，爱伦堡是一位比较复杂的人物；但她迅速反唇相讥："他的专长就在于欺骗外国人。"她的意思是说：爱伦堡欺骗外国人，使他们认为他具有浓厚的自由思想，而实际上他并没有那么浓厚的自由派色彩；而且，这至今仍是那些喜欢巴结西方人士的作家、记者、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惯用的手法。我问她现在有谁在欺骗我们，她毫不犹豫地答道，"你们正在受叶甫图申科和沃兹涅先斯基的欺骗。"

她对西方世界的评价也是同样严厉苛刻，西方文化她是相当熟悉的，因为她曾用英、法、德三种语言广泛地阅读过西方作品，并且同一批访问苏联的西方学者和作家进行过交谈。按照她的判断，T·S·埃利奥特

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威廉·福克纳是一个“伟大的散文作家”。她之所以钦佩他们，不仅是由于他们的艺术，而且也是由于他们对基督教的信仰，因为基督教徒的品性对她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她总是说：“告诉我一位在福克纳以后的美国伟大作家。”她觉得索尔·贝洛的作品单调乏味。纳鲍科夫只是一个手艺人。W·H·奥登和罗伯特·洛厄尔不配与伟人相提并论。海明威浅薄。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她认为好一些，因为他抓住了一个时代的精神，而且他爱美国。

虽然娜杰日达·亚科夫列夫娜具有百折不挠的钢铁毅力，而且当局最近几年也未找过她的麻烦，好象没有她这个人似的，但是，她丈夫于1934年3月被捕后多年积下的恐惧心理至今仍在作祟。一天晚上，当只有我和安同她在一起时，她一直不停地给朋友们打电话，同每人只说上几分钟的话，好象一个盲人在房间里摸索着找墙壁，竭力使自己确信自己与罗盘上的某个熟悉的罗经点保持着联系。对其他知识分子的抄家和审讯，特别是在1972年和1973年秘密警察严厉镇压非官方的《时事纪事》期间所公布的那些抄家和审讯，使她大为惶恐不安。“我一到晚上总是浑身战栗，但过半小时就好了，”她颇为冷静地说。我瞟了一下手表。时间是八点半。“九点以后，他们就不会来了，”她说，“他们不准在九点以后出来。”我不清楚为什么她会认为秘

密警察有九点以后不准出动的禁令。但当时她很相信这一点，就象她早些时候一直相信他们会在她写出曼杰尔什塔姆的故事并设法送到西方出版之前把她抓走一样。她说，“我写那两本书时怀着极大的恐惧，但我还是不停地干。我必须干——没有其他事可干。这是我对自己丈夫应尽的责任。”

她指责说，美国人对于别人，特别是俄国人的生活状况一无所知。她听到诗人罗伯特·洛厄尔谈过他的看法，洛厄尔读过《反希望的希望》，对于她所着意刻划的斯大林时代充满告密、镇压、审讯、怀疑、深夜捕人、令人窒息的恐惧的地狱般生活，他的看法是，这类情况世界各地都差不多，显然这里带有几分安慰她的意思。“你们美国人是高明的说谎者，”她高声叫道，脸上露出一种心领神会的微笑。

1973 年苏联犹太人知识分子大批移居以色列和西方的活动达到顶峰的时候，娜杰日达·亚科夫列夫娜喜欢提出出国流亡这个念头来取笑自己和逗弄别人。然而，她在俄国的生活根深蒂固，而且她又是那么专心致志地在履行把自己所有的关于过去历史的知识传授给年轻一代这项任务，因此，没有人把她所说的马上就要离开俄国当真。但是，许多年来她的一个宿愿是要确保曼杰尔什塔姆的全部文集最终能找到一个安全的贮藏地点，最好是放在国外某个她信得过的西方

学者那里。她对一个朋友说，了却这个心愿之后“我就死也瞑目了。”

所以人们作出了安排，由一个美国青年协助把这些手稿带出国外。娜杰日达·亚科夫列夫娜以前不敢把手稿全部存放在家里，因为她担心秘密警察会来突然袭击。因此她把手稿寄放在最得她的信任的青年学者和学生之中。于是，她把这些手稿集中起来，总共约有二十五磅重。全部手稿都集中到她住所后，就间接地通知那位美国人来取。一、两天之后，他来了，从来不愿拘泥于繁文缛节的娜杰日达·亚科夫列夫娜开门见山的谈起了这件事。

“你来了，”她躺在床上说，“我曾把全部手稿弄到这里，但又送走了。”

她那褐色的大眼睛，搜索着对方的反应，她的宽大丰满、富有男子气概的额头上的皱纹从未象现在这样深，扎成一束的头发刚整理过但还没有梳好，这一切都表明这项决定对她是一个何等激烈的考验。对她来说，同这份灌注了终生心血的遗产告别，无异同离别俄国本身一样，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痛苦。

“你是不是因为我这样三心二意而看不起我了？”她用自己所特有的、毫不退让的圣经口吻问那个青年。他摇摇头。

“我不能那样做，”这位俄国文化的活字典说道，

"这些青年人挚爱那些手稿。你知道,俄罗斯总是存在的……"她无视任何危险,认为那些手稿是属于俄罗斯的。

很难想象两个个性之间的差异还会比娜杰日达·曼杰尔什塔姆和乔治·科斯塔基斯两个人更大的了。乔治·科斯塔基斯是一个在俄国出生的希腊人,他搜集了在二十年代遭到严厉压迫的早期俄国先锋派艺术家的辉煌绘画,它们无疑都属于世界上第一流的收藏品。娜杰日达·曼杰尔什塔姆表现为大胆、亵渎、勇于对抗强权,而科斯塔基斯却从来行事谨慎,深思熟虑,处处设防,运用外交手腕,对强权曲意奉承,想方设法哄而骗之。然而,他同她一样,也是海图上所不存在的秘密文化群岛中一座重要的环礁,因为他设法把俄国被人遗忘的文化财富大量搜集起来,并且在一个敌对的制度势必加以蹂躏而将其破坏殆尽的时候,把这种文化保存了下来。

甚至在今天,按照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所有逻辑,乔治·科斯塔基斯和他私下收藏的艺术品也是不应存在的。然而,这正是苏联制度的奇特之处,它公开谴责某种东西,私下却容许其存在,因而人们可以跨进科斯塔基斯那套高大宽敞、设备良好、拥有七个房间的公寓,进入完全脱离了苏联官方艺术那个墨守成规

的标语世界的另一个天地。

我和安不止去了一次，而是去参观了好几次，每一次，我们都是一踏进门顷刻之间就为现代化艺术的魅力所征服——这在一个社会生活如此缺乏艺术美、缺乏色彩的国家里真是光辉夺目，异彩四射。近三百幅作品简直照耀得整个公寓五彩缤纷，每一个房间，每一面墙壁，每一寸空间，无不光彩夺目。作者有卡齐米尔·马列维奇，瓦西里·康定斯基，马尔克·恰加尔，弗拉基米尔·塔特林，柳鲍夫·波波娃，伊凡·克柳恩，克利门特·里特科，亚历山大·罗德钦科，等等，等等。这里，满墙都挂着恰加尔以热情奔放的木刻风格描绘的画幅，画的是蓝色的幻想和神话中的乡村人物。那里，是九幅康定斯基的作品，包括那幅著名的抽象派幻觉画《红场》。对面，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油画，这是马列维奇在摆脱立体派，转而创造自己的几何图形至上派、开辟一条新的艺术道路的决定性时刻所绘制的一幅关键作品。

不拘是俄国人或外国人，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六十三岁的希腊人收藏了价值好几百万美元的俄国至上派、构成派、立体派和抽象现代派的艺术品。但是象普林斯顿的弗雷德里克·斯塔尔这样的艺术专家们则把它的影响同1913年在纽约举行的著名纹章展览相比拟，那个展览首次打开了美国人的眼界，使他们看到了

欧洲艺术的新趋势。"外国人看到我的收藏品后感到兴趣的是,"科斯塔基斯说道,"他们发现,俄国人的某些绘画艺术要比〔西方〕领先三十、四十、五十年。俄国人在1917,1918,1919年做的事情,美国人到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才做到。"

不仅外国人感到惊讶,就连科斯塔基斯自已也感到诧异。我记得一个寒冷的冬日下午,科斯塔基斯在引导一群西方使馆人员参观他的收藏品时,曾回想起他第一次瞥见奥丽加·罗佐诺娃于1917年作的单条纹白色和绿色抽象派图画时满怀喜悦的心情。"我的心在狂跳,"他说,"就好象发现了一艘造于1917年而一直藏在某人棚子里的火箭宇宙飞船。不可能啊!因为人们造火箭宇宙飞船才不过是十年或十五年前的事。但标记明明在那儿,的确是在1917年画的。"

据科斯塔基斯的看法,克柳恩所画的在几何图形上加圈圈和一层层半透明的颜色互相穿叠的至上派图案,预示了四十年后美国艺术家所作的某些实验。在一张床上他挂了一幅罗德钦科所作的满画面都是点滴溅泼的绘画,他感到这幅画的创作日期比杰克逊·波洛克最初作这类尝试的时间还早。"不要以为我是把俄国艺术捧得这么高,而把美国艺术贬得那么低,"科斯塔基斯说,同时把一只健壮的手高举过头,又把另一只手摆在膝部,"因为在今天,最重要的艺术——最令人

感兴趣的东西——是出在美国。不过，巧得很，有些东西最早却是出在俄国的。”

从他的体态外表来看，乔治·科斯塔基斯似乎不象是一个收藏了如此光辉夺目的现代艺术品的人。任何人如果有一块调色板，都会本能地想用柔和的棕色和茶青色把他厚实的肩膀、黝黑的头发、下垂的眼睛和粗大的双手形象地描绘出来。作为一个人，他也是个与众不同的复合体。我觉察到，在他对于光辉灿烂、不落俗套的艺术所怀有的强烈爱好中，不仅融合着一个收藏家的天然本能（这是他从生意兴隆的烟草商父亲那里继承来的财富），希腊商人对于价值的敏锐眼光，以及俄国人不具备的、作为一个受到保护的外国人所享有的特殊地位（从 1943 年以来他就一直为加拿大大使馆工作），而且还掺和着那种选区小政客所特有的天生稳健、谨慎的机警才干，对于主要政治风向研究有素，能够从既成权力机构中找到同盟者帮助他避开暗礁。

似乎荒谬的是，科斯塔基斯对于艺术的热爱竟是在二十年代中期先锋派艺术受到扼杀、康定斯基和恰加尔逃往西方的时候产生的。他十三岁时，参加了普希金广场正教堂的儿童唱诗班，伟大的沙利亚平有时也在这里歌唱。“有时候，我没有工夫回家，就睡在教堂里神父们的道袍上面，”他说。“那些道袍、圣像和绘

画都非常美丽，引起了我对于艺术的爱好。”

差不多也在那个时期，他的收藏家本能也得到了发挥。他的姐夫，希腊梅塔克萨斯贵族家庭的一员，去世时给自己的遗孀留下了一套珍贵的邮票。没有人识得这套邮票的价值，于是就给了年轻的乔治，他赶忙去把它卖掉，好凑钱买一辆自行车。邮票商店外边的一个日本游客“把他钱包里所有的钱——足够买六辆自行车——全部给了我，”当时他大吃一惊。科斯塔基斯在二十二岁时，就已经热衷于收集古玩、俄国古老银器以及法国和荷兰传统名家的绘画了。在战前时代，那些旧的沙皇贵族家庭由于财富已被剥夺，就变卖他们藏有的艺术品，因而莫斯科市面上充斥着廉价出售的珍贵艺术品。

科斯塔基斯生活的显著改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传统艺术品开始使他生厌的时候。“逐渐地，我对所有那些色调灰暗的东西感到厌倦了，”一天下午他一边喝着极浓的清咖啡一边解释道。“我希望在我周围有一些色彩。对我来说，光辉灿烂的现代艺术就象药物一样。当我感觉不舒服的时候，我可以到房间里来，坐在这些艺术品中间，这样就会把我的病治好了。我还想干些新奇的事情。我知道任何人都能收集荷兰艺术大师的作品。我对自己说，‘罗浮宫里摆满了这类东西，而且每一个城市都有四、五所古典艺术博物馆。’

我一直希望干一点事业——写一本书或者发明一架机器。后来，我偶然见到两三幅先锋派绘画。在我看来，它们充满活力而且色彩丰富。我未费分文就弄到了手。我把它们同我收藏的其他绘画挂在一起，而这就好象我一直住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忽然照到了太阳一样。”

他不仅别出心裁，大胆敢干，而且还很幸运。那时，正是斯大林的亲信安德烈·日丹诺夫在所有艺术领域中大力扑灭形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时代。“愚蠢的希腊人——在收集破烂货！”这就是科斯塔基斯回忆当时别的收藏家在谈到他时所用的语言。他开始象个侦探似的追踪寻觅先锋派艺术品。有些绘画是从艺术家的遗孀和家人那里得来的。另一些，象他所心爱的奥丽加·罗佐诺娃的作品，则是认为抽象派艺术品没有价值的收藏家送给他的。罗德钦科制作了六件现代派活动艺术品[1]，由于在斯大林统治下害怕被人发现而毁了五件，第六件幸存下来，藏在一个大衣橱的橱顶上，作品已经坍塌，科斯塔基斯把它修复了。波波娃画在胶合板上的一幅抽象画，在一间牲口棚里挂了好多年。另一幅画原来搁在某人厨房桌上的油布底下，不是出

[1] 活动艺术品(mobile)，一种抽象派雕刻品，其活动部分可由机械或风力驱动。——译者

于无知，就是故意藏在那里的。

当科斯塔基斯必须付款的时候，买价也总是十分低廉。马列维奇的一件大型立体一至上派作品，现在可能要值到一百五十万美元，而他只花了约四百美元。一幅可爱的恰加尔静物画《桌上紫丁香》也只出了这个价钱，而波波娃的一幅立体派作品只花了此数的一半。他解释道，在那些年月康定斯基和恰加尔等人已经闻名于世，但他们的作品并未得到充分赏识，而他自己也就是在这时候扩大了收藏范围，从搜集他喜欢称之为俄国先锋派的元帅和将军一级的作品扩展到"上校、上尉以至列兵级"。他估计总共有三百名左右画家参加了1910—1925年的先锋派运动，而现在他收藏有约四十名画家的作品。

在西方人看来，这类艺术品，除一幅外，都不带有任何政治上煽动性的东西，但俄国保守分子却能从任何非正统作品中发现反叛的含义。那幅例外的作品十分醒目，是克利门特·里特科在列宁逝世那一年（1924年）所画、题为《起义》的卡夫卡式预言性油画。它令人寒心地表现了即将来临的赤色恐怖和斯大林极权主义统治以及刚刚过去的国内战争。它象一幅政治圣像，以血红色为背景，在一个菱形图案里画着革命的主要人物——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在这个中心画像的周围，行进着阴沉忧郁的丧葬乐队和

一卡车、一卡车正在向大街上手无寸铁的人民开枪射击的军队。然而，在其余收藏品中唯一看得出的政治感情，如果有的话，也不过是俄国革命时期艺术家们充沛的理想主义。至于这批收藏品的命运，则仍处于苏联所特有的一种吉凶未卜的境地。

这种艺术本身仍受到当局禁止。但科斯塔基斯已经小心谨慎地在不受官方干涉的情况下向各种外国人展示了他的收藏品，从常驻苏联的外交官员到艺术专家和一些高贵的来客，如马尔克·恰加尔、尼娜·康定斯基、戴维·洛克菲勒、艾夫里尔·哈里曼和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等人。他也曾倍加小心地让一些经过挑选的俄国人观看这笔丰富的遗产。有时一次竟多达九十人，他们来自莫斯科建筑学院、普希金博物馆、特列齐亚科夫美术馆或列宁格勒俄罗斯博物馆。在他的私下展览中，科斯塔基斯非常仔细，不使俄国人同外国人混在一起观看。由于他陪着观众参观，并对这些艺术品进行讲解，或者在他那位金发妻子齐娜唱俄国古老的浪漫曲时他轻柔地弹奏伤感的六弦琴，因而科基塔基斯的事业十分兴旺。1972年6月他把克柳恩和波波娃的二十七幅立体派和抽象派绘画出借给库尔恰托夫物理学院一些对现代艺术感兴趣的高级科学家。另一回，他还在该学院组织了一次米哈伊尔·拉里昂诺夫作品的差不多是秘密的展出。

他那坚韧不拔的目标是要争取人们对于先锋派艺术的承认，首先是在国外，然后再通过西方来影响莫斯科。1959年他取得了第一个突破，当时文化部里一些同情他的官员帮助他把五幅绘画送到了在西德举办的一个恰加尔展览会上。从那以后，他收藏的其他绘画曾一小批一小批的短时间借给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伦敦的塔特美术馆、洛杉矶县立美术博物馆和日本、意大利、德国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美术馆，但苏联当局一直拒绝把全部收藏品同时借出。一些苏联官员，包括他的秘密庇护人、已故文化部长叶卡捷琳娜·福尔采娃在内，对此也很满意，因为他的收藏品在国外的展览以及在莫斯科有限范围内的展出，在既不危害官方制订的国内艺术标准而又增强了苏联在西方的声誉的情况下，对于宣传俄国的艺术成就颇有帮助，作为报酬，他们容许科斯塔基斯出售某些次要的现代派画家作品，可能还有一部分他收藏的优美而贵重的古典宗教圣像。

近年来科斯塔基斯以审慎的保守主义手法玩弄着艺术政治，这是他对某些当局所作的明显迁就的一个方面。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他曾收集过奥斯卡尔·拉宾，季米特里·普拉文斯基、瓦西里·西特尼科夫等当代非官方艺术家的作品。那一时期，好奇的西方人经常靠着科斯塔基斯的指引同处于地下的背离官

方准则的艺术家们接触。但随着他的半官方形象的增长，科斯塔基斯断绝了同这些艺术家的联系，并卖掉了他们的许多作品。当1974年9月他们大胆地试图举办一次室外艺术展览时，科斯塔基斯私下里对他们的对抗手法感到吃惊，害怕这会危及他自己的事业。"这种做法对于艺术无所裨益，"他抱怨说。有一个时期他停止对俄国人展出他自己的收藏品，直等这阵"丑闻"之风吹过。

西方人士认为苏联以政治高压手段扼杀了先锋派运动，他也起而争论辩护。"那是不真实的，"一天下午他对一群人断言道，其口吻与他自己过去所说访查隐藏的艺术品很困难多少有点自相矛盾。"先锋派把绘画送到国外去。他们也在国内展出。他们是有自由的。但人们不懂得他们的艺术。没有人重视或者赏识他们。世界各地——英国、美国、法国——人们对先锋派艺术都失去了兴趣。立体派被接受了。野兽派也被接受了。但先锋派却没有。只是在最近十年、十五年期间它才重新时兴起来。"

他对俄国艺术成就的热心鼓吹和他避免冒犯当局的审慎努力，帮助他赢得了官方的几分宠爱。福尔采娃女士在世的时候曾使科斯塔基斯相信，1977年特列齐亚科夫美术馆开幕时他所收藏的部分作品可以在那里陈列。不管她是否能够获得必要的共产党领导的批

准，她的死亡已经引起了新的不确定因素。作为科斯塔基斯的最后希望，他谈过某种安排，即：准许他保留和出卖一小部分他所收藏的绘画当作他留给他家人的一份遗产，而他则把其余部分捐献给俄国。“我不愿让这批收藏品遭到毁灭，”一天下午他以一个日渐衰老而又处于棘手困境的人的那种诚挚忧虑的口吻对我说。“当俄国人准备承认这种艺术的时候，我就把它献给国家。”

还有一种宣传工具，虽然它同科斯塔基斯的收藏品比起来文化造诣要低一些，但在知识分子的私人范围里却具有远为广泛的影响，这种宣传工具就是音乐——地下民谣歌手们的音乐。在俄国，把不可能出版的著作私下流传的做法远在普希金时代就已经开始。一百五十年前，当沙皇及其审查官禁止普希金某些诗歌出版时，普希金就是这样干的。俄国人把这叫做“萨米兹达特”，其字面意思就是“自己发行”。随着发明了灵巧的手携盒式录音机的电子时代的来临，“自己发行”经历了一番革命，意识形态警犬的工作就变得无限复杂了。一个携带吉他的作家或幽默家可以在一个小型聚会上向朋友们唱一些逗趣的、政治上不正派的歌曲，这时，如果有人带了一盘录音带或者一个盒式录音机（俄国人称之为磁带录音机），不经检查的

复制过程就立刻开始了，其流传之广是永无止境的。俄国人讽刺地把这称之为“磁带发行”。通过这种宣传工具，苏联社会中非法的现代派游吟诗人发展了数以百万计的听众，不仅是心怀不满的青年知识分子，连技术专家，甚至政府和党的官员都暗中成了它的赞赏者。

自从1960年前后，赫鲁晓夫把人们从斯大林的集中营里放出来，“磁带发行”开始出现以来，为人们所熟知的民谣歌手约有几十名。在地下音乐界中最负盛名的是布拉特·奥库贾瓦、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和亚历山大·加利奇。

奥库贾瓦现年四十多岁，是一个享有相当地位的自由派作家和诗人。他写的《自由的吞噬》是一本滑稽、淫猥和极其不同凡响的历史小说，书中描写十九世纪俄国所谓十二月党人革命家时，不是按照苏联宣传的陈词滥调把他们描绘为一批大无畏的英雄，而是描绘成一群混乱沮丧的乌合之众，尽管他们具有值得钦佩的民主动机。他所创作的地下歌曲也同样表达了一种异端的忧郁感情。作为一个负过伤的战场老兵，奥库贾瓦作的许多歌曲和官方赞词截然不同，它们描述了战争中漫无目标的暴行虐杀。“不要相信战争，孩子，”一首歌曲这样写道，“那是悲惨的，孩子，象刑具夹脚一样的难受。你奔腾的战马成就不了任何事业，结

果只能使你自己身中百弹而已。”[1] 奥库贾瓦有好几次因他那“不文明”的民谣而受到苏联意识形态专家的责骂，但他仍继续写作，直到1972年6月由于“反党行为和拒绝谴责在国外出版他的著作”被开除出共产党为止。从此以后，他的活动就比较少了。

迄今，最受人欢迎的民谣歌手是维索茨基，一个愉快活泼、头发黄中带红、全国闻名的电影明星和莫斯科自由主义的“塔甘卡”剧院的演员，我曾在该剧院看过他的几次演出。维索茨基娶了法国电影明星玛丽娜·弗拉迪，他已经成为所有青年人的偶像。他本人年轻时曾在劳改营服刑过一段时期，赫鲁晓夫时代被释放，在电影中扮演了旨在鼓舞理想主义的苏联青年的角色——登山运动员、地质学家、带头参加征服西伯利亚的爱国者——从而同政府言归于好、相安无事。现在刚四十岁出头的维索茨基，在电视或在“塔甘卡”剧院里扮演哈姆雷特、扮演布莱希特的《伽利略》里的主角以及莱蒙托夫名著《当代英雄》里的皮乔林，成了一位名人。

维索茨基巧妙地奉行了一条矛盾的路线。在他的正式发行的五张唱片里有歌颂登山运动员、友谊、宇宙

---

① 吉恩·索辛译：《磁带发行：持不同政见者的未经审查的歌曲》，载鲁道夫·L·托克斯编：《苏联国内的不同政见》（巴尔的摩，1975年）。在摘录奥库贾瓦和加利奇的这几段歌词时，我引用了索辛的优美译文。

飞行英雄和战死者等健康的苏联歌曲。即使是在他非正式的演出节目中，也穿插着嘲笑博比·费希尔、加拿大职业曲棍球员粗野作风等等幽默曲调，所有主题都有一定程度健康的爱国主义思想，他能够在音乐会上运用这些曲调，大群大群的苏联年轻吉他手也能在大街上平安无事地演奏。越是在私下的场合演出，他的胆子就越大，特别是在一群演员演出之后聚在一起饮酒到深夜的情况下。一个作家曾赞不绝口地对我说起维索茨基有一段经常演的拿手好戏，内容是模仿一位说话愚蠢、不合文法的工厂经理的讲话，这段表演十分投合那些瞧不起"我们农民出身的头头"的莫斯科知识界人士的胃口。但他在歌曲里很少搞得那么过分。维索茨基有一个玩弄音阶上"声音的不平等"的曲调，嘲弄了苏联官场的等级意识。另一首《硬通货商店民谣》讥笑文化名流成群结队地带着证明书前往特殊商店购买那些用普通卢布买不到的毯子、皮衣和鱼子酱。还有一首以神话式的人物《谢廖什卡·福明》为题的民谣，它讥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安居大后方，却授予自己以国家最高勋章的官员们：

当我为了卫国保家付出鲜血的时候，
某件事总使我怒火中烧：
我在为谢廖什卡·福明流血。
而他却在后方，没有损伤一根毫毛。

战争终于过去，
重担从我们肩头卸下，
我遇到了谢廖什卡·福明，
看哪——苏联英雄勋章，
在他的胸前摇晃。[1]

维索茨基有许多描述战俘营凄惨生活和战争时期服刑队的命运的歌曲，还有一首大胆的《疯人院之歌》，描述了一个被放进疯人病院，受到真正疯人威胁的、健全的人所身受的创伤——“如果能够把我们的不幸生活告诉果戈理，连果戈理也会瞪着眼睛注视它，绝不信以为真。”但机警圆滑的表演者维索茨基掌握着一种提供暗示、旁敲侧击的诀窍，他故意不说明这些被放进劳改营式精神病院的囚犯是犯的政治罪行还是由于进行别的破坏性较小的活动。这就使得他的许多歌曲拔掉了芒刺。

象奥库贾瓦一样，他曾公开受到过惩罚，1973年因在诺沃库兹涅茨克于四天之内举行十六场音乐会（规定是一天只能举办一场）而被痛斥为“牟取暴利”，并禁止去法国探望或陪伴他的妻子。但由于机灵圆滑，他总能设法跳回来，他赢得的广泛拥护和那些效忠

---

① 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谢廖什卡·福明》，见《地下民谣》，原载《共产主义问题》（华盛顿，美国新闻署，第19卷，1970年第6期，第28页），米沙·艾伦选译。

当局的民谣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他。"他是很聪明的，"一位女记者说。"维索茨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知道限度。克格勃本身也收集他的歌曲。他的所有关于集中营的歌曲，他们都知道。他们喜爱他所使用的窃贼行话——他们自己就是窃贼。维索茨基懂得一个人可以在这里或那里批评不同的事物，但不能批评这个制度，不能批评党，也决不能触及他们(头头们)个人。他的歌曲不是政治性的，而这正是加利奇完蛋的原因。"

同维索茨基不一样，亚历山大·加利奇属于老一代人，他没有进过集中营，相反，在前三十年他一直是个成功的作家，幻灭和内疚促使他加入了地下民谣歌手的行列。他是我唯一亲耳听过他演唱、并亲身结识的人。他的讥讽是最刺人的，他对苏联社会的看法最阴郁，他的主题思想也最大胆。他生于1918年，曾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学校受过演员训练，后来成了一个成功的剧作家。他创作的十部剧本和几部电影剧本曾被苏联官方刊物描述为歌颂"苏联青年的斗争和创造性劳动的浪漫史诗"，并在他失宠前上演过，但他的少数最佳的原稿却未能通过审查。他的地下民谣在道德方面持有尖锐鲜明的不同见解，从而使他后来获得"歌唱界的索尔仁尼琴"这个称号。

加利奇前额光秃、胡子翘起，看起来象是一个更加

壮实高大、也更显得悲哀的泽维尔·库加特[1]。他一边弓着腰弹他的小吉他，一边用柔和而不合调的男低音唱着歌，他能够把一间烟雾弥漫、挤满汗流浃背人群的房间变成一个政治性的夜酒店。“首先，我有一桩家务事，”他会开始说。“如果有人给我打电话，请告诉他们过一个或一个半小时再打来。”这种显然是叫克格勃等加利奇唱完他的政治性歌曲再说的暗示，引起了一阵哄笑。接着，他就会冷嘲热讽地唱起“双手清白的民谣”来，这民谣嘲笑苏联公民的政治命运就是象牛那样履行“咀嚼、哞哞叫并俯首倾听”的义务。当西伯利亚劳动营的营火正在燃烧，苏联装甲列车进驻布拉格附近的时候，加利奇把俄国人描绘成正在背诵语法课的小学生：“我不管，你不管，他不管……”

加利奇的吉他演奏带有朴素的象征音调，它常常对讲故事的人起着一种音乐烘托的作用，而故事里有许多对于公共生活中的官僚主义语言的巧妙模仿、历史的类比和下流社会的黑话。为了把某个形象塑造得维妙维肖，加利奇会荒唐地把一些人物凑在一起来讲，例如，把斯大林当作耶稣诞生故事中的希律王，把约翰·萨巴斯蒂安·巴赫硬扯作忍受苏联社会日常生活折磨的创造性个人的象征。他曾动人地演唱过一些关于华沙的反犹太主义、开往奥斯威辛的列车以及斯大

[1] 泽维尔·库加特(1900—)：美国爵士音乐家。——译者

林集中营里的囚犯的歌曲。但加利奇最大胆、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演唱苏联社会中身受压迫的小人物，而且也演唱他们头上那些高官厚禄、有权有势的压迫者——这是向当代的领导阶层挑战。

他在某几首歌里暗示斯大林主义作风并未消亡、刽子手还在缅怀以往的日子。在一首怪诞的幻想曲《夜巡》里，他虚构斯大林的雕像和成千个其他的塑像在深夜里复活，于鼓声中在沉睡的城市里大踏步行走。加利奇的另一首富有特色的抒情诗攻击那些沉默不语、随波逐流从而青云直上、飞黄腾达的野心家：

让别人在失望、侮辱
和饥寒交迫中号叫吧！
我们懂得沉默的好处更多。
理由在于——沉默就是黄金。
发财致富之道在此，
名列前茅之路在此，
做刽子手的诀窍也在于此！
只要保持沉默，保持沉默，保持沉默。

加利奇在他一百多首地下歌曲节目里塑有一些常见的苏联人物形象。就在我听到他歌唱的那天晚上，人们要求他唱一些关于"车间主任、多枚奖章获得者、市苏维埃代表"克列姆·彼得罗维奇·科洛梅采夫的歌曲。在一首民谣里，克列姆·彼得罗维奇请求上级

官员给予专门奖赏，因为他的厂出色地完成了1980年之前的全部经济计划，但上级官员请求原谅说，公开授奖太令人为难了——西方人会大叫大嚷起来，因为这个厂生产的是带刺铁丝网！俄国人所喜欢的另一个关于克列姆·彼得罗维奇的恶作剧故事，生动有趣地讽刺了在各种集会上要求每一个人都作出千篇一律的宣传性发言这一现象。在加利奇表演的这个故事里，克列姆·彼得罗维奇接到一份弄错了发言人的演讲稿，稿子是为一位妇女准备的，可是他并未察觉就兴致勃勃地念起来：

以色列黩武主义者，嗯，
是全世界人所熟知的，
作为一个母亲，嗯，和一个女人，
我要求让他们作出交代。

克列姆·彼得罗维奇大吃一惊，他一面把这个女权主义者的呼吁一节一节地念下去，一面察看听众和党的官员们的反应，但他发现他们由于听的发言太多都已经心不在焉，竟没有注意到这个错误。事后，党的书记夸奖了他，“你讲得很好——象一个工人的样子。”

令人惊异的是，1968年初加利奇竟大胆地在当时有自由派避风港之称的新西伯利亚科学城的科学家之家举行了一次——只此一次——公开的群众音乐会，

有两千五百人听他演唱了三个多小时。他告诉我，他演唱的歌颂帕斯捷尔纳克的歌曲，关于斯大林主义和克列姆·彼得罗维奇的奇遇等政治性歌曲，受到了热烈欢迎。但他说，事后他被作家协会的头头召去，他们不准他再公开演出。“哦，并没有人禁止我，”他笑着说。“你是知道他们的伪善作法的：‘我们不提倡这个。你的心脏不好，亲爱的朋友。不必这么劳神。……’”

然而，加利奇的垮台却是由于1971年12月的一次私人宴会，而他在那宴会上根本没有演唱。据加利奇说，在青年演员伊凡·迪霍维奇内与政治局委员季米特里·波利扬斯基的女儿金发的奥丽加·波利扬斯卡娅的结婚宴会上，维索茨基唱了加利奇的歌曲。波利扬斯基是个著名的极端保守派，据说他对维索茨基自己的轻松曲调倒很欣赏，但对加利奇尖锐的讽刺性歌曲却大为不满。出人意外的是，波利扬斯基的儿子，一个海军军官，也试图为之辩解，说这些歌曲并不怎么异常，就连海军军官也爱唱。但他的辩解反而使波利扬斯基更加怒不可遏。

据加利奇说，波利扬斯基在当天夜里就打电话给党内负责文化事务的主要警犬、彼得·杰米切夫，不出十天，就在12月29日，他们就借口加利奇宣扬犹太复国主义，怂恿人们移居以色列，拒绝声明在西方出版的加利奇歌曲与他无关，将他开除出作家协会。他的电

影剧本写作权也随之丧失。他的影片有些被撤销，有些则抹去了他这个编剧的名字。“我不仅成了不可接触的人，而且还成了不可提及的人，”加利奇后来抗议说。他失业了，靠国家发的六十卢布一个月的残废抚恤金生活，这笔抚恤金是由于他所患的心脏病发作过几次而发给的。1974 年初，由于忍受不了黑名单的威胁，加利奇曾申请护照去纽约看望一个表兄弟，但政府出于“意识形态上的理由”拒绝了他的申请。在他给国际人权委员会的一封公开信里，他抗议说：除了有权“承认自己完全没有权利，承认自己在五十四岁时生命就已实际终止，只能领取残废抚恤金并缄口不言”之外，他的一切权利都被剥夺光了。但由于国际上为他的事件发起了一个运动，结果他终于在 1974 年中期获准移居国外。

十七 宗　　教

索尔仁尼琴和俄国的俄罗斯民族特性

单凭才智并不能理解俄国。
对她也不能用常情去推测。
她具有独特的性格。
你必须相信俄国的一切。

费奥德尔·丘切夫
（十九世纪斯拉夫主义诗人）

西方虽然已对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不再着迷，但为时已过分晚了一点，这说明西方早先对于他这个人、对于俄国的俄罗斯民族特性是有所误解的。索尔仁尼琴辜负了西方对他的期望。这个英勇的持不同政见者曾经写过一些作品来揭露一个警察国家的恐怖统治，然而他竟然嘲笑民主，这就使人们感到困惑不解了。他是这样一个道德上的绝对主义者，总是念念不忘他的神圣使命，要把斯大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从俄罗斯祖国清除出去，因而，他在外国人已经读腻了他的

作品时，还是不停地把自己的著作连篇累牍地发表出来，这就令人厌烦了。人们感到震惊的是，当他发表自己的宣言时，他所提出来的社会模式并非是一个参加现代世界大家庭的、对外开放的科学化的城市式社会，而是一种复古循旧的神秘幻想，一个妄图闭关自守、脱离二十世纪而重建神圣俄罗斯的迷梦。西方人士总是很敏锐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自己所想象的那种左翼的不同政见上面，而往往容易忽视俄国的右翼不同政见，因而感到索尔仁尼琴的治世之道太陈旧了。然而他那种带有宗教性的俄罗斯文化优越论的性格，却清晰地表现了一种对于许许多多俄国人有着强烈吸引力的独特的思想和感情。

我第一次同索尔仁尼琴见面时，就发现他本人根本不象我原先所想象的那样。持不同政见者照说是不该专横傲慢的，然而他那种俄罗斯式独断独行的性格几乎在会见一开始就显露出来，使这次采访成了我一生中最困惑为难的一次。

那次我们见面是在1972年初，当时这种会见并不是没有危险的。因为他当时是生活在这个极权主义国家的虎口之中，孤立无援，但却有勇气坚定无畏地维护他作为一个作家所应享有的全部自由；当苏联当局禁止出版他的作品时，他竟敢向整个苏联国家机器挑战，在国外发表诸如《癌症病房》、《第一圈》等作品。由于

意识形态上的异端邪说，他已被开除出作家协会。同他接触就如同冒险进入政治上的放射性区域，那后果是难以逆料的。

为了避免走漏风声，不让当局知道，我们那次会见在事先作了周密谨慎的暗中布置。双方通过持不同政见的生物学家若列斯·麦德维杰夫进行了秘密磋商。因为恐怕被人窃听，我们从来不在室内提到这件事。麦德维杰夫本人偶尔也使用隐语。同我合作进行这次采访的《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凯泽有一次无意中听到麦德维杰夫在电话中对某人讲，他忘了拿公文包。他注意到麦德维杰夫身边带着公文包，就问："这是怎么回事?"麦德维杰夫说，这是约定与索尔仁尼琴在3月30日星期四见面的暗号。一天夜里，索尔仁尼琴不在莫斯科，我们先走过那幢将要作为会见场所的奶油色旧公寓，作了一次演习。我还和凯泽一起在列宁体育场附近一个冷冷清清、游人绝迹的室外溜冰场溜冰，以便秘密准备会见时要提的问题。

西方人士对于索尔仁尼琴在苏黎世的流亡生活已经听得很多，兴趣也淡薄了，因而他们忘了当年他在苏联所过的那种提心吊胆、时刻都有生命危险的生活——他时刻都在担心，不论哪一桩违抗当局的新行动都会使他又一次被逐回西伯利亚，慢慢地死在那里。他由于战时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批评了几句斯大林而

遭到逮捕，以后就在西伯利亚受到八个年头的折磨，患上了癌症。

在那些日子里，索尔仁尼琴是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人物。几乎没有人能见到他的面，更别提去访问他了。然而他在1971年12月的寒冬里光着脑袋参加了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葬礼，他那样落落大方，一言不发的情景轰动了一时。特瓦尔多夫斯基担任《新世界》杂志主编时具有自由派思想，就是他说服了赫鲁晓夫批准发表索尔仁尼琴第一部扣人心弦的作品——描写斯大林时期劳动营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3月中旬，索尔仁尼琴赴莫斯科音乐院，出席了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的音乐会，人们又象触电似的骚动起来。这位大提琴家曾因收留索尔仁尼琴在他的别墅里避难而触怒了克里姆林宫。当时人们正为了那部刚在俄国出版的《一九一四年八月》争论不休。索尔仁尼琴又进行挑衅，决心要在莫斯科举行一次不公开的受奖仪式，接受他于1970年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金，于是一场新的对抗就要爆发了。他一直不敢出国去领取这笔奖金，生怕回国时莫斯科会关上大门，不许他入境。

按照事先的安排，3月20日中午前几分钟，我和凯泽在离高尔基大街十二号第一六九公寓不远的一家食品店里碰头。妙就妙在这家商店不是坐落在高尔基

大街上，而是开设在大街后面一条街上。当我们沿着横街慢慢踱过去时，我们注意到大门口有一个穿制服的警官。我们俩就象盗窃银行保险箱时被当场抓住的窃贼一般愣住了。我们早已料到会有人监视，但没有想到会有人站岗。有的记者曾因接触了一些次要的持不同政见者而遭到克格勃的审讯、或被驱逐出境。我们可不愿连他本人都没见到就被抓住了。

“他们怎么会发觉的？”凯泽悄声问道。

“不知道，”我迟疑地说。“可能他们只是在跟踪他，他从罗斯特罗波维奇的乡间别墅‘带来了’一个尾巴。”

我们继续向前走了几步，然后决定回转身来，绕过街区，希望那个警察不过是凑巧呆在那儿的。真走运，我们从胡同里出来的时候，那个警察已经顺大街走开了，只有一个老奶奶颤颤巍巍地走过大门口。我们溜了进去，飞步奔上半段楼梯，按了门铃，等了很久。

索尔仁尼琴亲自来开门——不过只开了一条几英寸的缝。他那乌黑敏锐的眼睛急切地向外窥看，仿佛是在探索，核对和质疑。我可以看到他脸上红棕色的大胡子和身上的灰色松软套衫。他看上去很象我见过的那几张照片，只是显得更高更大。我们慌慌张张地低声告诉他，是麦德维杰夫叫我们来的，这时他始终拴着门上的锁链。接着，他相信了我们的话，就迅速放下锁链，开了房门，让我们进去，然后又迅速地关上门上了

锁。他这种搞秘密活动似的警惕性一直没有松懈过。将近三年以后，我在苏黎世见到他的时候，他仍然保持着警惕。即使是生活在瑞士人中间，他还是在院门上装了特制的锁，他对打来的电话也存有戒心。

进了室内，他热情地欢迎我们。他把娜塔利亚·斯维特洛娃作为他的妻子介绍给我们。她是个黑头发圆脸蛋、眼睛又大又温柔的女人，比他要年轻二十岁左右。他当时是五十三岁，而她只有三十二岁，是一位数学家。我们这次会面的地方就是她家那所轩敞的旧公寓。从法律上来讲，她和索尔仁尼琴尚未结婚，因为苏联法院采取十分不正当的拖延手段不让他和第一个妻子离婚。最后离婚终于得到批准，但那时索尔仁尼琴和娜塔利亚已经极其亲密了。他一切都公开地依赖她：请她出主意、帮助搞研究工作，并给予精神上的支持。她温柔和蔼，平易近人，在这方面要比他强得多，然而在具有这种可爱品质的同时，她也和他同样具有一种内在的顽强毅力，打心底里藐视苏维埃制度。1974年索尔仁尼琴被迫流亡国外，她留在国内搜集他所保存的文件、资料，然后带着这些文件、资料和他的三个儿子安全到达瑞士。在当时那几个紧张的星期中，我往往看到她的这种品质。每天晚上，她一家人聚集在厨房里收听西方电台报道索尔仁尼琴在一批记者的尾随下到达挪威的消息；他们也向我和其他记者询问

有关西方的事。由于一家人吉凶未卜，她精神上的负担十分沉重，但是她毫不动摇。她顽强地竭尽全力搜集一切对他有用的资料，直等到一切都安排妥当，才肯离开俄国。

虽然，娜塔利亚为索尔仁尼琴创造了他终生渴望获得的东西——即家庭幸福感。在他出生以前，他的父亲就已经去世，而他在第一次结婚后又没有生过孩子。现在，他不仅从文学工作中，而且从传衍子息的乐趣中汲取了力量。在他痛苦地被驱逐出境刚到达西德海因里希·伯尔的家里时，我凑巧打个电话找到了他，他一开口就问我："你今天见到我家里的人吗？几小时以前见到的？他们都好吗？"他要我答允把他安然无恙的消息转告给他家里的人。我转达了这一消息后，娜塔利亚说，自从他被捕以来，这是她第一次相信他还活着，没有被枪杀，也没有再被押解到西伯利亚去。1972年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名叫叶尔莫莱，这个刚满十五个月、正在学走路的金发孩子在地上玩耍，咿咿呀呀地跟父母学讲家庭口语。索尔仁尼琴为他的儿子感到十分自豪。

我们见面后不到几分钟，他那种平易近人和不拘礼节的态度就消除了我的顾虑，我本来以为这位当代俄国文豪会使我敬而畏之的。索尔仁尼琴具有热情和魅力。他的身体也比我原先想象的健康得多。他从椅

子上一跃而起，象运动员那样轻捷地从屋子那边走过来。一望而知他是个精力旺盛的人。对于一个遭受过这么多痛苦的人来说，他的气色是很不错的。但是劳动营中的煎熬和癌症的折磨在他那张表面红润的脸上留下了深刻的创伤。这使我联想到一张用旧了的桌子，透过一层表面的镶饰可以看到它那些瘢疤和刻痕。他微笑时，不锈钢假牙闪闪发光。他食指上染着深黄的烟渍，说明他烟瘾很大。

他的书斋里摆满书籍，写字桌上放着一架“索尼”磁带录音机和几叠报纸，我们就坐在那儿聊天。谈些初次见面的闲话时，我一直感觉到他那种不拘礼节、平易近人的魅力。但是我们的话题一转到实质性问题上时，我们就会碰到他那唯我独尊的意志。（在他最后一次被捕和被迫流亡国外前的紧张日子里，他打电话来唤我，他那严厉而生硬的声音至今仍在我耳边回响着：“我是索尔仁尼琴。我有一些事要和你谈。”他讲这话的口气简直就象是在说：“朕乃沙皇。召你立即进宫。”）

第一次见面的那天，他告诉我和凯泽说，他很遗憾，不得不把会谈的时间提前，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免得答复我们原计划用书面提出的问题了。他已经从麦德维杰夫那儿获悉我们感兴趣的问题的要点，因此，为了使这次会谈进行得顺利，他已经准备好一些材料。我

感到纳闷："不可能是一份声明吧？难道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劲，最后得到的只是一份预先准备好的声明吗？"

但那不是一项声明。他从写字桌上拿给我们每人一份厚厚的书面材料，标题是"接见《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记者的谈话"。全都在里边了，包括全部问题和答复——全都是由索尔仁尼琴事先准备好的。我不禁目瞪口呆。我想，这简直是在嘲弄嘛。这是《真理报》的作风。可是这位索尔仁尼琴，这位大声疾呼、殚心竭力地反对书刊审查制度的猛将，这位继承了普希金和陀思妥也夫斯基的伟大传统、敢于维护作家独立权利的战士——居然拿出一份预先炮制好的接见记者采访记录。他怎么能这样鲁莽，这样自高自大呢？我真想表示抗议，退了出去。

"这真是岂有此理，"我低声对凯泽抱怨。"我们不能接受他这份材料。"

凯泽比我更讲求实际。他建议说，"让我们先看看再说吧。"这正是当时索尔仁尼琴所要求的。于是我看了一下。材料一开头很象是苏联人向记者发表的谨小慎微的谈话："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您现在在写些什么作品？"当然，我们最终会提到这个问题的，但是我们希望在开头谈一些比较广泛的问题，谈谈俄国的作家们——从普希金到他本人的一般遭遇：俄国作家是不是不论在什么政权统治下都必然要遭受书刊审查、

流放和屈辱呢？赫鲁晓夫解冻时期里文化界所表现出来的丰富活力和激昂情绪后来怎样了？现在别的俄国作家有没有象他过去那样在秘密创作些什么作品，在若干年后突然公诸于世？我把我们提的问题交给了他，坚持要他趁我们阅读他那份材料时从头至尾看一遍我们提出的问题。他离开了书斋，丢下我们光和娜塔利亚在一起说话。

幸亏她留了下来。索尔仁尼琴的俄文文体既紧凑又复杂，他故意避免使用许多从德语、法语和英语假借的现代俄语词汇，因此即使第一流的译员也会对他这篇文章感到棘手。他那俄罗斯文化优越论的特征之一，就是使用最纯粹的俄语。我们两人都只在俄国呆了半年不到，单是把那篇二十五页十分古奥的冗长乏味的文章浏览一遍，已经非常吃力了，哪里还谈得上仔细阅读呢。娜塔利亚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她把他的文字译成我们能够理解的比较通俗的俄语。这种转译过程慢极了。索尔仁尼琴不时把头伸进书斋，对我们缓慢吃力的阅读速度感到吃惊，但他还是迁就了我们，未加干涉。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娜塔利亚离开书斋去拿一罐浆果汁和自己家里做的水果蛋糕来款待我们，这时我再次向凯泽表示，我对这一整套弄虚作假的做法深为不满。

凯泽说："但是他不懂得这是弄虚作假。据他自己说，这是他多年来——九年来第一次接见记者。可能

他是不懂。"他这样嘲弄我们未免太过分了，但这也说明苏联生活对索尔仁尼琴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这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目光短浅的一种反映，他们象苏联当局一样，对西方的生活方式一无所知，对民主制度那种自由随便的作风和西方报界提出的一系列难以应付的探索性问题毫无准备。索尔仁尼琴，这位苏联制度的死对头，使用的却正是苏联的方式，因为他只知道这些方式。

然而他这份材料的内容却完全不是苏联式的——而是一篇关于他作为一位作家如何遭受折磨的沉痛动人的叙述：他如何被禁止查阅政府的档案；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人如何噤若寒蝉，不敢同他谈话；当局如何不许他聘请从事研究工作的助手，他如何不得不靠偶尔遇到的志愿者的协助；他的邮件如何遭到检查；他的住宅如何遭到窃听；他的朋友们如何象"政治犯"似的受到跟踪；而研究所所长发现娜塔利亚和索尔仁尼琴的关系后，又如何非法地解雇了她。"1965 年他们决意要逼得我连气也透不过来，"他写道。"你们西方人无法想象我当时的处境。我生活在自己的祖国里。我在写一本有关俄罗斯的小说。但是我搜集材料时遇到的困难，就象我是在写一本关于波利尼西亚[①] 的书似的。……在我家周围划定了一个防疫禁区……他们

① 太平洋上的群岛。——译者

打算，不是把我置之死地，就是把我驱逐出境；不是把我干掉，委之沟壑，就是把我送到西伯利亚，或者使我湮没无闻，死于异国他乡。”这份材料充满了关于苏联生活中人们受到屈辱折磨的生动而有说服力的详情细节，而正是这种详细的描述使他的小说举世闻名。

接下去，材料以大量篇幅记载了索尔仁尼琴为自己祖父母的社会背景和他父亲之死而作的、不易为外人洞悉的辩解——苏联报刊曾暗示他的祖先是世代巨富，父亲是一名自杀身死的沙皇陆军军官，以此诽谤他的家庭，索尔仁尼琴对此愤怒地作了驳斥。对他刺激更深的是，西德的《明星》画刊也刊登了这类材料，他认为这是克格勃的阴谋陷害。他估计一周之内苏联报刊将再一次向他发动连珠炮般的攻击，因此决心在对方进行新的造谣中伤之前就先发制人，给予打击。

这里，我们面对着索尔仁尼琴这位杰出的对抗者，他因西方经常刊登他批评苏联社会的文章而受到苏联报刊的谴责，于是想当然地认为西方报刊就是他发表意见的工具。如果他不得不充当自己的辩护律师的话，那么他认为西方必定会提供偏袒他的证人和偏袒他的陪审团。他总是念念不忘地在研究策略来对付那些力图破坏他的声誉和导致他毁灭的人。

使我惊奇的是，他不仅希望全文发表这份“对记者的谈话记录”，而且希望立即，也就是在他原定的诺贝尔

奖金授奖仪式的前几天发表它。这样做肯定会让苏联当局获得借口，可以拒绝给那送诺贝尔奖金来的瑞士科学院代表发放签证。也许是一种殉道者的变态心理使他不惜冒险，宁愿失掉自己最珍惜的东西。也许是他估计到，授奖仪式反正是要遭到阻止的。也许是他的好斗性格使他作出了这种挑衅性行动，因为他讲过，他打算邀请文化部长和两名苏联记者出席他的授奖仪式。也许是他那积习难改的傲慢自大使他相信，他既能平安无事地发表这篇谈话，又能不受干扰地举行他的诺贝尔奖金授奖庆祝仪式，因为他也邀请我们出席那次私下筹备的、注定永远不能举行的小型授奖仪式。

劳动营的严峻考验，不仅使他获得了作为一个作家在道义上的无限勇气和巨大权威，而且使他变成了一个非常固执和一意孤行的人物。我告诉他《纽约时报》只能刊登他所写的那篇长达七千五百字的文章的大约一半篇幅，而且我们必须刊登我们自己向他提出的一些问题，他对此表示怀疑，并且坚持他的要求。我提醒他："哪怕是对美国总统，我们也不能保证把他的每一句话都刊登出来。"凯泽也对索尔仁尼琴的要求感到不安。他对我悄声说，"他以为全世界的人都急切想要听到他的每一句话。"他接着也说，《华盛顿邮报》只能刊登全文的一半多一点儿。我们两人都感到，在美国只有部分人会对索尔仁尼琴为他家史进行的辩解感兴

趣，但是索尔仁尼琴就是要把这部分材料刊登出来。

他又离开了书斋，我们试图向娜塔利亚解释我们的难处和我国新闻界的工作方式。索尔仁尼琴再次回到书斋，表示同意我们选用我们所需要的材料，但我们必须保证让其余部分刊登在其他西方报刊上。我们解释说，我们无权答应这一条件。他又离开了书斋，回来时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他说，假设有一位瑞典记者也参加了这次采访，而这位瑞典人同意刊登我们所删节的部分。

“但是这里并没有一位瑞典记者呀，”凯泽反驳说。

于是，索尔仁尼琴又走了出去，随后带进来一个黄头发细长个儿的年轻人，向我们介绍说，这位是斯堪的纳维亚通讯社驻莫斯科记者斯蒂格·弗雷德里克森。“嗯，”他宣布，“这是一位瑞典记者，他答应全文刊登我这篇同记者谈话的记录，但是他要在你们的采访报道发表后第二天再刊登。”索尔仁尼琴这种专横作风又一次使我大吃一惊。我们以前并没有见过弗雷德里克森。我们也没有看见他进入这幢房子。但显然是由于他的缘故，索尔仁尼琴才穿梭似地在书斋中进进出出。很清楚，瑞典记者到这儿来，事先并没有料到索尔仁尼琴会接见他——可能他只是从斯德哥尔摩得到了一些消息——因为他迅速接受了索尔仁尼琴所提出的条件，匆匆地被送出书斋，此后，我们又跟索尔仁尼琴夫

妇俩讨价还价地争论了两三个小时。

我们发现，他的材料中有一些内容是和我们提出的问题相吻合的。娜塔利亚似乎也逐渐发觉他的文章西方人读起来很别扭，他终于同意在几个问题上改用我们的提法。双方就我们提出的那些内容比较广泛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激烈的争论，他认为这些问题涉及的范围太广，政治性太强，而且显然太危险，因为他总是字斟句酌，要保证他的话不致于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被人利用来陷害他。最后，他态度软了下来，含糊地回答了我们的四个问题，并在他的磁带录音机上录下自己的答话。我勉强认为我们总算作出了一项双方可以接受的妥协，但是后来我获悉，这一妥协曾使索尔仁尼琴愤怒失望。因为这份"谈话"发表以后，他给我写了一封私人的信，抱怨我渲染过分，以一种不必要的写小说的笔调描写我们会见时的情景和他开门的样子，还说我不该把我们提出的问题排在他那份"谈话"的前面，这样就打乱了他这份材料的连贯性(后来他用俄文发表了这份"记录"，因为那个瑞典人也无法满足他所提的全文发表的要求)。但是那天索尔仁尼琴态度终于和缓下来，他让我们为他同娜塔利亚和叶尔莫莱一起照了像。我给他拍单人照时，他面部表情严肃，尽管我连哄带劝，他也不肯拍一张面带笑容的像片。他坚持说："没什么事值得高兴的。"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交涉，我和凯泽离开他家时已是精疲力尽。我们很紧张地向我的汽车走去，回家途中，我在某个路口忘了转弯，而当我刹住车准备按交通规则掉过车头时，有人从后面猛撞了我的车子。我们两人立即怀疑这是克格勃故意制造交通事故，以便逮捕我们，收走我们的录音带、照相机、胶卷和俄文记录文本。凯泽立即收拾起全部材料，在混乱中溜之大吉，留下我去和警察打交道，但警察姗姗来迟。原来，那只是一个粗心大意的出租汽车司机驾车撞上了我车尾的行李箱，他车里的乘客也象凯泽一样，为了避免与当局纠缠，早已逃之夭夭，这才使我放下心来，而且觉得这件事很有趣。警察很有礼貌，服务态度很好，他完全不知道我们会见过索尔仁尼琴。几天之后，我们的报道按原定时间刊登了出来。

将近两年之后，我又私下访问了索尔仁尼琴一次——那是 1974 年 2 月在他被捕并随即驱逐出境的前夕。他要求我提前发表《古拉格群岛》中的部分章节。他在这本书中尖锐谴责苏联当局，说法院运用具有追溯效力的法令和举行预先安排好的审判以及法官接受政府头头秘密指示等做法，这一切使苏联审理政治案件的司法程序成了一种骗局。而且不但在斯大林时期如此，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那一天天气阴沉，种

种迹象预示索尔仁尼琴将有大难临头。自从大清洗以来，苏联报刊从没有给任何人扣上象他那么多卖国贼和叛徒的帽子。高尔基大街公寓附近几条街上特工人员云集，他们有的在人行道上闲逛，有的四人一组坐在黑色伏尔加牌轿车里。在他们之间行走，就象八月末在海蜇群中游泳一样。索尔仁尼琴已经毫无顾忌地拒绝了两张传票。为了在不可避免地被捕之后仍能继续生存下来，他已经预先准备好一套个人用具，其中包括他第一次流放到西伯利亚时穿的那件旧羊皮短袄。这时他一再发表谈话，故意向西方报警。在风暴即将来临的危急关头，他那种胆量是很了不起的。

我们把他交给我的那部分《古拉格群岛》中一些难懂的监狱里说的隐语讨论了一会儿。他坚持说，"不接受采访，"他微笑着回忆起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拒绝了同我一起去的《洛杉矶时报》的默里·西格和英国广播公司的埃里克·德·莫尼的请求。然而德·莫尼终于使他同意朗读了《古拉格群岛》的片断，并且录了音。索尔仁尼琴坐在写字桌旁，头发披到脸上，娜塔利亚站在他背后，双手搭在他肩上。这时他变得严肃了。他那一向是急促和尖锐刺耳的声音，现在变得抑扬顿挫、和谐动人了，好象他想象到自己是面对着一群听众似的。他的朗诵生动地表达了丰富的俄语词汇和许多自编的讽刺语句。他对西方的含蓄警告是，西

方自由主义人士如果不是亲自听到狱警的吆喝："把手放在背后"，赶紧服从命令，他们是不会重视警察国家所提供的教训的。他故意把卷舌音 P 读得很重，①仿佛当年使他必须服从命令的吆喝声依然在他耳边回响。

第二天，他就不见了。象他自己写的一本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一样，他被七名特工人员用车押走，剥掉了衣服，进行了审讯，单独监禁起来，被控犯有叛国罪，受到判处死刑的威胁，最后被迫流亡国外。这一整套把戏很象是十九世纪由当局在幕后操纵的"处决"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场面的重演，当时沙皇是在行刑队即将举枪瞄准的时候赦免了陀思妥也夫斯基，然后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这次，不同的只是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到西方国家去——他曾把这种遭遇称之为"精神上的阉割"。1974 年 12 月，我在苏黎世再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饱尝了自己曾经向朋友描绘的最初的摧心裂胆的痛苦：他被赶出了亲爱的俄罗斯，弄得妻离子散，不知道是否还能继续从事写作，担心失掉了家庭和工作后简直就活不下去。当时，他已发表了他那篇震惊西方世界的个人声明，即"致最高领导人的信"。

以前索尔仁尼琴只是隐约地显露出他那俄罗斯文化优越论的哲学，现在这种观点完全暴露出来了。他

① "把手放在背后"中的"手"字在俄语中有卷舌音。——译者

的声明是俄国革命时期以来一位有名望的俄国人所发表的最尖锐的反共宣言，他在声明中表示憎恶二十世纪。象列夫·托尔斯泰伯爵一样，他的口气象是一个神圣俄罗斯的神秘信徒，一个原教旨主义者，一个主张在俄国恢复未被破坏的旧农村制度的爱国主义者。他象一位先知似地预言：意识形态上的愚蠢争论会引起同中国打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俄国人民会遭到灭绝的威胁，因为现代化工业技术发展的城市社会正在耗尽俄国的自然资源，污损风景如画的俄罗斯大地。

他把西方描绘成为输入罪恶的根源——现代技术是虚伪的神道，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黑暗的、非俄罗斯的旋风”。美国代表“荒唐胡闹的民主制度”，它的文化是没落的，因为它缺乏精神基础。俄国——指的是俄国本土，而不是苏联——只要摒弃马克思主义，放弃它的东欧帝国和苏联的非俄罗斯民族共和国，从欧洲转向国内并发展俄国东北部的内地就能获救。他说，可以在俄国保留独裁统治，但必须铲除掉马克思主义，不再将其作为国教，而应当使东正教成为新秩序的精神基础。

索尔仁尼琴所祈求的是旧俄罗斯农村那种使人心旷神怡的宁静、善良的美德和符合人情的生产规模。他强烈要求领导人放弃大规模生产，把经济减缩为小规模生产和手工生产，抛弃内燃机而代之以电车和马匹，

牢记二层楼住宅("人类住宅的最舒适的高度")值得赞赏的优点，禁止拆毁古老的俄罗斯建筑。"建造老式的新城镇，"他命令道。"使东北地区成为国家活动和居住的中心，成为青年人向往的场所。"他敦劝克里姆林宫，应该象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承认全国必须团结在俄罗斯——是俄罗斯的，而不是苏联的——爱国主义的旗帜周围，团结在东正教会的周围。他提醒他们，斯大林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曾发出这一呼吁，而结果是"我们胜利了"。

不管索尔仁尼琴的思想在西方人士听来是多么荒诞不经，但那并不是象他们所设想的那样独树一帜。他早已厕身于传统的俄国斯拉夫主义的主流派中，这些具有强烈的俄罗斯民族意识的人抱着怀疑的态度抵制对西方的消极模仿和崇拜，宣称一个独立于欧洲之外的俄国负有神圣和独特的使命，并吹嘘俄罗斯民族在精神上优越于其他民族。索尔仁尼琴推崇的宗教、国土、俄罗斯祖国三位一体论，早先曾为陀思妥也夫斯基宣扬过。他的农村民粹主义，也是十九世纪民意运动的旧调重弹。甚至在共产主义已经灌输了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其他斯拉夫主义的持不同政见者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其实，索尔仁尼琴与其说相信斯拉夫主义，不如说相信俄罗斯文化优越论，因为斯拉夫主义主

张兼收并容斯拉夫各民族，打算让俄罗斯起帝国的作用。）也许更重要的是，索尔仁尼琴明确表达了人们心中更广泛存在的对于俄罗斯往昔的眷念和正在复苏的对于东正教的兴趣，表达了一种农村浪漫主义和复活了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而这些思潮是与现代漠视思想意识的思潮同时并存的。从他的信看来，他几乎是打算为军事接管提供一种理性的和爱国的思想体系。他好象还暗示了这种猜想，即：甚至现领导集团中的一位成员也可能赞同他的想法。

确实，勃列日涅夫于1974年4月宣布投资三百五十亿卢布以发展俄罗斯北部和中部荒芜的农田的计划，听上去是同索尔仁尼琴所鼓吹的有着某些相似之处，而据说这个计划又是领导集团内部主张俄罗斯至上那一派要求通过的。当克里姆林宫决定推迟几年再向日本提出长期出售大量西伯利亚石油的建议时，我听到官方暗中表达了象索尔仁尼琴所提出的那种经济上的民族主义观点。尽管目前在推行缓和，但索尔仁尼琴这种孤立主义的论调还是在那些穷乡僻壤的俄国人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这些人比所谓的美国中产阶级更加偏狭，也更加信奉孤立主义。

索尔仁尼琴主张重建乡村化的俄罗斯，恢复其田园式生活，他这一富有浪漫色彩的号召，在大量官方出版的作品中也有共鸣，这些作品理想化地描述了只有

在农村中才能找到的纯洁的道德和"真正的俄罗斯"。代表统治集团的电影导演瓦西里·舒克申在他所编导的电影《红山茶树》中，也含蓄地表达了索尔仁尼琴和那些斯拉夫主义持不同政见者如弗拉基米尔·奥西波夫等毫无隐讳地发表的意见：只有依靠农民的道德力量来阻止由于现代化城市生活而引起的文化崩溃，才能挽救俄罗斯民族。一大批由官方发表其作品的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家，如费奥多尔·阿勃拉莫夫、瓦西里·别洛夫和维克多·阿斯塔夫耶夫等人，都以类似的笔调写了一些故事，隐约地谴责了现代苏维埃国家如何把粗糙的集体化制度粗暴地强加于俄罗斯农村，改变了它的本来面目。莫斯科先锋派"塔甘卡"剧院的导演尤里·柳比莫夫把阿勃拉莫夫的两篇故事搬上了舞台，该剧名为《木马》，它生动有力地表现了旧式农民在农业集体化和"社会进步"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以前所具有的美德。这出戏赢得了城市知识分子的热烈赞赏。

"我们兼有亚洲式的心理和欧洲式的文化，而现在正缓慢地回到我们俄罗斯的本源，"斯拉夫主义作家弗拉基米尔·马克西莫夫在尚未遭到当局追捕和被迫流亡巴黎以前告诉我说。"要不是由于发生了中国问题，我们是可以更大胆放手地干的。但是，中国人迫使我国领导人捍卫我们的意识形态。"

索尔仁尼琴出于本能地强烈要求保卫俄罗斯祖国

免遭外来的西方影响的侵袭，这一呼吁在俄国的官方人士生活中也有共鸣。象苏联前驻联合国大使、《外国文学》杂志主编尼古拉·费德林这样一个国际知名人士，就在索尔仁尼琴即将被驱逐出境的时刻发表了一篇文章，哀叹在俄语中大量借用外国词汇正在污损伟大的俄罗斯语言的纯洁性。费德林重复了十九世纪斯拉夫主义者的观点，他对于 nonkonformizm（不落俗套）、populizm（平民主义）、akedemizm（学院风气）、detant（缓和）、mass mediya（宣传工具）、sekularizatsiya（世俗化）、isteblishment（权势集团）、kheppening（事件）等词闯入俄语领域表示深恶痛绝。"'逐步升级'这个词开始使用时带有一点五角大楼战略家的色彩，他们是在美国侵略越南时使用这个词的，"费德林怒气冲冲地说。"后来，与这个词组合而成的种种名词应运而生。从战争升级和侵略升级演变为词的升级，意识形态升级，智能升级，感情升级。到后来又有了降级，抗升级，反升级。"

"难道俄语是这样贫乏、已这样枯竭了吗？"费德林悲叹。尽管他坚持他并不是要在俄语周围筑起一道"万里长城"，但他迫切地要求开展一次运动，提倡纯洁的俄语，阻止"无限制地借用"西方语言。

对于许多思想新的俄国人来说，这样维护旧事物是绝无成功希望的，因为俄语中已经充满了象新闻稿、

贷款、晶体管、冰球、危机、爵士音乐和粗斜纹布裤等词，更不必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批评方面的一整套词汇了。而且，这并不是一种新的趋向。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女皇都曾引进了荷兰语和德语中的词汇。在十九世纪，有大量法语词汇渗入艺术、文学和军事等方面。索尔仁尼琴和费德林等主张语言纯洁的人却想开倒车，制止那些被费德林讥笑为"蛮荒的杂草"在富饶的俄罗斯土壤上滋生。

不仅是他们有这种想法。甚至象《共青团真理报》这样著名的苏联意识形态宣传机构也十分恼火，抱怨说俄国儿童不知道 lapta（俄国棒球），却听到人们大谈其美国棒球——"其实这只不过是由俄国移民传入加利福尼亚，以后又美国化了的 lapta 而已。"这份报纸主张恢复古老俄罗斯民族的体育运动，"犹如我们怀着爱护的心情修复名胜古迹一样"。

今天，俄罗斯文化优越论的暗流之所以被人觉察但又难以衡量，是因为它所表现出来的是情绪多于行动，隐蔽的成分多于公开的成分。随着俄罗斯民族在其他少数民族中强行扩大其文化和政治影响，这种暗流的比较温和的表现形式已为人们所容忍，甚至得到官方的鼓励，因为其他少数民族虽然已被并入苏联，但如今他们的人数却超过了俄罗斯民族。俄罗斯人对这

种状况十分担心，以至某些政府官员和专家鼓吹提高俄罗斯人的出生率以制止这一趋势。

在乌克兰长大的俄罗斯人勃列日涅夫有时特地称赞俄罗斯人是组成和发展苏维埃国家的带头人，表彰俄罗斯共和国是“老大哥”，这是俄罗斯文化优越论在政治上的一种微妙表现(从法律上讲，俄罗斯共和国只是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之一，然而它却有着压倒一切的优势——人口占一半以上，面积占全国的四分之三)。波德戈尔内主席是乌克兰人，但他同样宣称，俄语是苏联各民族中“实现统一和互相联系的强大的工具”。在我们访问的许多少数民族地区，我们发现官方坚持不懈地推广俄语学习，称它为现代的语言、科学的语言、“列宁的语言”。而学校的组织安排也是为了经常鼓励大城市中有更多的儿童将俄语而不是将本民族语言作为必修课。从 1959 到 1970 年，数以百万计的俄罗斯人移居波罗的海沿岸各加盟共和国、中亚和乌克兰(仅迁入乌克兰的就超过了二百万人)。[①] 他们集中定居于大城市中，因此，在某些加盟共和国内，俄罗斯人人数已超过当地主要民族的人数，引起了暗中同俄罗斯人的严重摩擦。(我记得，一位爱沙尼亚诗人谈到他的地

---

① 1973 年年底，自由电台根据 1959 年和 1970 年的人口统计数字进行了一系列详细的调查研究，表明这些地区的俄罗斯人有显著增加，我据此得出上述统计数字。

区缓慢但是不断地俄罗斯化时，曾绝望地向我哀叹说，“我们就象你们的印第安人一样，是一个濒于灭绝的民族。”）

全国各地党的领导人不断地抨击立陶宛、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乌克兰、乌兹别克等地的地方民族主义情绪，因为这种情绪得到民众广泛的潜在支持，并且构成了俄罗斯人统治下苏维埃国家所面临的最严重的离心离德的威胁。官方有时候也批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然而，由于共产党最高一级的九名书记都是俄罗斯人，由于俄罗斯人把持着苏联社会各方面的重要行政职务，所以推行俄罗斯民族主义要比推行任何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更受欢迎。

严格说来，俄罗斯文化优越论本质上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狭隘的俄罗斯爱国主义和宗教感情的色彩是与党所宣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斗的无神论以及苏联各族人民的多民族团结相抵触的。但是容忍这些意识存在的界限往往是模糊不清的，这是因为在战时以及战后苏联的共产主义已经包含有相当一部分俄罗斯超级民族主义，它有时候已转变为同三K党的沙文主义相仿佛的俄罗斯沙文主义，充满反动、反犹和排外的偏见。我认识的一些犹太人对所谓超级爱国主义的“俄国佬”出版和宣传象尤里·伊凡诺夫所著的《警告犹太复国主义》一类书籍就

特别敏感。

苏联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私下曾一再对我说，俄罗斯文化优越论者可以把共产党、秘密警察、武装部队和共青团中的重要官员看作是他们的秘密保护人。这些人都是热心的俄罗斯至上主义者，其中有一些是新斯大林主义分子和反犹分子，另一些则反映了右翼斯拉夫人对西方与缓和的较模糊的怀疑，并渴望颂扬俄罗斯的神秘气氛。由于官方的这种同情和保护，《青年近卫军》和《我们同时代人》这两份被竭力向青年推荐的保守月刊已经被叫做右翼俄罗斯主义的中心，它们刊登的是：对俄罗斯农村的赞歌、新斯大林主义者的小说、美化历代俄罗斯人对外族的征服的文章以及歌颂"俄罗斯人庄严崇高的灵魂"的作品。一位苏联记者毫不隐讳地说，赫鲁晓夫把斯大林揭露得威信扫地以后，"武装部队就迫切地需要向青年士兵灌输一些思想，而唤起俄罗斯爱国自豪感就成为意识形态方面一个可供选择的好办法"，虽然这种办法仅适用于俄罗斯共和国，因为在其他地区会引起少数民族的反感。共青团从前在顽固的保守分子谢尔盖·巴甫洛夫的领导下，于六十年代中期组织了祖国俱乐部，研究革命前的俄国，以此作为一种抵消西方文化在青年中影响的解毒剂，并试图填补赫鲁晓夫所留下的意识形态真空。

有一天，我在摩尔曼斯克的"六十九度线"旅馆同

一个矮小的看门老头儿交谈。打这以后我才认清，普通俄国人那种土生土长的爱国主义是同美英人士的爱国主义大不相同的。这个老头儿发现一个美国人说俄语，感到十分得意，于是滔滔不绝地大谈其俄语音调的优美和词汇的丰富，并解释这种丰富的语言和俄罗斯民族的力量是如何从本国乡土中培育起来的。他那衰老的手握着我的手，友好的眼睛因为我洗耳恭听而闪出喜悦的光芒。他讲述了一个神秘的故事，说的是一位古代的圣人怎样教俄罗斯人捡起俄罗斯大地的泥土放进嘴里，咽了下去，直接吸收它的养分，因为俄罗斯人的性格和文化正是从这泥土中来的。后来，每次读到类似这样热情洋溢的斯拉夫主义作品时，我就想起了这个矮小的看门老头儿。

有位西德的外交界朋友也向我讲过一个共产党员在复活节晚上带他去观看东正教礼拜的情景。他们并没有进入那座建造在列宁山上的教堂，只是站在一群看热闹的人当中，观看神父和教徒的午夜游行行列。“看，看那个！”那个俄国人激动地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不是一个教徒。但是，看到这些古老的俄罗斯风俗受到保护并且正在复兴，可真有意思呀。”

这种因循守旧的情绪最天真地表现在几方面，即渴望搜集和悬挂圣像，热爱沙皇时代的古董，而从作家起、以至将军和部长等权势人物也都乐此不疲。“在六

十年代初期，赫鲁晓夫执政的时候，人家看见你买古玩是要皱眉头的，”一位记者的妻子说，她向我炫耀一张漂亮的亚历山大时代的五斗柜和另一个王朝的扶手椅。“当时我们是不会想到买这种东西的。但是现在情况变了，各种各样的人都买这些东西了。”

说也奇怪，使搜集俄罗斯历史文物成为一时风尚的竟是出生于格鲁吉亚但怀有大俄罗斯思想的斯大林。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统治的头十五年压制了俄罗斯民族主义感情，后来又鼓励重新宣扬沙皇时代的英雄——电影中美化了彼得大帝、伊凡雷帝以及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同日耳曼骑士的英勇战斗——使这主题敷演至今不衰。他恢复了军服上的肩章，重新规定了军衔制度和沙皇式的勋章，大事赞扬伟大的俄罗斯人在反希特勒战争中的主导作用，并且在战后拨出重建资金，把埃尔米塔日宫的艺术珍品和富丽堂皇的沙皇宫殿修葺一新。

自从斯大林逝世以来，苏联对待俄罗斯遗产的政策几经反复，褒贬互见。十九世纪杰出的音乐、文学和芭蕾舞备受推崇。为库图佐夫元帅击败拿破仑那样纯属俄罗斯人的胜利树立了纪念碑。一些大教堂和礼拜堂被作为历史文物加以修复，而数以百计的其他珍贵建筑物则被拆毁。历史依旧是按共产党人所定的框框写的。

当官方政策不再积极推行的时候，在知识分子中重新抬头的俄罗斯主义有时就发挥了作用。1973年发生了一桩轰动一时的事件。有消息泄漏出来说，克里姆林宫正在制订一项要把莫斯科建成“共产主义模范城市”的法令，将批准一项计划，重建市中心区，拆除一些有代表性的建筑物，包括红场附近沙皇时代的旧市政厅和历史博物馆，以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创立的莫斯科艺术剧场和大剧院旁边的十八世纪的小剧院。全国深孚众望的一些科学家、艺术家、音乐家和其他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反对，终于制止了这项计划的实施。再早一些时候，在六十年代中期，一些国立莫斯科大学考古系学生奔赴俄罗斯北部各州首府，设法把一些原定要拆除的古老教堂划为优先保护的历史文物，从而保存了这些古建筑。

在那几年里，象亚历山大·尤尔洛夫指挥的俄罗斯共和国模范合唱团或者作曲家安德烈·沃尔康斯基建立的清唱小组等音乐团体都重新开始演唱教会的圣歌和赞美诗。其他作曲家在创作现代作品时也吸收了古老的宗教主题。我认识一些作家、艺术家和其他知识分子，他们在俄罗斯农村中漫游，走访修道院和教堂遗迹，足迹遍及边远的村落，收集古俄罗斯的各种手工制品，从圣像和用教会斯拉夫语写的书籍，直到古陶罐、木制品和农具。对圣像的一时爱好使它们的价格

飞涨。在过去十年里，象尼古拉·别尔佳耶夫和巴维尔·弗洛林斯基这些二十世纪初期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家的著作，黑市价格也猛涨，尽管这些人不仅反对马克思主义，而且鼓吹在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上彻底革新社会生活——而这正是索尔仁尼琴今天再次宣扬的理论。

约瑟夫·勃罗德斯基在一首题为《在沙漠中的逗留》的优美的诗中抓住了俄罗斯人思古之幽情：

狗儿念旧，循迹奔走，
故地重临，把后腿翘起。
教堂的墙，早已拆毁，
狗在梦中，却依稀看见——
现实情景，为梦所替……
如果要我认真谈谈
"这接力赛般的人类历史"，
那我就什么都不信，唯独这一接力赛——
这世世代代人已经嗅到，还将嗅到古代气息的
一代代往下传的接力赛。

没有哪一种古代的气息能比东正教望弥撒时散发出来的奇香更清新得令人难忘，也没有哪一个机构能比东正教在复活俄罗斯主义中起更重要的作用。好几世纪以来，教会一直是俄罗斯文化的特别保护人。在

一个习惯于把苏联想象为好斗的无神论国家的外国人看来，在复活节这样一个重大的宗教节日举行东正教礼拜竟然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这是难以置信的。使我惊诧不已的是，聚集在古老的教堂外面，想看一看里面热闹场面的主要是一些十几岁和二十来岁的青年人。但是，凡是了解俄国的人都知道，教堂是这个国家艺术方面的荣耀。

一个复活节前夕，安和我也被卷入了弗拉基米尔市(中世纪曾是俄罗斯的首都，而今成为州首府)的人群之中。成千上万的人拥向十二世纪建造的庄严的圣母升天大教堂。石头雕饰的教堂，在优美的圆形屋顶和匀称的重重拱门下面显得那么肃穆宁静。

我们沿着那条从莫斯科向东延伸的公路，驶过一片新绿的平坦田野，前往弗拉基米尔市，中途驱车在一个农家逗留一下，看一个胳臂粗壮的农妇揉面做传统的复活节圆柱形甜面包。她已经做好了奶油渣糕(一种用甜乳酪、黄油和葡萄干做的滋润可口的糕点)，并把复活节蛋跟洋葱皮一起煮，将蛋染成柔和的黄褐色。后来，我们看到一些老太婆带着节日食品往这座大教堂行祝福仪式。在摇曳的烛光下，她们把一盘盘面包和蛋糕放在一张矮长桌上，周围饰以鲜花。

根据东正教的仪式，俄国人庆祝复活节，要在星期六午夜一连望几小时的弥撒。在弗拉基米尔，行政当

局在这座古老的石头教堂附近公园里组织了一次露天舞会，显然是企图转移年轻人的注意力。但是这个权宜办法只不过暂时起了作用。到了十一点半，舞会一散，三四千年轻人就把教堂团团围住，向阻挡他们前进的一排排警察和纠察挤去。

我们去的那个教堂，已由于基督复活仪式而变成一个神秘迷人的殿堂。蜡烛如林，烛火辉煌，照亮了无数圣像，圣像镶在金银框子里，被信徒们频频吻着。大胡子神父穿着金光闪闪的长袍，摆动香炉，或传递一本镶嵌着珍珠宝石的圣经。一再重复的连祷以及楼厢中什么地方传来唱诗班忧郁伤感、悠扬缥缈的歌声，有着一种催眠的作用。望弥撒的人都伸长了脖子，想要看一看唱诗班，瞥一眼那过分雕琢装潢的圣像壁或者举世闻名的安德列·鲁勃列夫的壁画。

这是一个极端俄罗斯式的场面。它那拜占庭式的东正教强调宗教仪式的美和力量，造成了一种虔诚的心境，而不是象西方新教布道时那样要唤起个人的良心。教堂里不设座位。数百名礼拜者挤满了教堂，耐心地瞻仰、等待和倾听两三小时之久。仪式临近高潮时，教堂里挤得水泄不通，我发现那里简直是寸步难移。然而在人们心灵脉脉相通的感觉中，在神父使人昏昏欲睡的单调的歌唱声中，在圣像前的蜡烛轻微的爆裂声中，有着一种使人感到舒适的气氛。蜡烛加强

了人们心灵沟通的感觉。人们在教堂后部购买了蜡烛，把它们向前传递，从一个人的肩头传过另一个人的肩头，从一个人的手里传到另一个人的手里，嘱咐的话也从一个陌生人悄悄地传给另一个陌生人，这样每一支新买的蜡烛都会由远处一个看不见的购买者供在他所选定的圣像前面。

神父们由教徒尾随着，在每人手持蜡烛的行列中走出教堂，绕教堂三圈，象征寻找墓穴中基督的遗体，这在外面一群群青年中引起了一阵无法抑制的激动。就在这支队伍返回教堂庆祝基督复活的时候，几百名青年冲破了警察组成的人墙。

从理论上讲，在教堂外布置警察线是为了保护信徒不致受到小流氓的干扰，虽然完全可以肯定，这是为了要把青年人隔离在外面，以免为这种已被取缔的仪式所吸引。这道堤防被冲破时，我听到几个老奶奶焦急不安地说，青年人会砸坏圣像，或者嘲笑望弥撒的人。但是，就我所看到的，那些进了教堂的人都很安静，也很虔诚，特别是很好奇。有几个人挤进教徒中间，想看看神父和圣像壁（圣坛上有五层圣像帷幕），或者想听听唱诗班的合唱，有一两个人带着磁带录音机，去为这一仪式录音，这是比苏联世俗生活中任何演出都精彩得多的。

“你干吗要到里面去？”后来我无意中听到一名警

官问一个身材苗条的金发姑娘，她手里拿着一支点燃的蜡烛走出教堂，激动得满脸通红。

“我要去看看，”她毫不畏缩，坚定地回答。“真有意思，太美啦。”

我好几次看到这种情景，这使我感到，如果让老百姓随心所欲的话，他们是会重视索尔仁尼琴的呼声，转向教堂的。教堂的富丽堂皇，它所举行的仪式以及共同的宗教感情，是与俄国人的心灵相投合的。

在弗拉基米尔，也同在其他地方一样，经常做礼拜的主要是一些年龄较大的妇女（占百分之七十到八十），虽然有一位中年男子（他是一个信徒，但不常做礼拜）笑着对我说，“每一代老太太死去后，好象总有新的一代接替了她们。”然而，在平常的礼拜仪式中，我看到有相当一部分中年男女，偶尔也有穿军服的人，或者少数青年人，带着祈祷书，点着蜡烛，给自己划着十字，更不必提那些断断续续前往的爱看热闹的青年了。但是，由于苏联制度的压力和控制，对于二十岁到五十岁的人，尤其是对于那些富有进取心的人来说，上教堂终究是冒风险的。老年妇女相当自由，因为这个制度对她们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

然而，最近几年里有迹象说明，宗教在中年和青年一代中有一定程度的复兴。1974年，象《真理报》这样

的权威性报纸也刊载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抱怨青年男女对宗教的兴趣“有显著的增长”，而同时对意识形态却普遍地漠不关心。其他苏联刊物，如《科学与宗教》杂志，无意中道出，近年来，在某些地区，包括莫斯科地区，有半数的新婚夫妇都是在教堂举行婚礼的，有半数以上的新生婴儿都是受洗礼的。党的报刊经常批评受洗。为了同这种现象作斗争，当局开始要求神父查看受洗婴儿的父母的身分证，以此进行威胁。但是有人告诉我，要混过这一关，你可以到城外去借别人的证件。

有时候你会在各种小事情上看到人们暗中流露出对教堂或宗教的兴趣——一位国际旅行社向导向一个美国商人索取圣经；一位俄国神父向一位西方牧师透露，他没有时间诱导青年，因为他每年要施一千次洗礼，忙得不可开交；一个青年妇女小心翼翼地逗引来访的一位天主教神父说明他的信仰，然后表示她本人如何崇拜这种信仰；一位年轻的工程师把圣像供在传统上用来拜神的屋子角落，他还熟悉圣经中的经文。共产党的刊物不时责备党员或团员不该参加婚礼、葬礼和其他宗教仪式。1973 年，《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一位党的官员在宣讲无神论的时候，他的妻子和丈母娘却带着他的几个孩子去受洗。还有一些耸人听闻的事件被捂了起来。一位作家告诉我，1972 年，莫斯科

艺术剧场的首屈一指的女演员阿拉·塔拉索娃（曾任该剧场党的官员达十九年之久，又是最高苏维埃代表）去世，她留下的遗嘱要求为她举行宗教葬礼，这件事使党的官员都为之震惊，而她的丈夫，一位秘密警察官员，竟然照着她的遗嘱做了。这位作家还告诉我，已故的伊凡·彼得罗夫斯基担任了二十二年国立莫斯科大学校长，也是一个多年来秘密信教的人。

有一次，我遇见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看到这位四十五六岁的计算机专家挂着一个十字架，我问她是不是信徒。她低头看看那十字架，尴尬地向我笑了笑，想回避这个问题。“这是一个亚美尼亚的十字架——我是不上教堂去的，”她说。“我不喜欢人太挤的地方。”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上教堂——到那儿去太危险了，”我说。“但是我想要问的是，你是一位信徒吗？”

当时我们是在莫斯科她的公寓里谈话，旁边只有她的家人，但她还是犹豫不决。最后，她承认了。“是的，如果相信某些事物（她两眼朝上看了看）但并不上教堂也算信徒的话，我是一个信徒，不过我没有圣经。前些日子我搞到了袖珍本四福音书。”她走过去，从垫得又软又厚的椅子后面取出了比火柴盒大不了多少的四个小本本。“我经常读读，觉得它们对我很有益处，”她说。“有时我也念给孩子们听。”

“跟你年纪相仿和程度相等的科学家，象你这样信教的多吗？”我问。

“很多，”她点点头。“他们也象我一样不上教堂但是相信宗教。”

“为什么信教？”我问。

“主要是这儿的生活空虚，对我们当代生活的空虚感到沮丧。宗教使人的精神有一些寄托。我是这么感觉的。”

斯拉夫主义的持不同政见者弗拉基米尔·奥西波夫曾经写道：近年来有一些中年知识分子皈依宗教，因为在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期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运动中幻想破灭了。“我们这些未来的‘异教徒’在我们青年时代都是斯大林主义者。”如果没有斯大林，这些人就会感到无所适从。我认为无法判断奥西波夫或那位女科学家的观点究竟有多大代表性，但是我怀疑科学家中虔诚信宗教的、甚至随便信宗教的人会非常多。那些和我谈过话的人所以大多数被东正教所吸引，是因为把该教看作是俄罗斯文化的化身，看作是一个同他们受到压制的文化遗产相联系的纽带。

教会与党的关系是很不寻常的。作为一个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受到斯大林严厉压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发扬俄罗斯爱国主义而让其复活、后来又遭到赫鲁晓夫的粗暴镇压的机构，东正教会终于同

意勉强迁就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在整个俄国历史上，东正教一直向教徒宣扬服从国家，以此加强其世俗权力，如今它仍旧是这样做法。皮缅大主教和东正教的其他高级神职人员发表应景的讲话，赞扬苏联的国内外政策。教会向苏联和平委员会和其他共产主义事业捐赠了数以百万计的卢布。它使用这种策略保全了自己，宣称它拥有三千万经常做礼拜的教徒，这要比这个国家持有党证的党员人数多一倍——虽然教徒人数的多寡，其意义是有限的，因为规定教会存在的条件是党而不是教会。（其他较小的教会，如立陶宛的罗马天主教会，以及其他地区的浸礼会教徒，由于较强烈地坚持己见而遭到更大的压制。）

党已默认，苏维埃国家之所以能保持团结，是由于各种爱国精神形成了一种特殊综合体，而东正教是该综合体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它那俄罗斯特性的重要成分。但是党用种种规定限制了教会，如：神父可以做弥撒，但是不能讲道或劝人入教；新建城市中不许建造教堂；在西乌克兰的一些地区，原有的教堂应予关闭。比较直言不讳的神父被革去圣职或受到惩戒。神父很缺乏。尽管扎哥尔斯克神学院院长对我们这批外国记者说，每年神学院出现一个空额就有四个人申请报名，但是政府不允许东正教的四个神学院把名额扩充到现有的一千人以上。

象索尔仁尼琴那样的持不同政见者，对教会之迁就党和被党所控制感到恼火。1972年，索尔仁尼琴写了一封信给皮缅大主教，措词激烈，指责教会已经抛弃了它的教徒，听任教堂被拆毁或荒废，本身已成为这个无神论国家的一种工具。一位在俄国人中交游甚广的西方教士告诉我，一些被解除了圣职的神父拒不服从党的命令，为较激进的教徒建立了“地下修道院”。他说，有一个修道院全部是由科学家组成的。但正式被授予圣职的神父极少敢于公开冒犯政府。

我在莫斯科接触到的一位最引人注目的“传教士”是季米特里·杜德科神父，他是一个矮个儿、秃脑袋、年纪五十开外的人，1948年由于写宗教诗歌被捕，在斯大林主义劳动营中关了八年。后来他成了索尔仁尼琴的神父。1974年年初，他因为在莫斯科圣尼古拉教堂（一座古老的小教堂）举行了几次极其坦率的问答会，轰动一时。一到星期天晚上，五、六百人，其中有许多是知识分子和青年人就挤满了教堂。他们来聆听他那真挚而毫无顾忌的讲道，他那些关于“应当如何生活”的伦理问题以及他对苏联基督教现状的评论。他的大胆见解常常使人们惊叹不已。

我还记得，当我勉强挤进了那嘎吱作响的教堂大门，听到他直截了当地攻击无神论时，我真有点不相信自己是在莫斯科。他没有那种通常听到的转弯抹角的

遁词，他肯定地说，在苏维埃政权统治的半个世纪中，俄国在道义上和精神上都衰退了。他说，现在是为基督教大声疾呼的时候了。他讲了人们皈依宗教的简单故事，追述了教徒们在集中营里显示的力量，并且抗议“无神论者干涉教会内部的事务”。最后，有一天晚上，他指责告密者大量渗入教会上层，包围了大主教，以致“他只要叹一口气，所有的器官——俄国人对克格勃的委婉提法——都听到了”。

人们离开教堂时不禁要问，这样的讲演能持续多久呢？这样的会举行了十次，当局就进行干预了。季米特里神父被堵住了口，不得不向大主教道歉，然后被遣送到一个偏僻的农村教区去。他的事件使当局在国际上声名狼藉，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情况保护了他，使他不致受到更严厉的惩罚。

一些信教的斯拉夫主义持不同政见者，他们的遭遇就更严酷了。早在索尔仁尼琴被流放前，当局就镇压了一批自称为“全俄基督徒解放人民社会联盟”的右翼的、反动的、激烈反苏的斯拉夫主义者。他们的作品在六十年代后期流传于列宁格勒、托木斯克、伊尔库茨克等城市，这些作品不仅表达了斯拉夫主义思想，而且具有反犹和新法西斯主义的意味。俄国朋友们告诉我，其中有些人据说已经记下了共产党官员的汽车牌照号码，并且谈到了暴力行动。1968年，有二十多人

受到秘密审讯，被判处长期徒刑。1971 年，另一批匿名者散发了一份地下的"俄罗斯爱国者宣言"，驳斥马克思主义，主张复辟东正教国家，宣扬色彩强烈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和白人优越论——跟索尔仁尼琴宣扬的不同，但是跟他一样主张集权主义统治，这是俄国右翼的共同特点。他们是否也被逮捕并受到惩罚，这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弗拉基米尔·奥西波夫，这位方下颚、宽肩膀、具有和平主义思想的斯拉夫主义作家，曾主编好些地下刊物，如《市民会议》（中世纪俄罗斯议会的名称）和《大地》。尽管他一再声明不反对现行的制度，但还是不断遭到迫害。1961 年，他被送往西伯利亚，在那儿呆了七年，然后在莫斯科以外的地方度过了一个时期流放生活，接着又由于在西方流传他的杂志而再次被捕，1975 年又被判处在一个守卫森严的劳动营中关押八年。

1974 年年底，索尔仁尼琴的几个追随者和他合作，在西方出版了一本名为《来自瓦砾堆下》的书。书中收集的一些短文，从宗教观点上分析了苏联社会道德的沦落，驳斥了马克思主义，鼓吹了别尔佳耶夫等二十世纪初期俄罗斯宗教哲学家的思想。这本书的一个目的，显然是要在苏联知识分子中间挑起俄罗斯文化优越观点的辩论。甚至在此书问世以前，教会历史学家瓦季姆·鲍里索夫和艺术史学家叶夫根尼·巴拉

巴诺夫这两位三十多岁的撰稿人就被解职，而鲍里索夫还被禁止为自己的学术论文进行答辩。另一位撰稿人、五十多岁的伊戈尔·沙法列维奇受到了保护，这显然因为他是一位世界闻名的数学家和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但是我听说有人一再设法不让他在莫斯科大学执教。

迄今为止，使苏联当局感到左右为难的并不是如何对付那些明目张胆地持不同政见的俄罗斯文化优越论者，而是如何控制权势集团内更广泛和更难以捉摸的复活中的俄罗斯主义和宗教热情。文化界的警犬每过一个时期就要训斥作家们，说他们厚古薄今，责备插图画家，说他们美化了沙皇统治下的农民生活，指控音乐家，说他们过多地恢复了古老的教会音乐。但是党本身在如何公平合理地处理这件事的问题上好象也是意见分歧的，这显然是因为在党的队伍中也存在着俄罗斯文化优越论的影响。例如，在1972年年底，党中央有势力的宣传鼓动部部长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发表了一篇重要评论，谴责某些杂志和作家以浪漫主义手法描写俄罗斯的过去，美化传统的乡村生活，过分崇敬古老的教堂和历史文物。他的文章似乎是发出了党要抑制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信号。

但是几个月后，雅科夫列夫被悄悄地解了职，降格地调往国外去担任外交职务了。几个俄国知识分子告

诉我，党的领导集团内部对应否发表他的文章在幕后发生了争论。有些人获得的消息是，核心中的"某一个最高领导人"不同意他的意见，要保护正在复活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

十八　持不同政见者

镇压的新技术

在其他人随声附和以前，对于第一个喊出"皇帝一丝不挂"①的人，禁止他说话是极为重要的。

乌克兰持不同政见者瓦连京·莫洛兹

1974年初亚力山大·索尔仁尼琴突然被驱逐出境，这件事所引起的轰动，淹没了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事实：有一个短时期，苏联的三位主要持不同政见者，就他们国家的前途问题开始辩论起来了。对于半个世纪以来缺乏真实的政治谈话的国家，这是个值得注意的事态的转折点。在西方，大家对这类事情并不重视，因为长时间以来，西方人对所有持不同政见者是笼而统之、不加区别的。但这里，两亿五千万人口中的三个人——第一流的、斯拉夫文化优越论的说教者索尔仁尼琴，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的科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以及具有改良主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罗伊·

① 见丹麦作家安徒生的著名童话《皇帝的新衣》。——译者

麦德维杰夫——却敢于公然冒犯共产党宣布的对社会思想的垄断，居然对西方报刊发表声明，提出自己关于俄国前途的主张，而这些声明又通过西方无线电广播的迅速重播，向他们本国的人民播送了回来。

这一发展在十年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由于缓和这顶保护伞以及他们自己的名望，这种发展才成为可能。然而这几位超级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辩论，也给人以错误的印象。它模糊了这样一件事实：持不同政见，作为一个运动，已经逐渐衰退了，其活动分子可能从未超过一千名。随着缓和的继续，苏联镇压的措施变得更巧妙，也更有效了。富有意想不到的讽刺意味的是，缓和并不象西方所希望、克里姆林宫所害怕的那样，在苏联知识分子中产生更大的骚动，恰恰相反，缓和已成为加紧控制的一个理由，有时更提供了平息那些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的新手段。只有象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和麦德维杰夫那样的著名人物，才能利用缓和作为庇护，深化他们的不同政见的内容。

索尔仁尼琴被强行逐出之前的最后几个月里，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经常自然而然地被相提并论——在苏联报刊上被诬蔑为“叛徒和变节分子”，对养育他的祖国“昧着良心，忘恩负义”地进行诽谤和出卖；在西方却被推尊为维护个人权利的战士，是把缓和人道化并使苏联扩大民主化的象征。索尔仁尼琴已于1970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萨哈罗夫也将在1975年获得诺贝尔奖金。

但是我发现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是截然不同的人。萨哈罗夫从外貌上看来很不象是一个引起国际上骚动的人物。他并没有索尔仁尼琴的堂皇的风度，威严的个性或好斗的气质。索尔仁尼琴会满怀信心地冲向对话的舞台中心，萨哈罗夫就只会在一旁徘徊徬徨；他是一个腼腆的朴素的毫不矜持的人，接待客人时，他宁愿倾听并细细品味别人的话，把头歪向一边露出深思的表情，直到他感到同几位新来的客人足够熟稔了，才无拘无束地交谈。

他们两人的体格也完全不同。索尔仁尼琴长着一个圆鼓鼓的胸膛，红润的脸上满是皱纹，有一双因劳动而磨损的手，赤褐色的络腮胡子，敏锐的两眼灼灼有光，炯炯有神。他在晚年为了卓越的成就而奋斗，正象他早年为生活本身而奋斗一样；于他合适的时候，他是喜欢威望和声誉的。正好相反，萨哈罗夫有文弱书生气息。他是高个子，背有些驼，前额很高，秃顶，两边各有一块稀稀朗朗的灰发，大手，没有体力劳动的痕迹，眼睛是忧郁而富有同情心的。他是一位内向的人，一位俄罗斯式的聪明人，道道地地的知识分子。

在他沉默寡言的时候，在他谈话间歇的时候，人们感觉到他是一个孤独的思想家。他对隐居生活的天然

爱好，由于二十年来从事苏联原子能研究工作被迫离群索居而加强了。他不得与外界往来，每到一处，都有一名警卫员跟着他，即使他去游泳时也一样。（他告诉我，有一次他曾恶作剧地躲开警卫员溜到森林里去滑雪了。）他所获得的苏联奖品和勋章之多，是空前未有的，但并不给他带来什么公开的荣誉，因为这些都是在保密情况下授予的。他的照片从未在报刊上发表过。我的同事特德·沙巴德看见过他胡子也没有刮，穿一件弄皱了的雨衣走进一家杂货店，为了庆祝他第一个孙子出世想买些东西，可谁也没有注意到他，谁也没有认出他来。

萨哈罗夫是同奥本海默和特勒齐名的理论物理学家，作为苏联氢弹之父之一，萨哈罗夫在年轻时就自然地轻而易举地成了名。他的光彩夺目、飞跃上升的科学事业（二十六岁得理科博士学位，三十二岁就前所未有地当上科学院正式院士），替他赢得了崇高的地位，使他早年就发了近十四万卢布的财，直接登上了苏联社会结构的宝塔尖。他表示不同政见的第一个行动，是在克里姆林宫一次会议上写给赫鲁晓夫的一张字条，反对进行一亿吨核试验，他认为这一试验在技术上是没有必要的，在政治上是冒险的，而且由于放射性散落物的缘故，对生物是有害的。有十年时间，他仅仅在苏联头面人物的稀薄气氛中表示过这种顾虑。

直到 1968 年，萨哈罗夫的名字才在国外被大家所知道，当时他的备忘录《进步，和平共处与思想自由》已泄漏到西方，文中提倡停止军备竞赛，建议实行缓和，敦促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汇合。此后，萨哈罗夫才在公开场合开始利用他在知识界的崇高地位，但最初也难得如此。他和索尔仁尼琴不同，他生性不愿抛头露面。我有几个月时间试图说服他——也有别人这样做过——接受访问或者拍一张新闻照片，但他避免个人出风头。到 1973 年秋，萨哈罗夫被苏联报刊刺耳的宣传运动造谣中伤，逼得走投无路，他才不得已地把他个人问题诉诸世界舆论。

萨哈罗夫的生活渗透了简单朴实的精神。在他的姿态、举止、衣着、居住环境等方面，处处朴实无华。他把积蓄下来的财富捐献给防癌研究所，因为他感到这是制造大屠杀武器而得来的血腥钱。他穿了一条宽松下垂的裤子，吊着两根绝细的背带，脚上穿双长统袜子，真象一个下班的守夜人那样平凡简朴，客人来了也不忙去换衣服。为了表示对社会习惯的让步，他上戏院时改穿一套黑灰西服，在白衬衫或劳动时穿的灰色衬衫上，不伦不类地别上一个活结领带。

他住的公寓和他本人一样毫不铺张。萨哈罗夫同他的第二个妻子叶莲娜以及她的母亲和儿子住在一起，共有两个房间，一间厨房。为了接待早上来访的客

人，他们把被褥卷起搬走，使朴素的主要卧室变成同样朴素的客厅；褪了色的东方地毯上，放着一张泡沫橡皮双人沙发床；一只打字机和一架老式留声机堆在玻璃书橱旁，橱里塞满了文稿；窗口的暖气管上挂着一只盘子盛放滴水。由于公寓的面积难免很狭窄，雪橇就不得不放在小小卫生间的洗脸盆旁。滑冰鞋就挂在近边。

第一次有人带我去他公寓时，我们发现屋子正在大修，一切都乱七八糟。萨哈罗夫表现了俄罗斯人的好客天性，对我们简单表示歉意以后，就领我们直接进入厨房，那里放着一张搪瓷面的桌子，桌上杂乱无章地放着盆子、茶杯和零落的茶托。安德烈·季米特里耶维奇(俄国人是用他的教名和父名称呼他的)，正在喝加了糖的茶——或者说仅仅有点甜味——还吃着一片片又青又硬的小苹果。

"这是我特别喜爱的喝茶方法，"他说，以此来答复我那好奇的眼光。

"人们经常说贵族喝茶用柠檬，厨师喝茶用苹果，因此，这就是厨师喝的茶，"他妻子主动插进来说。

萨哈罗夫很有礼貌地劝我用他的厨师的茶，我就喝了。一杯就够受了。我喝第二杯时另外加了糖。他们拿出一纸匣普通饼干，后来又拿出一小匣什锦糖，几块巧克力和其他糖果混在一起。一切都是简单朴素

的。七个人挤在一张小桌子周围。这完全是俄罗斯方式，客人被溶合到主人的生活中去，使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谁也不想法把事情搞得矫揉造作。以后我每次到那里去都是这样，萨哈罗夫完全没有那种矫揉造作的作风。尽管深居简出，沉默寡言，说话温和，萨哈罗夫的感情流露却是非常坦率的。当他动感情时，对于不公道的事情具有强烈的反感，对于遭受苦难的人，富有敏感而深切的同情，一言一行，天真率直，对他个人承担的后果毫不介意，尽管他对他一家所受到的威胁和困扰深感痛苦。

几年来，苏联当局试图在其他知识分子中把他的非正统观点弄得名誉扫地时，对他那一点儿天真的理想主义大肆渲染。在对科学家所作的不公开报告中，党的发言人把他说成是一个天真的怪物，嘲笑他心肠虽好却是一个无可救药的脱离现实的空想家。1973年9月间，由著名的苏联学者和社会名流署名的痛骂萨哈罗夫的文章，天天发表在苏联报刊上，这种宣传高潮煽动了要求把他送进精神病院的情绪，这使人回想起十九世纪的生物学家兼哲学家彼得·恰达也夫因为持有不同政见而被沙皇宣布为疯人的遭遇。

萨哈罗夫颇有幽默感，他对于作为一个先知而不能在国内得到尊重这一可悲的讽刺，仅仅付之一笑。我听到他开玩笑地谈起他被当作半圣半疯的自行其是

的人的遭遇。他对自己以及他在1970年和其他两位物理学家所组织的"人权委员会"的一点有限的影响也有足够的眼力。他开玩笑似地把它比作"匹克威克委员会"①，一笑置之，这是对党的崇尚空谈、无所作为的嘲弄。

有些会见过他的西方人离别时，对于苏联这样强大的国家会把萨哈罗夫这样一个人物看做政治威胁，颇感迷惑不解。还有人大声地问，如此逆来顺受的一个人，怎么会象他在1973年末那样给自己头上招来苏联权力机构的一致愤怒呢。这些问题低估了萨哈罗夫的异端观点所具有的力量，也低估了共产党为保卫它对社会思想的垄断所怀的戒心。象萨哈罗夫那样向这种思想垄断挑战，是会危及这个社会制度的基石的。因为如果不用意识形态作指导，现代的经理和工程师就可以经营经济，管理人员和官僚就可以管理政府和外交，党就失去其正统性和存在的理由了。这就是为什么党对萨哈罗夫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抗如此猛烈反击的缘故。

这几年来他思想的激化——反映了他对于社会制度内部进行改革的可能性越来越失望——使对抗尖锐化了。他也受了他第二个妻子叶莲娜·格奥尔格夫

① 匹克威克是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中的主人公，"匹克威克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天真幼稚、脱离实际的人。——译者

娜·邦涅尔的影响；她是亚美尼亚族犹太人，持不同政见的活动家，她母亲曾在集中营关过十六年；1971年，她和萨哈罗夫结婚，从此他在不同政见方面吸取了她的某些强烈感情。

1968年时，萨哈罗夫作为有声望的官方科学家，以一份带有哲学色彩、经过仔细推理的备忘录，开始提出他的非正式抗议。他列举了主张缓和的合理的论据，并要求更大的思想自由。备忘录谴责"斯大林主义的罪恶"和新斯大林主义者的影响，可是把批评苏联的镇压同批评资本主义和美国的政策并提，以求不偏不倚；而且还强烈肯定了萨哈罗夫的"深刻的社会主义"观点。就是为了这个1968年的备忘录，萨哈罗夫从苏联原子能研究工作中被开除出来了。但是他的思想传布四方，他的威望在科学界的自由主义者中间迅速高涨，成为代表他们的不畏强暴的发言人。

不管怎样，五年之中他一直在为关在精神病院中受迫害的持不同政见者，为主张民族分离主义而受到秘密审问和监禁的亚美尼亚人，为要求移居国外的犹太人，为给子女以宗教训练而遭受迫害的独立不羁的浸礼教徒，发出痛苦的呼吁，因而他就变成被社会所遗弃的贱民了。1972年在慕尼黑世界运动会期间杀害以色列运动员事件发生后，萨哈罗夫参加了在黎巴嫩大使馆前举行的通宵达旦的抗议运动，因而曾遭逮捕。

而他对苏联社会的谴责，也变得严厉而彻底了。

1973年7月，萨哈罗夫会见了一位瑞典广播记者奥尔·斯坦洪；这次会见使斯坦洪被驱逐出境，也引起苏联报刊掀起了一场反对萨哈罗夫的运动。"我对整个社会主义抱怀疑态度，"萨哈罗夫对这位记者宣称，"我看不出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带来了什么新东西，或者带来了什么更好的社会秩序。……我们和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犯罪和心理变态。差别在于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极端的典型，极度缺乏自由，思想上极度僵化，还有——最典型的——极度自负，自以为是最好的社会，尽管它肯定不是这样。"

萨哈罗夫早在一系列声明中提出广泛的改革意见——要有几个候选人的选举制度；创办不受党和国家控制的报刊和出版社；分散集中领导的经济；发展私营服务行业；取消党对任命主要职位的控制；老实承认苏联生活中消极的方面作为进行改革的基础。他攻击自吹自擂的苏联义务教育和公费医疗制度是一种"经济上的假象"，它以工资收入低微的医生和教师为基础，服务质量"极为低劣"。他谴责等级制度的"毒害"作用，在这种制度下党——政府——知识分子中的权贵享受"公开的和秘密的权利"，例如更好的学校、门诊所、特殊商店和"装在特殊信封里的额外工资制"。他抗议"经济军事化"已形成对和平的威胁，因为"任何国

家的军事支出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都没有象苏联这样高——百分之四十以上。”

引起轩然大波的是：他竟认为西方的压力是使苏联社会自由化的最主要的希望。我听到他在私底下恳求西方自由主义者用他们公开的抗议来保护受折磨的苏联自由思想者；恳求他们使他们自己的国家团结强盛，用来抗衡逐渐增长中的苏联实力。他还公开地对美国国会发出呼吁，要求在对莫斯科作出贸易让步时强迫它付出代价（除非克里姆林宫对自由移居国外敞开大门，否则不要给予对等的关税待遇或长期信贷）。他的理由是：如果苏联领导能够买进西方的高级技术而西方却不迫使它在国内实行自由化，克里姆林宫就会感到毫无必要去解放它自己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1968年8月21日，是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五周年纪念日，他在那天邀请外国记者到他公寓去，对假缓和的危险性提出了令人寒心的警告：

> 缓和而不〔在苏联〕实行民主化，缓和而西方在事实上接受苏联的竞赛规则，那是危险的，实际上决不会解决世界上的任何问题，而仅仅意味着在真实的或夸大了的苏联实力面前举手投降。这就意味着同苏联进行贸易，购买它的天然气和石油，而对其他方面一

律置之不顾。我认为这样的发展前途是危险的，因为它会用苏联社会中那种反民主的特性去毒害全世界，它会使苏联绕过靠它自己的力量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而集中力量去积蓄更大的实力。结果，在这一无法控制的官僚机器面前，全世界将束手无策。我认为如果让缓和完全不加限制地按苏联的条件向前发展，它就会对整个世界造成严重的威胁。这就意味着去造就一个封闭的国家，在那里发生的任何事情，外界都看不见；这就意味着去造成一个戴上了假面具、掩盖了真面目的国家。

然而，索尔仁尼琴发表宣言攻击苏联制度时，萨哈罗夫却大为惊惶。他不急于表示同意，因为他们正好站在两个极端，正象十九世纪俄罗斯主张西洋化的人同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一样。

我记得一个晚上，萨哈罗夫披上一件褪色的浴衣，穿了一双拖鞋坐在沙发上。他刚从一个学术界朋友那里听到一个消息说，他那所大学有批学生被索尔仁尼琴的幻想——一次神圣的俄罗斯文艺复兴——所迷惑，他因此心烦意乱。使他感到吃惊的是：这样一种幻想竟具有强大的潜在吸引力。他觉得非要公开向索尔

仁尼琴挑战不可，尽管在此以前，由于共同面临的无情压迫，他们很注意站在一起。萨哈罗夫还是用典型的俄罗斯方式，先谈到他对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和其他作品从道义上强有力地揭露了斯大林主义，他是如何“深为钦佩”。但是，索尔仁尼琴的“宗教的古老的浪漫主义”(按照他的说法)；索尔仁尼琴对现代科学的神秘的怀疑；索尔仁尼琴从斯拉夫文化优越论出发对西方的诽谤；索尔仁尼琴的孤立主义——摆脱国际间的贸易往来，摆脱为解决饥饿、卫生和环境问题而进行的全球性合作，并退缩到俄罗斯祖国的怀抱中去；这些却使他大为震惊。

在公开反驳中，萨哈罗夫象在私下一样赞扬小说家索尔仁尼琴。他发现他们具有共同的观点：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法定的意识形态；希望克里姆林宫放弃东欧国家；要求享受思想上和文化上的自由，包括宗教自由。但是他攻击索尔仁尼琴的权力主义的气味，说它是十分讨厌的，而且指责他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是“完全从半官方宣传武库里出来的”东西。他说，这正带有一点儿在整个冷战期间对苏联人民进行的那种“臭名昭著的军事爱国主义说教”的味道。他甚至暗示，索尔仁尼琴之突出地宣扬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虽然怀有和平的意图，却与斯大林的做法遥相呼应。萨哈罗夫警告说，“斯大林在大战期间，直到他临死以前，对

'驯服的'正统观念不加约束。索尔仁尼琴的建议和它彼此相象，这不但引人注目，而且值得我们提高警惕。"

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内部，左右两翼之间的分歧已经开始，而且是无法弥补的。

三角辩论中居第三角的是罗伊·麦德维杰夫，他是头脑冷静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化身。对于象彼得·雅基尔那样的反抗者的战斗的精神状态，他感到很不自在。后者长得魁梧结实，满脸络腮胡子，是在斯大林的集中营里磨炼出来的。罗伊故意避开索尔仁尼琴或萨哈罗夫的义愤的激情。他永远保持深思熟虑、坐而论道的改良家的那种头脑冷静、不感情用事的姿态。他能熟练地运用实用主义，在发表声明时，他既着眼于声明所产生的影响，又选择适当的时间；这就使当局要进行反击而又要避免使自己在西方陷入窘境，或在国内引起一场令人不快的丑闻就很困难了。

我在见到罗伊之前，很久就意识到他是我们的研究对象，从他身上可以研究有分寸的离经叛道。他似乎并不把心里话一古脑儿都说出来。他的抗议时常用苏联共产主义的生硬的语言来表达，使之对党组织内隐藏着的温和派有吸引力，并以公然宣传致力于恢复某种清除了斯大林主义和新斯大林主义罪恶偏向的、真正的更纯洁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作为护身符。

其他几位持不同政见者私下藐视地说：他仅仅是统治集团中的一个自由主义者而已，他要求的是更多的灵活性，希望让他和他的同伙能从西方得到更多的消息和出版物，使他们自己能过一种比较自由的生活，而并不真正要求苏联社会的变革。我还不止一次地听到更激进的持不同政见者挖苦他们说，麦德维杰夫兄弟两人——罗伊和若列斯——是"剩下来的仅有的忠实信徒"，因为在他们的理想主义中，他们把苏联共产主义想象成为具有人性的。

但是，如果言外之意是说他们所持的不同政见已化为乌有，那也是不公平的。罗伊·麦德维杰夫冒险在西方出版了他的著作《让历史去审判》；那是材料丰富、富有学术价值、全部用文件论证的对于斯大林时代警察国家的控诉书，出版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的前两年。他的孪生兄弟若列斯也写过一本著作，记述在特罗菲姆·李森科的假生物学统治下历年来对苏联遗传学的压迫；揭露苏联阻挠东西方科学交流的种种控制；剖析苏联邮政检查制度的秘密活动。他们两人还合写了《精神病问题》，这是一篇写得不渗入个人情感、却使读者感到毛骨悚然的报道，描写了若列斯怎样在 1970 年被诱骗关进精神病院以使其缄口不谈不同政见，后来罗伊又怎样使之成为一场国际丑闻才把他救了出来。索尔仁尼琴因出版《古拉格群岛》而遭

到倾盆大雨般的最后围攻时，罗伊胆敢分送文章，赞扬这部著作的真实性，谴责把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国是表示“当权者道德上的失败，因为这些人既不愿答复，也无法答复”他对斯大林时代的恐怖的“控诉”。

斯大林主义是驱使罗伊·麦德维杰夫持不同政见的症结所在。十三岁时，他和若列斯两人亲眼看到他们的父亲于 1938 年的一个子夜被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所逮捕。他们的父亲在俄国国内战争时期任红军政委，后来在托马切夫军政学院任政治指导员。他们和他的最后一次接触，是贴在满面胡子的脸上的紧紧拥抱。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见到他。

当我第一次看到麦德维杰夫弟兄，或者宁可说，第一次见到若列斯(因为罗伊喜欢缩在背后)时，就谈到了斯大林主义问题。若列斯比罗伊早出世二十分钟。长时期来我觉得，也许正是年长短短二十分钟使他成为两人中更大胆更勇猛的一个。率先同当局发生麻烦的是若列斯——他第一个把持不同政见的作品送往国外去出版，更早冒险私自会见西方人，充当索尔仁尼琴的中间人，而 1972 年在基辅举行国际老年医学大会时，他又设法活动出席，终于被克格勃拖走。罗伊在 1961 年入党(若列斯从未入党)，1969 年他发表声明，反对给斯大林恢复名誉的计划，因而被开除出党。不过，倒是罗伊写下了更扎实的对苏联社会的政治批评，提出

了改革的建议，特别是在新出版的著作《论社会主义民主》里；这本书，我在莫斯科时已读到了俄文版的大部分。

1971年后期，当我遇见若列斯时，他正在帮助罗伊逃避秘密警察的追踪，这幕插曲很有点喜剧味儿。罗伊曾以当过教师和校长的身分，在教育学研究所著述有关教育方面的小册子，可他忽然辞职不干了。他写的那本未经批准的有关斯大林的著作，即将在西方出版，他有充分的理由害怕报复。他的想法是这样：如果坐待大难临头，他肯定会终身列入黑名单并且受到酷刑。因此他决定先离开，躲起来，静待争论冷却下去后再说。但是在他能走一着棋之前，秘密警察早已派人监视他的公寓大楼了。

罗伊和若列斯是一对外貌非常相象的孪生子：衣冠整洁，差不多六英尺高，漂亮的长圆形脸，一头银发，比其他五十岁的苏联人看来都年轻。他们俩这样相象，连好朋友也分不出来。若列斯以戏弄秘密警察为乐，讲到他怎样设法让监视者受骗上当，在罗伊所住的公寓里几次进进出出，希望秘密警察把他认错而跟踪他，好让罗伊安然脱身。但是这套手法没有成功。“我看他们派了好手在干这件工作，”他哈哈大笑道。然而，罗伊戴上假发伪装妇女后终于设法溜了出来。他在南方隐居了几个月。当他回来时，他不能回到原来

的工作岗位上去，其他公家的活儿也都找不到。他靠西方的版税和他妻子的薪金生活。他之得以免受更严厉的惩罚，使我怀疑政府机构中还有对他表示同情的保护人。

差不多两年以后我认识了罗伊。当时若列斯逃往英国，继续他生物学家的事业，并代表弟兄两人同西方出版社联系。罗伊仍然当自由投稿作家，写些历史和散文，是我遇到的最谨小慎微、生活最有条理的俄国人(实际上，他的父亲是俄国人，母亲是犹太人)。他遵守一种有规律的日常工作习惯，不受社交生活的干扰；而社交生活也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他很少外出，完全不看电视和电影，读书则贪得无厌，还有条不紊地保藏着大量资料。他的住处是一间整洁的小书房，三面墙壁都是书架，我们常常就在那里谈话，相隔五、六英尺面对面坐着，背后两台短波收音机放送着各种节目，目的是去搞乱任何"室内窃听器"。

罗伊象一个善于管账的人那样挑三拣四，而且对此极为自豪。有一次我谈到他是何等一丝不苟和井井有条，他的嘴边露出了笑容。他解释说："我在中学高年级时，就已经想好我将怎样来安排资料。我变换过几次编目法，但是我总是知道怎样查到我所需要的任何材料。"

连克格勃在1972年搜查他的公寓时，对于他的资

料库也有深刻的印象。罗伊回忆时还洋洋自得。“他们只花了三小时，他们立刻知道他们遇到了一个认真的人，卷宗里包含的东西就是在标签上注明了的。所以他们能那么快完成任务。”为了比较，他提到另一位我也认识的持不同政见者，那是个精力充沛、富有魅力、但是杂乱无章得出奇的作家，他说，去搜查这个作家的家，“那就要花上他们四天时间了。”使我更感到惊奇的是，罗伊无须为了要求发还他的资料而去同秘密警察作无休止的争吵——这种事总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他在几年以前，早已养成习惯把所有材料都打印了复本，另有一套资料储备在安全处所。因此当秘密警察用车子装走了他的资料库后，他找出了另外一套又照常写作了。

这种处之泰然、沉着镇静的态度，是罗伊的特点。这和他提抗议仔细考虑分寸，故意不趋极端的策略是一致的；不然的话，就会使当局感到非绞死他不可了。他向我指出，他同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不同，苏联报刊从未攻击过他。他说，他还让官员们知道他的研究工作的基本路线。实际上，关于斯大林的那本书，是在1962年正当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时开始写的，当时还有在莫斯科公开出版的设想。但到1968年完稿时，党的路线改变了，正在为斯大林恢复名誉。但原稿仍送党的官员们过目。这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罗伊尽力使

这本书合人口味，把斯大林主义说成是“假共产主义”，是“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极不相容的”一种歪曲，而不说是制度上的根本性缺点；同时也部分地说明为什么他战战兢兢地对待苏联生活中那批“小斯大林们”，那些人现在都当了大官，他们就是借助于斯大林的清洗才升官发财的。即使当他写到现代苏联生活时，罗伊也避免对党进行正面攻击，而是批评新斯大林主义者的“变形”和保守的教条主义。

总之，罗伊·麦德维杰夫是持不同政见者之中一位非凡人物。他组成了一个忠心耿耿的反对派。在公开场合他谴责包括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在内的其他持不同政见者的“挑衅”行为和“极端”观点。虽然最近几年来他自己所持的不同政见正在深化，但他主要是一位实用主义者，一位想让苏联制度缓慢地自然而然地逐渐改良的渐进主义者；这种改良主要是由上面决定的，但也是对来自“统治机构中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和最向前看的一些个人之间的联盟”的压力所作出的反应，但也并非不发生新斯大林分子施加压力所造成的周期性后退和收缩。此外，他的做法，使我象其他人一样怀疑罗伊是否系党内一个暗藏的自由派的代言人。但是罗伊对我是谨慎的，他坚持说他只代表他个人说话，尽管他并不隐瞒与党有长时间的关系。

他常常告诉我：从长远来看，现代化将迫使制度朝

着较大的民主方向演变。复印机和最后由人造卫星转播的国外电视以及国外无线电广播，将使当局无法捂住盖子，阻止新闻和思想的传播。他觉得，现代经济的需要，将迫使经济的管理权分散，并使他所认为“笨拙、臃肿”的过度集中的国家计划和控制机构放松。他预言两代或三代人以后苏联将演变为多党制。

他对苏联制度的某些批评，似乎与早期萨哈罗夫的言论很相似。的确，他们在1970年与瓦连京·图尔钦一起参加了对苏联制度的重要批判。后者是苏联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少数苏联计算机语言中的一种语言的作者。罗伊集中火力攻击居统治地位的官僚寡头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以及特权制度和死板的行政管理。他觉得意识形态的控制压抑真正的辩论而使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僵化。他要求：缩减臃肿的党组织的范围与权力；工业试行南斯拉夫式的工人自治；对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对派不采取高压手段，却给以合法地公开活动的自由。他极力要求在科学和学术生活中有较大的获得情报的自由，他花言巧语地对隐藏在党内的自由主义者说：较大的灵活性与放松控制将使苏联共产主义具有新的活力（他觉得苏联共产主义对群众已丧失了吸引力）。“一种正常的政治辩论过程，只会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发展，促进一代新的、更有能力的共产党领导人的成长”，这是他在《论社会主义

的民主》的 1975 年英文版本中说的。

有时，听起来麦德维杰夫好象在鼓吹杜布切克共产主义（虽然他批评捷克斯洛伐克改革家们搞得太猛太急了）。1974 年春，就某一个问题答复索尔仁尼琴时，麦德维杰夫要求“言论与信念的绝对自由”，结社与集会的自由，宣传宗教的自由，各种政治团体和党派候选人公开竞选的自由，但是都始终不超出社会主义制度的范围。不过，其他时候他却闪烁其词。他嘲笑苏联书刊审查制度竟如此严厉，甚至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能通过审查官的审查，如果他们今天还在写作的话。但是他又主张出版自由必须有所限制，不但要保守国家机密，而且要保守党的机密和专业方面的机密。虽然他大谈其他党派，但对于除共产党以外其他党派是否能真正掌握权力，他却不置一词。

更重要的是，他的不同政见，在整个气质方面与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迥然不同。麦德维杰夫表现出一种超然的哲学态度和容忍的气氛，而他们则试图鼓动其他人们大声疾呼，并强烈要求现在就实行改革。他与索尔仁尼琴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他摒弃索尔仁尼琴的宗教性的俄罗斯文化优越论，认为这既无吸引力又不现实。他的理由是，宗教在现代并不能吸引足够多的人作为社会的支持。如果把索尔仁尼琴的计划强加推行，将有蜕化为专制神权国家的危险，成为西班牙

宗教法庭的翻版。

罗伊·麦德维杰夫与萨哈罗夫的分歧表现得更为微妙。有几年他们尽管私下意见不同，当众还是站在一起，共同呼吁对社会各阶层实行自由化和放松控制。但是当萨哈罗夫强烈要求西方迫使莫斯科进行改革时，罗伊的实用主义的和忠诚的性格，迫使他与萨哈罗夫破裂。萨哈罗夫警告西方不要上假缓和的当：通过假缓和，西方大有被骗去帮助加强苏联政权和缩短技术差距的危险。当时我听到罗伊私下坚持他的看法：如果美国对于贸易和贷款提出先决条件，这种侮辱性的最后通牒，将激怒克里姆林宫并招致适得其反的恶果。到了1974年12月，他便举出莫斯科取消苏美贸易协定来证实他的话。

罗伊的看法是：西方能影响苏联对于个别事件的处理，但是萨哈罗夫以及其他人们却过高估计了西方对于苏联内部总的情况所发生的影响。按照罗伊的推理，从长远来看，西方领袖们对于苏联内部的改革和问题，行将失去兴趣。他所希望的是，十至十五年内，通过缓和而与西方增加接触，将助长苏联领导集团内的改革趋势。但他作为一位正直的历史学家，承认缓和的开头两年里“对于持不同政见者所施加的压力甚至会增加”，而镇压的手段则还要加紧。

萨哈罗夫本人的遭遇就是一个确切的例证。1973年8月他正在黑海休假，当时，官方指使的对他的诽谤，有如洪水决堤，滚滚而来。他和他的妻子正躺在索契附近的海滩上。他的妻子告诉我，当时他们从旁人的半导体收音机里听到连续不断地尖刻批评这位“叛徒”科学家出卖灵魂给西方的广播（只字不提他帮助苏联制造氢弹所起的作用）。在他们周围，一群一群休假的人开始愤怒起来，谈论萨哈罗夫，痛骂他的不忠和想象中的他对缓和的反对，而他正躺在他们中间，谁也不认识他。萨哈罗夫的妻子想立即离开，但是萨哈罗夫却逗留不去。他走到一群人中间，听他们骂过他后问道，是否有谁真正认识萨哈罗夫或者看过他的著作。谁也没有。虽然这群人对于苏联在其他事件上所作的宣传总是抱着老一套的怀疑态度，但在萨哈罗夫事件上却听信了表面文章的宣传。他仍不说自己是谁，镇静地建议说，值得了解萨哈罗夫真正说过什么，因为“也许他毕竟是一个好心好意的人”。他的妻子不能再容忍下去了，赶忙催他离开海滩，生怕如果被人发觉的话，他可能受到伤害。

在维利·勃兰特、奥地利总理布伦诺·克赖斯基、瑞典外交大臣克里斯特·威克曼等人提出了抗议以及美国科学院院长菲利普·汉德勒打电报警告苏联科学院后，猛烈攻击萨哈罗夫的宣传到9月9日便突然

停止了。汉德勒严厉地通知对方,"折磨或者监禁萨哈罗夫,将严重地影响美国与苏联两国科学团体之间的关系,并且将会损害我们最近对于增加交流和合作所作的各种努力。"

这才触及了要害。克里姆林宫显然觉得,把反对萨哈罗夫的运动进行到底,要付的代价变得太高了。这就证明了西方的干涉具有威慑作用,得以防止萨哈罗夫可能被逮捕(他曾被副总检察长和秘密警察审问和警告过)或被拘留进精神病院,被苏联科学院开除——这些都是党组织拚命在幕后试图策划的。

这是一个胜利,然而是一个以重大牺牲换来的胜利。因为克里姆林宫业已成功地削弱了萨哈罗夫在他有天然威望的领域——苏联科学界——中的势力。他成为一个被搞得孤立和意气沮丧的人。1968年,成千上万的科学家阅读过他发表的第一篇关于和平共处的备忘录,但,据我所认识的莫斯科的科学家说,至今没有几个人看过他随后所发表的更尖锐的重要声明。我不但在莫斯科听到如此情况,西伯利亚西部的新西伯利亚的一位物理学家、摩尔达维亚首都基什尼奥夫的一位生物学家,以及其他一些人也都如此说。公开的宣传运动谴责他反对缓和,窃窃私议则说他有点儿疯狂,这两者都使他名誉扫地。

1974年末,一位医药科学家告诉我:"在过去的两

年里，对于萨哈罗夫的敬仰已经下降了。人们认为他是一个反常的、有些意志薄弱、离奇、感情用事以及不可捉摸的人。”及至这位科学家知道我认识萨哈罗夫时，他就仔细问我萨哈罗夫看上去是否神经正常，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想对萨哈罗夫表同情，但是他很谨慎小心。他的态度使人想起女作家莉季娅·丘科夫斯卡娅的聪明的观察：“那堵由当局怀着恶意井井有条地筑起来的、把精神价值的创造者同那些为之创造精神价值的人们隔离开来的隔音墙，已变得更高和更坚固了。”对这位女作家，局外人知之甚少，而她对于苏联生活实际的活动方式却揭露得非常充分。

当局坚持不懈地把知识分子赶到两个阵营中的一个阵营中去：或者公开持不同政见，以致被告发或成为被社会所排斥的人；或者变为参与镇压的人。据持不同政见的科学家瓦连京·图尔钦说，这是苏联政权组织这许多著名科学家、作家、学者以及知识分子参加对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集体诽谤的主要目的之一。他所持的理由是：这些人觉得由于这一行动已在道义上和当局妥协，罪重难返，因而不管他们私下的观点如何，他们还是要继续参加抨击所有离经叛道者。

图尔钦是一位细长的、说话温和、不愿抛头露面的科学家。他感受到自身被追踪的极大压力。他为自己对萨哈罗夫的忠诚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1973年末恶

意中伤倾泻而来的时候，几乎只有他一人为萨哈罗夫辩护。报复是飞快的。在他工作的单位——建筑工业计算机系统研究所——开了一个大会。这是典型的批判会之一，会上，所长、党委书记以及其他工作人员，都公开谴责图尔钦左袒萨哈罗夫。有人要求把他免职，虽然在反萨哈罗夫运动结束时暂时放过了他。但他立即觉察出来那些私下同情他的同事们都冷冷地远远避开他。他开始分析他所谓的缓和时代的"镇压技术"。

有一个晚上，他说："人群中有一种难以相信的犬儒主义。""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于没有大胆说话而觉得有罪。他们无法了解，他怎么会有勇气去干他们本人所不能干的事。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他以安慰他们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在欺骗自身之外的每一个人。'苏联种的人'，就好象妓女一样，因为她自己是妓女，便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苏联人认为整个世界是分为党派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党或另一党的成员，而且根本没有真正的诚实，根本没有人支持真理。如果有人说他是超党派的，并且是力图只讲真理的，那么，他是在说谎。这种犬儒主义给当局帮了大忙：使知识分子就范，把'不驯服'的持不同政见者排斥于社会之外。人们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听西方的无线电广播，只要普遍存在这种犬儒主义，认为那不

过是其他一方在说话，就无关紧要了。这种犬儒主义提供了极权国家今天的稳定，以代替斯大林时期的恐怖。”

萨哈罗夫自己告诉我，除了有几个象图尔钦这样的朋友以外，实际上他被大家所摒弃。过去经常到他的乡间别墅来的第一流科学家们，在1973年运动之后，几乎没有一个人还来探望他。对权势集团中的人来说，私自和他接触业已成为道德败坏的事了。他自己的朋友和支持者都吃苦受难。两位比较年轻的和他一起组织人权委员会的物理学家，瓦列里·恰利泽和安德烈·特维尔多赫列勃夫，都被解除了职务。特维尔多赫列勃夫最后终于被逮捕。流放西伯利亚的威胁使恰利泽感到太可怕了，所以他同意“出去”，到美国去了。1974年夏，根据委婉的说法，图尔钦由于“社会方面的理由”而被解除了职务。他被列入经济黑名单，这就迫使至少有四个研究所拒绝录用他，因为他不愿保证缄口不言。1975年10月我最后听见他的消息时，他仍未获得工作。克格勃审问了他几次，搜查了他的公寓，没收了他的打字机以及他的许多私人文稿。当他还未被逮捕送去西伯利亚之前，他曾经想方设法，要以访美学者身分去美国。但是这条移居的途径也被阻塞了。

萨哈罗夫私下对我承认，在1973年展开反对他的

运动之后，他变得垂头丧气，竟申请让他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去，并且为他的继子、继女和她的丈夫等人安排进美国马萨诸塞理工学院，这显而易见是作为一种永久性的流放。从理论上说，他本人约定的期限是一年；但他知道如果真出去的话，他可能永远回不了莫斯科。主要是由于这个缘故，他在索尔仁尼琴被强制放逐以后，就取消了出国的想法。他觉得，他在道义上不得不留下，不应听任苏联的不同政见缺少一个权威发言人。但是，匿名信用死亡来威胁他的子女与孙儿，行政当局对他家属一再作难，迁延数月拒绝让他的妻子为防止眼睛失明而去意大利治疗，凡此种种所造成的紧张，都折磨得他身体衰弱下去。虽然 1975 年 10 月的诺贝尔和平奖金无疑地抬举了他和他的一小群朋友，他的抗议却愈来愈成为一个孤独的呼声，而不是有他的支持者也参加在内的大合唱。1975 年夏秋之交，他为反对对他家属的威胁和"谋害"发出痛苦的呼吁；他说，他的家人正在被用来作为反对他的"人质"。

这也并非仅仅是萨哈罗夫个人的处境。这反映了俄国不同政见更普遍的退缩。立陶宛和亚美尼亚的许多民族主义者团体，或者象浸礼会教徒那样的民间宗教团体，都定期发出集体的呼吁书或抗议，但是俄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持的不同政见进入七十年代以来却在逐渐土崩瓦解了。如果超级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大

辩论扼要地表现了他们意见的实质和活力，这也证明了这种直率的离经叛道愈来愈成为这几个世界闻名的人物的奢侈品了。几百名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那个松散的联合，即有点自夸的所谓“民主运动”，到七十年代中已被驱散、放逐和搞得意气消沉了。许多一度同罗伊·麦德维杰夫一样希望从内部使苏联社会自由化的人们，也已被无济于事的感觉所压倒了。

这是一个显著的对照，在六十年代初期，大群的人曾经违抗当局，聚集在普希金广场公开朗诵诗篇；而在六十年代中期，确实有几百名属于权势集团的科学家、作家、学者和文化界知名人物，冒着危险在请愿书上签名，抗议审问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和尤利·丹尼尔（这两位被控非法用假名在国外出版“反苏”作品）。这就触发了1965至1968年的群众抗议浪潮。一位年迈的莫斯科作家告诉我：“我们所有的人当时都希望通过对制度的公开反抗，事情最后总会变好一点。这是一个力量悬殊的斗争，我们也知道这一点。我们抱有希望。但是毫无结果。唉，有什么用处呢？”

记得1972年秋天，尼克松—勃列日涅夫最高级会谈以后缓和之潮初涌之际，我会见了一位有成就的莫斯科数学家，他解释了为什么他不情愿在反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一轮新的政治审讯的抗议书上签字。这是他的一种转变，因为过去他对于传布请愿书很是积极。

"这是另一张废纸,"他失望地说,"你的良心告诉你不能沉默,但是你知道这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们尝试过了。但是,除了更多的人被迫害以外,并没发生什么作用。"他是指几十个在早期的抗议书上签了名而被开除出党和被免职的人们。

那种徒然和幻灭之感甚至影响了最坚强的活动家。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尔在西伯利亚流放多年归来时,他们便不再加入那些活跃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行列,而是保持沉默,安分守己。年轻女诗人娜塔利亚·格尔巴尼耶夫斯卡娅,由于参加在红场举行的反对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简短的示威游行,被关进精神病院;她从医院出来后,仍旧写诗,可是养育儿女,不再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了。其他一些人也都受到了屈辱,象拉丽萨·鲍戈拉兹、阿纳托利·马尔钦科和亚历山大·金兹贝格等人,当局禁止他们重回莫斯科。马尔钦科则由于重回莫斯科终于在1975年被送回强迫劳动营。另一杰出的持不同政见者安德烈·阿马尔里克,在西伯利亚流放六年后于1975年秋企图再开始积极活动时,也受到了可能遭到同样命运的威吓。

在我看来,这好象是合乎逻辑的:缓和的曙光会鼓励苏联知识分子,特别是科学家和学者,重振旗鼓来支持萨哈罗夫和麦德维杰夫关于与西方开展更自由和更直接的互访和交流情报的主张。然而,人们对这些问题

却毫无反响，死气沉沉。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当局严密控制了所有出国以及与西方接触的途径，并且利用这种东西方交流的机会使之成为强制意识形态一致化的新手段。

时常有人告诉我：把一个科学家从一个出国代表团除名，或者不准一位学者与来访的西方团体会谈，其直接借口就是这个人偏离了官方的路线，至于公开持不同政见，那就更不用说了。我个人也知道一些事例，那些与西方人士过分自由地友好来往以及过分健谈的人，都失去了下次出国的机会。人们都渴望保持他们自己的档案清白并表明他们忠诚可靠。

一位青年生物学家责备我说："你们美国人一点也不了解我们的制度如何运行。你们想象缓和会自动地使我们的制度开放。对于那些可靠的'党员'科学家们，这是一件'好事'。他们得以一再出国游历。剩下我们这些人就必须表现得非常好，如果我们要想获得任何机会的话。所以你看，缓和给与当局一个新方法来奖励和惩罚我们。"

有一位中年的电影剧本作家，曾经游历东欧，但从未准许他游历西方，他提出的批评是尖刻的。"我知道一些作家会在任何声明书上签字，任意痛骂萨哈罗夫或者当局所指定的任何人，以便作品得以出版或者个人得以出国游历。"他愤怒地说，"我知道有一位科学家，

为了到日本游历，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你们应当理解这是一件多么阴险恶毒的事。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会那样做。他们为了到日本作三星期的游历，甚至不惜告发他们自己的同事。”

罗伊·麦德维杰夫对我谈起，“最近几年来镇压的技术变得更精明了。过去，镇压总是搞得大大超过了必要。斯大林杀害了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这时候其实只要逮捕一千人便足以控制人民了。我们的领袖们从来不懂得搞得恰到好处以及不要过头。但是他们终于发现，要使人民不作声，并无必要把他们关进监狱或者精神病院。还有其他办法。”

正是由于索尔仁尼琴以及其他一些人十分强调斯大林的大规模恐怖，国外的人们才看不到七十年代苏联更奥妙然而更强有力的压制手段。现代苏联的专制主义比斯大林牌号的更加有效——虽然并非完全有效——因为用少得多的肉体暴行达到了生活中几乎完全的顺从。人们已经习惯于顺从了。

克格勃仍旧是一个可怕的组织——据熟悉情况的西方人估计，大约有五十多万人。到处使我觉察到它的存在，在埃里温或里加的街上我都被人钉过梢，在中亚细亚受到警探的款待，他们把比较正常的市民从我的餐桌旁边强行赶走，或者在一辆深夜“出租汽车”的严密

监视下，在萨哈罗夫住的公寓外面把我的车胎戳破。

关于苏联公安机关那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庞大人力，我亲眼目睹的最强烈印象是在1972年5月末尼克松总统到达莫斯科时获得的。他在莫斯科市中心西南二十英里的伏努科沃机场着陆。几千名穿灰色制服的警察从市区一直排到接近城郊的地方。在他们后面你可以看到第二列便衣人员，其队伍延伸出去，经过民警行列，一路直排到机场。一英里复一英里，每二十码左右便有一个影影绰绰的人物在树林中徘徊。我禁不住怀疑这么庞大的人力平时究竟干些什么——跟踪居民，偷听电话，编档案材料，审问，讹诈，搜查，逮捕。

大剧院芭蕾舞团举行《天鹅湖》专场演出来欢迎尼克松。随后据一些俄国人告诉我，大厅中挤满了克格勃官员和他们的家属，再加上党政方面其他少数忠诚干部。据大剧院经理处的人告诉我，有些克格勃的分队是用公共汽车从外省城市送来的，以保证观众绝对可靠。大剧院管弦乐队一位音乐家随后向朋友发牢骚说，那天晚上那里是一个"死厅"，没有一点温暖。他说："你能感觉到这些人并不是为了看表演而来的。他们简直无动于衷。"

1970年苏联劳改营群岛的人口约有一百至二百万(究竟多少，这取决于你相信西方哪一个估计；苏联则从未宣布过)，其中包括一万至二万政治犯——从乌

克兰人、立陶宛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其他民族主义者，到拒绝服兵役或者坚持给他们的儿童受宗教训练的那些宗教信徒，到闻名西方的持不同政见的民主人士。这是一支庞大的队伍，但是与斯大林监禁几百万政治犯相比还差得很远。

不但数量较少，而且斯大林时代那种完全不能预知的武断专横的恐怖也已减少。最普通的人可以不致于蒙克格勃的光顾，尽管在苏联每一工厂、院校、机关或者集体农庄，都有人事科，亦即所谓"第一科"，保管着每个人的全套档案材料。甚至持不同政见者也会承认，他们进行抗议是明明知道冒着被捕危险的，而固守党的路线和避免政治上离经叛道的普通人，一般也不会受到政治警察的折磨。

对于那些在政治方面背离党的路线的人，最有效力和广泛采用的控制方法，是把他们列入经济方面的黑名单。这种方法，西方在过去政治迫害和恐赤时期也曾使用过，但打击力量远不及经济集权化国家那样严重。在那里国家实际上是唯一的雇主，个人都有一本工作簿，其中登记他一生的工作经历，载明他的政治与职业情况；而每一机构都有自己的人事科来核查新雇人员的政治背景。

西方人士可能大部分忘记了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但是苏联自由主义者却深切地感觉到那年

是一个压迫的时期——特别是经济报复和列入黑名单——因为克里姆林宫担心捷克斯洛伐克自由主义的坏影响将在苏联知识分子中间散播开来。勃列日涅夫似乎对于他在1968年2月底访问布拉格时所目睹的一切特别感到焦急不安，因为他回国后便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演说，警告说苏联的"叛徒不能指望获得豁免"。俄国人把这话看作即将采取严厉手段的预兆。米哈伊尔·阿古尔斯基是一位系统分析家，也讲过列宁图书馆的一些内幕。他的确告诉我，他和其他一些犹太人突然发觉，原来答应给他们安排的工作，那年春季都被取消了。因为犹太人都是抗议书签名者中的突出人物，行政官员对于录用他们都格外小心谨慎。莫斯科大学有几位数学家受到了申斥，有些人则在那年夏天被剥夺了他们的工作。从列宁格勒到西伯利亚西部的新西伯利亚，各研究所的离经叛道的科学家们，其遭遇也同样如此。解雇和降级的浪潮，给知识界的生活带来了严寒。

这种事件我听过很多，不胜枚举，但只要举出两件事便能说明国家作为一个垄断性雇主使离经叛道者就范的力量。一位朋友给我讲了列昂尼德·彼得罗夫斯基的情况。彼得罗夫斯基是一位党员，出身于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家庭。他的祖父于1922年曾任后来成为最高苏维埃的那个机构的第一任主席。他本人在莫斯

科列宁博物馆研究所有一个挺不错的研究职位。随着捷克斯洛伐克和莫斯科的事态发展，他象其他人一样，担心新的斯大林主义浪潮会到来。他在几个不公开的集会上攻击新斯大林主义，并且私下散发文章，对于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趋势提出警告。其中有一篇在瑞典出版。

彼得罗夫斯基立即被开除出党和撤职。过去，他曾经替中央报纸撰写一些关于苏联历史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文章，可以得到稿费的额外收入，但是现在这条路被堵塞了。有一阵他偷偷地把几篇文章投到边远一些州的报社去，那里还不知道他已被列入黑名单。但是不多久那条稿费来源也断绝了。

一位我们共同的朋友告诉我:“他的家庭过着艰苦的生活。他的妻子是一位普通教师。她的收入每月不到一百卢布。他们有两个小孩。四个人靠这样微小的收入在莫斯科生活是不可能的。彼得罗夫斯基根本无法获得任何工作。他们走投无路。由于彼得罗夫斯基的家庭背景，他恳求中央委员会不管在什么单位里给他一个工作。但没有回音。他恳求了许多次。仍旧没有回音。在一段长时间以后——据我所知至少有一年——他们终于把他叫去，在国家档案馆给了他一个工作。现在他没有心情提任何抗议了。他是一个好人，忠诚老实，但沉默寡言。他是害怕了。”

这种方法的变化是无穷无尽的，但是其用意和效果几乎总是相同的。我遇见一位愁眉苦脸的艺术史家，他是一个身材高大、步履蹒跚的人，有一对忧郁的眼睛，一副清白无辜而受到损害的模样。在长达七年的过程之中，他被无情地从他所找到的每一工作岗位上驱逐出去，因为他在一份——仅仅这一份——替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辩护的请愿书上签了名。他多年在艺术出版社工作，1966年却非法地被解除了职务。他到法庭去控诉官僚机构用欺骗手段使他失去工作的阴谋。这毫无用处。他告诉我，法官私下承认，本来对这个案件打算作出的判决是有利于他的，后来接到了上级的秘密指令，才作出不利于他的判决。后来他获得了几个临时工作，在某一所学校教书，在一个研究所上班，在图书馆当档案保管员，最后他饥不择食，甚至在书库做搬书的工作。但是政治警察总是不放松他，他总是被解职。当我遇见他时，他正失业；由于自己毫无希望的处境，依靠他妻子担任大学语文教师的不高的工资过活，使他变得麻木不仁。他的前途是终身失业，因为他远不象彼得罗夫斯基那样有特殊的关系。

我知道有些作家被列入黑名单将近十年之久，他们还活着，只是由于他们的妻子在工作，或者由于文学界的朋友偷偷地把他们的作品设法用假名字出版。其

他的人们虽然未被解职，但仅仅由于社会关系而被认为有罪，以致前途黯淡。以阿纳托利为例，他是一位有才能、有前途、可爱的三十岁的青年物理学家，在距莫斯科八十英里的奥勃宁斯克的一个研究所工作。1969年，他以党员身分写信给在卡卢加的州党委会，温和地建议他们重行审查有关两位科学界同事因犯很小的政治错误而受到严厉处分的案件。他的这封信是私人性质的、内部的，而且合乎党章的规定，即党员可以向上级提出问题。政治上有识之士当然懂得这是神话，因此他们保持沉默。但阿纳托利是受良心驱使而为他的两位朋友辩护的。

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召开了会议。委员会主席指示其他三十二位委员说，阿纳托利的来信显示了他政治上的不成熟，应给以降级处分（据别人告诉我，这是党的总部下达的命令）。虽然其他委员喜欢阿纳托利，并且知道他的业务才能，但只有一人为他说话，责问为何对于这封温和的信如此小题大做。其他几个人立即把矛头转向这个人，攻击他反对主席所规定的方针。再没有其他的人敢于为阿纳托利辩护了。于是采取不记名投票表决。所有三十三个人都投票赞成降级，甚至原来为阿纳托利辩护的那一位也包括在内。我还听见过其他几件集体制裁的事例，每个人都照党所吩咐的去做，甚至违反自己的良心，尽管投票是不记名的。

有些持不同政见者说，这种强制的一致性是"我们最大的耻辱"。

上述三人——彼得罗夫斯基、艺术史家或阿纳托利——没有一个是最坚强的持不同政见者。象许多其他的人那样，他们是消极地在政治上不满，只不过偶然有过一次公开的行动。然而黑名单、降级和经济压力足以使他们屈服；而且足以使苏联社会中某一部分的全体成员受到威吓，否则这一部分将成为萨哈罗夫的支持者，并且毫无疑问也将卷入六十年代末越来越公开的辩论和不同政见的潮流。但过去五年来，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联盟，有效地促使六十年代初期的骚动和六十年代中期的更积极的活动朝后倒退，并且对知识界的这些并无定形但重要的分子再度实施有效的控制。

在对付最坚强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战术方面，政府要严厉得多，但已不如过去那样倾向于过多的杀戮了。有些持不同政见者把这种精明的做法归因于 1967 年成为秘密警察头子的尤里·安德罗波夫，许多人认为他是政治局中最聪明的一位委员。缓和也需要更大的慎重。在敏感的时刻都避免采取严厉措施，例如：西方重要领导人即将来访，东西方谈判的关键时期，或者勃列日涅夫即将去西方访问。在外国外交官或新闻记者无法到达的外省，兜捕或者审问可以不受阻碍地

进行。但是在莫斯科，秘密警察小心地选择他们进行报复的时机，并且精明地区分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次要的不出名的人物。前者遭受的苦难将会引起西方的同情和抗议，后者被处死刑也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不会危及缓和的气候。

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可以免受最严厉的刑罚，但是他们的朋友的处境就要差些。我已经提过萨哈罗夫的同事们所受的迫害。索尔仁尼琴被流放以后，他的朋友中有一位叫亚历山大·戈尔洛夫的控制论专家，因为1971年偶然碰上警察搜查索尔仁尼琴的夏季别墅，就被毫不客气地解除了职务，就这样为了一点友谊的表示而终身被列入黑名单。更恶劣的是，一位叫加勃里尔·苏佩尔芬的懦弱而年轻的档案保管员，他曾抽出一部分时间替索尔仁尼琴作誊写工作，因而被拖到外省的奥廖尔城，隔离监禁了八个月。接着，他出庭否认他在残酷的讯问下所招认的口供，随后他就被判在集中营监禁七年，并流放西伯利亚——由于他做了比索尔仁尼琴本人所做的要小而又小的事。

这种事情不胜枚举，因为苏联当局对待持不同政见者，如同在官僚阶层本身的圈子里那样，顽固地一贯注意他们的地位和重要性。有声望的人可以有言论和行动而不予追究，如果这种事情出在不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身上，那就会被处死刑。反对官方信仰的作家

莉季娅·丘科夫斯卡娅由于庇护索尔仁尼琴和支持萨哈罗夫，终于被开除出作家协会。她几次指出：在偏僻城市里，“小人物”之被审问和定罪，只不过因为藏有她所写的几篇反斯大林的作品和抗议书；而她本人却部分地托庇于自己已被败坏的名声和家庭关系，仍旧逍遥法外。这种有意识的双重标准，不但使那些较有名望的持不同政见者陷于孤立，而且也使他们感到痛苦：其他一些人说了他们的心里话却比他们冒更大的危险，这就使他们的心头时常萦绕着自己有罪的感觉。

克格勃行之有效的另一个挫伤士气的手法，是挑拨持不同政见者的各派彼此互相攻击，并且对持不同政见者必须时常提防告密者的那种自然的、自卫的小心谨慎，狡猾地加以利用。我记得一位作家愁容满面地叙述秘密警察如何恶毒地捏造谣言，污蔑他是他们的特务之一，用来毒害他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所谓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麦德维杰夫之间的辩论，虽然并非克格勃所制造出来的，却有悲剧性的恶毒攻击个人的一面，使持不同政见者愈来愈缩小的队伍彼此不和。但是，最有名的和最具破坏性的事件是有关彼得·雅基尔的。他的父亲曾经是苏联陆军高级将领之一，在 1937 年被斯大林清洗、处死。

雅基尔还只是一个十四岁的儿童时，便被送入集中营，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三十岁中的十六年。当我遇

见他时，他将近五十岁，是一位大胆、亲切、头发蓬松、嗜酒、好捉弄人的持不同政见者。他的粗俗与直率的反斯大林主义和无所畏惧的精神，使他成为年轻一代持不同政见者的父辈人物。对记者来说，他已成为获得消息和《时事纪事》双月刊的一个重要途径。《时事纪事》是不同政见者的主要刊物，冷静地记载他们的活动以及镇压他们的情况。雅基尔的浮夸和轻率，使那些比较小心谨慎的持不同政见者担忧，深恐他的圈子里有密告者渗入。可悲的是他们竟说对了。

1971 年末，领导层决定要砸烂这个双月刊以及它的通讯网和发行网。到 1972 年年中他们把注意力集中于雅基尔和他的朋友、也在集中营里关过的维克多·克拉辛。两人都被逮捕，分别隔离监禁了几个月。最后被审问者逼得意志消沉，他们竟在口供中伪称与国外反苏移民团体有联系，并且牵连了其他许多人。几个城市的几十个知识分子，也许多至二百人，都被审问，有些人被迫与雅基尔和克拉辛作痛苦的折磨灵魂的对质。雅基尔与克拉辛力劝他们承认参加某些活动(其中有真有假)，因为克格勃“已经什么都晓得了。”这对于持不同政见者的士气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太多的人曾经认为雅基尔是磐石一样可资信赖的，但是当他开始供认时，他们的幻梦便不堪忍受地破灭了；不但是对他个人，而且是对于共同努力使苏联社会自由

化的任何希望都感到幻灭了。

一位列宁格勒的持不同政见者告诉我，“真令人痛心——痛心得不忍去谈它了。”

“别再提了，”一位灰白头发的莫斯科的译员说。“这表明社团在政治方面和道德方面都极为危险——政治方面是因为你可能被警察逮捕，道德方面是由于任何社团都可能被渗透，从内部被腐蚀掉。”

有些持不同政见者名声太大了，不容易既加以镇压又不引起公愤；有些人意志太坚强了，不可能把他们转变为告密者。说也奇怪，缓和倒为秘密警察对付这些人提供了一个最后的意外收获。对付他们，新的方法就是驱逐出境。实际上，作为一种策略，这也并不是完全新的：列宁和早期的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后一段时期内也用过同样的方法清除了一批重要的反共知识分子。斯大林于 1929 年放逐了他的敌手托洛茨基。在七十年代，索尔仁尼琴是主要的靶子。在迅速策动下，苏联当局放逐了他，使自己摆脱了国内最讨厌的批评家。不管西方感到如何为难，西方可无力使他不被放逐，但对于索尔仁尼琴不致饮弹而亡或被判流放西伯利亚老朽以终却感到宽慰。对莫斯科来说，把他放逐是极为成功的一着棋子。六个月后，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在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中仍是热门的禁书，但是

他本人已远非一种明显的势力和影响了。

在未被许多西方人士注意的情况下，整整一批更大胆反抗或直言不讳的知识分子也受到这种方式的对待——象索尔仁尼琴那样被赶到西方去，他们大部分都在犹太移民的洪流中出去了，虽然有些并非犹太人：大提琴手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诗人约瑟夫·勃罗德斯基；作家维克多·涅克拉索夫，弗拉基米尔·马克西莫夫，以及阿纳托利·贾科勃松；讽刺作家兼文学批评家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物理学家瓦列里·恰利泽；政论家亚历山大·扬诺夫；剧本作家兼地下民谣歌手亚历山大·加利奇；索尔仁尼琴的朋友、著名语言学家叶菲姆·叶特金德；以及其他的人。对有些人克格勃直截了当地警告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到西方去，或者被装到西伯利亚去，承受周而复始无穷无尽的审问和定罪判刑。

巴维尔·李维诺夫事件是新策略的典型例证。斯大林的外交部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的孙子巴维尔是一位高大、强壮、有点象爱尔兰人的青年，笑容可掬，态度真挚直率。1968 年 8 月 25 日为反对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在红场示威游行时，他是七个参加者之一；他因此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近满洲边界的一个污秽、遥远、严寒的乡村里。虽然巴维尔学的是物理学，尽管他所流放的那个乡村的地方学校里并无物理教师，但他

却必须在萤石矿中干体力劳动的活儿。他在1972年12月回到莫斯科时找不到正式工作，也无法把他和他的妻子、两个年幼小孩的户口重新迁回莫斯科。在审查雅基尔案件时，他受到审问和讹诈，说是他如果能与克格勃合作，就可以安排工作并领到居住许可证。他拒绝了。他想方设法找到了私人教授中学生物理以及翻译英文科学著作的工作，也取得了莫斯科的户口。但是他重新参加了人权运动，因而几次被克格勃拘押。

1973年12月5日晚事态发展到了顶点，当时巴维尔正向普希金广场方向前进，准备在那里举行人权运动一年一次的简短的示威活动。在到广场还有半条街的距离时，有四个自称为克格勃的人把他围住。他们命令他跟他们一起走。巴维尔随后告诉我："我拒绝了。我要求看他们的证件。他们什么也不让我看。头头是一个矮胖子，阔肩膀，象拳击手一样的脸，塌鼻子，面目可憎。他告诉我：'如果你不去，就要有一场搏斗，你就要因为无赖行为坐十五天牢。'所以我答应去了。"他们领他到当地的警察分局。头头把巴维尔带到一个小房间内，同他谈话二十分钟。饶有趣味的是，巴维尔称这个狮子鼻的特务为克格勃里的"我的教父"，因为"他对于我的案子知道得一清二楚，我的生平历史，我的私生活，我的家庭。大概他是负责管我的。"

这个克格勃的人说："哦，李维诺夫，你真正又回到

你的老行当了。当然，你一定晓得我们对此是不会宽容的。我们不能容忍这种事情。最好你还是停止干这种事，否则你会落到比上次糟糕得多的处境——而且要许多年。”巴维尔认为这是一个明白的警告，行将把他长期关在劳动营。但是，随即提出一个可供选择的机会。这个克格勃的人又说：“我晓得西方以及以色列邀请过你。如果你申请出国签证，这对大家来说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否则你将往东去。”

选择的途径是很清楚的。巴维尔说：“他并没有给我肯定的保证，但是当然有相互的谅解。他们一定知道我的感受，因为我并没有隐瞒对自已的前途感到多么悲观失望。我甚至对我的朋友谈过，我想到国外去。当然，克格勃对于那些在西方享有名声的人，与其把他们送到西伯利亚去，毋宁让他们去国外，因为这样引起的公愤要小些。”

巴维尔在一个月内便申请移居国外；两个月后他便在美国了。对一些重要的案件，一再采取这种解决方式，提供同样的选择——要么到西方去而被人遗忘，要么就在这里慢慢地被毁灭。有相当数量的人象李维诺夫那样选择了到西方去这条路，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从此永远失去了他们。

一位仍留居国内的妇女悲叹说：“我们多么寂寞。第一个是索尔仁尼琴；然后是涅克拉索夫、加利奇、李

维诺夫以及其他这样的人。现在住在莫斯科真象住在月球上一样了。”

十九　外部世界

特权阶级和贱民的范围

苏联社会分为两个集团——准许出国的和不准出国的。

俄国科学家，1973 年

“立陶宛号”是苏联的一种小型的高级游船，它夏季往返于温暖的地中海，主要是招徕外国游客，以赚取硬通货，可是，1974 年夏天，“立陶宛号”却载着一批特殊的乘客从敖德萨出发，驶往伊斯坦布尔、那不勒斯、雅典、马赛和其他海港，作一次为期十五天的航行。这批乘客是莫斯科、基辅和其他大城市共产党高级官员——大城市党机构的主要干部——和他们的家属。一位英国外交界朋友奈杰尔·布鲁姆菲尔德碰巧也买了这次航程的船票；经过这一番同船旅行，他对苏联人出国旅行的动态大开了眼界，而且对那些共产党员厚颜无耻的资产阶级趣味和生活作风感到好笑，因为这些人在国内都是大声斥责，大肆攻击腐朽的资本主义

世界的。

“不论是男人、女人或者小孩，没有一个人是苏联服装打扮的，但他们都是党内的大亨，”布鲁姆菲尔德惊奇地对我说。“他们从头到脚都是西方装束。吃饭时靠近我们坐的那一家是从基辅来的。父亲是当地党内的大人物。孩子们穿的是西方的喇叭裤和衬衫，妻子正在唉声叹气，因为她被一身苗条的西方服装束缚得太紧了，这种衣服本来就不是为她那种肥大臃肿的乌克兰身材裁制的。”

布鲁姆菲尔德说，每停靠一个港口，那些共产主义的头子就象拗曲了的弹簧一样向货物充沛的西方百货商店弹去。他说，“我们在那不勒斯上岸时，船上的几个西方游客全都结队去庞贝游览，但是那些俄国人却向相反的方向走去。他们对游览不感兴趣。他们会拿出大卷的美钞——十元的，二十元的，一百元的。钱多极啦。显然，这种钱只有特殊人物才能弄到手。他们直奔外汇兑换处，把美元换成里拉，然后一窝蜂去抢购东西。西方人回到船上时，有些人可能买了几件浮雕小徽章或者小玩意儿，可是俄国人却令人惊讶地满载而归，买的是新衣服、喇叭裤、鞋子、衬衫、收音机等应有尽有的货色。在整个旅程中他们都是这样。西方人是游览，俄国人却是买东西。”

总之，去西方禁地旅行已成为苏联社会上一小部

分人的别有风味的特权——苏维埃制度让他们代表它向世界露脸的这些人包括当朝权贵以及少数装潢门面的官员，宣传大员，当官的专家，运动员，作家，芭蕾舞女演员以及小提琴家等。出国旅行，特别是去西方国家，已经成为显示苏联特权阶级社会地位的最好象征，也是政治可靠性的最肯定的标志。对于那些可以经常沉溺于这种癖好中的人说来，出国旅行已经成为一件相当有利可图的生意经了。

大剧院芭蕾舞团、苏联国家篮球队或者一些大腹便便的外贸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所带回来的西方国家的半导体收音机，摇摆舞唱片，上等外国衣料，立体声收音机，厚底高跟鞋和其他时髦商品，都为莫斯科黑市提供了货源。私人贸易被公认为因公出国后理所当然的一种活动了。

一位短篇小说作家告诉我，他有个同行去和作家协会出国委员会的官员打交道，想申请去西方一趟（每个重要机关都设有出国委员会，负责甄别谁可以出国，谁不可以出国）。那位作家对那个党员说，他需要同一些熟人保持联系，为他的创作找些新素材。这位党的官员对他这个说法反应很冷淡，但是这时他碰巧对这位作家的衣服瞟了一眼，就说，"怎么回事，万尼亚，你的衣服穿旧了吗？"

"是呀，是呀！"作家回答，立刻心领神会，凑上去

说。"我穿得挺寒碜，我的妻子也跟我一样，要添置点新的啦。"

于是，那个党里的人就同情地帮他安排了一次旅行。

那些受到信任和走了好运、能经常出国的人，便开始依靠他们出国旅行所购买的商品获得一笔固定的收入。我有个朋友认识《新时代》——党在国际事务方面的主要外文周刊——的一位高级编辑，这位编辑的月薪是整整三百卢布(合三百九十美元)。他告诉我的朋友，他每年跑两次西方国家，所得的外快差不多要抵他一年的收入。一个芭蕾舞剧团的男主角对我说，你只要懂得一点生意经，就能够利用两个月在西方旅行时每天从有限的硬通货里积攒下来的钱，用手提箱带回些东西，净赚大约六千卢布(合八千美元)。他说，"在有些西方国家的机场上，只要花一百美元买一架免税的小磁带录音机，到了俄国就可以卖到八百到一千卢布。"这种生意并不是偶尔成交的。他事先把主顾排了队，知道该选购什么货物。除了电子设备，西方国家男女服装的衣料都是热门货。有这样多的钱可赚，他说，"人们只要能出国，哪怕是杀了亲娘也干。"

当然，最大的特权是弄到一个驻国外的差使。苏联政府给它的国外雇员发给特殊工资，但是扣下其百分之四十，在出国之行结束时发给"卢布证券"；可以用

来在莫斯科开设的硬通货商店里买东西，这种卢布证券在那里的购买力是一般卢布的四倍到八倍。这个办法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使那些人在供职期满后都愿意回国。有人告诉我，一个驻东京的苏联新闻社人员(可能是一个隐蔽的情报人员)，除了各项开支和生活津贴之外，每月还领到一千四百美元，他几乎全部用卢布证券存了起来。告诉我这件事的那个俄国人说，"照这样的比价推算，他一个月就赚进一辆汽车！"

即使是扣下了百分之四十的工资，一些俄国官方人员在国外呆了多年之后，还是能想办法满载西方货物而归。一位头发花白的莫斯科作家告诉我，住在他同一幢大楼里的一位前苏联驻联合国官员的房间里摆满了美国用具，其中包括抽水马桶，而这个马桶是他最引以自豪的一件东西。一位以前驻纽约的新闻记者，向我的一些外交界朋友炫耀他那全套梅塔格公司的嵌装式厨房、洛德和泰勒公司装修的起居室和他孩子房间里的宝宝窗帘。

当然，关键在于你是不是一个受到信任的官员，是不是一个官方代表团的成员。对这些人，苏联海关人员连看也不看一眼，一挥手就放他们过去了。否则，西方的货物就会被没收。我的行李便不时被检查得很仔细(搜查黑市卢布或外国文学作品)，我也曾看到苏联海关人员，特别是那些女的，搜查别人的行李就象乡下

女人使劲洗衣服一样，每样东西都要揉过。我看见过一个从保加利亚来的、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老年工人，被搜去了十个可怜的二两一团的马海毛团绒（每团黑市价格十五卢布）。海关人员死皮赖脸地动辄没收绒线团或《花花公子》杂志之类他们所需要的或者可以转手谋利的东西。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看见两个海关人员一面翻阅一位旅客携带的一本禁止进口的西方裸体画报，一面争论着该怎么处理。"咱们有这本吗？"一个官员问另一个官员，那一个吃不准，耸了耸肩膀。于是他们就没收了。但是，官方的代表团通常一点不用担心就滑过去了。政府报纸《消息报》的一个记者告诉我，他有一次从西方回来，手提箱里装满了禁止进口的文学作品——索尔仁尼琴和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花花公子》杂志，以及一大堆别的书刊。一个年轻的海关人员问他和代表团的其他记者有没有文学作品。

"没有，"那位《消息报》记者大模大样地说。"没有文学作品。"别的人也同样否认。

"真的吗？"海关人员带着会心的微笑问。"你们都是记者，记者不看文学作品吗？"

"我们是记者，"那位《消息报》记者告诉他，"所以我们知道什么可以带，什么不可以带。"

海关人员连一只箱子也没打开，就让他们走了。

对于受过教育的俄国人来说，西方长期以来有着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魅力。宣布推行缓和以来更激起了他们想要亲眼看一看西方国家的欲望。西方人近来非常敏锐地感到，他们的经济结构正在土崩瓦解，所以没有觉察到俄国人如何百般钻营，想方设法急于要访问崩溃中的资本主义堡垒。只要批准出国，不论去哪个国家，就足以使一个苏联公民兴奋得晕头转向。对于一个苏联人来说，这种晕头转向的滋味，远胜于西方人在约定参加一次旅行社代办的雅典和希腊群岛的旅行时所尝到的乐趣，因为批准你出国等于直接表明你有资格做极少俄国人所能够做的事情。一位女作家告诉我，"在作家协会里，只要一通知说你可以去阿根廷，情况就两样了。人们就会开始说，'啊，你要去阿根廷了。可好极啦。'于是人人都羡慕地谈起这件事来。这是件大事。甚至在你走之前，你已经觉得飘飘然了。"她坐在那里，眉飞色舞，仿佛坐上一块神毯飞往阿根廷似的。

在那些不能出国的人里面，我发现有许多人都如饥如渴地急于要从西方人口中听听关于西方的情况。例如，俄国人对美国的兴趣，大大超过了美国人对俄国的兴趣。而且俄国人的态度是一种精神分裂症似的爱与恨的交织。美国既是敌手，又是模范；它是俄国人觉得非用它来衡量自己不可的一个国家，又是世界上一

个值得重视的标准。他们可以贬低美国，说它是一个极端实利主义的、残酷的、拚命捞钱的国家，完全缺乏道德价值或公民责任，但是，许多人，特别是城市知识分子，谈起美国的工业技术、工作效率和物质享受，谈起美国那种无懈可击的现代化却又都羡慕不已。

我常常发现，俄国人在谈话中讲到美国时，总是忽冷忽热的。有一天晚上，我在布拉茨克和一个神情紧张、瘦削、喜欢争执的共青团官员叶夫根尼·维列夏金一起谈话，他跟我谈起了他 1961 年访问美国的情况。他对美国的公路、物质财富和大多数人的热情友好印象很深。但是，他一会儿怀念他和他在大战中认识的美国飞行员那些暖人心怀的聚会，一会儿又痛斥资本主义，讥讽美国商人为牟取厚利而故意把产品造得不经用，批评美国工人愚蠢地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他会举杯祝愿俄国和美国永不交战以及我们的子孙永不交战。接着他马上又会刺激我一下，说我的孩子们将来要在共产主义下生活。

维列夏金和一般人不同，因为他亲眼看见过西方。其他大多数俄国人对西方的真实情况毫无所知，他们或者过分羡慕西方生活（主要是知识分子），或者莫名其妙地、眼界狭小地觉得苏联比西方优越（比较普通一些的人往往如此）。俄国知识分子对本国人民的狭隘的乡土观念早已有所察觉，并且动辄拿这种人开玩笑。

我从好几个人嘴里听到那个经常讲起的一个笑话，说乌克兰的日麦林卡小镇上有个犹太人，他碰见一个朋友穿了一套裁剪合身的衣服。他问朋友是从哪里买来的，人家对他说是巴黎。犹太人问，“巴黎离日麦林卡有多远？”朋友告诉他，大约有一千五百英里。他说，“想不到巴黎离日麦林卡这么远，那儿的人居然会缝这样漂亮的衣服。”

我还听到过这个老笑话的不少新翻版。有一次，在中亚细亚布哈拉城那个古代穆斯林文化中心，我随便走进了一家小小的金属加工场，两个工人看出我是个外国人，就向我盘问起美国来，提出的都是些一般关心的问题，工资呀，物价呀，汽车呀，等等。不多一会儿，其中一个就打断了谈话，以攻为守地反驳说，美国有的是失业，缺乏的是免费的公共教育。而且，他使出了最后一击：“卢布比美元值钱。”

普通苏联人所提的问题，往往最能暴露出他们知道些什么，心里想的又是些什么。在另一个中亚细亚城市伏龙芝，一天傍晚，几个美国记者在公园里被一些年轻人包围，他们向我们提出了一大堆问题。J·P·摩根有九百二十亿美元吗？洛克菲勒特为他的女儿造了一座城市吗？肯尼迪总统的父亲当真是靠贩卖色情电影发财的吗？为什么爱德华·肯尼迪不肯竞选总统？你们可以杀掉你们的总统而始终逍遥法外吗？美国国

会的外交委员会干些什么？把人送上月球和把登月车送上月球，哪个好些？你是什么“民族”的人？为什么这里不多卖些美国书刊？有那么多的枪杀和摩天楼失火事件，住在美国安全吗？

我发现某些人对西方生活的知识很是惊人。在辽远的西伯利亚腹地，一位音乐家问我美国的手风琴装有四排还是五排按钮，因为，除了这一点，他对西方乐器的牌子和品种差不多全都了如指掌。不论我走到什么地方，差不多总能碰到一些年轻的苏联人，他们对披头士乐队、米克·贾格尔[①]或者其他西方摇摆舞明星的社交生活和职业生活，远比我了解得多。他们渴望知道最近有些什么小道新闻，而当我不能满足他们时，都感到很失望。在莫斯科，我认识的美国人惊异地发现，建筑师协会里的俄国人竟那样一清二楚地了解一本很时髦的杂志《高级建筑学》中所宣传的最现代的西方建筑动向，而且对蒙特利尔展览会上摩西·萨夫迪[②]的建筑提出了一些很内行的问题。一般说来，我发现苏联知识分子对当代美国和西方生活的基本情况要比西方人对苏联的生活和文化熟悉得多。

可是，他们所缺乏的是对西方生活结构的认识。

---

① 米克·贾格尔(1944—)：英国摇摆舞明星。——译者

② 摩西·萨夫迪(1938)：加拿大籍犹太人，著名建筑师。——译者

他们从苏联报纸上知道有关失业情形、昂贵的医药费用或者贫困状况的统计数字，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听到关于失业保险、医疗照顾计划，或者在美国怎样的收入水平才算贫困（这个数字要远远高于苏联的平均工资）。那些从来没有出过国的人总要用他们自己的制度来想象外部世界，对不符合这种想象的事物往往抱怀疑态度。

有位年轻的语言学家对西方的事物非常注意，但是对水门丑闻和五角大楼文件泄密事件却很健忘，他曾经问另一个美国记者：究竟哪一国的检查制度更为严格，是美国还是苏联。一位海关检查员把一本刊载经过改装的高速汽车的美国杂志从头到尾翻阅了一遍，然后退还给我们的一个美国朋友说，"当然，他们并不是真正有这些车子。只不过画给孩子们看看罢了。"一个懂好几国外文、而且多年来很留意西方学术界情况的学者，在他第一次访问西方——去罗马——时，看见报摊上不但卖意大利共产党的《团结报》，而且卖《真理报》，不免感到惊奇。一个年轻的乌克兰妇女告诉另一个美国朋友说，别国的人学外国语时不是去学俄语而是去学英语，而且西方的年轻人把苏联看成是保守力量而不是世界进步思想的柱石，她觉得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一位根据文化交流计划留苏的美国学生告诉我，她感到诧异，因为她发现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一些相

当有头脑的大学生竟然相信苏联电视新闻报道西方各国工人举行罢工和示威是为了支持共产党的事业的这一套宣传。这个女孩子说，“有个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听见我说，美国的工人一般是保守的，激进分子都是学生，他简直没法相信。他问我，‘什么人看《工人日报》和其他共产党报纸？’我说，‘几乎没有人看。’他说，‘你是说除了工人以外，没有人看吧。’我说，‘不，工人也不看——工人连碰都不碰它。’他没法相信我的话。”

那些参加各种代表团访问西方的人回国后，照例要帮助证实《真理报》对西方所描绘的情况。他们时常要被迫作一些关于西方生活的报告；有人告诉我，这些报告和他们私下里在朋友面前的坦率反应是大不相同的。因为这种做法太普遍了，所以俄国人为此编了一则笑话，这是一位官僚告诉我的，因为他觉得太好笑了。笑话讲的是一位俄国官员从西方回来后，对他的同事们谈起资本主义如何颓废、腐败、衰落。“你简直是看着它烂了下去——你能闻得出它腐烂的气味，”那位官员一本正经地说。然后，他脸上掠过了一种心满意足的表情，并叹了口气说，“可是，啊，那气味多么好闻啊！”

在这个缓和的时代里很容易使你相信，对冷战的

警惕已经放松，东西方之间的边境已经开放。但是，据我的经验，苏联边境上仍旧存在着一条可以明显觉察得出的分界线，它将苏联划分为另一个世界。一个很小的标志是：那些老资格的旅客都有一种不自觉的习惯，他们不说到苏联“去”和从苏联“来”，而是说“进”和“出”。和其他许多外国居民一样，我每次回到莫斯科，总是由于警察国家的压力而有一种明显的恐惧感。在机场上，苏联当局检查证件的时间好象比别的国家要长得多，而且警卫人员总一定要察看你的脸，并且仔细地同你的护照进行核对。从旅客接送站开向飞机的大轿车一直开到舷梯跟前，好象害怕有人会冲向舷梯一样。一个士兵站在机尾下面，另一个站在舷梯旁边——并不是象西方那样监视恐怖分子，而是防止有人偷上飞机。

对边境上这种小心翼翼的警戒，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从赫尔辛基坐火车回莫斯科。我们通过芬兰边境时，只见一个孤零零的芬兰哨兵，穿一件灰制服，淡漠地看着火车穿过一片片深绿色的松树林和发黄的白桦树林向苏联境内驶去。几乎是刚越过边界，我们就看见一片层层密布的铁丝网。接着，树林里突然露出一片空地，向两头伸展出去，好象大自然被人刮过脸，以标出那里的边界似的。在前面一个小山顶上，有一座有支柱撑着的了望塔在窥伺。火车再行驶几百码，

就在没有路的森林中停了下来。十名苏联边防军，穿着海绿色制服和长筒靴，突然出现，有的佩着手枪，有的拿着冲锋枪。他们看上去象是十几岁的少年，可是办起事来倒极为认真。两个士兵沿着火车两侧检查车厢底架。另外两个站岗，一个站在机车旁边，一个站在列车车尾。在我们的头顶上，还可以听到另外两个士兵的沉重的皮靴声。乘客把头探出窗外看他们检查，但很快就受到劝告，缩回车厢里。我们还没有觉察，另一些士兵就已经一对对地走进火车来了——高个子，金发，样子很漂亮。一个士兵很有礼貌地收集我们的护照。另一个查看我们的盥洗室，爬上一个床铺，张望上面的大行李架，最后请我们站起来，掀起了床铺，检查底下放东西的地方。查得非常彻底。

对于那些经过法律手续获准出国的俄国人，出边境时还要经过一道证件关。要获得一纸出国旅行的护照，其手续之复杂真是使人难以置信，那比在西方国家通过一次绝密安全审查还要严格。一个乌克兰建筑工人(他是一位党员)被派往埃及阿斯旺水坝工作，他告诉我说，他和他几个同志都是经过克格勃的周密调查之后才得到这项工作的。“他们把你的祖父和你的曾祖全都查到了，”他说，“如果有什么不清白的地方，他们都会查了出来——这是肯定的。”我从别人口中得知，有些受尊敬的科学家和看来很可靠的学者，在审查过

程中落选，而其他的人连埋怨都不敢埋怨一声，生怕失掉了自己的机会。经常同俄国人接触的西方学者，已经习惯于看到俄国代表团到达时少掉了几个人，据说不是生病了就是有别的要紧事情无法分身，虽然谁都知道，一个俄国人只要有办法可想，他是决不肯错过一次出国机会的。

而且，有几个人告诉我，每次出国之前，苏联公民还必须经过专门的政治灌输，并且要在一个小本子上签字，保证他们已经知道政府的训示和苏联公民在国外应遵守的行为准则。连去捷克斯洛伐克那样的共产党兄弟国家也必须通过一套手续，一个作家向我描绘了这方面的情况。她说，一个党的报告员，对大家说："听着，你们是要离开祖国的苏联公民。你们必须明白，你们担负着多么重大的责任。你们应当知道，会有许多人向你们挑衅，提出挑衅性的问题。你们必须知道怎样答复他们。"她说，那些到非共产党国家去的人都受到严厉警告，不准和那里的俄国移民接触，必须集体行动。如果要去散步，最好是两三个人一起走。基洛夫芭蕾舞剧团的女演员加林娜·拉戈津娜，后来和她丈夫瓦列里·帕诺夫一起移居外国，她告诉我，基洛夫芭蕾舞剧团每次出国之前，都要经过一些专题的政治学习和简单的测验，以确保他们已经懂得怎样按照党的路线回答一些尴尬的问题。她说，那情形就象

考试前死记硬背一样。一个履行了同样手续的科学家告诉我:"你必须知道, 外国人问你对以色列的看法或者对美国社会的观感时,你应当说些什么。你必须说,你赞成某一次〔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审讯, 因为被判刑的人的确是人民的敌人, 但认为对路易斯·科尔巴兰〔智利共产党领袖〕的审讯是极端不公平的, 因为他是被智利法西斯分子非法逮捕的。有长长的一张单子,上面有许多标准答案,你必须完全记住。"

我听到过一些俄国人说,由于既要经过这类手续,又有克格勃人员和告密人员混杂在各团体(从越野滑雪运动员起到宇宙航行员)中一起旅行,所以他们不愿意出国。但是这样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对于城市知识分子来说,旅行的瘾头,特别是去西方旅行,几乎是无法克制的。失去一次旅行的机会, 是今天的俄国人最感到恼火的挫折。一个党的宣传工作人员, 过去曾经出过国, 现在却碰上了麻烦, 要等上六个或八个月才能得到批准, 他因此气得骂娘, 虽然他总算有希望出国, 这已经是比别人幸运了。"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他发牢骚,"为什么还要我们等待? 他们担心些什么呢?"

苏联官员喜欢谈到, 自从六十年代以来出国旅行的人增多了, 其实也多得很有限。1974年, 苏联公民出国旅行的有二百二十万人次, 这还不及小小的捷克

斯洛伐克出国旅行人次的一半，更不及美国的十分之一。苏联人出国大部分是到东欧。差不多所有的旅行都是因公出差——不但政府官员和外交人员是如此，而且芭蕾舞剧团、体育队、科学代表团也是如此——年复一年，去的大都是同一些人。有些挑选出来的工人和学生团体访问东欧，但是个人出国旅行的几几乎没有听说过。"只有共产主义的标兵才能出国，"一位失望的作家愤愤地说。一位计算机专家要带家属去东德看望朋友，被拒绝了，他怒骂旅行控制是"二十世纪的奴隶制度"。实际上，把出国旅行的权利赏给国内一些享有特权的政府官员乃是俄国统治者的旧传统。在她的1785年宪章里，叶卡捷琳娜就把出国旅行的权利定为贵族和绅士的特权。

现在克格勃和党就利用知识分子出国旅行的强烈愿望，作为控制国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使其就范的主要手段之一。我有几次亲耳听到说，当局由于对一些诗人和剧作家的某种失检行为不满，因而取消了他们的出国旅行。但是，有时候当局拒绝旅行申请而不作任何说明，就象卡夫卡的一篇扑朔迷离的小说一样，使人感到心惊肉跳。

一个地位很高的科学家说，"最糟糕的是，他们因为某种原因拒绝了你，但又不讲出理由。"此人以前曾经出过国，但是后来一次因公访问波兰，却意想不到地

没有批准，这使他受到很大的打击。即使他们讲出点什么来，那也是同实际的问题毫不相干的。真正的理由是不得而知的。知道人家不信任你，而又不知道个中原委，并且没办法查出个中原委——这滋味真不是好受的。

西方人满有理由对许多移居国外的苏联犹太人所身受的折磨感到难过,但是,也许使他们觉得奇怪的是,犹太人还应当算是得天独厚的，这的确有些矛盾——因为犹太人虽然身为贱民，但在苏联少数民族中只有他们能够有机会到苏联国境以外的禁区去。

其他少数民族是那样羡慕犹太人,而俄罗斯人、拉脱维亚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和别的民族又那么眼明手快地抓住同犹太人结婚的机会，作为自己能够出国的一种手段；这一切使犹太人感到一种啼笑皆非的满足。那些犹太活跃分子看到时来运转，自己竟会处于一种今非昔比的有利地位，实在感到好笑，他们很爱讲一个名叫阿勃拉莫维奇的人在护照和登记处被讯问的笑话。护照和登记处是批准出国护照申请书的机关。

“阿勃拉莫维奇,”处里的上校问,“你是教授,地位很不错。你为什么要到以色列去呢？”

“并不是我要去，”阿勃拉莫维奇辩解说，“是我的

老婆和孩子们要去。”

“可是，阿勃拉莫维奇，”上校追根究底道，“你有一套很好的公寓和一座别墅。你为什么要离开你的社会主义祖国？”

“并不是我要去，”阿勃拉莫维奇耸耸肩膀，“是我的丈母娘要去。”

“你说，阿勃拉莫维奇，这是为什么？”上校恳求地说。“你还买了一辆汽车，你为什么要放弃这种好日子不过？”

“我已经告诉你了，”阿勃拉莫维奇没有改口，“并不是我要去，是我的舅母和表弟们要去。”

“那么，既然你并不要去，你为什么要申请呢？”上校问。

“你难道不明白吗？”阿勃拉莫维奇回答说。“我是我们家里唯一的犹太人呀。”

犹太人——象阿勃拉莫维奇、他的亲戚以及那些同他拉扯上关系的人——大批离境，大概是我在莫斯科时所见到的最难令人置信的现象。现在人们已经把这种外迁运动完全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以致忘记了事情的整个过程，而如果用1968年的眼光来看，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不仅是1971—1974年有十万犹太人离境是预见不到的，而且随之而来的那些抗议活动，在苏联生活中也完全是史无前例的——年轻的犹太人在

邮电总局发动静坐抗议，或者佩着黄色的大卫王之星[①]，举着标语牌（"放我的同胞走！"），在最高苏维埃的接待室里或者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灰色大楼外面示威，那种景象是令人吃惊的。

外迁运动喧嚣一时使克里姆林宫惊惶失措；它使人产生一种错觉，好象党和克格勃也不是万能的。当然，这不仅由于犹太人决心反抗（他们既有明确的外迁目标，又有国外强大而有组织的支持），并且由于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不愿意采取斯大林式的赤裸裸恐怖手段，否则外迁运动刹那间就会完蛋。克里姆林宫的人进退两难，因为他们不想在追求缓和的时刻太露骨地显出铁腕警察国家的样子。他们的手段虽然粗暴，但是他们也知道适可而止。

克里姆林宫对犹太人的政策可分为两个时期，先是强硬时期，在那段时期里，他们对劫持飞机的犹太人和其他想要移居国外的人进行审讯，或是对受过教育的犹太人勒索天文数字的巨额移民税；后来是尼克松来到莫斯科、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和美国国会准备讨论贸易法案之前的温和时期，在这个时期，犹太人大量外流，政治气候也变得温和起来。克里姆林宫在这两个政策之间摇摆不定的情况，现在就不必再提它

① 六角的星形图案，犹太主义和以色列的象征，又名大卫王之盾。大卫是古代以色列国王。——译者

了。使我感到与克里姆林宫的性格最不相称的时刻，是华盛顿州的亨利·杰克逊参议员正在谋求取得自由外迁的坚强保证作为提供贷款和对苏联商品降低关税的交换条件时，而克里姆林宫竟也有意同他拍板成交。虽然克里姆林宫要回避执行这些规定，还有许多空子可钻，但是肯作这样一笔交易仍不失是一个巨大的让步。现在回顾起来，勃列日涅夫后来缩手不干，觉得美国的贷款太吝啬，认为把私下交易公之于众这种不适当的泄露太丢脸，那就不足为怪了。

苏联领导集团只是勉强的、经过代价高昂的不断摸索，才找到一种它认为是过得去的对策，即有选择的威胁和有限度的外迁相结合的对策。这好象能适合它那既复杂又矛盾的目标——安抚西方，防止科技人员严重外流，抑制一下整个外迁的趋势，但同时又能谨慎地摆脱国内那些心怀不满的犹太知识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并在乌克兰、立陶宛、亚美尼亚和别的地方进行一些更巧妙和更轻微的镇压，使其他少数民族知道，犹太人的外迁是一种特殊情况，是不能援例效法的。

不论是否出于他们的本意，苏联领导人终于认识到，西方将会因为有十万犹太人离开苏联而洋洋得意，并为了象舞蹈演员瓦列里·帕诺夫那样著名的人物终于获得自由而欢欣鼓舞，可是西方人不会懂得，其他的芭蕾舞演员将会象我一样记得，帕诺夫在列宁格勒他

的小公寓里象一头关在笼子里的黑豹，万念俱灰地踱了两年之久。那个黑头发的漂亮的青年天体物理学家叶夫根尼·列维奇会在以色列受到人们欢呼，但是克里姆林宫知道，苏联科学家们都晓得他那位驰名的父亲本·列维奇(申请外迁的苏联第一流的科学家)在几个月之后仍然被扣留在莫斯科，他们也记得，叶夫根尼本人在祈求一份出境证之际，曾被送到西伯利亚北极海边提克西湾那里的前哨基地去打扫厕所。对多数申请签证的人，手续办得不算慢——至少办得不比打算出国旅行的普通苏联公民更慢。不过对于有才能的人总要刁难。总是有少数几个人要受到折磨，他们的苦难经历使得申请外迁就象是在玩俄国的轮盘赌。一位知识分子对我说，西方人对于总的统计数字都有很深刻的印象，但是，对苏联公民来说，“事件的语言”(这是他所用的妙语)往往是通过个别的事例最有力地表达出来的。

犹太人离境的人数自从1973年达到三万五千名的高峰以来，目前已经引人注目地下降了。如果苏美在贸易问题上达成一项新交易，这个数字可能再次上升。但是，在苏联生活中，一个难解之谜是究竟有多少苏联犹太人想去以色列。犹太朋友们提醒我说，要去还是不要去，这取决于当时要费多大力气才去得成，以及留下来的犹太人又将过怎样一种生活。这也取决于

苏联犹太人的精神状态和性格，他们的情况远比我所想象的更为复杂，而且也不象外迁运动所显示的那样容易摸得清楚。

有一百来万或远比此数为多的犹太人，已宁愿同化于苏联生活，他们已别无他路可走了。据苏联1970年的人口调查，共有二百一十五万一千名犹太人，但是，这并没有把不暴露身分的犹太人计算在内，这些人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俄罗斯人或其他民族的成员。据持不同政见的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他的父亲是俄罗斯人，母亲是犹太人）推测，他们的人数大约在一百万到一千万之间。据1970年的人口调查，犹太人的数字比1959年下降了十一万七千人，然而，当时那些活跃分子却预料，这个数字将同其他民族一起增长。这一事实表明，即使是在六十年代，仍有许多犹太青年利用父母是异族通婚，自称属于其他某一民族，从此不提他们的犹太人身分。这是俄国的老把戏。在革命后的年代里，直截了当地改名换姓的做法是一件轻而易举、而且相当平常的事情。麦德维杰夫告诉我说，犹太籍党员可以给公安人员十个卢布，随意挑个自己认为合适的名字和民族（通常是俄罗斯族），登记在自己的证件上。帕诺夫向我坦率承认，在他到了十六岁要作出决定的年龄时，因为他生在白俄罗斯，而他的母亲又要他避免打上犹太人的烙印，他就挑选了白俄罗斯人。

其他的一些知名人士，如大剧院芭蕾舞剧团的首席女演员玛雅·普利谢茨卡娅，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或莫斯科电视台评论员瓦连京·佐林，也都对于自己的双亲中有一个是犹太人的问题尽可能谨慎地保持缄默。

纽约举世闻名的犹太医院西奈山医院的一位美国医生对我说，联合国的苏联官员有时到那里去找一位移居美国的老医生接生。尽管他们明明有着俄罗斯人的名字，但有些人却悄悄地问医生："您可以为我的孩子割包皮吗?"医生同意之后，接着就听到这个含蓄的问题，"也许，您不反对把手术安排在第八天吧?"因为这显然是遵照犹太人的习惯，[1]所以那个美国医生往往把这类请求看作是一种默认：他们是隐瞒身分的犹太人，多年来一直被看作是俄罗斯人，而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苏联外事部门或者克格勃中升至受到信任的要职。

苏联犹太人的精神状态和性质也一直是难以捉摸的，因为就连外迁运动本身的精神状态和性质，经历了几"代"犹太人的离境他去之后也发生了演变。在1968—1970年期间，当这个运动开始形成的时候，充

---

① 按照犹太教的规矩，婴儿出生后第八天应当为其行"割礼"，即割除包皮。——译者

当运动先锋的是早期一批坚决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相当笃信宗教的犹太人。但是，到了1971年8月，当我到莫斯科的时候，他们已经离开了这个国家，或者已经被关进了监狱。尽管有不少笃信宗教的犹太人从苏联的格鲁吉亚（一个具有容许宗教信仰的特殊传统的地区）不断外流，但在莫斯科，另一种性质的犹太人已居于领先地位。当我了解到这些活跃分子的领导者对世俗的兴趣多么浓厚，而宗教对他们的吸引力又是多么薄弱时，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可以看到，那些比较年轻的犹太人于星期六聚集在莫斯科大柱子的犹太会堂外面相互交换有关外迁运动的最新小道消息，或者在象西姆查斯·托拉[1]那样的节日里，用哈瓦·纳吉拉之类散居在外的犹太习俗的歌舞庆祝作乐直至深夜。至于搞"圣训之子"[2]仪式的，或是戴上犹太小帽、披着祷告披肩而不感到拘束的，即使有的话，那也寥寥无几。[3] 几乎没有人懂得意第绪语或希伯来语。对他们来说，成为一个犹太人，这是人生中一个遗传学的事实，是一个继承问题（由于俄国生活中的消极势力，这

---

① 犹太教的一种节日，即在犹太历的正月二十三日，纪念诵（犹太）经日的开始。——译者

② 犹太教为满十三岁的少年所举行的一种仪式，经过这种仪式的少年即被认作已经成年，必须遵守一切教规。——译者

③ 犹太小帽，一般犹太男子所戴的便帽；祷告披肩系犹太男子在晨祷时用的。——译者

个问题受到着意渲染)，而不是宗教吸引力或宗教特性的作用。

罗曼·鲁特曼，一个身材矮小、沉默寡言、镇静自若的中年数学家，在他1973年去以色列前不久告诉我说，他是在一个共产党员家庭里长大的，是从相反的方向学到了有关犹太教的一切——阅读无神论攻击宗教的文章，从字里行间串连起来领会了它的意义。他在童年从来没有进过一座犹太会堂或其他教堂。“当时〔斯大林时代〕几乎不可能弄到一本《圣经》，”他说。“我在二十岁左右，感到一种精神上的空虚。我不愿称它是一种对宗教的渴望，那只是生活上若有所失的一种感觉。为了了解《圣经》的内容，我就去看那些反宗教的作品。例如，我总是非常粗略地在一个地方读到关于洪水的事，又在另一个地方读到关于挪亚的事，然后把两件事拼拢来。”到我认识鲁特曼的时候，他相当经常地上犹太会堂去，但不是去做礼拜；而是去同别的犹太活跃分子保持接触。一直到鲁特曼离开俄国的前夕，他私下告诉我，一个犹太教士才劝他披上祷告披肩。“我觉得《圣经》很美，”他说。“那真正是诗。非常可爱。”他开始研究起犹太教来，并以此教他的儿子。

象鲁特曼这样对宗教深感兴趣的人，是很少见的。但是，另一方面，在我碰到的许多参与外迁运动的人当中，他却是典型的，那些人有瓦洛加·斯列帕克，米哈

伊尔·阿古尔斯基，列昂尼德·齐平，瓦洛加·科兹洛夫斯基，阿列克赛·戈尔德法尔勃，以及其他我不愿意透露他们的姓名的人，以免间接影响到他们的亲友。他们都是在苏联飞黄腾达的统治集团家庭中长大的。同鲁特曼一样，许多人都是立场坚定的共产党员的儿子，是在一个无神论国家的传统下长大的。他们之所以成为犹太教的活跃分子，往往是由于对社会制度或者对他们父母的一种个人反抗行为，其尖锐激烈的程度，不亚于美国青年投入抗议越南战争、唾弃他们事业顺利的父母所过的那种中上层阶级的富裕生活。

然而，我有时候很难理解的是，这些人是由于什么力量的影响要离开俄国去以色列，而另外一些同他们差不多的人却留下来不走。有时候，我很难看出使他们决定要走的因素是什么。在1972年和1973年，外迁还只是在人们口中流传而已。这种趋势就象雪球一样愈滚愈大。有些人所以离开，是因为突然间能够离开了。我碰到的少数几个地道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说，他们要到自己真正的家乡去同自己人团聚。可是有更多的人似乎同其他打心底里讨厌警察控制、书刊审查和苏联消费生活中的折磨的少数民族一样，并不十分热中于去以色列或脱离苏联社会。少数人以为他们到了外部世界就可以飞黄腾达，后来我听说，其中有许多人看到了西方那种激烈的竞争生活痛苦地感到幻想的

无情破灭。

我弄不懂的是，很少有活跃分子提到反犹主义的恐怖故事作为他们决定移居国外的理由。当然，这并不是说反犹主义不是苏联生活气氛中的一个容易觉察的成分，或者说反犹主义没有影响到他们，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能记得起对他们个人进行的一些诽谤，或者对一般犹太人表示的鄙薄。正如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在他那首关于巴比·亚尔的名诗中所表达的，俄国人从娘怀里吸奶的时候起就吸进了反犹主义。

一个犹太语言学家说，“你看看报纸上。如果一个俄罗斯人偷东西，那因为他是个贼。但是如果一个犹太人偷东西，那就因为他是个犹太人。”出生在乌克兰哈尔科夫的女作家尼娜·沃罗涅尔，不寒而栗地回想起她童年时的一个情景。有一个女孩子放学后到她家里去，发现尼娜是个犹太人，那个女孩子指着尼娜哼哼地说，“噢——，你是个犹太人。”尼娜追忆说，她讲这句话的神气“使我感到，如果地上有个洞，我准会钻进去死掉。第二天，这个女孩子告诉了学校里所有的人。我一辈子都对我父母亲有阿弗拉姆和伊兹拉伊列夫娜这样的名字感到羞耻。”

近年来，好象莫斯科犹太人记得最真切的一件社会新闻，是苏联大名鼎鼎、最受欢迎的滑稽演员阿尔卡季·莱金有一次在乌克兰演出，观众中有人冲着他喊

了一声“吉得”（和美国人说“凯克”一样，意思是犹太人）。莱金立即停止他的滑稽表演，问道，“这是谁喊的？”没有一个人作声。“哪个喊的举起手来，”莱金追问。没有人承认。莱金走下台去，不演了。

乌克兰人，特别是在那些外省村庄里的乌克兰人，是以各族人中最公开反犹闻名的。可是，我有时候也听到有些俄罗斯人信口诽谤犹太人。一位艺术家的妻子有一次告诉我，她喜欢住在乡下，因为那里有真正的原汁牛奶和家里烘的面包，而且因为那些地方“没有被犹太人糟蹋过”。我听见的一次最无聊的谩骂是出自一个大剧院歌剧团男低音歌唱家之口的。他是一个彪形大汉，外衣里面的一件高领运动衫，紧紧绷住他那粗壮高大的身躯。他在战时是个铁路工人，后来有人发现他嗓音洪亮，送他进了声乐学校。有一次我在火车上遇到他，就和他谈起外交政策来。这个俄罗斯爱国者把中国人骂得体无完肤之后，就无端地大肆攻击犹太人。

“他们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民族，比中国人还要危险，”他警告我说。“你们美国人以为他们在这里日子难过，可是他们实际上是享有特权的人物。你看来看去，到处都是犹太人。大剧院有百分之八十四的人是犹太人。乐队里拉小提琴的你以为都是些什么人？穷苦的农民抚养子女，教他们怎样种地或者开车，他们长大了便是集体农庄庄员或者拖拉机手。他们挣不了多

少钱。可是犹太人是怎么干的？他们教他们的子女拉小提琴，最后进了大剧院，每个月拿四百卢布。他们还不满意哪。他们都是下流坯子，那些犹太人。”

他大大地夸张了那些小提琴手的工资级别，其中有许多人挣的钱比拖拉机手还要少；不但如此，我还听到犹太人伤心地叙述他们在教育和工作上所受到的歧视。一个犹太人研究生，有一次向我认识的一位高级科学家提出抗议，因为这位科学家曾经奉一位俄罗斯人教授之命，把几个投考国立莫斯科大学的犹太学生批了不及格的分数，虽然他们考试的成绩都是很优异的。一个原来在出版社担任高级编辑的人说，每次出版社把下一年的选题计划送交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审批，发回来时总是有几个犹太作家写的书被划掉了。不需要作任何解释；早已规定了一个犹太人的“限额”。一个实验室主任俄罗斯人告诉我，他向上级提出，要用几个业务水平很高的犹太人，但遭到上级直截了当的拒绝，理由是“我们已经用了够多的犹太人了”。

犹太人指出，除了苏维埃政权大吹大擂的少数几个著名的例外人物以外，犹太人实际上没有资格担任外交官、政治记者以及军队、共产党机关的工作和党的高级官员。可是凭自己的才干在苏联发迹的犹太人在犹太人总数中所占的比例，远远超过犹太人在苏联总人口中的比例，这也是事实。1970年官方发表的数字

表明，每一千个犹太人中有一百三十四人受到高等教育，这要比俄罗斯族每一千人中只有二十二人的数字高得多了。尽管受到歧视，犹太人在诸如艺术、文学、音乐、戏剧和电影等创作领域，以及在具有很高声誉的科学领域，都搞得很好。在经济部门，许多苏联官员用犹太人当副手已成为一种传统，正如地位显要的党的工作人员往往使用犹太学者为其捉刀一样。由于在苏联生活中，职位高低决定了生活水平的高低，一般犹太人按照苏联的标准说来，都过得相当不错。

此外，正如一些犹太活跃分子向我承认的，今天苏联生活中的反犹主义比斯大林时代要温和得多，而且也不象沙皇时代那样坏。反犹主义是造成外迁运动的一个原因，但不是决定性的原因，在那些据说反犹主义最厉害的外省村镇，一般只有很少的人外迁，而在宽容犹太人出名的格鲁吉亚，却有大量的人外迁。我认识不少犹太人，但是，我很少听到其中有人是由于公然反犹的丑恶表现而移居国外的。

我发现，外迁的最有力的动机是一种新近活跃起来的犹太民族主义意识。但是，这种民族主义并不同于我原来以为的那种好斗的犹太复国主义。这种民族主义与其说是对以色列的热衷向往，毋宁说是经过几十年自我否定之后产生的一种要求在苏联生活中自我肯定的冲动。因为，如果说苏联犹太人已经习惯于那

种反犹主义的诽谤和职业上的歧视的话，那么最使那些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活跃分子产生强烈反感的是他们被剥夺了任何明确表现他们民族身分的机会。“我是一个民族主义非常强烈的国家里的一个没有民族的人，”后来移居以色列的生物学家阿列克赛·戈尔德法尔勃对我说。在苏联的制度下，做一个犹太人，同时表明自己的犹太人身分，这不言而喻是同做一个忠实的苏联公民相矛盾的。而正是在这件事上，犹太人觉得自己的处境不如别的少数民族。

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往往忽略民族身分在苏联人民中的极端重要性。如果他们偶尔问一个苏联人是什么民族出身，而他回答是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乌兹别克人、拉脱维亚人、乌克兰人或者犹太人时，美国人往往误认为这就等于他们习惯向一个新认识的人说自己是哪一州人一样。英国人因为几百年来认为自己是苏格兰人、威尔士人、爱尔兰人或者英格兰人，所以懂得这样说的涵义要比美国人所理解的深刻得多。这是一个人的身分的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它把语言、传统、文化、评价事物的标准和家世都包括在内了。

实际上，正是由于这样剥夺了他们表现自己文化和民族身分的机会，犹太活跃分子才以他们的外迁运动来表示抗议。在历史上，犹太人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曾抱很大希望，因为他们在革命中起过相当的作

用。在苏维埃国家成立的早期，意第绪语有过一度复兴。到了三十年代，总共建立了一千二百多所意第绪语学校和大学里研究犹太问题的科系。还有意第绪语报纸和剧院。有些犹太人如列昂·托洛茨基，还担任过重要的政治和政府职位——不止是象今天那样挂个虚名。

斯大林的清洗以及他在战时大力提倡狂热的俄罗斯民族主义，遏止了这种上升的趋势。1948 年成立了以色列国之后，他发动了他最后一次对“不生根的世界主义者”——犹太人——的偏执狂的进攻。作家被谋杀，医生受迫害，一切意第绪文化的痕迹被一扫而光。这大致也是今天犹太人所处的地位。别的少数民族私下里抱怨，逐渐的俄罗斯化正在剥夺他们的文化特征和文化遗产，但是他们仍有自己的地理领域、自己的“政府”、学校、民族剧院和文学与文化传统。而这些东西犹太人几乎全都没有。只有一个意第绪语的出版物——一个由政府控制的代表官方说话的月刊，叫作《苏维埃祖国》，和一个很小的简直不大活动的意第绪语剧团。在东西伯利亚比罗比詹官方指定的犹太自治共和国，只有百分之十八的人口是犹太人，多数犹太人认为这是一出生拼硬凑的滑稽戏。以色列在 1967 年“六天战争”取得的胜利所激起的，正是犹太人对这种种族和文化真空状态的失望情绪。他们一再告诉我

说：这次战争“使我们觉得作个犹太人很自豪”。由于许多犹太知识分子都在自由主义的文化和科学界以及持不同政见的运动中享有盛名，他们在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特别感到懊丧和抑郁。新的希望和剧烈的失望这样接二连三地出现，促使他们拼命要离开苏联。

那些留下来的人怎么样呢？

在和一些处境顺利的和被同化了的犹太人的私下接触中，我发觉他们同样具有那种复活了的犹太人自尊感和文化上的灰心失望情绪，但他们对此都讳莫如深，或者只是同几个信得过的朋友谈谈。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这样畏缩呢？

通过一些行将离境的犹太人，我们认识了一对夫妇，他们想要离开俄国，已经犹豫了好几个月了。妻子塔尼娅是一个配角演员，皮肤黝黑，长得很讨人欢喜；她丈夫马克是一个五十岁的脾气不好的剧作家，瘦长个子，摘下眼镜时，眼睛里有着一种古怪的不高兴的表情。按照苏联的标准，他们是过得很好的，但是两人批评起苏联社会来都是毫不留情的。他们为以色列人感到自豪，并嘲笑苏联援助阿拉伯人。同我们在一起时，他们都强调自己是犹太人，可是，据我猜想，同俄国人在一起时，他们是会把调门降低的。马克很少在他的作品中流露出他个人的感情。当我问起他的作品时，

他感到很窘，并且相当尴尬地拒绝把他写的东西借给我看。他说，“从能够出版的东西里，你没法知道一个苏联作家真实的想法。”我猜想，他并不是一个经常同审查官顶牛的人。他的苦恼多半产生在为使作品合乎官方的口味而自己进行审查的时候，虽然我也有几次听到他对自己的作品受到宰割而发牢骚。“我准备放弃一切了，”他郁郁不乐地说。“他们老是在我用字遣词上吹毛求疵。大有‘寄人篱下’之感。我们在生活中傻子似的不敢吐露真情。实在太可怕啦。”

马克在斯大林的清洗中失去了父亲，老是担心会出现另一个反动的黑暗时期。他往往先问我的看法，然后说出他担心会发生的最坏情况。塔尼娅则摇摆不定，时而痛斥剧院中那些没有能力得过且过的人，时而为俄国文化辩护，对之表示一种热爱和自豪。马克隐约地说到他想出国，塔尼娅也认为出国对孩子们是上上之策——他们有一个已届大学学龄的儿子，对语言学颇有才华；还有一个年纪小得多的女儿，爱好戏剧。他们用彼此心照的口吻向我们仔细探询西方生活的情况。

他们总有一点犹豫，不肯畅所欲言。“以色列的生活也不是什么玫瑰园，”马克往往这样说，然后利用我对西方生活的批评意见，把他平时对本国的辛辣讽刺转而发泄到以色列和西方。他看书很多，完全知道什么

地方有什么问题。他预料别的犹太人将发现自己不能适应以色列的生活。当一些新近在耶路撒冷定居的人寄来了几封信，逐渐透露出他们的失望情绪时，他就感到自己看对了。但他对此事似乎还是感到很伤脑筋。他往往间接地暗示，真正影响他作出决定的是些什么原因。尽管他懂得德文和英文，可是，他吃不准在他这样的年纪是否还能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他担心，如果申请出境签证，当局不会立即放他走，而是先把他挂上一、二年，去留未卜，工作落空。“我觉得非常疲乏，”有一天晚上他对我说。“所以我决定留下来了。”我想，他这是表示他对渺茫的前途太担心了，他对自己在苏联社会里营建起来的小安乐窝太一往情深了。

我还碰到过另一些“驯服的犹太人”（那些比较激烈的活跃分子这样称呼他们），他们对外迁运动感到十分不满或公开表示敌意。在那些我正式会见过的人当中，如担任《文学报》主编，又是地位很高的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的犹太人亚历山大·恰科夫斯基等，他们尖刻地谴责那些即将离国的犹太人，并且语气非常激昂地断言，犹太人在苏联有充分的机会，并不受到歧视。这种话有些肯定是宣传。但同时我感到，这是一些靠贬低犹太人而发迹起来的人的一种自卫性反应。实际上，任何一场要求他们坚持犹太人权利的运动，都是对他们整个生活方式的威胁。“他们（活跃分子）都是

些捣乱分子，"有一天一个电影翻译工作者用一种刻薄的口吻对我说。"他们使我们这些留下来的人日子更难过了。"

她说外迁运动已经助长了反犹主义和对犹太人的歧视，这话是很有道理的。我从科学家方面听到，当犹太人纷纷出境时，犹太人就更难在好一点的科学研究所中担任要职和获得提升了。主管人对他们总是存有戒心。一位计算机专家说，"如果一个犹太人要求工作，人家首先就要问他'你打算出去吗？'"一位医学科学家告诉我，这种对犹太人的日益增长的怀疑，终于使他申请出境签证。有一次他觉得自己应当提升，但结果没有被提升，后来他的一位俄罗斯族上级和好朋友暗中告诉他，提升他是不可能的，因为怕他以后可能外迁。一位很红的科学作家，过去曾用俄罗斯笔名出版过好几本书，谈了一个类似的情况。1974年初，一位曾和他密切合作过的编辑建议他写一本书，并已得到出版社负责人的初步同意。但在签订合同时，因为合同上有作者的俄罗斯笔名和他的犹太真姓名，出版社的人就拒绝签字，并且告诉那位编辑，说作者的"名字不对头"。这位作家听了这话之后，担心事情会越搞越糟，于是就决定要外迁了。

从1968年犹太人的运动开始以来，官方就更歧视犹太人了；最显著的例证是每年高等学校入学学生的

统计数字。1968年人数最多，有十一万一千九百名犹太人，这是过去几年不断增长的结果。1968年以后，犹太学生的数字不断下降到1972年的八万八千五百人。当1973年的统计年鉴出版时，这张统计表不见了，这表明那一年可能出现了更加惹人注目的下降。有些犹太人对我说，甚至在大街上他们也觉察到俄国人在言谈中对犹太人表示的敌意比过去更公开了。一个外貌象犹太人的中年妇女说，有一天下午，她对一个店员态度有些急躁，这个店员就对着她怒气冲冲地说，“你要是不喜欢这里的话，为什么不到你们的以色列去？”

那些留下来的人家，往往得为那些已走了的人的积极行动付出代价。几个犹太青年讲，他们的父亲已经从重要的行政职位上被拉下来或者被调开了。作家一类的人则得到通知说，他们再也不会得到那种高档任务了，或者被通知说，因为他们的亲戚迁往以色列，他们再也不能出国旅行了。一位妇女有个兄弟在克格勃工作，因为她的缘故他被降了职。我听说，当神经质的英俊青年物理学家维克多·亚霍特决定要出去时，当局为了阻止他，曾对他的父亲(一位多年的老党员，担任莫斯科财政学院教授的高级职务）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同剧作家马克一样，这位父亲觉得自已年纪太大了，不能在以色列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于是决定不

去，但是，他理解儿子的心情，就干脆让他走了。学院院长大发雷霆。老亚霍特被开除出共产党，职位逐步下降，他的学位一个一个地被剥夺掉，同时那些共事了一辈子的同僚和下级都抨击他。生活中经过这场风暴袭击之后，他觉得太丢脸了，没奈何也只好决定外迁。还有些犹太人发现，许多平生知己，显然是为了保全自己，一夜之间就同他们翻了脸。我认识一位芭蕾舞女演员，她的事业前途所以被官员们断送，仅仅是因为她犯了一个错误：同一个申请外迁的人公开表示友好，而当时党要大家都避开他。

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个同化了的犹太人的那种堂·吉诃德式的感情。在撒马尔罕机场，我遇到一个犹太裁缝，他说他有些已去以色列的亲戚如今谈论要回来了。这个犹太人已经同化到了自称为"党外布尔什维克"的程度，并且（为了纪念列宁）把他的儿子起名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尽管如此，但当他开始谈到他的亲戚时，他还是为他们辩护，表示谅解他们。他的解释是，他们是被别的犹太人怂恿走的。他说，他不知道要是我写一篇关于他们的报道的话，会不会有可能促使他们回来。但是，当陪同我的苏联人走拢来偷听我们谈话的时候，这人马上就大骂他的亲戚，并表示要同他们断绝关系。"他们弄得我们很尴尬，"他说。"他们向自己喝过的杯子里吐唾沫。他们背叛了祖国。"

然而，因家庭风波而陷入困境的，最悲惨的莫过于瓦洛加·斯列帕克了。在我留在莫斯科的全部时间里，斯列帕克在整个外迁运动中一直是一个有耐心的长者，也是中流砥柱，他虽负有盛名，但申请签证并未获得批准。

斯列帕克的故事读来就象是这个运动的一部简史。他的积极活动开始于1969年。他自从1970年填了出境签证申请书以后，已经几次遭到解雇，受到折磨，被钉梢和搜查，大门被人砸开了，被拘留或者讯问至少不下二十次。在尼克松总统两次到莫斯科时，他都遭到预防性拘留；尽管在第二次拘留时，他向莫斯科检察官提出抗议，说他遭到非法监禁，但官方却通知他说，并没有关押过他。尽管受到种种折磨，在我看来，斯列帕克还是处之泰然，极少公开表示气愤，而且非常乐于帮助别人。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时，他正坐在他自建公助公寓房间里一只垫得厚厚的大椅子上，他举杯向我祝酒道别；由于没有伏特加，我们就用小酒杯喝苏格兰威士忌。但是，他的妻子玛丽娅，一个个子高大、面孔讨人欢喜、很有耐心的女人，非常安详地承认，等了差不多五年，日子越来越难熬了。

斯列帕克本来不大想谈他最焦心的事情——即他的父亲阻止他出去。但是，他的话匣子一打开，这个故事就象一出希腊悲剧那样展开了。他的父亲，原名所

罗门·伊兹拉伊列维奇·斯列帕克，亲身经历过俄国革命的进程。他在沙皇时代因为是激进分子而被捕入狱，二十世纪初期，他象胡志明和其他共产党人那样到了西方，在纽约当过码头装卸工。革命一爆发，他就赶回国去，先是领导一支抗日游击队，1920年时成为萨哈林岛党的高级领导人。二十年代初期，他以记者身分成为苏联第一个派驻日本的代表。在苏联外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的示意下，他换了一个不那么明显象犹太人的名字——谢苗恩·伊格纳捷维奇·斯列帕克。最后他被指派为共产国际（由列宁创立的国际共产党团体）的主席团成员。他不但具有一个真正老牌布尔什维克值得自豪的经历，并且怀有与之相称的不可动摇的信念。

据瓦洛加回忆，他同他父亲第一次的尖锐决裂发生在五十年代初期，当时斯大林正在开展他的反世界主义运动。瓦洛加的妻子玛丽娅，那时在一家医院工作，对于医生阴谋案件的指控和受斯大林偏执狂之害的无辜牺牲者感到极为不安。瓦洛加开始同他父亲为这件事争辩起来。

“只要你砍树，麻雀总要飞的，”老头子用一句谚语来消除玛丽娅的顾虑。“所以，就让一些人成为无辜的牺牲者吧。最要紧的是消灭那个真正的敌人。”

“父亲，你已失去知觉了！”瓦洛加对他大声叫嚷。“我是决不会参加你们的党的。”

老头子大吃一惊。“为了你和这些小孙子，我被关在牢里服苦役，”他回忆说。“我为苏维埃政权打仗，再帮着把它建立起来，而你却说出这种话来。”儿子大逆不道，老头子就发了心脏病。“他得成天用那种滴剂，”瓦洛加追忆说。

那些年里全家人住在一起。后来他们分开了。直到斯大林去世后，创伤才平复。但是，到了1968年，在“六天战争”和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瓦洛加告诉他父亲，他打算去以色列。父亲不睬他。瓦洛加在电视科学研究所领导一个实验室，1969年初他辞去了研究所的职务，希望这一步骤可以使他比较容易出去，因为他曾经接触过一些机密材料。他直到着手申请出国的时候，才通知了他的父亲。“吵得可真厉害，”玛丽娅·斯列帕克对我说。“那次家里爆发了一场内战。”

瓦洛加·斯列帕克个子高大，身体结实，快五十岁了。他有一双工人的大手，一个拳击选手的体格，一副预言家的络腮胡子，以及忧郁的棕色眼睛里蕴藏着的内心的宁静。我从没有见过他父亲，不过从瓦洛加他两口子的描述中，知道他也硬得象块石头一样。父子俩都很刚愎自用。我可以想象得出老头子对瓦洛加去

以色列的决定会怎样大为恼火。

“这可不行——这是叛国，”老头子朝瓦洛加喊道。“你是在这里生长的。你不能走。”

“我们考虑过了，”瓦洛加坚持说。“我们不会改变主意的。”

“那么，我们双方就是敌人了，”父亲宣布说。他冷冷地声明，他再也不愿意看见沃洛佳和他的一家了。“你和你的孩子不要来看我了，”他说。“离开我，让他们忘掉我，让我也忘掉他们，也忘掉你们。”

玛丽娅的母亲（以后她也迁往以色列了）想打个圆场。她提醒老头子说，他两个孙子生下来时（现在快十几岁了）都是他亲手从医院里抱回来的。她告诉他说，他不能一下子就同他的亲骨肉一刀两断。

“不，”老斯列帕克说，硬得象块石头。“我现在就要斩断。既要斩断，你就得一下子一刀两断。”

这个严酷的决定正是苏联制度所要求的——同那些想要外迁的精神叛徒立即彻底断绝关系。斯列帕克老头子并不是个唯一的例子，不过，他那决定和坚持的程度却严厉得异乎寻常。

自从家庭中发生了这场轩然大波之后，在将近六年的时间里，瓦洛加·斯列帕克和他的孩子只见过老头子三次（老头子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每次都是因为他病重了，其中两次是心力衰竭。全家人——或其

中一个人——坐地铁和公共汽车前往第六十医院探望老头子，这座医院通常称为“老布尔什维克医院”，很相称地坐落在“热心人林荫大道”上。每次老头子看到他的儿孙都很高兴，同他们互相说些开心话。但是，每次他总要转到那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上：“你改变了主意没有？”

瓦洛加总回答说，“没有。”

于是老头子就下命令说，“那么，走开，不要再来了。”

别的亲戚告诉瓦洛加说，他父亲有几次到坐落在卢比扬卡监狱旁边的克格勃总部去，表示反对让瓦洛加一家前往以色列。瓦洛加伤心地向我承认，“他是去过那儿的，至于他对他们说些什么，那别人只好揣测了。我有一次向他问起，但是他根本不肯谈这个问题。他只是对我说，‘走开，不改变主意就不要再来了。’”

斯列帕克父子远比我见过的多数犹太人都一心一意。多数的人都象剧作家马克和他的妻子塔瓦娅那样，心理上是矛盾的。在那些行将离境的犹太人中，甚至在那些活跃分子中，我发现有相当多的人在最后时刻临近时总是对俄国怀有矛盾心理。突然间，他们感到一种依依不舍和留恋过去的冲动，一种不愿意决然离去的心情，一种既有忧郁感，又有那种经过长期努力

终于达到目的的得意心情。

“我还没有准备好要走呢——时间太仓促了，”这是在最后获得批准时我一再听到他们说的一句话。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确实是还没有准备好，因为当局通常只给他们一个星期，有时只有少得可怜的四、五天时间去办完一大堆官僚主义的外迁手续，包括：把他们住的公寓房间“交还”给国家，有数不清的证件要批准、盖章和签字，还要得到当地警察局的批准，付清水电煤气费，把行李送请检查和核对，为他们的出境签证缴纳九百卢布等。但是他们确实在情感上也没有准备好同他们以往的生活一刀两断。他们也许已经抛弃了苏联的生活，并且觉得它也抛弃了他们，但是他们还不曾准备好全部放弃。

尼娜·沃罗涅尔是一位中年的女作家和语言学家，从她那张少女般面庞和一双好奇的大眼睛中，很难看出她写的独幕剧会带有贝克特[①] 那种残酷的绝望情绪。她曾向我吐露，在她一家人的签证申请第一次未获批准时，她曾暗自庆幸。开头我很难相信她的话。因为我知道，当她的丈夫亚历山大·沃罗涅尔（他是一位核物理学家，也是持不同政见的犹太科学家的头头，他身材瘦瘠，剪着平头，说话口齿很清晰）屡次受到克

① 塞缪尔·贝克特（1906—）：当代爱尔兰先锋派小说家和剧作家。——译者

格勃的讯问和威胁的时候，尼娜是多么害怕。有一次他躲了起来，而她也经常受到秘密警察的钉梢，当时她真怕得要死。然而，她说，“我没有准备好要走。我的朋友都在这里。这是我的世界。我不想离开它。我总是沿着普希金广场附近的街道漫步，边走边想，‘我以后再也看不到这些地方了。’特别是秋天，树叶正在凋落，我时常走到林中我特别喜爱的一些地方，想着我以后会多么怀念这些地方啊。”对尼娜以及其他一些作家来说，这种离情别绪也许更使人难受，因为这些得不到他们自己犹太文化的作家，已经把自己沉浸在俄罗斯的文化中，沉浸在这种文化的传统、语言和丰富多彩之中了。我知道，有些人在最后的紧张心情之下真的悲痛欲绝，就象上断头台那样，突然恍然大悟。必须同自己既往的一生永诀了。罗曼·鲁特曼对我说过：“那情形就象预演一次死亡一样。”

有些人经过这段体验，象神话中的长生鸟自焚后复活一样，适应得很好；但另一些人则发现外部世界比他们原来所想象的要艰险复杂得多。

“你们这里已经进入共产主义了，”国际法专家亚历山大·亚诺夫在他到达纽约两天后对我说；当时由于想象不到西方在物质上这样充沛，精神上颇为震惊。我记得，我自己在1974年12月最后从莫斯科出来到达苏黎世的时候也有同样的感觉。我在街上溜达，就象

被马洛的鬼魂惊醒了的斯克罗吉[1]一样，看到橱窗里冬天还有老大一串串的香蕉，象轮辐那样的意大利大香肠，再有电灯、家具、汽车、古玩、服装，琳琅满目，简直叫人不知挑哪个才好，当时确实暗自笑出声来。我遇见一些犹太人，他们在到维也纳的头几天，看见什么都要摸摸，觉得开心之至；他们试试裤子、衣服、运动衫和鞋子，砰地一声揿开了自动烤面包器，试验一下各种家常用具，坐进小汽车，闻闻房间里新家具的气味，把过去一辈子受压制的沮丧情绪都尽情发泄出来。

然而，数月之后，我听说亚诺夫同许多别的人一样，无法解决怎样布置一套公寓的问题，并且发现在美国要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又是多么伤脑筋。美国既没有那种为合格的专家自动提供工作的政府，又没有象俄国那样帮助解决这个问题的老朋友关系。美国的生活方式也是奇怪的。我认识的一位妇女想不明白，她学完打字的课程之后，在纽约找一个打字员工作怎么会那样困难。在莫斯科，一张毕业证书就能保证你有个工作。于是人们怀着思乡的情绪谈到莫斯科。如果说他们开头会被难以置信的大量私人小汽车弄得晕头转向，那么他们后来就会由于公共交通工具不足和收费太高而大失所望。他们以前在莫斯科的朋友也从以色

---

① 斯克罗吉是查尔斯·狄更斯《圣诞颂歌》小说中的主人公。——译者

列来信，对一个民主国家的许多问题感到烦恼，对种种紊乱的办事手续和没完没了的政治辩论感到吃惊或者不耐烦。一位友人引述了另一位苏联犹太人开下的一张惊人而夸张的处方："〔以色列〕政府太腐败，他们需要一个斯大林。"

奇特而又奇特的是，我开始听到犹太人自称为俄罗斯人。这是我以前在苏联从没听到过的。根据官方规定，苏联的制度对俄罗斯人和犹太人加以区别，如同对其他民族一样，一定要在身分证上写明每个人的民族。犹太人被人嘲弄地称为"第五条人"，因为在证件上，第五条列出的是民族。特别是在最近几年积极活动的情况下，我认识的苏联犹太人是决不会想到在莫斯科或者列宁格勒自称为俄罗斯人的。可是在纽约，而且也在以色列，许多犹太人都感觉到他们的俄罗斯人身分。甚至没有离开俄国就患上了这种思乡病，拉丽萨·鲍戈拉兹（她是六十年代最出名的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是纯血统犹太人）便写道："我习惯于俄罗斯风景的色彩、气味和树叶簌簌声，就象我习惯于俄罗斯语言、俄罗斯诗歌的格律一样。对于任何别的东西我都觉得是格格不入的。"

对许多苏联犹太人来说，来到以色列或西方之后发现自己有这种思想感情，自己也不免大吃一惊。许多西方人习惯于把苏联犹太人一律想象为狂热的犹太

复国主义者或笃信宗教的犹太人，他们发现了这一点也会大吃一惊。但是这一点很能说明犹太人的心情和性格，包括那些留下来的和那些已经走了的。甚至在那些抛弃了俄国的那些人身上，俄国的印记也是很明显的。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一个很有才华的俄国讽刺文学作家曾因在国外发表著作而进过劳改营，后来从营里出来后定居巴黎。尼娜·沃罗涅尔引用过他的几句话。有人问这位已经成了持不同政见运动的象征的西尼亚夫斯基，拿他在劳改营的头半年和他在巴黎的头半年相比，他觉得哪一段时间更难受。

“在巴黎的头半年更难过，”西尼亚夫斯基回答说。“在劳改营里的时候，我毕竟还是在俄国呀。”

对此，一位也是刚刚移居到纽约来的犹太知识分子，补充了一个颇有见地的意见：“象西尼亚夫斯基这种人，离开俄国并不是真正为了去寻找以色列或者西方，而是为了去寻找一个没有警察国家的俄国。我们有许多人都是这样。”

二十 融 合

他们正在变得更象我们吗?

> 我相信，我们能够用贸易拯救它〔俄国〕。商业具有使人清醒的力量。……我认为，贸易将比其他任何方法更有把握结束布尔什维主义的凶残、劫掠和粗野。
>
>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
>
> 1922 年 2 月 10 日

一个消息在俄国人中间传开了。它象下雪一样，开始时似落非落地飘着几片雪花，逐渐纷纷扬扬，一阵紧似一阵，终于变成了一场暴风雪。这个消息，是：苏联政府已停止干扰"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和西德电台对俄国人的广播，而这种干扰是它一向不肯承认的。

那是 1973 年 9 月中旬的事。几天以后，我们去几个俄国朋友的家里访问，这些人长期以来为了要从国外搞到一些粗斜纹布裤和法国香水、为了能在他们书架上摆几本西方出版的平装本书籍、为了能在他们厨

房的墙上贴一张披头士乐队的招贴画，煞费苦心。他们那个十岁的儿子瓦夏信步走进客厅，把一只半导体紧凑在耳边，棕色的眼睛闪闪发光，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孩子的母亲解释说："他最近几天来一直是这样，不论到哪里都带着他的半导体收听'美国之音'。我们也都在听。"

另一个朋友，一位电子计算机专家，告诉我，他研究所里的一些工作人员曾被召集到一起，去听一个共产党宣传人员做关于安德烈·萨哈罗夫问题的政治报告。这个党的官员讲完开场白后，有人要求他把萨哈罗夫到底说过些什么给讲讲清楚，因为苏联报刊上从来没有发表过萨哈罗夫的任何著作或声明。作报告的人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也许有人一直在收听外国电台广播吧，他可以给我们谈谈那些电台讲到萨哈罗夫些什么嘛。"没有一个人接受他的建议，但是，这倒是一个突出的事例，足以说明那一夜之间所发生的变化。

这并不是说，有些人不是一直在偷听西方电台广播。在我到苏联的最初几个星期里，有人带我到摩尔达维亚苏维埃共和国首都基希涅夫的一个狭小破旧的公寓里。我看到一对夫妇放下了窗帘，正在调谐一只有着细长撑脚的笨重老式落地短波收音机，选择电台。在西伯利亚的布拉茨克市，人家带我去看一个使我惊讶的图书馆，里面收藏有西方摇摆舞的录音磁带，那是

一个爱好流行歌曲的青年团体从"美国之音"播送的音乐中录下来的。这些人并不真正懂英语，但是他们摹仿着广播员优美的声调说："这是威利斯·康诺弗向你们播送美国音乐，"然后哈哈大笑。在莫斯科郊外树林里散步和野餐的苏联人，到自己乡间别墅去的苏联人，或是住在从白俄罗斯的喀尔巴阡山到太平洋远东地区小城镇里的苏联人，多年来一直小心谨慎地收听外国电台。但是，在大城市里由于干扰，收听外国电台不仅困难，而且冒风险。

现在干扰突然停止，人们不仅可以收听，而且可以互相承认以前收听过。青年人可以用盒式录音机随便把外国流行音乐表演录了下来，然后互相交换，或者拿来卖钱。他们的父母上班时，可以公开传播关于阿拉伯—以色列 1973 年斋月战争的最新消息。那个中年的电子计算机专家第一次对我说，他亲身感受到缓和的影响。他说，苏美关系的改善当然使他感到宽慰，"因为每个人都希望和平"。但是，在干扰不曾结束之前，他感觉缓和只是"为大头头们的，并不是为我们的"。

正是西方报刊报道的以及西方旅游者或商业代表团带回来的这类简短消息，又使人们想起了那两个久已存在的、情不自禁要提出的问题：他们正在变得更象我们吗？俄国内部的生活已经改变了吗？——它正在

自由化吗？

这是一些很自然的设想。我动身去莫斯科的时候也倾向于这样的设想。有了二十世纪立刻传到的无线电通讯，经常不断的世界旅行，日益扩大的贸易，东西方缓和的宣布，我们往往会这样设想：世界各国正在变得更加相似了，逐渐形成一个全球性的村庄。如果东西方的领导人相处得更好一些，如果普通人都坐在相仿的喷气飞机里，降落在相仿的机场上，都坐汽车，都穿西装系领带（或者穿厚底高跟鞋和粗斜纹布裤），都把宇宙飞行员送上太空，建立原子能工厂，用电子计算机解答问题，青年人都随着同一节拍跳摇摆舞，那么就可以说，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正在变得日益相似，而这一点几乎是大家公认的一条道理。学者们甚至已经给它杜撰了一个名词，叫做融合，这是一种富有引诱力和令人快慰的理论，它认为，当代经济的大量生产、巨大规模，复杂组织和现代化技术，将迫使这两种制度沿着相仿的道路前进。按照这种理论，各种经济和政治制度都要互相融合，因为它们必须对付同样的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会有相仿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和体制。

自从斯大林去世后，几乎在苏联历史每次发生变动时，我们西方人，还有好多俄国人，就要设法证实这样一个希望，即由斯大林建立起来的严厉的极权主义

正在消蚀。1956年和1961年，赫鲁晓夫彻底谴责了斯大林主义的恐怖，在当时似乎已经粉碎了共产党永远正确的神话。有些俄国人满怀希望地（其他人则是惶惑不安地）设想共产党在苏联生活中无可争议的最高权力将不会再象从前一样了。赫鲁晓夫的解冻在文化界引起的骚动——叶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索尔仁尼琴等人开出的第一批花朵——看来已经把苏联文化和知识生活的自由化引向了一个前途大有希望和似乎不可逆转的新方向。在五十年代，西方通过同莫斯科发展文化交流来鼓励这种趋向。当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在国外出版时，我们既感到吃惊，又感到乐观。不错，他受到诽谤，被迫放弃了诺贝尔奖金，最后在孤独中死了。但是他并没有被消灭掉，要是在斯大林时代他是肯定会被消灭掉的。六十年代中期，自由化似乎已经加强了，当时有几百位科学家和其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其中有的是共产党员——冒险在抗议书上签名，抗议对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和尤里·丹尼尔等作家进行审讯。这些作家曾把他们的著作偷偷交给西方去出版，因此受到赫鲁晓夫的继任者的处罚。等到提出抗议书的那个阶段逐渐过去，接着转入防御时，一些头脑更清醒的人就认为，教育出一代工程师、有专门技术的政治家以及电子计算机专家，势必会冲淡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而带来经济和政治的改革。

最后是缓和，这是对战略僵持的正式承认，同时莫斯科又决定谋求同一向被它恶毒攻击的资本家做生意。苏维埃制度再次显得好象是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苏联生活中的暗流是如此之多，而且又是如此经常地向相反方向流动，这就使得局外人谁也没有把握知道苏俄究竟要往何处去。但是，某些变革的力量是看得见的，而且某些变革已经明显地发生了。当然，最引人注目的是斯大林那样毫无理性地大批杀害党的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消灭几百万普通公民那种专制的、疯狂的大规模恐怖已被遏止了。这件事是赫鲁晓夫办到的。虽然人们对斯大林的恐怖至今记忆犹新，并且心有余悸，但是，对大多数俄国人来说，斯大林进行清洗的那种令人提心吊胆的情况已经消除。这种解放感是现在苏联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实。有一次，我和两对年轻夫妇从我们外国人住的公寓区出来。刚才他们胆子真大，竟敢经过大门口秘密警察的岗哨走进来。其中一个青年人在出来时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坦白地说："如果在斯大林统治下，我绝不敢这样冒险，我们会因此完蛋的。"在勃列日涅夫的俄国，他们是否可以完全不受到惩罚，因为我没有能够再同他们接触而无从知道。但是，我相信，即使被发现了，他们也不会受到象在斯大林时代那样的严厉处分。

再有一件事情几乎是同等重要的，那就是，自从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生活水平有了根本的改善。在那位独裁者的统治下，他们实在流尽了血汗，得不到象样的食品、住房和衣服。他们作为国家建设的强迫劳动力，被压榨到了极点。现在，七十年代里，他们在物质上享受到了苏联历史上最好的十年的生活。他们比起工业化的西方标准来仍旧生活得很苦，还必须忍受在买东西时所遭到的种种麻烦，而如果是一个较为软弱的民族，这些麻烦会使他们意志颓丧的。但是，就象许多俄国人告诉我的，他们拿来比较的唯一的真正标准是过去的生活，因此，想到“我们比起自己的父母来，日子要好过得多”，他们已经感恩不尽了。

此外，在知识分子、行政官员、工程师、作家、芭蕾舞演员等上层中产阶级中间，官方所认可的鼓励消费政策已使俄国人压制了几十年的那种资产阶级渴望占有的本能大为发作。他们在私人汽车、私人购置的公寓和私人乡间别墅(哪怕它比一个工具棚大不了多少)里发现了一个不受包罗一切的集体主义约束的生活小天地。他们占有了一些东西。这个事实本身又引起了要求得到更多东西的欲望，并且加深了对苏联消费品和服务的低劣质量的不满。这也使黑市有了新的推动力，而黑市这整个非法经济活动，现在已经成为苏维埃制度中的一个固定部分了。

一些较老的、比较正统的共产党人担心，这种新的物质第一主义已经助长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消蚀。虽然人人都是在口头上响应党提出的口号，但我记不起在莫斯科的三年生活中，曾听到有哪一个人令人信服地再次表现过象叶夫根尼娅·金兹伯格那样的感情。叶夫根尼娅·金兹伯格是一个被斯大林关进监狱的富有理想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家，她在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时这样说："我不愿意夸夸其谈，而是诚心诚意地说，如果命令我为党去死，不是死一次，而是死三次，……我会毫不犹豫地服从。"那是四十年前的事了。今天，这种热情再也找不到了，并且也不必要了。今天要紧的是表面上的政治顺从。因为党虽然警觉到意识形态的信念正在减弱，但还是坚持要人们外表上表现忠诚，于是那些热衷的年轻野心家就照样做一套，也不管他们私下里是怎么想法；因为他们懂得：当上了党员，就可以得到好工作，过舒适生活，也许还有出国的机会。

苏联制度内部要求改革的最为强大但尚未被了解的力量，也许就是那股要求实行重大经济改革的冲力。在经济体制内部，有一个相当大的、潜在的、忠诚的反对派，一个经理和技术官僚阶层，这些人同少数直言不讳、主张有一个开放的多党民主制度的持不同政见者很不同，他们担心的是他们痛心地称之为苏联经济中

的"停滞"状况。他们满足于保留现有的政治结构，但他们想要使经济现代化，使它运转得更加合理，较少受到党的高级领导和中央计划人员的干扰。一批具有现代化思想的数理经济学家，一直对由斯大林传下来的那套高度集中的计划制度持有异议，反对那样不惜任何代价来贯彻硬性的生产指标，他们极力主张采取一种比较灵活的做法。六十年代中期，柯西金总理提出了一些经济上的权力下放办法，并且试验用利润和销售、而不是单纯用产量来衡量经济成就。在农业和建筑业方面还试行了其他一些较为有限的注重经济实效的试验，试图以此提高生产率。

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发展起来的苏联社会学是另一种离开意识形态而转向更大现实主义的趋向，它引起了西方学者们的兴趣，同时使几位苏联社会学家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陈词滥调。例如，勃列日涅夫尽可以吹牛说，随着年复一年的胜利，苏联社会正变得更没有阶级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区别也在日趋消失，但是，社会学的研究却开始显示出一幅相反的情景。

其实，社会学早在二十年代的苏联就已略具雏形，但后来它被斯大林正式指摘为反马克思主义才停止发展。在1958年以前，它一直是几乎不存在的，最多也不过是经济学和哲学的一个非常孱弱的养子而已。它不

是作为一个单独的学科来教授的，因为它的经验主义方法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和党垄断社会情报的一种含蓄的挑战。社会学之成为赫鲁晓夫时代知识界普遍骚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实际上是在五十年代末期开始的。甚至还有一些温和的共产党人，把它看成一种管理社会的现代化工具而加以鼓励。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一些社会学家曾经乐观地但不那么认真地设想，要冒险闯进政治科学的领域，摆脱意识形态气味很重的老一套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自成一种经验主义的学科。到了1968年，应用社会研究所在莫斯科建立起来了，据说它是在为党和军方做一些秘密研究工作。

但是，在此很久以前——实际上更为引人注目——已经出现了一些实地调查研究，这些研究已开始表明：苏联社会中正在形成更多的阶层（而不是象勃列日涅夫所宣称的那样正变得更没有阶级了）；体力劳动的工人阶级的子弟要爬上那条社会阶梯已经越来越困难，尽管当局大肆宣传这是一个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国家；体力劳动受到高度尊重，但是，各个社会阶级出身的年轻人却看不起体力劳动者的职业，都渴望成为物理学家、工程师、医学科学家、数学家、化学家或无线电专家。有一项调查研究表明，知识分子的后代进大学的机会比农村子弟至少要多七倍，西方的学者

从这个材料推断，认为可能是二十四比一的机会。

有的社会学家开始报道，一些体力劳动的工人离开了他们在工厂的工作（按照苏联的教条，这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因为照理说离开工作应该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结果）。另一些学者开始研究有关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的社会学。还有一些学者揭示出年轻人对于物质享受、称心如意的职业或者国外旅行很感兴趣，而对政治思想灌输则感到厌烦。这些都是在某一个小地区进行的范围有限的研究，因为苏联社会学家过去没有——现在仍没有——众所公认的进行全国性民意测验的能力。调查的结果常常只刊登在发行有限的学术期刊上，模糊不清地反映在一些图表里。但是仍可以看出其中隐含的意思。而且，理论家们也开始为苏联社会学提出一些与西方理论有密切联系的概念。一部分有见识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乐观赞同的眼光，注视着这整个现象，他们认为社会学的发展——以及它所暴露出来的苏联生活中的实际材料——是检验能否实现自由化的试金石和通向最终改革的重要途径。

但是，到了1971年，形势又倒退了，经验社会学被迫处于守势。同苏联文化生活的其他领域一样，它受到了重重打击，包括捷克斯洛伐克自由主义运动所产生的不利影响，苏联对国内"修正主义"思潮和国内自由化的保守反应，以及对那些在前些时候，即六十年代

中期与后期早些时候的骚动中签名请愿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犹太人)的全面镇压。

“有太多好管闲事的人在动脑筋，他们〔当局〕决定他们有必要封住这些人的嘴巴，”一个黑头发的年轻苏联社会学家萨沙这样告诉我。我们是在莫斯科闹市某自建公助的公寓中一间灯光很暗的房间里会见的。萨沙因为和一个美国记者会见而感到很紧张，但是他又急于要讲一讲莫斯科应用社会研究所里的清洗的故事。该所是全国同类研究中心中最重要的一个。他说，党在1971年底和1972年成立了调查委员会，盘问了所里的全体人员，并且宣布要“清除坏蛋”。照萨沙说，所长被迫退休，在三百名专业社会学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被清洗，其中包括一些最大胆和最有生气的研究人员，这些人都躲到其他学科的研究所去了。接着保守派便施加压力来取消西方的概念和术语。新任所长M·N·鲁特克维奇表明了严厉的态度，重申党的控制权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压倒一切的地位。1973年9月鲁特克维奇在《真理报》上宣称：“社会学是一门具有党性的科学。凡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不管他是科学家、党的工作人员或经济工作人员，都不能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研究者’的姿态。”

莫斯科研究所受到清洗，是社会学在全国范围内所遭受的一次重大挫折，因为那个研究所搜罗了许多

优秀的研究人员，并且在这个领域内起着主要的作用。此后新著作的出版逐渐减少了。社会学家之间出现了分化，他们感到必须收敛。我试图会见其中几个人，但是，除了萨沙，其他都不敢冒这个风险。萨沙说，"现在的形势很不利于社会学的发展。人们都感到孤立。"

但是，为了在国际上恢复一些地位，还是允许苏联社会学在组织上恢复起来。1974 年秋天，一个定期的社会学刊物创刊了，而莫斯科这个研究所则重新命名为社会学研究所，这是前进了一步。一批新的研究著作出现了，但是，它们没有给西方社会学家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新的研究工作虽然有时候做得比六十年代更为细致，但看来范围更窄，更加谨慎小心，而且，一般说来，也更少暴露情况。据传说，最有价值的研究是保密的，是不发表的，而公之于众的苏联社会学则在思想上变得更保守了。它的前途如何还很难逆料。其他一些苏联知识分子都感到灰心丧气。一个物理学家怏怏不乐地说："这太不象话啦。他们现在进行的研究范围更狭窄了。这不仅对他们来说非常糟糕，对于我们其余的人也是如此。"

苏联社会学的命运，很能说明勃列日涅夫统治下俄国的政治特征：第一，出现了先试验后收缩的格局；第二，1968 年 8 月克里姆林宫决定入侵捷克斯洛伐

克，粉碎那里的自由主义改革，这件事构成了苏联国内生活中的分水岭。我所认识的一些自由主义的俄国人认为，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下，苏联的七十年代是国内一个顽固保守的灰暗时期——是一个比赫鲁晓夫统治时代更无闯劲、更少刺激、更乏希望的时期。勃列日涅夫时代部分地恢复了斯大林的名誉，制止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恐怖统治的批评——对所有俄国人来说，这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重大改变。西方人如果要理解这意味着什么，他们不妨想象一下：这就等于在美国不许公开报道或谈论越南战争、水门丑闻以及关于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国内政治活动的整个争论一样。就象一些俄国人对我说的，当你把历史的黑暗面遮盖起来时，现在的一切也变得黑暗了。

不仅不准批评过去，而且对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展开了一场镇压运动，来缩小赫鲁晓夫的解冻所引起的动荡。六十年代后期，这种镇压运动似乎把矛头对准了那些参加写抗议书的科学家和其他学者。他们中相当多的人都被开除出党，强迫离职或解雇，并且永远列入黑名单，以迫使官方机构里的自由主义分子不敢再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七十年代初期，尽管有了缓和，但对持不同政见的活跃分子却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驱逐索尔仁尼琴出境，有效地孤立萨哈罗夫，开展了查禁地下刊物的运动，在乌克兰、立陶宛、亚美

尼亚以及其他地方监禁了民族主义者，继续对那些较不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进行审判，把他们放逐到西伯利亚或国外去。

在更为广泛的文化领域里，也相应地加强了控制，于是在赫鲁晓夫统治时期所引起的文化上逐步自由化和言论上有更大的自由的种种希望，现在都破灭了。到了 1970 至 1971 年间，这种控制的效果便相当明显了。此后，几个有书出版的作家对我抱怨说，在赫鲁晓夫时代和在勃列日涅夫统治的早期已经出版的书不能再版了。一个小说家对我说："在赫鲁晓夫统治时期，我们的文学要好一些。那时，呼吸要畅快些。在《新世界》〔杂志〕上，你可以读到真正的文学作品——索尔仁尼琴、杜金采夫以及其他人的作品。现在，索尔仁尼琴被赶走了，杜金采夫的作品也读不到了。"不过另一些人则认为，戏剧界变得更活跃和更有趣了。但是，他们也承认，虽然个别的电影、戏剧或书籍可能会引起一时的兴味，但勃列日涅夫时期已把赫鲁晓夫的解冻所造成的激情感、方向感和希望都扼杀了。在一个历史上曾象火山爆发似的涌现出大量创造性天才的国家里，自从索尔仁尼琴和帕斯捷尔纳克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真正有分量的作家，这确是衡量这种文化上的幽闭恐怖状态的真正的尺度。

保守分子也阻碍了其他领域里的变革。柯西金总

理在六十年代中期曾打算实行经济改革，给予工业经理们以更多的物质刺激和更多的灵活性，但是这些计划都被莫斯科有势力的党和政府的官僚们破坏和扼杀了。数理经济学家们建议实行更有灵活性的计划，也受到中央计划人员的排斥。在农业方面，耕作小组的试验被抛在一边，实际上是放弃了。

总之，尽管俄国人生活深处隐藏有种种吸引人的异常现象，但大部分从斯大林继承下来的基本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今天仍然原封不动。虽然赫鲁晓夫引起了一场政治地震，但共产党的统治和它的绝对正确仍然是苏维埃大厦的支柱。持不同政见的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对我抱怨说："任何一个小小的组织，哪怕是一个养狗或种仙人掌的俱乐部，也有党的相应机构进行监督。"在党内最上层或接近最上层的人当中，极度缺少新鲜血液。赫鲁晓夫打算强制实行轮换一些党内最好的职位，但这项计划已经被废弃不用了。领导集团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保守了（1975 年政治局成员的平均年龄是六十六岁），在他们下面的各级官僚也是如此。

血腥的清洗虽然已经结束，但是使用暴力的制度及其西伯利亚集中营和秘密警察并没有结束。在赫鲁晓夫时代偶尔受到批评的秘密警察，现在已经恢复了他们的威望，赞为"我们勇敢的契卡人员"（列宁是这样

称呼他们的)。克格勃头子尤里·安德罗波夫于1973年4月被提升到政治局里，他是自从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头子拉夫连季·贝利亚之后，第一个享有这种地位的。斯大林通过大规模恐怖手段进行控制的办法已被抛弃，这是苏联生活中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然而实际上现在似乎可以适当地运用一种更为巧妙的镇压技术，——斯大林杀人太多，现在的做法更有效了。一个持不同政见者说，现政权发现，只要挑选出几千个人，把他们抓起来和列入黑名单，就可以起一种威慑的效果，不必去搞大规模恐怖。一个电影剧本作家承认："大家之所以谨慎小心，主要并不是因为怕关进监狱，而是因为怕那些更巧妙的压力——施加在各方面，包括工作、旅行、享有小小的特权和机会等。这套制度是起作用的——它在悄悄地起作用。"

在苏联生活中，在经济上的改善与政治的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发展之间，并不象许多西方人所设想的那样存在什么自动的因果关系。苏联消费者日益提高的期望和一个意识到本身存在的中产阶级的出现，总有一天会影响苏维埃制度，但迄今为止，资产阶级情调的滋长还没有迫使当局重新安排全国的先后缓急的次序，或使权力发生任何转移。在公开场合下，勃列日涅夫集团大肆渲染对消费者的关怀，而苏联消费者的状况也毫无问题是比过去改善了。1970年12月波兰波

罗的海港口城市因肉类涨价引起码头工人暴动后，克里姆林宫大为震惊，答应苏联人民要在1971—1975年的五年计划里争取消费品生产部门的增长高于重工业，这样的五年计划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但是，到了1972年，先后缓急的顺序又悄悄地倒过来了；而到了1974年，苏联领导集团就公开承认优先地位又属于重工业了。

在其他国家，这样一变很可能引起危险。但是，俄国人生活中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领导有能力控制住消费者的欲望。美国社会学家保罗·霍兰德提出了一个敏锐的看法，他说："五十多年来，苏联人民一直被告知说：理想国就要到来了。然而，在他们中间，理想国的意识却看不出有什么显著的发展。"这个政权许下了各种各样的诺言，但是都不曾兑现。然而，只要面包、卷心菜、土豆和伏特加能经常供应，偶尔运来一批桔子，每隔一阵子有机会看一场西方电影，那么俄国消费者也就心满意足了。他们的要求比任何其他工业化国家的消费者都低，——这是这个政权能保持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再说，看来正是苏联知识分子中的这种消费者的物质第一主义情绪，消蚀了他们谋求改革的精力，并且转移了他们对一种更自由的文化和政治气候的向往。赫鲁晓夫时代那种早期的理想主义已让位于一种玩世

不恭的情绪。一位幻想破灭了的数学家说："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一位地位很高的党员新闻工作者也说，人们都热衷于追求个人名利，很少关心更广泛的社会问题。首长，即头头阶级，和文化科学界的名流暗中纵情于他们的物质享受，而他们下一级的那些人则对这些特权垂涎三尺。从他们私下里对我说的话来判断，数量惊人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这种状况感到痛心，但是，他们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于是宁可钻进个人生活的避风港，而不愿去同这个制度较量。在我离开莫斯科前不久，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在一首小诗里把这种情绪表达了出来。这首诗嘲笑自由主义作家们(我猜想，也包括他自己在内)怎样被阔绰的排场所驯服，从而放低了他们作品的调子。他说，那个隐藏在内心里审查自己作品的恶棍，名字叫做妥协·妥协奥维奇，他

在你心底里，悄悄地讲：
"好啦，别再挑剔了，
只要你稍微修改一行半行。"
这个劝诱妥协的家伙
凡事精打算盘细思量，
他用各种东西来收买，
把我们看作大孩儿一样：

公寓呀，家具呀，还有时髦的衣裳。
于是我们不再是交战的一方，
只有当三杯下肚的时候，
我们才会吵吵嚷嚷。

一位杂志编辑若有所思地说："你必须懂得，我们落后于你们西方好多年。我想，我们目前大约处于你们美国人战后所处的阶段，当时你们正在恣意享受着战时所享受不到的东西——汽车、房子、衣服。那时候美国并没有激进的政治运动，也没有迹象可以看出二十年后会发生的事情，虽然现在那些反叛你们社会的青年学生同当时那些人和那个时期是不无关系的。所以，目前我们社会上出现了抢别墅、汽车以及其他东西的热潮。人们只谈这些东西，不关心其他一切。但是，也许再过一段时间，对这些东西已享受够了，人们就会开始更多地考虑生活的质量——也许那是在一、两代人以后吧。"

"也许在一、两代人以后吧。"这句话是我相当经常地听到的。俄国人的时间观念和西方人很不一样，他们更有耐心得多。俄国人同美国人和其他西方人不一样，他们并不以为向一个更自由、更开放的社会前进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

尽管如此，缓和在苏联还是产生了影响。例如，如果没有缓和，一个美国总统就不可能两次在苏联全国电视网上向公众发表演说。也很难想象，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能由苏联秘密警察保镖，深更半夜在莫斯科同犹太人外迁运动领袖们会晤。上文中有关收听广播的简单描叙也说明，缓和为西方无线电广播获得了几百万新的听众，使这些人看到了外部世界的一鳞半爪。近年来，苏联同西方签订了许多科学、技术和文化的交流协定，显著地扩大了苏联和西方专家接触的次数。苏联要保持这种接触的愿望，也使得克里姆林宫对西方的公开抗议非常敏感，西方抗议的是1973年秋天对持不同政见的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的诋毁运动，以及一年后苏联采取警察国家的粗暴手段，用推土机摧毁一个有点儿离经叛道意味的画展。为了安抚西方，克里姆林宫就放弃了反对萨哈罗夫的运动，并且允许举行另一次画展。后来，作为一种人道主义的姿态，它允许象棋大师鲍里斯·斯帕斯基和一个法国女人结婚，这是一种装潢门面的让步，对那些比较不出名的人很少影响。

缓和偶尔也使苏联领导人公开某些秘密。为了诱使法国在西方联盟中保持更大的独立性，他们在1966年给了戴高乐总统一个荣誉，让他作为第一个西方人去参观在哈萨克的拜科努尔的苏联秘密的空间发射

站。九年后，在同美国人一起举行的阿波罗-联盟号对接飞行的势头推动下，以及在美国阿波罗号指挥官托马斯·斯塔福德空军准将的强硬坚持下，苏联被迫对少数美国人开放了拜科努尔，甚至还让美国的政府官员和新闻记者参观莫斯科郊外的对接飞行地面控制站。(我记得在我们参观宇航人员的"星城"时，我在想，同普斯科夫的老克里姆林宫多么相象啊！不但整个空间联合机构的周围有墙，而且墙内还有墙，把一些我们不能进去的更秘密的区域隔绝起来。)美国的空间计划是公开的，为了不让美国在这方面擅美于前，苏联第一次不得不让他们自己的人民看到空间发射的实况，以及阿波罗-联盟号对接飞行的全过程。在长时间的拖延之后，又允许一些美国技术专家去参观莫斯科希望用美国贷款来开发的西伯利亚天然气田。华盛顿三次受到苏联大宗购粮的冲击，但对它的后果毫无准备，此后莫斯科于 1975 年表示愿意谈判一些长期协定来减轻大量购粮所引起的震动。

然而，说明缓和在人情方面产生影响的最生动的例子，莫过于七十年代前五年里，克里姆林宫在美国国会的强大压力下愿意让大约十万名苏联犹太人移居以色列和西方。(西德也施加了类似的压力，不过宣传和争论比较少些，结果是几千名日耳曼族人也获准离开了这个国家。)克里姆林宫一向希望苏联在国外能保持

一个社会主义乐土的引以自豪的形象，它在这一点上是十分敏感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允许这样多的人离境乃是一种史无前例的让步——这说明苏联犹太人是如何严重地不满，而勃列日涅夫及其领导集团中的支持者们又是如何强烈地希望从对美国的贸易中得到好处。

一个终于移居国外的犹太科学作家说："你不能想象有了这个'第三种选择'是多么重要。十年前，如果你不能忍受苏联制度下的生活，你可以……"说到这里，他用一个指头在自己脖子上划了一下。"现在，亏了美国主张缓和政策和苏联需要这些小小谷粒，于是就有了三种选择。或者你象以前那样〔手指头在脖子上一划〕，或者你可以为争取一点儿自由而斗争，因为你知道，还存在着第三种选择——可以离开这个国家。"

然而，重要的是必须认清莫斯科所定下的限度在哪里。就象这位科学作家所指出的，允许苏联犹太人移居国外，是苏联一般对旅行和移居限制的"一个例外"。他说，虽然放走了这些犹太人和日耳曼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是赋予他们一种永久性的权利，也不意味着其他一百多个苏联民族能够分享到这种特权。他强调说："犹太人是个例外。你必须记住这一点。每逢我们的统治者遇到一个难以对付的问题非作出让

步不可时，他们就会规定一些例外。但是，他们并不喜欢改变那些常规。”

照我看来，在估计苏联对缓和所作的其他让步的影响时，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西方的义愤能使安德烈·萨哈罗夫免于囚禁或不致于被撵出科学院，但是并不能保护其他许多不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它也没有能为其他苏联科学家赢得思想自由。实行缓和以来，苏联继续对不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进行审讯。西方对于用推土机粗暴地摧毁那个现代画展的公开抗议，使苏联统治者感到丢脸，因而允许另外举行一、两个特别的展览会，但是它并没有改变对苏联艺术的根本性控制。一个憔悴的青年作家在举行这次画展后对我说：“必须让你稍微发泄一下，但是要用极少引起麻烦的方式——比如，让青年人留点儿长头发，听点儿爵士音乐，穿两件西方式样的衣服，开一个小型艺术展览会。但是，可不要弄错了：他们并不打算批准抽象艺术。在文化生活中是不会出现什么大变化的。”

犹太人的移居国外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两亿五千万苏联公民中百分之九十或者更多的人从来不曾在国外生活过一天，并且也许永远不会去国外。拜科努尔的空间发射场对美国宇航人员开放，并不表示苏联在空间计划方面实行全面的开放政策。甚至停止无线电干扰也只不过是回复到赫鲁晓夫时代的情况

而已。在上次苏美缓和发展到高潮时，赫鲁晓夫也曾于1963年停止过干扰。勃列日涅夫在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重又恢复了干扰。即使在1973年部分停止干扰后，对于播送苏联新闻最多的西方电台——自由广播电台——始终不曾停止过干扰。而且，我的一些苏联朋友坚持说，随着缓和的推行，“美国之音”也已经冲淡了它的政治内容，以免激怒克里姆林宫。还有些人，对西方电台一味报道自己经济上的困境，也感到非常厌烦。一位教师冷淡地说：“我们可以在本国报纸上读到那些报道。我们要听其他新闻，那些在我们本国报纸上看不到的新闻。”

与西方的接触虽然是增加了，但也不容许听之任之，不加控制。每一个出国的科学或文化代表团都得经过仔细审查，那些出席在苏联举行的联席会议的苏方参加者也同样如此。一位自然科学家抱怨说：“要参加一次同美国人一起举行的会议，简直就象要走进一个保密的〔国防〕研究所一样。”难怪那些在特权圈子以外的人感到比以往更加与世隔绝。一位苏联科学家对一个正在安排科学交流的美国人说：“赶快邀请我们所有的头头到美国去吧。只有等他们都去过以后，我们代表团里才会有空额让真正从事实践的科学家参加。”所有这些集体的接触都有告密分子监视，他们往往就是那些希望自己能有特权更多地去西方旅行的科学

家。

换言之，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要肯定不再重犯他们显然认为是赫鲁晓夫犯过的错误——随着国际紧张关系的缓和，在国内也有所放松。缓和归缓和，警惕防范国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颠覆破坏，仍然是苏联报纸最主要的内容。在一些秘密报告里或者甚至是在公园的小型露天电影里，都要向苏联人宣传：外国游客、学者或商人怎样想办法要把宗教或政治性的书刊或其他“违禁品”带进苏联来，毒害苏联人民。虽然1975年7月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也同意交换观察员，监视在欧洲进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但莫斯科仍然反对军备协定中的现场观察原则。莫斯科得到了对东欧实际边界的正式承认，正如它早先利用那种更为松弛的缓和气氛来促使东德、古巴和北越被接纳进入国际大家庭一样。俄国人接受了这次会议关于家人团聚和东西方更自由地旅行的宣言，但是勃列日涅夫公开警告西方，“谁也不可以根据这种或那种外交政策的考虑去命令别人应该采用怎样的方式管理他们的内政”。政治局委员如尤里·安德罗波夫和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坚持认为西方对人权的关心只不过是为“意识形态破坏活动”打掩护，他们借此着重地向西方表示，莫斯科并没有进行内部的改变来迁就西方。苏美关系的主要发言人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极力争辩说，俄国人在

实践欧安会宣言有关人道主义的内容方面“远远超过了西方，特别是美国”。换言之，克里姆林宫极想在国外推进缓和，以利用苏联马克思主义者所爱说的“正在改变的力量对比”，但同时又企图在国内遏制缓和所带来的影响。勃列日涅夫把手伸向国外，但同时又试图在国内控制住局势。直到现在他都干得很成功。

西方现在还是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贸易可以越过意识形态的障碍，并将成为促进两种制度融合的催化剂。特别是在美国，人们感到，商业关系会最终使苏联这个警察国家软化，并且会播下最后实现自由化的种子。这并不是一种新的观念。早在1922年，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就对议会说，商业的“清醒的力量”，将“比其他任何方法更有把握结束布尔什维主义的凶残、劫掠和粗野”。（事实上，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英国、德国、美国都同斯大林的俄国做过大量的生意。）现在有种大同小异的说法，即随着苏联同资本主义西方做更多的生意，一些资本主义的方法将会被排除，而克里姆林宫也将不得不有所放松，并朝着一种市场社会主义发展。这种理论认为：由于苏联工业经理接触到西方技术，俄国公众接触到西方生活方式，他们将会看到西方制度的力量，而这就会增强要求更大自由的欲望，并且会在基层群众中形成要求在苏联实行根本性改革的压

力。

我在1971年到达莫斯科时，也对这种可能性很感兴趣，但是在那儿住了三年回来，我对它就更加怀疑了。首先，勃列日涅夫集团之所以转向西方谋求新技术，是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不必使苏联自己的经济自由化。等到1965年国内经济改革失败后，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认定，使苏维埃制度现代化的捷径，是从西方买进计算机、石油化工厂和其他高级技术，把这些设备原封不动地纳入苏维埃制度，而不是允许苏联经理人员、科学家和工程师享有必要的自由以发展这些技术。我的一个俄国朋友讽刺说：西方的技术将使苏维埃制度现代化，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个装备着计算机的斯大林主义”——也就是有一种仍然是集中控制的经济，而不是一种更为灵活的经济。

当然，经过很长一段时期后，这是可以改变的。但是，苏联统治者自己对于同西方商人接触的前景看来并不感到不安。苏联官员和党的新闻工作者多次相当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他们对西方的商人远比对西方的政治家、记者或作家更为欢迎，因为，象一个官员说的，“商人们会接受现在我们这种制度”，并不从意识形态上去反对它。换句话说，克里姆林宫发现利润的动机是可以信任的，因为西方的商人都忙于做生意，无暇把民主的传染性病毒带进苏联。俄国人自己对于他们与之

打交道的商人也不存什么意识形态方面的疑虑。在美国人中间，他们最喜欢的一些贸易伙伴是美国最大的国防承包商。东欧国家一向愿意试验各种新形式的合作企业和各种出售产权而同时又长期租用该产业的安排，但俄国人却坚决反对改变苏联经济的基本结构。

我相信，反对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于意识形态，而是不肯分散权力。归根到底，克里姆林宫还是要依靠那个传统，即把作出决定的一切实权都掌握在中央手里。西方以为，贸易将以某种方式在基层群众中激起一种不可抗拒的压力，要求苏联生活中有更大的自由，这种想法相当天真地忽视了苏联——以及俄国——的历史。这是一种建立在西方经验之上的西方观念。过去，苏维埃制度也曾发生过几次重大改革，但都不是由于苏联公众的压力，而是由于最高领导作出的决定。是斯大林在1928年发动了工业的五年计划并下令实行农业集体化；是赫鲁晓夫在1956年揭发了斯大林，后来又重新改组了党的体制，并且在全国强制推行分区的经济管理；是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领导集团颁布了1965年那次半心半意的、注定要失败的经济改革。

缓和本身是这个领导集团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推行的一种政策，并且一直到现在都是由这个领导集团谨慎地控制着的。它所带来的那么一丁点儿变化，都被限制在不作根本改革的范围之内。他们现在的作法

是：移植西方的技术，使其适应自己，或是规定一些例外，作出一些零敲碎打的调整，而不是要进行彻底的改造。为了鼓励西方投资，现在也许会让西方的技术人员到西伯利亚去看一些天然气田和油田，但是，不许他们去看按他们的业务范围应该去看的其他许多工业基地。也许会请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去为《真理报》和《消息报》安装计算机操纵的排字设备，为卡马河汽车制造厂安装计算机操纵的控制系统，但是，多数专家都必须住在西欧，定期用飞机送他们去苏联工作，因为莫斯科的护照签证不许该公司有两个以上的人员同时住在苏联。他们首先考虑的是保安和对接触的控制，而不是便利或效率。结果是，到现在为止，看不到他们接受的任何新的胚芽——不论是通过限制核武器、文化交流或是扩大贸易，全都被笼统地称为缓和——已经在自己土壤上开花，并明显地开始改造苏维埃制度。这是因为，克里姆林宫已经证明它有本领把它的人民隔绝起来，不让他们受到西方自由思想的感染。

然而，起作用的还远不止是苏联的那种控制制度。因为缓和还要遭到俄国历史所积累起来的势力的对抗，遭到几百年来已成为俄国人固有的惯性和态度的对抗。西方那些被融合论迷住心窍的人，往往看不到今天俄国本质上仍然是俄国式的。我们知道俄国是一

个非常古老的国家，但是，尽管如此，在考虑它的现在和将来时，我们很容易忘记它的过去。当然，如果认为经过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那是愚蠢的，这个革命是本世纪翻天覆地的事件之一。王公贵族都被一扫而光，后来，在斯大林领导下，整个一块大陆上的经济被改造过来了。今天公众生活中的一套花言巧语毫不含糊是共产主义的。然而，在莫斯科待得愈久，我愈少感觉到这个国家是多么共产主义化，愈多想到它是多么俄国式的。共产党人并没有改变从沙皇继承下来的中央集权的独裁统治制度，而是把它强化了，使它更加深化和更加有效了。他们那些激动人心的、白手起家的建设项目也不完全是什么新方针，而是彼得大帝兴建圣彼得堡的那种残暴方式的现代变种。苏维埃统治最初二十年间，一些剧烈的社会大变动固然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是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他们同沙皇时代的贵族一样唯恐有损自己的权力和特权。说来也许荒谬，但俄国似乎正逐渐在很多方面回复到它过去的老路上去。

冷战遗留下来的影响以及战后时期莫斯科在经济上的孤立，使许多美国人有了一些错误的想法，例如，以为同西方进行贸易对俄国人是一种新考验。但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所走的道路和所推行的政策同他那些沙皇前辈是多么相似，几百年来俄国的独裁统治从

它同西方的偶尔接触中受到的影响是多么微小，看来这确实是惊人的。早在发现美洲以前，俄国贸易的格局便已经是用它的原料来换取西方的先进技术了。

五百年前，莫斯科大公伊凡大帝曾经雇用意大利建筑家和工程师建造两座克里姆林宫的大教堂、一座宫殿以及克里姆林宫城墙与城楼，这同今天克里姆林宫那些统治者雇用西方公司来建造卡车和小汽车工厂、金属铸造厂以及石油化工厂非常相似。另外一些意大利人曾经为大公办过皇家造币厂，经营过大炮的铸造，而希腊的专家则被聘请来教授艺术。继承他的那个沙皇伊凡雷帝，曾劝说一些英国人创办了第一个俄国印刷厂；在1552年和鞑靼作战时曾雇用德国工兵帮他围攻喀山；他还让荷兰人开设铁厂来支援军火工业。然而他却是整个俄国历史上最残酷的暴君之一。十八世纪初叶，彼得大帝甚至更大规模地搜罗西方技术(今天，有些俄国人戏称勃列日涅夫为现代的彼得)，他把几千个各行各业的外籍技师请到俄国来，还招募了几百个瑞典人和德国人到他的文职机关工作，因为他佩服他们的效率、纪律和诚实。他也是个铁腕统治人物。

今天西方人认为，苏联采取某些做法，是因为共产主义警察国家执迷于保密和排外，其实这些做法也是沙皇时代就已经发展起来的。那时，俄国人也曾经对

贸易加以思想上的控制，并且把外国商人同当地居民隔离开来。十五世纪俄国的东正教会，也同今天的共产党一样，对外国异教徒是严加戒备的。警惕而防范着的教会，怂恿大公的海关人员没收西方商人带来的书籍，这同今天的苏联海关人员从那些有失检点的西方旅行者手里拿走政治书刊、裸体画报或某些摇摆舞唱片是一样的。那时同现在一样，外侨被安排在一些隔离的居住区里，同俄国的人民群众很少接触。最主要的一个隔离区叫做“中国城”，位于克里姆林宫墙外，就是现在俄罗斯旅馆所在地，这是今天外国商人和西方代表团最常住的旅馆之一。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为了改善一下气氛以利于对美贸易，就让更多苏联犹太人移居国外，而他的这番努力在俄国历史上也可以找到先例。在1600年前后，沙皇鲍里斯·戈都诺夫蓄意哄骗德国的一些公国同他通商，就曾经释放过一批在诺夫哥罗德战役中俘虏的德国商人。

不仅在贸易的格局方面，而且在政治制度方面，苏联也继承了沙皇俄国的传统，这些传统今天已经构成实行变革的强大阻力。每逢共产党的节日举行盛大庆祝仪式时，领导人聚集在列宁陵墓上，蜂拥的人群列队通过红场，向他们表示忠诚，这就使人想起托尔斯泰笔下群众宗教仪仗队恭顺地通过红场向沙皇致敬的精彩描述。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群众高举的是党的政治局

成员们的画像；在沙皇统治下，群众高举的是大幅的宗教圣像。象普希金那样的诗人都遭到审查，陀思妥也夫斯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托尔斯泰的晚期作品要到西方去非法出版，这些都是今天苏联镇压自由思想作家们的先例。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叛乱刚开始，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便下手镇压，这同十九世纪沙皇粉碎匈牙利和波兰叛变的方法又是如出一辙。那时同现在一样，统治者得到了为朝廷效忠的贵族阶级的支持，而为了酬报他们的效劳，就赐予他们土地和其他特权，到了今天就变成苏联为权势人物服务而建立特种商店、医院、休养所以及别墅区的制度。那时也同现在一样，皇家芭蕾舞剧团由国家出钱供养，用它来在国内外树立一种有文化修养的风雅形象。

也许，比社会生活中这些经久不变的安排和仪式更为根本的，是历史对于俄国人性格和习俗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包括：中央集权制，对等级地位的迷信，老百姓的排外思想，与外界隔绝的知识分子的徒然的牢骚，俄国人对自己俄罗斯祖国的深厚感情，群众对最高领导人习以为常的服从，以及他们毫无异议地接受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天壤之别。在苏联愈住得久，就愈觉得这是俄国式的；因此就愈不相信它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每当我看到一点点变革的迹象时，俄国知识分子就会纠正我的妄想。我逐渐深信，俄国人不同

于西方人，他们并不认为俄国的独裁统治将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民主制度，因为他们深悉它的权力和它的持久性；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它那不放弃实质而又能适应的本领；他们发现在它所提供的稳定和秩序下过日子也挺舒适。他们觉得，西方自由主义的民主制度是一种可怕的混乱的骚动，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希望俄国有民主制度。即使那些向往民主的知识分子也会说，他们的社会还没有为实行民主制度所需要的相互礼让、政治上的容忍与和解以及自我克制做好准备。即使是这些人也对民主望而却步，或者说要经过好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发展成为这种制度。

西方人士之所以不能理解这样的感情，却轻易地假定俄国人“跟我们一样”，也许是因为俄国生活对外国旅游者没有提供明显的异国情调——身穿沙丽或和服的女人，庙宇里的菩萨，沙漠里的骆驼——来提醒他们这里是一种异国文化。它没有经历过形成西方特点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立宪自由主义时代。但是，这里有的，却是一种从拜占廷吸收了东正教精神的文化，一种经受过蒙古人的征服和统治、后来又在好几百年的沙皇绝对权力下发展起来的文化。在此期间，这种文化也曾对西方断断续续开放过几次，但每次开放之后，都再退缩回去，使整个一片大陆又与世隔绝。这种格局一再反复。俄国人几次对西方的侵袭，曾给本国

带来某些变化；但从来不曾持久地、从根本上冲淡俄罗斯国家强有力的独裁倾向。如果要说有什么影响的话，那也不过是用西方的一些发明去强化俄国的方法而已。彼得大帝可以被誉为使俄国西方化的最伟大人物。但是，他也是现代警察国家的奠基人，在不容异己方面，在血腥惩罚不听话的贵族方面，他都是残酷无情的。叶卡捷琳娜二世迷恋伏尔泰和法国百科全书派，她由此开始同西方搞缓和，但她最后却用加强控制的办法来消灭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对她朝廷的感染，从而结束了她所开始的这种缓和。总之，俄国经常从西方受到一些不稳固的影响，但是，这些影响一向都被俄国的统治者们成功地对付过去了。今天勃列日涅夫的手法可能稍有不同，但是他的战略却同那些老沙皇一模一样：从西方弄到最好的技术，而不必吸收产生这些技术必不可少的精神状态或生活方式。正象在他之前的那些沙皇一样，勃列日涅夫是冒了风险的。但是，迄今还没有明显的理由可以指望俄国生活中这种由来已久的格局会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

往往是一些有趣的小事情使人强烈地感觉到，今天的俄国是过去俄国的延续。在尼克松1972年第一次访问莫斯科后不久，我和安一起驱车去雅罗斯拉夫尔看看俄国夏季的农村景色。半路上，我们在一个苏

联汽车加油站停下来加油——这是我第一次坐苏联汽车在公路上加油，我对这里的一套例行手续发生了兴趣。首先，我得找一个我要用的油泵，估计一下我需要多少公升汽油，告诉办公室里的那个圆脸蛋儿的女孩子。然后，我先付一种特制的汽油票，她再在办公室里的控制台上给我拨上需要的公升数。最后，我才转回身去用油泵给自己加油。这一切都完全是要由自己动手的。

对我来说，这是一场多少有些好笑的情景：每个人用油泵为自己加油——一个送面包的，两个骑摩托车的，一些大型卡车的司机，还有几个俯身凑向莫斯科人牌或扎波罗什人牌苏联小轿车的人。那个汽车加油站上的景象非常混乱。人们从任何一个方向把车子开上前或是倒回来加油，在任何一个适合于他们的角度停下车来。这样挤进挤出，简直是在折磨人，我忽然想到，这倒是拍几张照片的好镜头。我刚刚拍了四、五张照片，一个脖子又短又粗的、穿件衬衫戴顶帽子的俄国人就挡在我面前，在我镜头前面挥动手臂，愤怒地对我咆哮着。

“把你的证件给我看看，”他要求。从他的胖脸、大肚子和肥大宽松的裤子来看，他是个典型的刚刚离开集体农庄的俄国工人。

我知道苏联并没有明文规定禁止拍摄汽车加油站

的照片，再说他看来只不过是一个过分热心的苏联公民(这样的人在苏联是很多的)，所以我想不去理睬他。“没啥关系，”我哄着他说，“对不起。”我向旁移过一步，避开他，想从另一个方向再拍几张。

他又一次挡在我面前，要我出示证件——一种标准的苏联式的威胁方法。

“你是什么人？”我问。

“把你的证件给我看看，”他又说一遍。这时他是有点恼火了，显然是因为我没有立即屈服。我们争了起来。我猜想，大概会有一群人来给他帮腔，但是其他开车的人都只顾加他们的汽油。他们盯着看，但是都不加入争论。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这位身体结实的朋友是加油站的经理。我向他解释说，我是个美国记者——这一点，他无疑早已从我们汽车的特殊号码的牌照上得知了——我刚刚写好关于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会谈的报道，带着妻子出来转转。

“你要往哪一条路走？”他怀疑地追问。“我要去叫警察。”

我说我们是朝雅罗斯拉夫尔方向去的，接着，为了想办法把他哄过来，就问他是不是在电视里看到了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是的，他都看到了。我问，他是不是赞成缓和呢？是的，当然啦。他希望我们两国人民之间有和平——但拍照还是禁止的。然后，我说，他既

然关心和平，那么一定读到过军备协定了。是的，他当然读过啦。我问他有没有注意到双方同意让对方的人造卫星飞过自己的领土上空，拍摄导弹的照片，以防止发生突然袭击的危险。他好象脑子里转不过来了。但是一、两分钟之后，我看他似乎领会了这个意思，知道苏联人造卫星正在天上拍摄美国火箭的照片，而美国人造卫星也正在天上拍摄苏联火箭的照片。

最后我说："好啦，既然我们的领导人能那么友好，同意让人造卫星拍摄导弹的照片，那么拍几张汽车加油站的照片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皱起了眉头，露出了农民的谨慎神情。"这是禁止的，"他发火了，他原先的愤怒又发作了。他气冲冲地对着我的照相机挥动着他的一个手指头。"这是禁止的。我去叫警察来追你。"他咆哮着去打电话给警察。我最后又拍了几个镜头，就把车子开走了。后来警察并没有来麻烦过我们，但是我仍旧埋怨，怪这位加油站经理不该一味监视一个漫游的帝国主义分子，认为这种共产主义警惕性太过分了。

安那时正在读亨利·特罗亚特写的托尔斯泰传，她想起托尔斯泰死后，他的遗体停放在一个外省的火车站时所发生的那段故事。一些俄国摄影师想拍下这位伟大人物遗体的照片，但是，火车站长不准在他的车站上拍摄任何照片。他对摄影抱有怀疑，也模糊地知

道有种种禁止摄影的规定。在没有得到圣彼得堡的特殊许可前，他坚决不许人在他的车站上拍摄任何照片。

安说，“所以你看，这并不新鲜。在沙皇统治下也是这样的。他们是同样的人嘛。”